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ORY

结构调整论

刘振华 著

绿色山西
信用山西
数字山西
节水山西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新世纪·新山西

NEW CENTURY·NEW SHANXI



责任编辑：林晓靖

封面设计：李　桐

ISBN 7-80169-457-0/F·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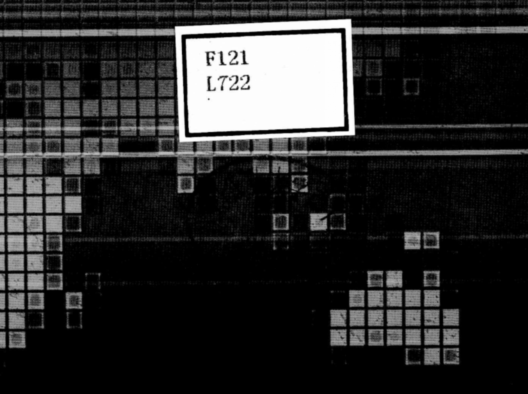
定价：36.00元



结构调整论

F121

刘振华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UCTURING THE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调整论/刘振华著．-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9
ISBN 7-80169-457-0
Ⅰ．结… Ⅱ．刘… Ⅲ．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中国 Ⅳ．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2895号

结构调整论

刘振华 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 青蓝大厦东办公区11层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64066019（发行部） (010)64011788（编辑部）
传真	(010)64065971
发行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版次	2003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0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字数	372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36.00元
书号	ISBN 7-80169-457-0/F·192

序

山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中国煤仓"和"中国古代博物馆"之誉。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在挑战与进步之间,产生了令世人瞩目的两个"山西现象":一是由一个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经济发展速度、城镇化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游的省份,逐步落伍到上世纪末全国排名倒数的省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开始出现重大转机,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开始重新焕发新的活力,2002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的位次大幅度前移。两个"山西现象",两种鲜明比照。这一切都可以从山西经济结构及其战略性调整中找到深层次的答案。

一

人类经济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转型的过程。在需求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结构每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升级,都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了从上世纪后期开始的世界性经济

结构的大调整,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全球性课题。这种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经济结构大调整,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必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也将由此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崭新时代。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间,内外部环境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使得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加剧,世界经济格局不断调整,国际分工重新定位;二是国内总供求关系出现根本性转变,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在这种变化背景之下,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成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因此上升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过多年奋斗,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山西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承载了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成本,为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也使山西形成、巩固和强化了国有经济比重大、战线长,支柱产业单一化、初级化、低效化的经济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日趋不合理,使山

西经济发展与其他省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相比，速度越来越慢，效益越来越差，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由一个改革开放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发展速度、城镇化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游的省份，变成上世纪末在全国排名倒数的省份，山西由此具有了鲜明的“中部省份、西部特征”，形成了国人瞩目的第一个“山西现象”。面对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潮流，作为一个资源型省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如何按照中共十六大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传统经济结构和传统能源工业基地的升级转型，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样令国人高度关注。

二

令人欣喜的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充分认识到经济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山西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矛盾；要振兴山西经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乃至实现兴晋富民的目标，根本的出路是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上世纪末开始，山西省委、省政府做出了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几年来，山西上上下下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培育后发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全省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GDP和财政总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摆脱连续两年倒数第一的局面，位次前移到全国第23位；其它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排位大幅度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新兴接续产业快速发展，比重显著提高；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显现。这一

切都说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山西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经济潜力被激活了。山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复苏",正在创造落后省份加速发展的新的"山西现象",引起了经济界人士的关注。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切入点,较好地兼顾了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企业结构以及提高城乡人民收入和改善环境等方面的关系,不仅成功地走出了结构调整的第一步,而且初步探索积累了一套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经验。这就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当把握"项目是基础、改制是前提、筹资是关键、创新是灵魂、企业是根本、环境是保证"这样六个关键环节。

必须清醒地看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及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新型经济结构还远远没有形成。实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奠定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产业基础和体制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西要坚定不移地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和主线,需要继续深入系统地探索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形成新思路,创造新经验。

刘振华同志担任山西省重要领导职务,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山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着切身的感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认真总结山西 20 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山西从上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几年来的基本经验,对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系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性、前瞻性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结构调整论》一书,就

是刘振华同志多年辛勤探索的结果。

刘振华同志的《结构调整论》，是一部难得的研究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专著。这部专著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第一，立意新颖、眼界宽广、前瞻性强。书稿以中共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对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问题，从国际国内形势、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兴晋富民目标的高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资料丰富、观点鲜明，许多成果富于创新性，能够给人以深刻启迪。第二，切合实际、讲求实效、实践性强。书稿充分吸收了近几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精神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山西实际，科学总结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经验，论据可靠，论点针对性强，合乎山西实际，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第三，精心布局、善于谋划、体系性强。对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从重要意义、总体目标、战略重点和推进机制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书稿不是一个个研究课题和研究报告的拼凑，而是通过精心布局谋划的一部结构完整、论证严谨、逻辑清晰的专著。书中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对新世纪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理论工作者的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当前，山西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今后五到十年将是山西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新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和在原有水平上“填平补齐”式的调整，而将会是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的、以科技进步为导向的

“升级转型式”调整，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的、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远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不是以计划为导向、以行政为主体的调整，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调整；不是经济结构的局部性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系统性的调整。

刘振华同志的《结构调整论》，对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虽然书中提出的个别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但其主要研究成果具备较强的实践性。根据刘振华同志书中的主要研究成果，谈点我个人对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体会：

1. 把建设生态化绿色山西摆在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突出位置，着力提高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期以来，山西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所形成的重型化、粗放型、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结构，严重破坏了山西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自然环境，大大降低了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山西成为全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为低下的省份之一。山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确立大生态观念，把建设绿色山西、提高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实施农业生态化、工业清洁化和综合整治生态环境（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等），着力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新山西。这既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目标和内容，又是山西顺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

2. 把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由增量调整转到存量调整上来，以增量调整推动存量调整，实现山西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基地升级转型。

山西大力发展特色信息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的战略,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考虑到传统能源产业是山西目前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关系到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传统的能源产业调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现实状况,山西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存量结构的调整上,以存量调整促进增量调整。可以考虑从煤炭能源产业的大重组入手,建立山西煤炭能源生产销售集团,并逐步带动山西材料、机电等传统产业的大重组,推动山西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基地升级转型。传统能源产业能否通过大重组,实现向新型能源基地的升级转型,应当是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是否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一个重要标志。鉴于产业重组升级转型必然涉及就业结构的大调整,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通过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传统能源产业大重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保障条件。

3. 加快建设大(同)运(城)高速公路经济带的步伐,推进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和特色城镇化进程。

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对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此,必须加快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步伐,着力实施以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为核心内容的"绿色工程"、"科技工程"和"人文工程",实施具有山西地方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工程",推进全省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快速发展,展示山西新形象、新面貌,体现山西新特点,实现山西新发展。

4. 全面启动和实施"信用山西"工程,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整体环境不优是制约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以建设信用山西为目标,启动“信用山西”工程,下大力气创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这包括:建设“诚信政府”,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推进政府法制建设、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督;提倡“市场诚信”,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市场效率;实施“行业诚信”,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督;实施“区域信用”,创建市县乡村信用品牌;营造“社会信用”,加强公民的信用教育,倡导和形成诚信守约、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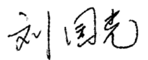
5. 建立健全政府决策智囊机构,着力实现政府决策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知识型、民主化的转变。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结构调整任务的艰巨复杂性和长期性,对政府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由过去的经验型决策模式转变到科学化、知识化、民主化的决策模式。按照中共十六大关于重大决策及决策实施要建立和健全专家咨询、论证、评估制度的精神,借鉴其他省市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应尽快组建由省内外有关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参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制订、重大决策的攻关论证、实施方案和进程的评价、重点工程项目方案的评审和成果鉴定等工作,为政府决策科学化服务,实现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

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中共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省3200多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山西一定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加快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实现从前一个“山西现象”向新的“山西现象”的实质性转换,走出一条资源型省份和传统老工业基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子,使山

西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革命传统的热土，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

谨以此序祝贺刘振华同志《结构调整论》一书出版发行，并以此送上对山西人民深深的祝福！



2003年8月8日

目　录

第二编 总体目标:“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和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

第三编　战略重点(上):传统产业改造

第四编 战略重点(中):发展新兴产业

第五编　战略重点(下):构建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

第六编　动力机制:全方位创新和建立复合型支撑体系

第一编

结构调整:全面建设小康山西的根本途径

经济结构,是指人类一定时期内生产方式的状况和比例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讲,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就业结构、出口商品结构等来表现,其中产业结构是核心;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经济结构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构成和比例关系,主要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分配结构来表现。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质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是该国家或地区经济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并受政治、历史、地理、分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山西是个资源大省,各种资源非常丰富,尤以煤、铁为最,被称为“煤铁之乡”。作为全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山西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进行了多年的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 由此形成了以重型化、初级化、国有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曾经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然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经济结构，在国家由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日益严重制约着山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面对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面对国内外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滚滚浪潮，面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在更广阔的领域、更大的范围、更深刻的程度、更大的规模进军国内市场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大对老工业基地改造力度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山西只有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适应全球产业升级大势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迫切要求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飞速崛起、全球经济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20年；是中国经济顺利实现腾飞、为国家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的20年，也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但是，在这20年里，山西经济在全国的位次逐步下滑，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必须认真总结和深刻反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为战略支柱的产业结构。这些传统产业的资产存量占到山西总资产存量的很大比重，它们为山西所生产和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税、就业人数等，都影响着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这些传统产业同时又都具有初级化、低效化、竞争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特征。从山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要求，首先必须把山西传统产业的重组、改造、升级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实现传统产业基地向新型产业基地的转型。

作为老工业基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任务极为艰巨，面临的困难很大，调整的壁垒很多。

进入新的世纪，山西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性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升

级的步伐清晰可闻。时不我待，形势逼人。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乘“十六”大东风，山西应脚踏实地、全面彻底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融入全球经济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走上强省富民的振兴之路。

一、全球大规模产业升级潮流对山西提出严峻的挑战

产业升级是人类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和技术进步密不可分的，人类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及其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都会引发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和升级。铁器的发明和应用，开创了人类的农耕文明，使农业由原始农业升级为耕作农业；工业革命的发生，则把人类带进了工业经济时代，大机器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曾经发生过多次具有非凡意义的重大技术创新。但是，还没有哪一次技术创新，包括工业革命在内，能够和起始于20世纪中叶，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仍在以如火如荼之势迅速扩展的信息技术革命相媲美。

如果说，此前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科技发明和进步都意味着人的肢体的延伸和人的体力劳动解放的话，那么，目前的信息技术革命则意味着人的大脑的延伸和人的脑力劳动的解放。它正在推动人类走向一个新的更为辉煌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人类正在迎来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经描述过的人类自由王国的第一缕曙光。正是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

伟大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浩浩荡荡、内容全新的大规模产业升级潮流。

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升级潮流相比,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具有着更多本质的不同:

1.知识经济迅速崛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它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这就是知识经济。按照经合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所谓知识经济就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在农业社会,第一要素是土地;在工业社会,第一要素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第一要素是蕴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知识信息及其在经济中的应用。

传统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知识经济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传统的工业经济主要依赖大量的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知识经济则主要依赖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传统的工业经济是建立在传统的工业技术基础之上的经济,而知识经济则建立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基础之上。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知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它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装备和更新。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经济发动机的燃料的话,那么,知识和信息就是知识经济发动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燃料。

知识经济兴起的历史尽管非常短暂,然而发展势头却异常迅猛。据有关资料,目前经合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崛起,突

出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有资料显示，在知识经济先行一步的美国，与信息直接和间接相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80%，美国 GDP 增幅的 1/3 以上来自知识、信息产业。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ISCO）提供的资料，美国网络经济 1998 年的总收入为 3014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能源（2230 亿美元）和邮电（2700 亿美元）的收入，成为仅次于汽车工业的第二大产业。根据 CISCO 发布的报告，1999 年美国网络经济总额达到 5070 亿美元，如果把美国的网络经济视为一个经济体，那么，它将是全球第 11 大经济体，位于西班牙之后，在韩国之前。根据一项最新资料的分析，2000 年美国网络产业的产值达到 8500 亿美元，超过汽车工业（7280 亿美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美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成就来源于巨额的技术研究与开发（R&D）投入。有资料显示，从 1993 年到 1999 年，美国 R&D 投入总额由 1654 亿美元上升到近 2500 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由 2.52% 上升到 2.79%。其投入额相当于其它六大工业国的总投入之和。巨额的投入奠定了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强大优势地位。1998 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到制成品总出口额的 33%，这个比例比日本高出 7 个百分点，比德国则高出 19 个百分点。为了巩固这种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美国又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计划，诸如“因特网Ⅱ”计划、1000 万亿次超级计算机计划、发展 10 项高电子技术、开发未来芯片、资助学校上网等。

美国知识经济的卓越表现及其带来的一片光明的经济前景，吸引了欧盟成员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目光，他们纷纷加大投入，推进本国经济向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

术化升级。欧盟制定了“知识欧洲”的宏伟计划,试图通过该计划实现其产业知识化、信息化的目标,并最终完成信息社会和知识欧洲的建立。日本则制定了“健康信息网络”计划,加速其产业升级;韩国制定了“加强国家竞争力的信息化战略”;新加坡则制定并着手实施一项名为“新加坡一号工程”(S－1工程)的知识化、信息化战略;马来西亚专门成立了全国电子商务委员会,用以制定协调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印度专门设立了信息技术部,并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和政策,以争取在2008年建成“超级信息大国”。其它国家也都不甘落后,纷纷推出各自的应对战略,由此汇成了一股全球性产业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的升级浪潮。

许多专家学者预测,未来5～10年内,高科技产业将有可能集中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两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是生物计算机的突破,一旦成功,信息产业将重新改写。人类基因图谱测序工作的完成,使生物工程技术产业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突破,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形成知识经济的第二波浪潮。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龙头产业,围绕这两大产业,全球将形成新一代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2.传统产业加速升级。

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是当前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的全球性扩散转移和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改造。

传统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扩散是全球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大量传统产

业包括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就大规模转移扩散。这种转移也使得美国能够专注于新兴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并最终确立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亚洲"四小龙"接受日本的传统产业扩散转移,实现了自身的结构升级。八、九十年代以后,高新技术产业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导致的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发达国家加速了传统产业扩散转移的步伐,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高新技术产业的硬件制造产业如计算机制造等都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达国家则专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及其产业化发展。

相比较而言,对传统产业进行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改造,则是当前传统产业升级的越来越重要的途径和方式。高新技术具有极强的广泛渗透性,事实上,世界各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并不是以高新技术本身的产业化为惟一方向,而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应用、改造并驾齐驱的,生产多层次的高新技术产品,形成以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相结合的战略产业群。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已经使得传统产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目前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利用计算机软件、网络、数据库等信息技术,与自动化生产设备融合,将产品设计、加工制造以及人力资源等融合在一起,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加工工艺和数据程序,可以使传统产业的产品质量提高 200～500%,生产率提高 40～70%,设备利用率提高 200～500%,生产周期缩短 30～60%,工程设计费减少 15～30%。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曾形象地说,现在的汽车工业已经不像是传统的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可以占到一辆高级车总成本的 70%,普通轿车的 1/3,这样的汽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技术产品"。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日本的汽车工业相对于美国还具

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然而,正是高新技术向汽车工业的渗透,到90年代美国汽车业已经重新夺回了对于日本的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加速传统产业改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大量运用高新技术武装本国的传统产业,从而使全球传统产业日益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

3.产业的生态化、绿色化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导趋势。

工业经济是建立在传统工业技术基础之上的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诸如原始森林消失、大气污染、地下水干涸、生态破坏等等,导致了人类综合生活环境质量的下降。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兴起了大规模的环保运动、绿色浪潮。知识经济的崛起、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而且直接推动了产业生态化、绿色化的升级潮流。

一是绿色消费成为全球市场消费的时尚。随着人们生态观念、环保意识的深入,绿色消费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市场消费的新时尚。据有关资料统计,77%的美国人表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94%的意大利人表示在选购商品时会考虑绿色因素。在欧美市场上40%的人更喜欢购买绿色商品,贴有绿色标志的商品在市场上更受青睐。据欧盟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德国消费者和67%的荷兰消费者在超级市场购物时,会考虑环保问题。日本曾经对家庭主妇进行有机栽培蔬菜消费意识的调查,结果表明,91.6%的消费者对有机栽培蔬菜感兴趣,96.8%的消费者愿意购买有机栽培蔬菜,36.8%的消费者表示即使价格较高也愿意购买。总之,绿色消费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消费时尚。

二是绿色产业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增长点。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拉动了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的迅速增长。有资料表明，1985年，在全球新产品总数中，绿色产品的比重只有0.5%。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增长了3.18倍。根据美国国际环保商业公司的统计，1990年，新产品中约有5%的绿色产品，到1997年这个比重已经攀升到80%。另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绿色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3560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6000亿美元。总之，绿色产业，诸如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绿色汽车业、家电业、保健品业、纺织品业等等，正在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的焦点。

三是绿色技术、绿色投资成为传统产业向生态化、绿色化升级的重要动力。一方面，为了尽快占领世界绿色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本国传统产业的生态化、绿色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绿色投资，开发绿色技术，争夺绿色技术的制高点，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产业生态化、绿色化的进程。自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生态银行之后，发达国家的绿色投资就一直是直线上升的态势，美国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3%，并在商务部下设立绿色产品出口办公室，专门负责绿色产品的投资和促销。日本政府提出了“以21世纪新地球为主题的绿色地球百年行动计划”，积极扶持绿色产业。欧盟经济决策部门还在税收、贷款、出口政策上对绿色产品实行倾斜。1997年为实施零污染计划就支出经费8.85亿美元。瑞士每年新增投资的70%都用于发展各种可生物降解或易于再循环使用的新产品。在欧洲还出现了“绿色基金会”、“绿色股份公司”。绿色投资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绿色技术的开发，诸如美国的脱硫、脱氨技术，日本的烟尘、垃

圾处理技术,德国的污染处理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美、日、欧三极更多地在传统产业中应用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使其变成一个高科技的绿色化、生态化产业。

以上是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升级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工业高级化和信息化正在不断加速,产业发展的生态化也日益受到重视。可以说,我国东部地区目前正在加紧融入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升级的历史潮流,山西则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是准备阶段。山西落后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以传统技术和落后技术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势必面临全球性产业升级大潮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二、全球市场竞争要求区域经济体系大幅度提高竞争力

产业结构的大规模升级必然引起市场竞争的升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崛起以及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市场竞争也愈演愈烈,日益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资本等为主导要素的竞争演变为以知识、智力等要素为主导的综合竞争能力的竞争。充分把握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的走势,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新一轮的全球市场竞争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知识资本成为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要素。

在工业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决定市场竞争的第一要素,谁拥有

了强大的资本实力，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第一要素则是知识，是科技创新，谁拥有了强大的知识资本，谁拥有了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当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科技进步的加速，知识资本、科技创新能力正在取代工业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经济。据有关资料，人类的科技知识，19 世纪是每 50 年增加 1 倍，20 世纪中叶是每 10 年增加 1 倍，90 年代是每 3 至 5 年增加 1 倍。有人估计，截止 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社会掌握的科学知识，90％是二战后的 30 余年间获得的。而根据许多未来学家的预测，今天人类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将只不过是 2050 年的 1％。我们曾经把 20 世纪比喻为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真正的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把 21 世纪的知识大爆炸比喻为核爆炸的话，那 20 世纪的所谓知识大爆炸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颗小小的手榴弹。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石油置换为知识，从有限的自然能源置换为无限的智力能源，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经济竞争的加剧。剧烈的市场竞争突出表现为科技知识、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技术更新几乎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在 19 世纪，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共用了 65 年的时间，真空管用了 31 年。到 20 世纪，这种时间间隔已经大大缩短，雷达从发明到应用只用了 15 年的时间，电视用了 12 年，从发现核裂变反应到制成第一个核反应堆仅用了 4 年，集成电路从无到有用了 2 年，激光只用了 1 年。还在几年之前，美国通用公司新型车从开发到推向市场还需要 45 个月，现在则只需 15 个月；其产品开发周期 1994 年还需 42 个月，1998

年已经缩减为24个月,现在只有18个月。世界技术转移的速度也明显加快。据研究,30年来世界技术转移的周期曲线显示,第一产业硬技术转移周期从平均10年缩短为4年,第二产业从5年降低为2年,第三产业的硬技术和软技术从平均2年缩短为0.5年,而信息技术从过去的平均1年压缩为2个月。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拥有了更强大的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能力,谁就赢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为此,各发达国家不仅纷纷加大本国研究开发的投入,而且把触角伸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发掘知识、智力资源。1994年加拿大的北方电信公司在北京投资成立了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1995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成立IBM(中国)研究中心;微软公司也投入巨资在中国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

2.人力资源成为全球市场竞争的焦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竞争、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掌握了高新技术知识的人才的竞争。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人才尤其是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丰富经验;既具有顽强奋斗的精神,又具有出色的外语能力以及突出的责任心、创新意识等高素质的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各大公司的首要争夺目标。大力培养人才,并在全球范围内挖掘人才已经成为各发达国家、各大公司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突出表现在:一是教育投资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二是全球性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例,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教育投资从3530亿美元增长到635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教育投资占到GDP的7%以上。近年,已有50所大学设立了创造力研究机构,涌现出了几十家创造力开发咨询公司。美国企业每年为职工

在职教育提供的资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正是持续不断的巨额教育投入，使美国成为全球人才大国并由此占据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的位子。美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只有5%，却拥有世界50%的研究生、35%的大学生和25%的科技人员。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如此雄厚的人才资源，美国是否还能创造出“新经济”的奇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创造美国“新经济”奇迹的，并非全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多年来，美国几乎从未放弃过任何引进、抢夺全世界人才的机会。

有资料表明，当今美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达491万人，大约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1901～1936年，美国有13人获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人数126人的10.3%；1943～1997年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人数320人的53%；1998～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人数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就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人数11人的72.7%。美国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移居美国的科学家，2000年的8位获奖者中则有半数是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核武器和核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问世、应用和一代代产品的推陈出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和航天技术的大发展等等，都是在移居美国的科学家的参与甚至主导下完成的。如果说美国的“新经济”还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引进世界人才、争夺各国人才、利用全球人才，恐怕就是最大的公开的秘密。

当前，为了在人才竞争战略中缩短与美国的差距，欧盟成员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雄心勃勃地予以实施，从而形成了美、日、欧三极竞争人才资源的格局。美国继续推行其“知识外交”，德国钟情于完善和发展其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

法国实施政府与企业拨出专款用于继续教育的庞大计划,日本则通过立法规定继续教育的费用来源和比例。许多发展中国家则着手进行教育模式的改革,抛弃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发展创造教育。以开发人类创造潜能为使命的创造教育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总之,人才竞争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可以说,这既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

3.企业并购内涵发生着嬗变。

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价格战、企业兼并是跨国公司两种基本的竞争形式。但是,现在价格战在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份量已经大为下降,日益让位于产品的升级换代、知识含量的增加、服务质量的提高、产品性能的改进、个性化的设计等等非价格竞争手段。而兼并、收购、联合等竞争手段则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的企业并购浪潮,尤其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并购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在金融、电信、计算机、航空、医药、媒体、军工、电力、铁路、洗涤用品、汽车及零配件、造船、化工、公用事业等诸多行业,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并购。1997 年全球兼并交易额达到创记录的 1.4 万亿美元,1998 年达到 2.5 万亿美元,1999 年再创新记录,兼并交易额高达 3.4 万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跨国公司的并购也正在升级。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并购加速其战略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全球产业升级和竞争升级的需要。

和以往那种以大吃小、以强并弱的企业兼并不同,新一轮跨国并购更多的是强强联合,合作共赢,比如,1995 年初,英国的葛兰

素医药公司成功地兼并英国另一大医药公司韦尔康姆公司，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医药公司；1996年底，波音公司以133亿美元并购了麦道公司，从而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2%，远远超过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新一轮并购中甚至出现了以小吃大、以弱并强的企业兼并，比如1997年4月，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就购并了比自己更强大的德国蒂森钢铁公司，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在美国，诞生只有十几年的传媒公司美国在线则成功地并购了老牌传媒巨头——时代华纳。跨国兼并风起云涌，则是新一轮兼并浪潮的另一大特色。据统计，1997年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达3326亿昧元，占到当年全球企业兼并额的近25%。美国的许多大企业在欧洲大量收购，而欧洲对于收购美国公司也毫不手软。进入1999年后，跨国购并更加势头迅猛，先后出现了美国福特公司购并瑞典沃尔沃公司轿车部、美国英美烟草公司购并荷兰乐福门公司等巨型跨国并购案。

但是，这些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形式的不同。新一轮全球性企业兼并与过去的企业兼并，本质的差别乃在于兼并动机的不同。以往的企业兼并甚至包括80年代的企业兼并，其兼并动机大多都是短期获利的增长与市场份额的扩大。而90年代以后的企业兼并，其目标动机则直接指向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比如，IBM公司兼并莲花软件公司，就是看中了后者在软件开发领域所具有的雄厚实力；法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公司——阿尔卡特公司兼并美国DSC通信设备公司，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推动同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阿尔卡特公司曾试图与摩托罗拉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但未能成功。DSC公司是摩托罗拉的一个主要客户，兼并DSC公司后，阿尔卡特公司便可以顺利地建立与摩托罗拉的经营联系。美国福特公司购并瑞典沃尔沃公司案的实质

则是沃尔沃公司主动向福特出售其轿车业务,以便集中精力发展其核心业务——卡车和巴士业务。所以说,获"力",即获得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形成竞争能力,而非获"利",是新一轮企业并购的直接目标所在。

从上述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的一些基本特点中不难看出,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演变为综合竞争能力的较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把产业竞争能力的培育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提高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否则,经济结构调整就难以摆脱"落后—调整—再落后—再调整"的怪圈。

三、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必须全力推进结构调整

世界范围的大规模产业升级潮流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在美国知识经济一枝独秀、综合竞争能力日益强大的同时,欧美其它发达国家也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加速向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的冲刺,与美国展开了综合竞争能力的较量。发展中国家也利用一切条件加快其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把产业竞争能力的培育、提高,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东部地区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向工业高级化、信息化发起冲击,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山西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已经"初见成效",但从长远目标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已经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成员。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国际化,意味着山西将不得不直接面对全球性市场竞争的挑战。

然而，山西目前的经济结构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及国内市场的竞争与挑战。

山西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初级化。

从山西三次产业的构成情况来看，要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0年为例，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分别为10.9%、50.4%和38.7%。农业所占份额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服务业高出全国水平5.4%。这样的结构状况，即使与东部一些地区相比也是较好的。但是，山西经济的效益情况却明显较差，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连续两年列全国倒数第一。问题就在于各产业内部结构初级化。

农业尽管比重较低，但主要还是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的结构，畜牧业、养殖业、林果业等经济型农业所占比重较低，近几年尽管有所调整，但2000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仍然高达68.2∶31.8。

工业比例尽管较高，但山西工业基本上是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重型化结构，煤炭、炼焦、化工、黑色冶炼和电力这五大行业，占据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产总值、实现利税的七成以上，而效益较好的新兴产业如电子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却严重不足。

山西的服务业也基本上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真正代表现代化水平、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的信息服务、知识咨询、中介服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仍然十分落后。山西产业结构的整体状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好的不多，多的不好。因而造成山西尽管三次产业结构程度较高，但结构功能却严重低下。

2.技术构成低级化。

山西产业的技术构成基本上是以传统落后的技术为主体,甚至还有相当部分属于淘汰技术,整体上三次产业都缺乏高新技术的武装。以工业为例,目前,山西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大体上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5%的机器设备需要淘汰,40%的机械设备超期服役。根据几年前我省10个工业厅局对所属企业进行的调查,受调查企业设备达到一般国际水平的只有8%,属于国内落后水平的有15%,设备新度系数只有0.7,全省工业设备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至少落后30年。全省大中型企业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占70%以上,属于七、八十年代的不足30%。正是由于技术构成层次低,山西经济发展多年来一直依赖投资的增长和能源、资源的粗放式利用,近十几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达5个百分点。

3.所有制结构单一化。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20多年的历史表明,越是经济发展速度快、发展程度高的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就越活跃。有人甚至说:中国的东西差距主要是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如今,在我国GDP总量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达到25%左右,在东部许多地区,如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地方经济的将近一半。然而,山西的所有制结构仍然是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结构。有资料表明,1998年,我国非国有工业的产出比重已经达到77.1%,而山西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仍高达69%,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65%,个体私营经济占GDP总

量的比例只有9%，这个比例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低大约15个百分点以上。

4.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化、小型化。

当前的全球市场竞争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市场竞争，要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企业的规模化，尤其是身处传统产业的企业的规模化就成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山西的产业组织结构却表现出强烈的分散化、小型化特征。除了象南风化工这样的寥若辰星的几家既具有一定规模、又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还鲜有几家规模化的企业。以煤焦工业为例，山西煤炭外调量占全国各省外调总量的70%，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山西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煤炭市场的订价权，左右全国市场，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煤炭产业组织结构的分散化、小型化在作怪，尽管总量规模庞大，但平均生产规模却严重不足，与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的趋势完全相悖。

5.产品结构低档化。

区域经济参与市场竞争，最直接地表现为产品的竞争，全球性产业升级的潮流也直接体现为产品知识含量、科技含量的提高。而山西的产品结构仍然基本上是以低档化产品为主体的结构。具体表现为“三少三低”。即：名牌产品少、拳头产品少、高精尖产品少，产品深加工度低、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低。“傻”、“大”、“黑”、“粗”就是对山西产品形象的最好概括。产品结构的低档化带来的一个重大恶果就是经济的低效化和资源价值的流失。根据不完全测算，近20年来，山西能源工业直接、间接的价值转移、流失高达

1200 亿元之巨。

6.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近些年来，尽管山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逐年加快，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34 户优势企业全部进行了公司制改造，80% 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制。但是，字面的统计数据几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然，不能否认像南风化工、运城制版集团等等一些企业，已经走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但是，许多企业甚至是大部分企业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仍然是“新瓶装旧酒”。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管理失范仍然是制约山西企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以上是山西经济结构在世纪之交的基本状况。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概括这种状况，那就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在全球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高新技术化的潮流面前，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能力，就意味着缺乏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因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是山西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的根本出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兴晋富民，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在新世纪头20年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求山西经济建设走上与社会、自然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牺牲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条件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兴晋富民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它既无助于山西在当前摆脱贫困落后的现实状况，更无助于山西在将来缩小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赶超。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乃是山西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兴晋富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战略选择。

一、满足人民现实生活需求必须加快改造低效益的产业体系

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生产，任何社会也都不能没有消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的持续增长，意味着人类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而消费的增长，是以经济收入的增长为条件的。如果没有收入的增长，那么消费的增长，即人们生活

需求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只能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获得了极大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处在贫困状态,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然而,到今天,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人口不仅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走向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而且,正在加速向富裕型小康生活目标迈进,不少地区、不少人口已经提前实现了富裕型小康的生活。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给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全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取得了根本性的变化。有资料表明,1978年,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101.61元,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905.6元,增长了17倍多;1978年,山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00多元,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4724元,增长了14倍多。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山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改革开放之前,填饱肚子还是山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一个主要生活目标;在今天,这个目标则日益指向吃、穿、住、行、用的全面升级。富裕型小康生活日益成为山西城乡居民的普遍生活追求。

但是,和全国相比,尤其是和东部地区相比,山西城乡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发达省市的水平。在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同时,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位曾不断后移。

有资料表明,1978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只有42元,在全国排第28位,然而,到2000年,这个差距已经拉大到1556元,在全国排倒数第一位;1978年,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只有32元,在全国排第22位,到2000年,尽管排位前移了两位,但收入的绝对差已经拉大到347元;1978年,山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63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17元,然而,到199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8346元,山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却只有6065元,相差达2281元。山西整体收入水平远远地落在了全国的后面。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水平的增长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绝不能说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绝不能说山西的经济没有发展、社会没有进步。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加速形成的情况下,山西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至少说明山西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比较缓慢。有资料表明,山西城乡居民除汽车、洗衣机、摩托车拥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如电冰箱、摄像机、照相机等15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位次也靠后。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山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排序为第26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排序第29位。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收入水平低。

要提高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首先必须找出其收入水平低下、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这个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比如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政府倾向和企业倾向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1998年为例,在当年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企

业、个人的比例,全国为17.6:14.63:68.1;山西则为21.5:18.61:60.64。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山西比全国高3.9%,企业所占比重比全国高3.8%,而个人所占比重则比全国低7.7%。1999年,山西以初次分配收入为主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109.2亿元,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2%,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第9位,高出人均GDP排序11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63%,在全国各省市区中高居第4位,高出人均GDP排序16位。而人均GDP排序位于山西之后一、两位的安徽省,其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排全国第17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42%,在全国排第27位。人均GDP排序高于山西一位的重庆市,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2%,在全国排第24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0%,排在第16位。

所以,山西城乡居民的低收入水平是和对国家的高贡献相联系的,也是和他们对政府、企业的高贡献相联系的。这种积累与分配关系的失调,是山西今后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不过,从深层次的角度分析,山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产业结构体系的低效。

山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是以低技术含量、低加工度、初级化产品等为主要特征的。这样的产业体系必然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体系。如果要对山西的产业体系进行准确定性,可以说是一种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输出型和加工品、消费品等产品输入型叠加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产业体系,是一种价值(效益)多重流失型的产业体系。一方面,由于输出的产品绝大多数属于低技术含量、低加工度、低附加价值的产品,甚至一大部分产品是以原始状态输出,其价格必然偏低,从而导致第一重价值(效益)流失,可以称之

为输出型或收入型价值(效益)流失；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能力的绝大部分集中于原材料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能力不足，尤其是深加工、精加工能力和终端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每年不得不从省外输入社会所需的大部分加工品、消费品，其价格必然偏高，这样又导致第二重价值流失，可以称之为输入型或支出型价值流失。

以2000年为例，当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9.1亿元，其中，外省输入货物就占到约65%。也就是说，当年全省用于购买外省商品的花费高达408.9亿元，而用于购买本省商品的花费只有220.2亿元。如果按利润水平占价格的10%计，那么，从山西流向省外的利润就是40多亿元，还有相应的税收、就业机会、工资收入等的流失。这就是典型的输入型或支出型价值流失。

山西输出型价值流失的典型产业是煤炭、电力。有专家估计，并有相关资料佐证，煤炭及电力产品价格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束缚，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仅此两项，山西每年的价值流失就达50亿元之巨。另外，山西还是全国重要的原材料产业供应基地，原材料产品价格同样受到计划体制的严厉束缚，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由此造成的价值流失每年有多少？数字惊人！

山西农业名优土特农副产品多达6大系列580多个品种，且品质上乘，但山西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能力却严重不足，自产食品满足率不足40%，60%以上的食品要从外省调入，每年花费约30亿元。

山西低效的产业结构体系导致的价值流失，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价值的流失，或者说主要并不是经济价值的流失，而是生态价值、环境价值的流失。有专家估计，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的估计每年也有49亿元(《山西日报》2002年1月21日C2版)。

山西之短在于水,水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尤为珍贵的资源。然而,根据一项《山西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破坏影响调查研究》的报告,仅仅煤炭开采对山西水资源的浪费破坏从而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就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根据该报告,20年来,山西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为:采煤漏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损失3.23亿元;采煤漏水使水浇地变为旱地,损失3.46亿元;矿井水排放造成经济损失340.5亿元;水利工程被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为0.69亿元。合计为347.88亿元,占全省20年GDP总和的2.8%。

更为严重的是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改变了地下水自然流场及补、迳、排条件,打破了地下水原有的自然平衡,改变了降水、地表水与地下水"三水"的转化关系,并由此造成了地陷、地裂、滑坡、崩塌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土地质量下降、植被破坏等严重后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说,山西的产业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价值(效益)流失型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产业体系必然是低效益的产业体系。山西国有控股企业与全国国有控股企业效益情况的比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仍以2000年为例,全国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6.77%,浙江省这一指标高达7.61%,而山西则只有4.96%;全国国有控股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2.89%,浙江省高达5.25%,山东省为3.24%,河北省为3.20%,而山西只有1.56%;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每人每年35740元,浙江省高达50394元,山东省高达37968元,山西则只有23121元,不及浙江的一半。

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以产业产出的增长和效益的增加为条件的。低效益的产业体系必须导致收入水平的低下。所以说,要提

高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满足山西人民群众现实生活需求，就必须加快改造现有的低效益的产业体系。

二、推进可持续发展
必须改变高消耗重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今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强大历史潮流。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在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全球经济面貌已经为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虽极言之而不为过。事实上，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领域里兴起的经济生态化、绿色化浪潮，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持续深入的结果。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不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的内在要求，而且，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各国的深入。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早提出于 1987 年第 42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它的基本含义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环境的保护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可持续发展”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它所提出的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可持续发展战略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凝聚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结晶的《21 世纪议程》，为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中国政府在此次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作出了履行《21 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并

于1994年3月率先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方案、政策措施等,表明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明确态度和坚强决心。

可持续发展是以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和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特征的生态发展以及以公平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的三位一体。就经济的发展而言,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经济增长,但要求达到具有可持续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仅注重数量上的经济增长,更注重质量上的经济增长,要求改变传统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文明消费,节约资源,减少每一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就社会的发展而言,它要求人类社会能广泛分享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把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增强社会保护和建设地球生态环境的能力。就环境的发展而言,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地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并保障资源的可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对工业化以来的发展历史深刻反省的结果,是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重新认知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类综合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为代价才换来的。毫无疑问,山西如果不想成为一块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地方,山西如果不想被全球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历史潮流所抛弃,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以往山西经济发展的模式恰恰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严重冲突的模式。长期以来,在众所周知的以煤炭能源基地建设为核心的经济发展

战略的主导下，在低级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山西经济发展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以牺牲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条件为代价，超强度、低水平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在“晋煤暖天下”、“晋电亮天下”，以初级化粗加工产品供应全国，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山西的经济发展却不可避免地陷入难以为继的泥淖。

高消耗、重污染的模式以及低级技术条件下的资源超负荷开采和粗放利用，日益加速着全省矿产资源的消耗、枯竭。许多具有多重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大多只是进行了单一的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20～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则低达20～30个百分点。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省2661亿吨探明煤炭能源资源储量中，已动用42.4%，大同侏罗纪优质动力煤，其开采年限仅能维持10～15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开发、加工、运输、转换、利用过程中，产生大量废弃物，环境污染严重，外部不经济状况日益明显。

这种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严重破坏了山西的土地资源。到2000年，全省已形成地下采空区1300余平方公里，造成地面塌陷520平方公里，据估计，全省每年还将新增塌陷区面积约25平方公里。电力建材工业累计破坏土地150万亩，冶炼和其他工业项目损坏土地50万亩。在所损坏土地中，耕地占到60%以上。使山西人口规模与国土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严重破坏、浪费、污染了对山西而言几乎和生命一样珍贵的水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采煤漏水达30多亿立方米，每年矿坑排水总量达4亿多立方米，造成了全省水资源总量大幅减少，山西成为全国严重缺水的省份之一。全省水资源总量为142亿立方

米,仅高于宁夏,为全国倒数第二,人均466立方米,亩均143立方米,分别只有全国平均量的17.3%和8%。山西每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达2000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5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全省24条主要河流已有85%的河段受到污染,具有饮用和灌溉功能的河段不足15%。全省由于工业排污而受污染的农田面积700多万亩,许多过去的水浇地沦为旱田,土地生产能力严重退化,粮食严重减产,人畜吃水困难,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还使得山西水土资源条件和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山西本就十分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据测算,全省森林覆盖率仅11.72%,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加上灌木林,林木覆盖率也只有20.1%,人均森林面积仅0.09公顷。到2000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约10.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9%。其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6.76万平方公里,海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4.04万平方公里。全省多年平均输沙量4.56亿吨,平均输沙数3000吨/平方公里,最严重的地区高达20000吨/平方公里以上。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泥沙大量下泄,使31.2亿立方米的大中型水库淤积10.3亿立方米,并引发了多种自然灾害,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巨大损失。

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更使得山西的空气环境污染发展到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根据有关统计,山西的烟尘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1%,每平方公里负荷比全国平均值高出6.5倍;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6.4%,每平方公里负比全国平均值高出3.9倍。受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山西新生儿出生缺陷率达到189.86名/万名,高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平均值的

1.9倍。

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重复一段根本不必重复的弯路,被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早已经证明了的而根本无需亲自求证的道理,不幸又被山西再次证明:罔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受能力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其结果是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然不会是高质量的发展,也不会是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社会、生态被不断"边缘化",就是一个无可辨驳的证明。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山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国内排序为第25位,环境状况排序为第29位。每一个有点社会道德责任感和生态忧患意识的山西人都会为此而感到痛心。

值得强调的是,在铁的事实面前,山西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没有幡然醒悟。照此以往,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山西就将真正成为一片不毛之地,真正成为一块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恶土。

因此,山西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高消耗、重污染的产业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三、争做经济强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经济结构全面升级

兴晋富民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目标。这一目标的长远含义就是要实现山西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使山西广大城乡居民过上像发达国家居民一样富裕的生活。这一目标的中期含义则是加速山西社会经济赶超发达地区的步伐,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强省,使

山西广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全国先进地区的水平。然而,就其现实意义而论,兴晋富民的含义主要还在于尽快使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追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各省市区社会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朝着富裕型小康的生活目标加速前进。与之相比,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明显落在了全国的后边,尤其是远远落在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后边。山西的有些地方仍然为贫困问题所困扰。

有资料表明,山西城镇居民的贫困面在全国来讲都是比较大的。以2000年为例,当年底,山西城镇居民家庭户贫困率高达12.6%,这一水平比东部地区高出10.2个百分点,即使与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高的西部地区相比,也高出3.3个百分点;山西城镇居民的人口贫困率更是高达14.4%,比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12.4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还高出3.7个百分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山西城镇居民家庭贫困线的标准仅为每人每月100～120元,属于全国城镇居民贫困线标准最低的省份之一。

1999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上的户数比例为87%,1000元以下的户数比例为13%;而山西相应户数的比例则分别为73.9%和26.1%,1000元以上的户数比例比全国水平低13个百分点,而1000元以下的户数比例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还多。山西农村的贫困面和贫困程度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非原本就比全国水平低。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明清之际,山西曾经是全国最为富庶

的省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曾经是全国有名的“模范省”,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建国之初,除了东北这样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以及像上海这样的少数几个城市地区,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能够超过山西的在全国都屈指可数;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山西的经济在全国也稳居中上游水平。以1978年为例,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88亿元)占全国的比例为2.45%,排在全国第15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3元)在全国28个省市区(不含西藏)中,排在第10位。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丝毫也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所以说,山西的落后绝不是什么先天的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横向比较,山西不仅经济发展落后了,社会发展落后了,连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也都落后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与迅速发展的东部地区相比,是山西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全面“边缘化”的20多年。

山西要实现兴晋富民的目标,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首先必须找出之所以落后的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山西的落后呢?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诸如地理环境封闭、基础设施滞后、改革开放迟缓、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失误等等。但是,经济结构低级化,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经济这个基础绝不只是一个空泛的理论,而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产业及产业间的相互关系为支撑的。正如没有经济的强盛就没有社会的繁荣一样,没有一个个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相对其他地区较为高级化的产业结构,也不会有强大的经济。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能在全国一直居于前列水平,就是以晋商

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发达的金融商业产业为依托的。晋商的商业经营网络几乎覆盖了半个地球,其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城乡居民生活的一切所需,使得晋商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商帮。山西票号的实力可以与美、英等国的大银行一较高下,到清代后期,晋商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命脉。正是依托强大的商业和金融业,才奠定了当时山西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社会地位。山西现有的产业结构相对于现时代比较而言,就是一种低级化的产业结构,缺乏市场竞争力是山西产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山西这种低级化的产业结构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影响面也是非常之广的。主要是:一方面,由于产业体系是以煤炭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为主体,且技术结构低层化,致使产品结构呈低档化状态,加工深度、精度严重不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的超负荷的、单一的开发利用和过度消耗,由此造成了产业体系的低效化,造成了资源、环境价值(效益)的多重流失,又进而导致经济体系自我积累能力的贫乏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滞缓;另一方面,由于各产业之间缺乏应有的紧密联系和协作,产业依存度差、关联度小、分工协作不够,致使产业结构呈分散化、低度化状态,综合效益形成能力,能源、资源优势的产业转化能力以及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等等,都严重不足。产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与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产业技术结构越低级、产品结构越低档,各产业之间结构关系也越松散,越难以形成应有的分工协作格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多重“边缘化”的陷阱,陷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太效应”漩涡而难以自拔。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所谓兴省,其本源意义就是建设经济强省;所谓富民,其核心内容就是提高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和

生活水平。富民是强省的目的，尤其是在全国各省市区人民群众都在加速向富裕型小康生活冲刺的情况下，离开了提高山西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个核心目标，强省就既毫无意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强省则是富民的保障和基础，离开了强省，富民就只能流为空洞的自我安慰。要建设经济强省，就必须首先消除掉导致山西社会经济日益“边缘化”的根源——产业结构低级化，就必须加速推进山西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从低档化的产品结构，转向特色化、品牌化、高效化的，深加工、精加工、高档化的产品结构；从低级化的技术结构，转向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武装的高新技术化的技术结构；从分散化、小型化的产业组织结构，转向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的产业组织结构；从松散化的产业结构，转向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的高度紧密联系的产业结构等等。一句话，就是必须加速推进山西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四、改革创新所有制分配结构
是实现兴晋富民的重要途径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调整改革，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经济结构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活动影响极大。当前，随着山西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经过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正在进入全面转轨、整体推进、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已经深刻触及到一系列需要认真解决的生产关系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其中，所有制和分配结构调整改革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进行基本经济体制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可以说，山西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调整创新，是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兴晋富民宏伟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

1．所有制结构的状况及其主要弊端。

所有制结构既是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又表现为基础性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否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对于国家及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全国其它省市一样，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下降，非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初步形成了新的所有制格局，对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山西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打破过去“单一化”的所有制格局只是初步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格局还远未形成，突出表现在国有经济比重仍然过大，非国有经济比重过小，混合经济发展缓慢，民营经济不发达。这种所有制结构，成为山西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体制障碍，极大地阻碍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阻碍着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1)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比重过大，整体效益下降，一大批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亏损严重，成为影响山西全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突出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

第一，国有经济分布太广，战线过长。2000 年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山西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791 户，其中，中央国有及控股企业 107 户，地方国有及控股企业 1684 户。这些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布在 39 个大行业、181 个中行业、464 个小行业中，分别占到国家标准行业分类总数(即行业大类 40 个、行业中类 190 个、行

业小类 564 个)的 97.5%、95.3%和 82.3%,真可谓“层层渗透,面面俱到”。然而,在山西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真正符合生产力发展实际水平和中央明确提出的需要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即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为数不多。除军工、铁路、邮电、通讯等不多的中央企业外,大量的地方国有企业中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少之又少,不足企业总数的 10%。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山西多数国有企业都属于通过资产重组、并购、租赁、拍卖、破产等方式逐步退出之列。

第二,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改制和退出步履艰难。尽管山西近年来国有经济在整个工业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但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沿海发达省份,甚至比周边的河南、河北等省份也高。据统计,2000 年山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数的 5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7%,分别高于河北、河南、山东、浙江 13.6、22.7、27.9、和 40.6 个百分点;2000 年山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到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6%,分别高于河北、河南、山东、浙江 14.8、14.6、30.2 和 46.1 个百分点;2000 年山西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数比上年减少 62 户,退出率为 3.3%,而同期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比上年减少 7294 户,退出率为 11.9%。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几年在全国国有经济逐步退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逐年降低的大趋势下,山西国有经济比重基本未降,甚至有的指标反而提高了。如 2000 年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到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8.9%,比 1999 年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山西国有经济的改制步伐是严重滞后的。

第三,国有经济整体效益差,一大批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由于经营机制僵化,改制步伐缓慢,山西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大大低于沿海发达省份,也低于周边河北、河南等省份。2000 年,山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 4.9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河北、河南、山东、浙江 1.4、0.7、2.7 和 2.7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效益指标也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沿海及周边省份。同时,山西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远远低于我省的非国有企业。2000 年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分别低于同期非国有企业 2.7、2.4 和 21 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我省一大批劣势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发展难以为继。据统计,2000 年在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资不抵债即资产负债率达 100% 以上的企业有 336 户,占总数的 18.8%,当年亏损的企业有 438 户,占总数的 24.5%,其中连续两年亏损的企业有 294 户,连续三年亏损的企业有 181 户,分别占总数的 16.4% 和 10.1%。这些资不抵债或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陷入困境,难以继续生存,更谈不到推动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2)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成为山西区域经济增长的重点,全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缺乏生机和活力。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与其它省份的差距来看,山西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为突出。省工商联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 年全国非国有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25%,浙江、广东、河北分别占到 48%、30% 和 28.1%,而山西只占 10% 左右。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主要表现在:

一是集体经济发育不良,近年来出现整体下滑的局面。山西

集体经济曾有过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山西集体经济比重曾占到全省经济的 30%。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山西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日益受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挤压，再加上自身先天发育不良，企业规模化、市场化、高新技术化改造步伐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出现了整体下滑的局面。2000 年，山西集体经济比重仅占 17.53%，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 40%以上的比重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和东部省份集体经济创造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相比，山西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滞后，而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明显偏低。

二是个体私营经济比重过小，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十分缓慢，与东部沿海省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1997 年，居全国个体工商户前三位的是山东、河北和湖北，个体工商户分别是 253.6 万户、247.9 万户和 186.1 万户，而山西只有 65.7 万户，只占全国总数的 2.3%。同期全国私营企业数 961 万户，而山西私营企业只有 22 万户，也只占全国的 2.3%。到 1999 年底，山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国的 1.6%和 2.1%，全省注册资金在 100 万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分别占全国的 1.8%和 1.6%，其中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 64.02 亿元，产值 61.75 亿元，私营企业注册资金 172.1 亿元，产值 52.87 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五大后，在全国非国有经济大发展的几年里，山西非国有经济反而大幅度下滑。2000 年与 1996 年相比，全省个体工商户由 67.6 万户减少为 29.9 万户，从业人员由 117.7 万人减少为 56.7 万人，分别下降了 55.7%和 51.8%；注册资金、产值总量相应减少 16.2 亿元和 33.5 亿元。同期私营企业虽有所发展，但增幅不大。2000 年全国私营企业比上年增长 16.8%，而山西同比增长为零。民营经

济发展缓慢、规模小、比重低,已成为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是混合经济极不发达。山西由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独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组成的混合经济极为弱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1997 年,山西混合经济创造的产值仅占全省产值的 5.4%;到 1997 年底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积已达 3000 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9 万家,而同期山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积只有 14 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1861 家,分别占全国的 0.5% 和 2.1%。混合经济不发达也成为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表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速度与质量状况,与所有制的结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山西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比重过大,整体效益低下,而非国有经济比重太小,发展缓慢,因而严重制约了全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因此,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从生产力发展来说,是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讲,就是要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党的"十六"大精神要求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从现有行业中退出,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集中财力和精力,抓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产业支柱的企业和高新技术的企业;同时加强和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推动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2. 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统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山西的分配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仍旧单一化的“按劳分配”，平均主义严重，要素市场极不发育，按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处于萌芽状态，这是造成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缺乏内在的市场动力、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动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由于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和分配调节功能不足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处于较低水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埋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反过来制约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制约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目标的实现。

平均主义分配表现在：

(1)对企业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山西国有企业经营者，在现行体制下获得的最大奖励是升官晋职，缺乏与其经营效绩直接挂钩的年薪制、股票期权制等现代经济激励机制，企业经营者的分配平均主义，导致企业经营管理者缺乏搞好企业的积极性，造成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经营者和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采取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方法，不肯努力去解决难题，去克服困难，去推动国企的改革与发展。

(2)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发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山西到现在为止，仍然缺乏像东部发达省份那样对待科技人才、科技创新与发明的有力度的奖励政策、待遇政策、按要素分配政策等经济激励机制，从而造成不仅外部的科技人才、科技成果吸引不来，而且自身已有的和自己培养的人才还不断大量流失，甚至出现科技人员的创新和发明成果不在本省申报而到外省申报的咄咄怪

事。对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创新发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山西的科技创新与发明、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动力和活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缺乏人才和科技进步的支持。

(3)平均主义和旧的分配体制,使一些地方出现了国家权利部门化,部门权利个人化,个人权利商品化的倾向。由于平均主义和旧的分配体制的影响,再加上政府体制方面存在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在利益驱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山西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国家权利部门化,部门权利个人化,个人权利商品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在许多敏感环节上不断产生腐败现象,如国有企业中"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用权力"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制造者和国有资产运作效益低下的促成者。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山西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表现在:

一是山西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省市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并且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绝对差距已经由 1980 年的 98 元扩大到 2000 年的 1556 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由 1980 年的 79.5%下降到 2000 年的 75.2%。20 年来,山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排队的最好位次是 1989 年,居第 24 位,绝大多数年份居全国倒数第一、第二位。与沿海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1980 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上海少 214 元,到 1999 年差距扩大为 6589 元,只相当于上海人均年收入的 40%。山西与周边省份河北、河南、陕西、内蒙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1980 年山西与河北省的差距为 55 元,1999 年扩大为 1022 元。

从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1980 年

差距为32元,2000年扩大为347元,2001年,又扩大到410元,山西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30个省(市、区)中一直处于20名左右的位次。与东部地区比较,1990年差距为275元,1999年扩大到895元。与所处的中部地区相比,1990年山西比中部地区农民平均收入低29.4元,1999年扩大到230.2元。

二是山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使城乡收入差距呈日益扩大趋势,这在全国是共同的。以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较(不考虑价格因素),1980年城市为农村的2.44倍,1985年达到最低点1.66倍,1994年达到最高点为2.9倍,之后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速度略有减缓,2000年为2.48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收入还包括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反映收入存量的储蓄存款水平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以1999年底山西农村居民人均存款余额估算,占人口总量74%的农村居民储蓄占总储蓄额的比例仅为12%,而占人口总量不到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总储蓄额的比例高达88%。

三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镇居民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多种因素的作用,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95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高中低收入户分组,高收入户收入是低收入户的1.9倍,到2000年扩大为4.3倍,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绝对差距也由3227元扩大为6907元。一些居民特别是低收入户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更谈不上提高生活质量。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呈上升趋势。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246,2000年上升为0.295,在这6年间基尼系数大约

上升了20%。2000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中有15%左右的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不足200元,这些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仅为1807元,比全省平均水平4724元低62%。

四是在农村整体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山西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十分显著。随着高收入户的逐年增多,低收入户也明显呈增加趋势。根据省农调队住户调查资料,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元的户占调查户数的比重为2.77%,1999年增加到5.53%;同时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户占调查户数的比重由1997年的18.52%上升到1999年的21.33%。全省农村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也逐年扩大。由1978年的0.243,上升到1989年的最高点为0.315,之后缓慢下降,到1995年为0.289,1999年又上升为0.313。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还有全省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问题。2000年底,全省农村未解决温饱人口(按照2000年人均纯收入625元标准)大约60万,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比例降到3%以下,但是加上扶贫攻坚区以外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182万和这几年因灾返贫的98万人,全省需要继续解决温饱的人口总数在250万人以上。由此可见,山西农村无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还是消除绝对贫困任务都十分艰巨。

五是不同行业和同不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近年来,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出现扩大趋势,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全省职工工资平均水平50%左右,甚至是收入较低行业的1～2倍。在1999年全省16大行业中,年人均工资最高的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通信、邮电行业,为9433元;最低的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为3613元,最高与最低工资水平

之比为2.61:1,二者绝对额相差5820元。从总体工资水平看,外资高于内资,国有高于集体,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工资比值由1990年的1.48:1扩大到1999年的1.80:1。考虑到货币工资以外实物收入分配和福利性分配的因素,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分配的差距可能会更大,因为能够支付较高货币工资的行业,也是有能力支付给职工较高福利和实物收入的行业。

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还处于较低水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减震器"和"稳压器",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山西国有经济比重大,国有企业的改组、重组、兼并、转产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山西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管理模式的影响,长期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机构,尤其在养老、失业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极不完善,功能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低下,能力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面对大批企业亏损,几十万庞大的下岗职工队伍,缺乏解决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能力,在人员分流安置、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离退休人员生活保障等诸方面承担不起全部责任;通过政策、舆论导向、信贷优先等措施来积极引导帮助和促进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工作力度不大,存在着依赖等待,以及矛盾上交等现象。缺乏筹资渠道,社会保障资金难以到位。山西全省342户大中型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负债总额达到1226亿元,再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主导产品如原煤、焦炭、化肥、白酒产量较过去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货款拖欠规模上升,产成品库存居高不

下。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企业无钱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基金，普遍欠费严重，1999年底总计欠费12亿元。这严重影响了山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足额到位，致使社会保障机构难以顺利运转。

需要指出的是，山西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和客观必然性。山西收入分配低水平化，根源还在于山西低效化的经济结构。我们所要高度关注的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和分配体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所造成的新形势下的平均主义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扩大化，及其对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正是由于山西的分配结构还没有真正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发展的新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制约着山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推进山西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兴晋富民的目标，必须改革创新山西的分配结构和分配体制。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现实选择

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结构调整升级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高新技术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一方面给山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宝贵机遇，另一方面也向山西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只有把握机遇，才能赢得挑战，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加速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其尽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乃是山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现实选择。

一、二十多年来山西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山西是在全国最早提出结构调整问题的省份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全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山西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重要性，不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而且也有所行动。“六五”时期，提出以调整农轻重比例为重点，调整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七五”时期，提出以加快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加快教育科技发展、加大技术改造和环境保护力度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进入90年代以后，山西又不断出台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政策。1990年制定了《山西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研究报告(14888工

程)》;1991年制定了《关于实现山西省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个翻番的对策研究》;1992年出台了关于90年代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与改革战略设计——《整体创新,综合开发》和《关于促进经济上新台阶的意见》。这些政策、意见,基本阐明了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及战略重点。其目标是实现深加工、多品种、优质化、高增值,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外向能力和竞争能力;其原则是重中选优,轻中选优,效益优先;其战略重点是以能源为重点支柱产业,发展冶金、装备、食品和精细化工4大支柱产业,并以支柱产业为基础,发展8个产品链与88个重点产品,以实现资源的多次加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有关加快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战略设计,仅在部分行业和地区产生了一定效果,并未能在全省范围内真正贯彻实行。尤其是1993年后,当全国进行结构大调整、山西能源产业面临严重危机时,山西又一次失掉了调整的机遇,结构调整进展乏力,经济发展步履艰难。

综观山西省以往结构调整的实践,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在产业开发和新支柱产业培育方面,作为二次能源的电力工业,作为煤炭深加工的焦炭、化肥工业,作为具有一定优势的不锈钢、特殊钢、铝工业、重型机械工业以及饮食业等,都有相当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有所发展。在区域经济调整方面,运城、阳泉、长治、太原等也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从总体上看,教训多于经验。可以说是"醒得早,起得晚",雷声大、雨点小,成效不大。究其原因,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结构调整的战略前瞻性和开放性认识不足。

虽然山西较早对本省经济结构的弊端就有所觉察,并制定了

一系列转型升级战略，但实际上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本省产业结构提出的严峻挑战认识并不深刻，因而也就对本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当资源性市场需求紧缩时，试图解决产业结构弊端的决心和工作力度就大些；而当市场需求扩张时，则往往放松结构调整的步伐，使得本来确定要调整下来的生产能力得以保存、恢复，甚至再度扩张，始终未真正把调整经济结构摆上重要位置，调整经济结构、创新发展思路并未真正上升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

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相对应，山西制定的一系列调整战略也缺乏前瞻性和开放性，实质上是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这样就将山西的发展定位于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能源的角色。这一角色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明确，问题是，随着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这一角色受到了冲击。西部的资源在不断地开发出来，西部地区正在成为全国新的能源供应基地。也就是说，从全国的分工格局看，山西正逐步退出煤炭能源供应惟一基地的角色，逐步让位于西部地区。山西更应该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发展加工型经济。重化工基地的提出也有意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山西的重化工基地建设又是以能源工业为核心，为之服务。结果是，煤炭基地形成了，但重化工基地却"难觅芳踪"；初级化的能源材料产业体系形成了，但向高级化、高效益能源材料产业的转变却极为缓慢。各项战略设计大体仍未跳出传统的能源基地模式，对山西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缺乏设计。因此，这些设计更适应于山西短期的发展，而不适应更长时期的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不可能预测得无比详细，但对于山西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从这一要求来讲，原有发展战略自身存在着前瞻性和开放性不足的缺陷。

2. 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缺乏连续性。

全省的结构转型升级战略制定出来以后,一直处于修订稿阶段,没有经人代会审议,因而,也就一直未能法制化。转型升级战略的部分内容被制定成有关文件和政策,但是,由于没有法制化,导致因领导层的变动调产战略也不断摇摆,始终未能全面实施。尽管如此,如果能够切实贯彻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校正,全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肯定也会有所好转。但遗憾的是,它的实施又是极不连贯、时断时续的。

3. 调整方式欠妥,行政性运动式推动多,市场推动作用发挥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明确分工的,政府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调节、经济发展规划、社会管理等工作;微观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市场来调节。具体到资源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应该制定战略,指明方向,出台鼓励性政策,建设重点工程;而企业的发展,则由市场调节。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山西政府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对许多应该做的事始终未做或未做好,导致宏观与微观脱节。一方面政府高喊结构转型,另一方面企业照常大卖资源,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

4. 过于注重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产业的外延扩张型调整,忽视了传统产业素质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在结构调整中,投资重点过度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倾斜,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投资力度不大,投资重点与结构调整重点错

位。据统计,1991 年至 1998 年,全省国有单位累计完成投资 1835 亿元,重点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部门。其中,交通邮电 405.4 亿元,占总投资的 22.1%;煤炭 374 亿元,占 20.4%;电力 280 亿元,占 15.3%;冶金 168.6 亿元,占 9.2%。能源交通产业的投资占到 58.1%,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机械、化学工业的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建材、食品等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产业的投资明显不足,忽视了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支持。同时,投资安排还出现了明显的外延化倾向。对旧有产业的投资,过分重视量的扩张,而忽视产业素质的提升,反映到投资上,是新建项目投资大幅度上升,而改建项目投资却大幅度下降。

5. 对科技、教育、人才重视不足。

实施结构转型升级战略的关键,是要充分重视科技、教育和人才,以科技为手段,以教育为基础,以人才为支柱对资源性经济结构进行改造。然而,山西虽然很早就提出"科教兴晋"等口号,但说得多,做得少,对科技、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致使科研资金短缺、科技人才待遇低下、科技管理体制落后等矛盾日趋尖锐。本来山西的生存环境就不太好,许多科技人才动力就不足,再加上始终得不到重视,结果导致人才大量外流,出现了一方面人才极为缺乏,另一方面有限的人才却大量外流这样一种怪现象。

6. 对中央政策的僵化理解与死板运用。

1979 年中央提出"尽快将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设想,虽然如此,国家意图也并不是要求山西只能单打一地发展煤炭能源产业。1979 年 8 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对《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我国北方的强大的能源基地》一文批示:"逐步

形成以煤炭的开发和综合利用为中心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的,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才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山西建设成为我国北方的强大的能源基地。"由此可见,国家还是要求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同时,要使各个产业部门综合协调发展。但是,山西囿于片面理解中央政策精神,只是围绕着能源重化工基地开展工作,而不能根据山西的情况提出更新的区域性综合发展战略。结果,由于初级低效的产业结构的制约,山西经济发展日趋缓慢,与外省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当然,也应当承认,国家重点将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进行长期建设,以及国家对能源产业的强力控制,不仅是山西形成和强化重型化、国有化、低度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山西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延续和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对中央政策的僵化理解与死板运用,还体现在对待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调整改革上。山西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僵化和保守,总是不能很好地根据时代发生的新变化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山西的所有制和分配结构调整改革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思路、开创新局面。突出表现为习惯于用姓"社"姓"资"的标准来判断和分析问题,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也不愿意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敢也不愿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长期作为国家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国企大省"的山西,成为国有经济改革步伐缓慢、对非国有经济管制时间最长、管制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由此造成山西国有

经济比其它发达省市改革滞后得多，排斥非国有经济的思想意识观念比沿海地区要强烈的多，而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相应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基础条件要比沿海地区紧缺和落后得多的局面。山西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基本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机，尽管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所有制结构的状况仍然远远落后于其它兄弟省市。

二、结构调整进入全面升级转型的新阶段

尽管由于结构不合理等诸多原因，降低了山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但是，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发展，山西的经济实力还是得到了显著地增强，为山西 21 世纪的全面振兴与腾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表现在：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1998 年与 1978 年相比，全省第三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09%，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20.8%上升到 33.58%；第一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2%，比重由 20.7%下降到 12.9%；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6%，比重由 58.5%下降到 53.5%。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以 1990 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发展到 1998 年的 8.82:17.28:73.90。农村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单一种植农业结构转向农、工、建、运、商、林、牧、副、渔业并举，多业综合发展。

经济成分多元化。改革开放使全省经济成分由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到国有经济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充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并存的格局。

地区经济结构初具特色。目前省内已初步形成一批依托中心城市,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经济区。省会太原市已建成山西的核心工业区。在这里有全国最大的特殊钢生产基地——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型机械、矿山机械、机床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等机电产业以及采煤、发电、化工、轻纺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都具有相当规模。塞外古城大同市是全省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也是全国动力煤和出口煤基地,电力、动力机械、机车制造、水泥等工业也占有重要位置。晋东重镇阳泉市是以采煤、冶金、机械、化工等行业为主的新型工业城市。上党中枢长治市的机械、钢铁工业在全省占有一定地位,洗衣机、缝纫机等日用机械和日用化工产业比较突出。古泽州晋城市是全省重要的无烟煤基地。地处三晋腹地的晋中市是纺织工业集中的地方。新崛起的朔州市已成为华北地区新兴的煤电能源工业城市。古尧都临汾市和古晋(国)都侯马市正逐步发展为机械、纺织、冶金、制药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城市。运城市农业资源丰富,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和盐化工业以及日用品工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这些都为全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但是,山西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的发展模式已毫无前途可言,外部形势以及山西内部发展都强烈要求经济结构尽快升级转型。近几年,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在不断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昭示着山西结构调整的光明前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省委、省政府吸取历史教训,对经济结构调整给予了高度重视,将结构调整确定为山西"十五"计划纲要的主线,确定了重点调产项目规划,设立了政府扶持基金,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效益驱动、市场融资的动态调整机制,并且建立了项目责任制,进一步改善了投资环境,全省上下朝着结构调整"一年

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目标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000年全省实施的30个工业调产项目,省投资金6亿元,带动银行资金100亿元。2001年9月底,省委、省政府发布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1311”规划,包括第一产业重点扶持发展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第二产业重点扶持发展30个战略性工业潜力产品项目,第三产业重点扶持发展10个旅游景区,高新技术领域重点扶持发展100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这一规划如能顺利实现,“十五”期末将新增销售收入900至1000亿元,新增利税200亿元。

这些都表明,山西结构调整已由过去少数部门、小范围的适应性调整转入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已由过去少部分人操作转向全省上下齐抓共调,标志着山西经济结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进产业、产品结构优化,围绕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延伸产品链,提高附加值,实现产品高加工度化。二是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全面提高工艺、装备的技术水平,加速产业高技术化。三是大力推进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努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扩大服务范围和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五是大力调整和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发挥比较经济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特色化。

新世纪开始后的5到10年将是山西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新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的、以科技进步为导向的“升级转型式”的全面调整;不是以计划为导向、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体的调整,而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背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行为为主体的调整;不是经济结构的局部性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分配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整

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系统性调整。

三、结构调整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性任务,它需要克服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困难,消除种种不利因素,方可逐步推进,取得成效。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推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许多难得的历史机遇,有许多有利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机遇和条件,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把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向前进。

1.党的“十六”大关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精神,为山西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快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基础。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作出了我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部署,即通

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在基本经济体制改革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可以完全这样讲，在党的“十六”大关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精神指导下，必将开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山西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大解放，开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为山西经济结构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进入新世纪，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使山西经济面临更为激烈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为山西经济结构

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其主要标志是:(1)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目前,世界上有近百个大大小小、一体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区域集团组织,其中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最大,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据计算,三大区域集团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到全球85.8%(1997年)和89.6%(1996年)的份额。在新的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向纵深发展,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2)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6～1998年,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从3600亿美元增至6400亿美元。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跨国公司的发展将呈现如下趋势:一是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和跨国度将更大,跨国并购将日益扩展;二是建立伙伴关系,以知识为基础的网络化经营将成为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三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继续在投资和引资两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四是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仍将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五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会稳步上升,新兴大市场将成为热点;六是因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政策的不同,引资效果继续出现不平衡;七是随着合作研究的增加以及海外研究开发机构的创建,技术扩张将加快;八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会从发展中国家崛起;九是跨国公司奉行商业原则,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其视野之外;十是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有利于发展经济,促进友谊,维护和平。(3)资本市场国际化趋势加剧。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与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市场将促进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资本

市场将加快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通过它的信息传播功能和资产重组功能，大大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风潮，加快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流动。

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对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整体展开，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并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科技产业化、国际化和商品化的趋势迅猛发展，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都将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革。受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传统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竞争的优势将进一步向拥有先进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倾斜。二是全球范围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进一步深化。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与成效，将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中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同时也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途径。结构调整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领域，形成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空间，使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拓宽，同时也将给各国经济带来新的挑战。由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发展和扩大，全球工业化的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竞争力，需要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全球21世纪的发展战略方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重视居民发展能力的提高，为居民提供更多平等发展的机会，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实施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使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相对突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将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绿色产品、环保产品、发展教育用品等新兴产业将成为空前广阔的消费市场。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市场国际化,将给山西的结构调整带来不可多得的良机,为解决山西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开辟新的道路,从而有利于按照确定的目标向前推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最重要任务是改变粗放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重型结构,急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与改造。但是,山西不太宽松的资金市场不能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的需求。多少年来尽管山西产业发展有着强烈的升级要求,但产业升级的战略进程一直困难重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惯例,山西的资本市场将会逐渐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这必将为国际资本流向山西创造良好的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的整体调整和重组也将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新的机遇。山西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形成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比较浓重。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山西在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里落伍了。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将会为山西产业的重新整合与崛起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凭借其高新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以知识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而其原有的以不可再生性资源为对象的采掘、加工、制造业等产业,不断向国外资源密集型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不仅带有资金,还有技术、管理模式和市场。这样,山西就会在承接这种产业转移中,产业因技术改造而升级,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也将得到调整。山西传统产业将逐步被新的高新技术产业代替,特别是那些现实生产力中以高耗能、高投入为支撑力,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传统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将会大大受到限制,而建立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以及高新技术基础之上的产业会尽快发育成长,从而促进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

3. 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形势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新世纪初的5到10年，同样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结构调整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种宏观形势将对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与新的变化：

(1)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后，在居民消费需求迅速扩张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品工业较快地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发展阶段)和第二阶段(以重化工材料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我国消费品工业是依靠进口设备、进口零部件和引进关键技术发展起来的，缺少国内基础工业，特别是装配工业的广泛支持，缺少自我发展和创新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买方市场特征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工业结构的这一内在缺陷凸现出来，并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矛盾也开始由资源供给，转到工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方面。因此，高加工度的新一代工业消费品将成为主要的增长热点。

(2)城市化进程加快推动全国工业结构调整步伐。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城市化速度将比目前加快一倍，并成为推动全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化速度加快将首先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次，城市化程度提高将加大对住宅、交通、水、煤气、邮电等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汽车、建筑、建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改善人们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推动整体消费结构的升级。

(3)消费结构升级将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全国城镇居民多

数家庭已基本解决了衣食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阶段过度,住宅、轿车等社会基础设施、通讯及其它新型电子产品、文化娱乐、旅游、社区服务等将成为重要增长点,并相应带动建筑、建材、机械、石化电子等工业部门的较快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状况将会随着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而改变,从而将会增加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拉动这些产业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期。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上述态势对于山西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山西应当而且也能够适应上述变化,利用国家在推动产业转换中所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及由此所创造的各种适宜环境,全面推进结构调整。

4. 国家加快中西部开发将对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的平衡问题与加速中西部发展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九五”开始,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和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力度:一是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三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鼓励和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五是加大扶贫力度,鼓励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

在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合作正逐步得到深化,由此推动了产业转移。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在21世纪初,东南沿海所需要的50%以上的电要

靠中西部地区输送,60%以上的原材料要依赖内地供给。因此,东西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一些东南沿海地区已纷纷采取措施,进行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如上海、广东已出台结构调整规划,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不宜在上海生产的行业如纺织、化工、轻工、建材、机电等产业大部分将转移出去,使上海的主体企业成为决策中心、开发中心、销售中心和管理中心。广东经过优先发展已处于由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许多加工型企业也将逐步迁出,向外地转移。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便是这些产业转移的接受区。山东省根据自己的发展规划,打算组织300家乡镇骨干企业,200家地市级企业集团,100家省级集团到中西部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山西能够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国家加快中西部发展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同时利用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有利时机推进自身结构升级,是一定会大大加快本省经济发展步伐的。

5. 山西推进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内因条件。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向来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作用。同样,山西结构调整升级在具备外部条件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具备了重要的内部条件。而这正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决定性的因素。

一是全省上下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已形成共识,有了空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起步较早,虽因种种原因,进展不快,但通过多年来的宣传教育与实践,全省各级干部和群众的认识逐步深化,思想逐步统一。大家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产业结构和所有制分配结构对山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具有根本性

的制约作用,普遍认识到了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优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使得我们推进结构调整具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重要的思想认识条件。

二是基础工业和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改善了山西的投资环境,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山西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全省的基础工业完成了对原有落后工艺、落后管理方法的改进,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发展邮电通讯事业、城市基本建设外,近年来重点发展了交通运输事业。截止到 2002 年底,全省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就达 1068 公里,跃居全国第 18 位,已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综合运输网。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山西人民把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的决心和信心。2000 年初,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产业结构调整"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战略部署。经过三年的努力,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年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了经济结构调整决策的正确性,对完成结构调整任务增强了必胜的信念。这将大大有利于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各项决策和措施的落实,从而有利于逐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战略目标。

第二编

总体目标:“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和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

为推动山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出发,山西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明确了山西经济结构为什么要进行调整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山西经济结构往哪里调?调整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对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影响大不一样。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科学明确,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就有了明确的重点和方向,发展就会少走弯路,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已经被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所证明,也被山西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纲领的要求和党的十六大精神，顺应和体现国内外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与潮流，针对山西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山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混

合型、规范化的所有制分配结构和“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按照这样的战略目标，山西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战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同时大力进行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通过“三步走”战略步骤，逐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构建"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和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从生产力调整上讲，要坚持以传统产业的重组、改造、升级为重点，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接续产业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为先导，通过在潜力产品成长基础上的产业化提升，在产业化基础上的系统化整合，建设具有山西区域特色和优势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实现支柱产业群的升级换代，进而建立和发展生态化、知识化、一体化、特色化和高效益的"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奠定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产业基础；从生产关系调整上讲，要通过对所有制分配结构的改革创新，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混合型、规范化的基本经济体制，奠定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体制基础。

一、"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山西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不调整，山西贫困落后的面貌就难以改变，山西兴晋富民的愿望就无法实现，山西就会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淘汰。这一点在全省上下都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山西产业结构要调整到哪里去？调成什么样

子？也就是说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总结以往山西历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之所以成效不大，一个重大教训就是缺乏明确的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调整总在是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这个表面问题上做文章。战略目标的不明确，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调而不动”，产业结构调整屡次沦为事实上的“空调”。

目标就是旗帜，是方向，是灵魂。战略目标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一个好的目标几乎就等于成功的一半，而在目标定位上的任何细小的偏差，都足以导致实践过程走上战略的歧途，最终事与愿违。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战略目标的定位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这是山西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一个重大历史教训。山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要想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吸取这一教训，就必须首先明确其战略目标。

山西省确定了十五期间的“1311”结构调整规划，在战略进程上，按“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明显变化、十年结构优化”安排。现在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感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深化。

山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目标进行定位，首先要对山西现有产业结构症结有一个本质的认识。山西现有产业体系的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它的低效。这里所说的低效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更是指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就经济效益而言，山西的产业体系是“好的不多，多的不好”，整体资金利润率等绝大多数效益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资料表明，全国利润率最高的五个行业和最低的五

个行业利润率差距在20%左右，而山西50%左右的生产能力分布在利润最低的五个行业中，分布在利润率最高的五个行业中的生产能力不足5%。就社会效益而言，山西在全国的排名说明了一切，多项指标在全国倒数前列。就生态效益而言，山西则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地面塌陷，许多资源枯竭，大气、水体污染，每年有不少高级人才以生活环境差为由调出山西。所以说，山西产业体系的低效，绝不是某一方面的低效，而是一种整体的低效。

造成山西产业体系整体低效的原因非常之多，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产业布局分散化。经济的发展，产业的进步，效益的提高，都要求产业布局的一体化，要求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而山西现有的产业布局则呈现出一种严重的分散化、分割化状态。以山西最大的产业——能源产业为例，上世纪末，在全省煤炭生产企业中，仅乡镇集体矿就多达5030个，占到全省总数的88.9%，平均生产规模只有2.75万吨；全省焦炭生产企业多达3143个，平均生产能力仅为1.7万吨。按全省108个县计，平均每一个县有乡镇集体煤矿47个，焦炭生产企业近30个。正是这样的产业布局，造成了内部的恶性竞争，经济效益下滑，造成了遍布全省的"污染源"。再比如，金属镁曾经是一项效益非常不错的产业，但随着全省一哄而上金属镁项目，使得该产业效益急转直下，一落千丈。所以说，在产业布局上的分散化，是山西产业体系整体低效的一大根源。

二是产业发展缺乏品牌、特色。一提到山东，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海尔、海信、青岛啤酒；一提到内蒙古，人们就会联想到伊利，联想到鄂尔多斯；提到四川，就会联想到长虹。而提到山西，人们会联想到什么呢？大概就是黑乎乎的煤炭了。"傻"、"大"、

“黑”、“粗”是山西产业发展的一个形象的写照。这样的产业体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产品是千篇一律的大路货，几十年来就吃一碗饭——煤炭饭，就打一张牌——煤炭牌，而且深加工、精加工程度严重不足，整体效益低下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关部门曾经做过粗略的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山西铁路运货出省的“黑白比”为7:3，80年代演变为8:2，90年代则上升到8.5:1.5。其发展趋势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几乎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三是产业发展背负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双重包袱。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可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然而，山西产业的发展却体现为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重度污染、重度浪费、重度破坏。有统计资料表明，山西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仅为20—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比发达国家低20—30%。许多具有多重价值的共生、伴生资源只进行了单一利用。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烟尘排放量占全国的11%，每平方公里负荷比全国平均值高出6.5倍；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的6.4%，每平方公里负荷比全国平均值高3.9倍。在全国空气质量较差的前10个城市中，山西就占了8个。全省26条河流中超Ⅴ类的河段高达73%，比全国平均水平(32%)高出41个百分点。全省11个大型水库中，有64%的水库水质达不到功能要求，45.5%的水库有轻度以上的污染。地下水质量劣于Ⅲ类的占35%，比全国平均水平(5%)高出30个百分点，并且污染物浓度也普遍高于全国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居全国首位。全省新生儿出生缺陷率达189.86/万名，位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1.9倍。完全可以说,山西环境污染之严重,已经到了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地步。

四是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低下。邓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知识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发达国家,科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60%—70%。反观山西,产业的科技含量、知识含量却超乎寻常的低下,仍然严重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和消耗支撑经济的发展。

以上这些,是山西产业体系的根本症结及其主要原因所在。立足于对山西产业体系的本质的认识,结合国际、国内产业发展的历史趋势,有必要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进行新的审视和定位。经过长期思考,我个人认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建立“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为战略目标。即:构建一个一体化布局、特色化发展、生态化、知识化主导的综合高效的产业体系。综合高效是山西新型产业体系的核心目标,不但要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有较高的社会效益,更要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效益。综合高效是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协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综合高效。而“四化”则不仅是山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本身,是综合高效核心目标的必要保障,而且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原则和途经,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

其一,一体化布局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重要前提。

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历史趋势,诸如科技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等等,都是一体化潮流的重要内容。而经济全球化则是集诸多方面的一体化潮流于一身的巨大历史潮流,它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发展到全球一体

化的程度。有人说,在今天,美国经济打个“喷嚏”,全球经济都要患上感冒。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之高。所谓一体化就是指各个经济体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协作、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全球经济一体化则意味着经济分工与协作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产品,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产品了,其零部件来自世界各地15个国家,车轮螺丝、液压推杆来自美国;速度计档来自瑞士;排气管固定装置、轮胎来自挪威;汽缸盖、除霜器护栅来自意大利;风扇皮带来自丹麦;电线固定夹、蓄电池来自西班牙;起动机来自日本;玻璃、收音机来自加拿大;交流发电机、主汽缸来自德国;软管钳、汽缸、螺栓来自瑞典;汽化器、离合器、点火装置、排气装置、油泵来自英国;涂料、机件来自荷兰;活塞、前轮盘、速度计、燃料箱、后轮轴来自法国;坐垫来自比利时;水箱、加热器软管来自奥地利,等等。

全球化分工与协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历史趋势。毫无疑问,山西经济要发展、要腾飞,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对此,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山西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问题,实现山西经济发展在区域领域里的分工与协作。因为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是建立在区域高度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的,没有区域的一体化,不可能有全球的一体化。山西区域经济的发展恰恰处于一种相互分割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参与全球的竞争、分工与协作。

山西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关键是在产业布局上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一是要避免各种形式的大而全、小而全,避免相互孤立;二是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低层次的雷同,避免

恶性竞争;三是必须密切注意与区域外的一体化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工与协作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没有分工与协作,产业的素质就难以提高,产业的升级就难以实现,这是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然而,山西对此仍然认识不足。缺乏一体化布局的起码意识和素质,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对山西而言,不仅包括增量调整的一体化,同时也必须重视存量调整的一体化,真正打破地区分割和所有制分割,推进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协作,提高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

其二,特色化发展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

特色就是市场,特色意味着效益,没有特色的产业,不可能是一个高效的产业;同样,没有一批特色化的产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构成一个高效的产业体系。当前,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在全球生产和消费领域,都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个性化生产与消费。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即大规模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方式,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柔性生产方式正在大量涌现。

人都是有个性的,从消费心理的方面讲,人的消费行为在潜意识里都具有个性化的倾向和需求,只不过在传统的工业化阶段,生产的技术能力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然而,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以及诸多高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使得实现消费与生产的充分对接成为可能。完全可以预料,随着更多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和发展,未来的生产与消费将是个性化的生产与消费,千篇一律的缺乏个性的产品将不再拥有市场。甚至,消费者的消费个性将主导生产。什么是个性?在这里个性也就是特色。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地发展，正在引领产业的发展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特色化时代。越是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产品，越是受到市场的宠爱，越是缺乏特色、缺乏个性的产品，越是为市场所冷落。手机的生产与消费，从最初的千篇一律的"黑疙瘩"，到今天的款式五花八门、色调千变万化，就是生产与消费特色化、个性化的一个典型例证。

当然，山西缺乏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终端产品，大多属于中间产品，但这并不代表山西产业的发展可以没有自己的特色。况且山西毕竟也还有许许多多的产品要直接面对消费者。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消费升级转型的阶段，小康型消费正在取代过去的温饱型消费，消费的特色化、个性化要求日渐突出。可以说，这种个性化、特色化的趋势，既要求山西必须发展特色化产业，同时也给山西发展特色化产业带来良好契机。

山西其实并不缺乏特色化的产品，比如像小米、莜麦、干鲜果品等等，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还有山西的汾酒、食醋等等。但是，都没有带动起一个特色化的产业。山西产业的特色化发展，关键还在于一是要切实坚持一体化布局，消除简单地重复和雷同，杜绝恶意模仿；二是要通过强有力的市场营销，塑造品牌，打造名牌，形成品牌效应；三是要实行产业化开发，要从特色产品出发，发展成一个特色化的大产业。

其三，生态化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

生态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性潮流，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日益深入，随着全球性绿色消费浪潮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随着人类对工业化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心，产业发展的生态化已经不仅仅是在巨大压力面前做出的无奈选择，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传

统工业的绿色化以及企业绿色形象的塑造,成为一种潮流。绝大多数世界级的大公司,象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杜邦公司、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瑞典的纸业公司等等,都把在环境保护方面胜过他人作为公司长期生存下去的一项重要战略内容。有资料表明,早在1990年,全世界各跨国公司用于环境计划的投资达2000亿美元左右,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行绿色产品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天使"、日本的"生态"、美国的"绿色签章"和"科学证书"、北欧四国的"白天鹅"等等。甚至,在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绿色壁垒"。

可以说,绿色生产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自觉行动,绿色消费也正在深入消费者的大脑深处。在未来的市场上,像山西目前这样的高污染、高浪费的产业、产品将难以有立足之地。不论是战略性产业,还是一般性产业,都必须是生态型的产业;不论是什么样的特色化产业,"绿色"都必须是它的基本色调;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也必须是在生态化基础上的一体化布局。所以说,生态化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

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还很难说我们对此已经具有了高度的认识和警觉。比如,能源市场环境稍有好转,许多地方就忘记了调产这个主线,争上煤焦初加工项目,小煤窑、小焦炉死灰复燃等等,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生态化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产业改造任务,还是一个艰巨复杂的思想意识改造任务。山西产业发展的生态化,一是传统污染产业的生态化改造,重点是能源产业的清洁化,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高效利用。二是新型的生态产业的开发,重点是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的开发。

其四，知识化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主导战略。

经济结构调整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山西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但是，经济结构调整绝非中国或者山西所独有。目前全球经济发展都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期。应该说，中国或者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知识化。

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已经取代传统的物质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重要的战略资源。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后来克林顿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已经使得全球第一号经济强国——美国成功地摆脱日本、德国的迅速追赶，并率先一步跨入知识经济时代，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历时近 10 年的经济奇迹。随后，西方其它发达国家也不甘落伍，纷纷实施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速本国经济的信息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知识经济的空前发展。而无论"星球大战"计划也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好，其本质都是经济的知识化。所谓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加速实现其自身产业知识化、知识产业化而主导的其传统产业(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加速外移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差距，本质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世界上 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举全国一年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一家企业的科技投入。如果不能取得产业知识化的突破，那么，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些国家必将沦落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地；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地。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山西一直是全国的能源材料基地,在全国经济信息化、知识化的大潮中,山西如果不能在产业的信息化、知识化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那么,山西和全国也将成为两重世界,成为发达地区的工业产品供应地和知识、信息产品的消费市场。

事实上,山西产业发展的一体化也好,特色化,生态化也好,都必须是知识化的。无论是战略性支柱产业也好,一般性的产业也好,也都必须是以知识化为主导的,没有产业的知识化,山西产业的一体化,将失去意义;特色化、生态化则将失去依据,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建设也将成为空谈。因此,知识化是山西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主导战略。

山西产业的知识化,从短期看,一是要加速现有产业的知识化改造,推广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科技的应用,提高产业的知识化含量。二是要加速知识的产业化,加速高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从长期来看,则必须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因为,经济的知识化,本质还是人的知识化。统计资料显示,在工业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比例:初期为9:1,中期为6:4,高级阶段则为1:9。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量的比例关系将不复存在,知识与劳动者将融为一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将合二为一。由此,建立完整的科技教育投入增长机制,加大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教育机制乃是山西产业知识化的长远利益所在。

二、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体系:所有制分配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一定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一定的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所有制分配结构状况如何，既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标志，又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存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调整经济结构，所有制分配结构的调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确立所有制分配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纲领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所有制的问题。党的十五大全面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所有制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特征，鲜明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对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党所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重要经济制度保障，同时也为山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体系战略目标，提供了根本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和要求，创造了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产占有如何实现社会化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应地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的核心在于对国有资源的占有是通过行政归属关系进行，企业所接受的是行政主管部门的指令，形成了条块分割的体制。这种超经济强制的行政管制方式，割裂了国有企业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传统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益是无法分离的，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了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步伐，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各种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不仅产业内部存在相互协作，而且企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甚至生产同一种产品也需要相互分工，相互协作。要适应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财产占有主体、占有方式、所有者的权利体系也就必然多样化、复杂化，要求以一定形式灵活使用这些财产。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尤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有企业可以相互参股、入股。股权的多元化，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等多种形式行使占有权、经营权、处置权等权益。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既可以完全行使，也可以分项使用。这就使企业各种权利、财产之间的联系实现了社会化，属于企业的财产权利，可以通过市场平等交换获得最大收益，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由于资源的使用效率与企业实现的效益相联系，企业的效益与生产经营者的收益挂钩，这就真正实现了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提高了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解放生产力，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不灵、决策成本高、激励机制失灵的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在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都日益复杂且变化极快的现代经济条件下，计划部门无法迅速掌握和处理这些信息，再加上信息传递的失真，既不能保证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有效地配置资源，也不能激励生产单位和劳动者有效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在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下，也无法保证“多劳者多得”。通过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解决信息传递失真的问题。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平等竞争。在市场上，人们只承认价格的权威。在市场制度下，价格反映了商品的稀缺程度，各个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的高低自主决策，自主选择。同时，市场机制鼓励强者，谁有效率谁就能支配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种激励机制能够保证企业微观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保证生产力快速、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的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能够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这个难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难题——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面对这个难题，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出现了两种错误主张：一种是从古典的私有制出发，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前苏联、东欧就接受了这种主张，但并没有达到预

期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不改革传统公有制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只要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传统的所有制形式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取消指令性计划,将自主权还给企业,企业就可以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认识到,不改革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不实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我们连企业的家底都搞不清楚,更谈不上让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动起来,实行市场交换,通过竞争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了。

山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改革,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其他省市相比,进展缓慢,以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性和要求来衡量,差距更大。突出表现在公有制经济实现行形式单一,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比重过高,有限的国有资本几乎遍及所有经济领域,在许多产业中"一统天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比重过低,多种经济成分不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严重制约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制约着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使整个经济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

解决山西所有制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体系的战略目标,并按照这一目标加快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主要内容是: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调整改革山西所有制结构,在战略上必须坚持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种主体作用,对山西来讲,首先不能简单地从数量和比重上衡量,而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的"质"上,通过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体现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增殖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另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国有制为主体,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混和所有制经济,推动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多极共存。根据有关资料,2000 年全国非国有经济占 GDP 的比例大约为 25%,非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是浙江,达到 42%。山西这一比重只有 10%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山西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必须在战略上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伐,力争在几年内,使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全国 2000 年平均水平,形成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多极共存的发展格局。各种所有制经济多极共存,一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个体、私营、外资等所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指不论何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都必须做大、做强,要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三是指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必须在共同的市场规则、政策环境下活动,进行公平、平等的竞争;四是指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相互之间要各展所长,互为补充,开展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形成有机联系,逐步建立利益共同体。

山西只有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体系,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优化的所有制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山西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有利于山西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大业。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也关系到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存和巩固。党的“十六”大报

告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收入分配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为山西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混合型、规范化的分配结构体系战略目标,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必然使企业之间竞争加强。竞争的优胜劣汰规律,使企业经营者必须把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的效率放在核心地位。我国国有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其生产经营效率,也要求对其实行战略性改造,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资本经营和运作。这对于多数国有企业而言,就要求通过"减员增效"来优化配置企业资源,同时用效率工资薪酬制来取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形成一整套促进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经营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在我国农村实行的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独特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效率原则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在个体、私营等经济成分的企业及经济组织中,为协调劳资关系,对劳动要素的投入和报酬要用效率高低来加以衡量,以便有效地发挥劳动要素在财富创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效率来决定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向劳动、资

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转变，是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原则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然选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将劳动作为惟一参与分配的要素，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工资报酬管理，劳动收益不与劳动的绩效挂钩，也不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社会财富创造的最终贡献，这必然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收入分配的无效率必然导致生产经营的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计划机制以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益，在收入分配上对按劳分配原则作了新的解释。按劳分配作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要求劳动的实际效果应与满足社会需求相联系，而不再是理解为简单的劳动时间的付出量。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市场化的资本运作的必然要求，在多种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下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其收入也要求按各要素对新增价值的贡献大小进行合理分配。其核心是允许和鼓励相对稀缺和相对贡献份额大的资本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人们在选择投资方向和项目时，必然会理性地按收益最大化原则，把与收益相联系的效率放在决策的首位，低效率收入的投资必然被人们理性地规避。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必然要把效率摆在优先地位。虽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分配方式或分配原则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原则都必须做到效率优先，一些非经济手段导致的“公平”其实有损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政府只有在财力、物力迅速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兼顾公平。

兼顾公平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要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方面要承认收入差别,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市场机制刺激效率,为过渡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等手段来构筑平等竞争的空间和平台,保证分配的公平。国家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不是去消灭收入差异,而是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两极分化或贫富差距过大。

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政府应从市场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两个层次来加以调控。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合理调控产业结构,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容纳劳动人口就业和扩大就业机会,从而保障其基本收入。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市场上的价格和社会成员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都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收入状况,因此,合理调节市场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弥补市场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十分重要。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政府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产品或劳务价格形成、资产运行和收入分配管理上进行调控,有利于抑制这些行业的不当过高收入,从而体现出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等。

利用税收来调节过高收入,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应加强的重要手段。这包括建立法人对支付居民收入的申报制、居民收入申报制和储蓄存户实名制,对存款征收利息税,完善城乡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以及特殊消费税等。要鼓励和支持先富起来的人将个人收入用来建立慈善基金或扶贫开发、教育等基金,或者无偿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对困难群众进行帮助和扶持,减轻政府负担,补充政府对民政救济财力的不足。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件“关乎国运、惠及子孙”的大事，是做到兼顾公平的百年大计，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要利用市场机制和按照经济规律，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劳动安全保险、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有所提高。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

山西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一方面是仍旧单一化的“按劳分配”，平均主义严重，要素市场极不发育，按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处于萌芽状态，造成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缺乏内在的市场动力、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由于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和分配调节功能不足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处于较低水平，整个社会的就业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埋下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隐患，从而反过来制约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制约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目标的实现。

解决山西分配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讲，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从分配本身来讲，必须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混合型、规范化的分配结构体系的战略目标，并按照这样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改革调整。主要思路是：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不可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也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分配结构。山西调整分配结构，必须在调整战略目标上坚持这一原则，并在实践中完善按劳分配的基本制度。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是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

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包括技术、管理在内的知识、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贡献,在分配结构中予以适当地倾斜,以吸引人才、技术,提高山西经济发展的质量。二是要通过一、二次分配,建立既坚持效率优先,又兼顾到社会公平的合理分配制度。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效益,按效分配;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调节收入差距,向低收入阶层适当倾斜,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三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四是要高度重视社会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山西只有建立和完善这样的分配结构体系,才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和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和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纲领,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山西的实际情况,山西所有制分配结构的调整,必须确立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和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混合型、规范化的结构体系目标。通过建立这样的所有制分配结构体系,更好更快地推进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推进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性产业协调发展:新型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绝不只是什么产业多一点、什么产业少一点，或者发展什么产业、不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在于对旧有产业体系的整体改造。这既是山西以往历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教训，也是山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以及山西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是构建构建一个一体化布局、特色化发展、生态化、知识化主导的、综合高效的“四化一高”新型产业体系。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正确处理好战略支柱产业和一般产业发展的关系。

战略性支柱产业及其群体化发展，是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产业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具备较强抗风险功能的重要标准。但是，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培育及其群体化发展，并不是产业体系建设的全部。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某一产业作为单一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甚至是惟一的产业，都可能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但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形成科学、合理、高效的产业体系，就不仅要重视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群体化，而且必须重视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任何战略性支柱产业都是从一般性产业发展而来的，它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作为战略性支柱出现。比如旅游业，在西方各发达国家，旅游业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般都在10%—15%，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旅游业所提供的收入则占到总收入的30%以上。然而，旅游业最初并不是以一个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面貌出现的，而只不过是少数人享有的一项“专利”。汽车工业在诞生之初，也只不过是富

有阶层的一个奢侈品,很难想像它能够发展到后来的规模,进入普通百姓家,并且对西方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汽车工业的强力支撑,恐怕就没有发达国家的今天。其它像钢铁工业、电力工业等等也都是这样。

另一方面,任何战略性支柱产业也都不可能永远都是战略性支柱产业。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任何战略性支柱产业都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必然降格为一般性产业,而原先的一般性产业则可能升格为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仍以汽车工业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汽车工业一直都是美国最为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0年代末,美国制造商生产的汽车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5%;20年代中期,汽车工业在付出的工资、材料的成本、制造的增值和产品的价值等方面都名列第一;3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从汽车工业中获得工资的人数也上升到第一;一直到1960年,美国都是全球汽车生产的中心,占全球生产总量的47.69%;七、八十年代以后,汽车工业在美国的绝对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便逐渐动摇,兴起于60年代的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则取代汽车工业,日益成为美国新的占绝对地位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有资料表明,高新技术行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头号支柱行业,从1990年到1996年间,美国信息产业的销售额增长了57%,达8600亿美元,对国民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已经超过了1/3,比过去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建筑和钢铁业)贡献率的总和还要大。1996年,仅仅成立还不足20年时间的微软一家公司,其产值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和。美国经济学家预测,在短短几年后,高科技部门对美国GDP的贡献将超过一半。

因此,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同时,必须重视一般性产业的发展,并从中发现和积累新的优势产业。否则,当旧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进入衰退期后，整体经济的发展就会由于缺乏新的支柱产业的带动而随之陷入衰退。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性产业在产业体系中都有着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互相支撑、互相依赖，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替代、转化。只有战略性支柱产业，而没有一般性产业，不成其为产业体系；反之亦然。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山西有着经济发展的深刻历史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在上游的。1978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88亿元，占到全国的2.45%，排在全国的第十五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3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中，排第十位。山西工业消费品的自给率达到50%，除了煤、电、化肥、电石等重工业产品外，一些轻工业产品、机电产品，比如白酒、洗涤用品、矿山机械等等，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后，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煤炭工业方面，确立了建设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战略，煤炭工业的战略性支柱地位进一步强化。应该说，立足山西资源优势，发展煤炭能源战略支柱产业，是应有的选择。但是，过分地专注于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其它产业的发展，导致山西产业体系的功能发育严重失衡，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有资料表明，"六五"以后，尤其是"七五"、"八五"期间，山西省大量投资流向煤炭能源产业，"七五"时期的五年间，全省能源工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77.67亿元，比"六五"时期增长97.65%，几乎增长一倍。"八五"期间，大量投资继续向煤炭能源产业倾斜，对这一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基建投资占到全省基建投资总额的64%。这种势头在"九五"期间仍然持续，以1997年为例，当年全省基建和技改投资总额302亿元，煤炭能源工业投资就占到40.1%。

由于过分偏重煤炭能源工业的发展，投资过分倾斜，使得山西

一般性产业受投资制约,发展严重滞缓。许多产品基本上退出市场竞争。

山西工业消费品的自给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50%,下降到80年代的40%,90年代以后只有30%。山西太原的许多大商场,经销的本地产品竟然不足10%。山西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位也从80年代以前的上中游滑落到现在的下游水平,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在全国居于末游。

在产业发展上搞"单打一",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过分偏重煤炭能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一般性产业的发展,是山西20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教训。一般性产业与战略性支柱产业在产业体系中只有作用和功能大小的区别,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必须是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性产业协调发展、互促共荣的产业体系。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必须能够带动一大批一般性产业的发展、升级,否则,就是没有起到真正的战略性支柱的作用。为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山西必须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统筹安排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协调发展,构造一个有机完整的产业体系。

事实上,重视一般性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山西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选择。

其一,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总是要和一般性产业发生这样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般性产业发展的不足必然加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发育成长的成本。与此同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必然要为与之相关的一般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较多的市场机会。如果不重视一般产业的发展,也必将人为地降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关联带动功能,人为地增加经济发展的总成本。

其二，山西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涉及到一些传统落后生产能力的退出，必然会加剧社会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落后生产能力的退出就会受到影响，并进而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山西大部分的一般性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通过适当发展一般性产业，可以为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一边挖渠、一边放水的作用，减少由于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因素。

其三，一般性产业中也有不少具有较好市场潜力的产品，比如山西的白酒行业中，就有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杏花村汾酒；再比如山西的一般性建筑材料、机械产品等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战略性支柱产业其实是一个优势发现、优势再造和优势开发、积累的问题，通过适当发展一般性产业，并不断培育新优势，也有利于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梯队型发展的格局。

其四，山西正处在一个经济大调整、大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既要求社会提供大量的一般性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为众多的一般性产业提供了巨大的、丰富的市场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适当发展一般性产业，既有利于减少山西在经济大调整、大发展阶段的经济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所以说，协调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一般性产业，是山西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的一个基本要求。

四、建设绿色山西、节水山西、数字山西和信用山西：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整体定位

按照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要求，从山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山

西经济结构调整在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就是要围绕建设绿色山西、节水山西、数字山西和信用山西来进行。可以说,建设绿色山西、节水山西、数字山西和信用山西,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整体形象化定位。

建设绿色山西,是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人口、社会与自然资源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农业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高产、生态的安全农业;坚持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与培育绿色主导产业并举,发展绿色品牌;加大退耕还林工作力度,努力搞好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坚持"造、管"并重,封山禁牧,积极推行舍饲养殖,鼓励农民、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参与林业建设,所造林木归投资者所有。生态环境建设要抓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京津地区风沙源治理、世行水保等生态环境项目建设,抓好水土流失重点区域治理;要以高速公路为依托,抓好绿色通道工程建设;要以创建园林城市为载体,实施绿色城市工程;要建设与资源、环境和绿色生产要求相适应的人口生态体系。能源工业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生态化、清洁化改造,发展循环经济,进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产业。第三产业要把绿色服务业特别是生态化旅游业、文化产业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加快发展。

建设节水山西,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建设节能、低耗、高效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达到高效综合利用和节约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目的。通过实行资源资产化管理,坚持有偿开发使用,淘汰用水效率低、水污染严重的工艺和设备,促进节水技术设备的研制开发;下决心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严重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推动节能降耗和资源的综合利用;进一步加大环保力度,继续抓好重点城市、重点流域、重点行业、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重点

公路干线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大力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建立环保产业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城市供水和污水、垃圾处理等市场化改革；大力建设节水型的城乡生活体系、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和生态体系，优化配置和节约使用水资源。

建设数字山西，是要坚持以信息化促进结构调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和结构调整道路，实现山西现代化。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专业信息网，建设全省基础性资源数据库和公共信息资源服务中心；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重点推广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网络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应用，增加产品的信息技术附加值；积极推进企业上网工程，加快实施电子政务工程。

建设信用山西，是通过建立山西金融信用、企业信用和社会信用体系，全面提升山西信用水平，改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环境。各级政府要加强协调服务，支持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通过严格的信用约束机制，提升和扩展金融安全区；加强全社会的的信用建设，启动"信用山西工程"，加强区域信用建设，创建市县乡村信用品牌，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督，完善市场体系，整顿市场秩序，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恶意逃废债行为，加强公民的信用教育，倡导诚心守约、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上述建设"四个山西"目标，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各级政府要围绕上述建设"四个山西"目标，提高意识、加强领导、科学规划、明确责任、落实措施、扎实推进。

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选择与构建

战略性支柱产业是产业体系的核心和骨架,是产业体系运行和发展的龙头。一个高效的产业体系必然要求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支撑。一般来说,任何国家或地区,如果没有几个或一批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带动,其产业体系就很难称得上合理,也很难做到高效运行。那么,按照"四化一高"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从国际国内区域分工和山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如何选择和构建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成为山西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发展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体的客观必然性

战略性支柱产业是产业体系的核心和中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影响和决定着其它产业的发展，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产业体系功能的发挥。不仅如此，战略性支柱产业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当今美国最为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近 150 年来，美国经济经历了 32 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为 53 个月，扩张期为 35 个月，收缩期为 18 个月。然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这一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强力支撑下，美国

经济却创造了长达近10年的扩张历史。

在传统经济学中，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宏观目标是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就主张，要使物价稳定就必须有5～6%的失业率；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必须忍受4～5%的通货膨胀率。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一直把2.5%的GDP增长率和6%的失业率作为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目标。

但是，这个似乎是铁定的“法则”，却被美国长达近10年的持续增长所打破。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5.4%，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却控制在3%以下；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的1.4%提高到90年代的平均3%左右；综合竞争力一改80年代的颓势，取代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位的新加坡，重新成为全球综合竞争力的龙头老大。

创造美国经济这一历史奇迹的，正是在其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资料表明，在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4年的6.3%增加到2000年的8.3%，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5%，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然而，也正因为信息产业是美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由于网络泡沫的破灭，信息产业遭受重创，技术产业部门陷入困境，致使美国经济在新世纪伊始便频发危机，面临经济衰退的威胁。尽管美联储连连降息，但经济回升始终乏力。加州电力危机的发生，使人们对新经济的前景开始感到疑惑和忧虑，人们甚至开始讨论旧经济挑战新经济的话题。在这里，我们无意谈论到底是新

经济强、还是旧经济弱的问题，而是意在说明，战略性支柱产业对于产业体系、对于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决定性作用。

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说，任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战略性支柱产业相关；我们也有理由说，任何经济结构的调整总是首先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调整相关。

对于有些国家或地区而言，一个单一的但却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足以支撑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繁荣。比如海湾国家，大多数都是以石油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石油资源不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使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享受着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居民才能享受的生活。再比如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国，旅游业是它们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甚至是惟一的产业。源源不断的旅游者为这些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同样，也保障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但是，一般而言，单一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结构是不合理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所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群体化乃是产业体系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这并不是绝对说省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要求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群体化，切合省域实际的一、两个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也能够支撑省域经济健康发展，如烟草和旅游业就已经成为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两台强力发动机。但对于山西来讲，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群体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健康持久的发展。像山西这样的落后地区，要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煤炭这个单一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难以负重的，必须构造一个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群体。如果我们把战略性支柱产业比作一台发动机的话，那么，一台发动机不足以带动山西社会经济这台庞大的机器，多台发动机共同运转，才能有效地推

动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发展强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体，乃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山西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战略性支柱产业比较单一，过分依赖煤炭能源工业。

根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2001年夏季报告（内部）资料分析，20多年来，山西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总计达932.3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3.6%；能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省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达51.1%；能源工业职工人数占全省职工总数的38.9%。目前，全省能源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总额的50.02%；能源工业利税占全省工业利税总额的64.7%；围绕能源工业发展的各项资金流总额年均达795亿元，占全省各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总额的49.2%，各项存款总额的44.36%。20多年来，能源工业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35%左右。2001年上半年，全省GDP增长率为8.5%，仅能源工业增长就拉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可以说，能源工业是在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然而，山西的能源工业大则大矣，却大而不当，大而不强。一是企业结构不合理。全省煤炭生产企业中乡镇集体矿多达5030个，占到全省总数的88.9%，平均生产规模仅2.75万吨，焦炭企业多达3143个，平均生产能力仅为1.7万吨。二是产品结构单一，附加价值低。在一次能源产量、一二次能源总量和输出能源产品中，原煤所占比重分别高达99.88%、59.4%和79.9%；全省煤炭加工转化率仅为45.5%，加工转化能源占一次能源产量的41.37%。大而不当，必然导致大而不强。由于能源产品价格先是长期受国家严格控制，产品价格与资源价值严背

离，又受到市场的挤压，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全省能源工业长期处于全行业亏损的状态。从1996年起煤炭就超量积压，常年积压量在1亿吨左右，用户拖欠煤款总额最高达120多亿元。

山西能源产业的大而不当，还表现为由于能源工业挤占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但并没有带动省内其它产业的发展；相反，由于投入不足，一些本来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产业，长期受到抑制，难以成长、发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能源工业这个一业独大、大而不当、大而不强的战略性支柱，还给山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

有资料表明，山西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20～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许多具有多重价值的共生、伴生资源只进行了单一利用。由此造成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巨大损失。省内有关部门曾经进行过粗略的测算，仅1980年到1990年间，山西能源工业直接或间接价格转移、流失就达900亿元之巨。另据测算，每生产一吨原煤造成的生态环境资源损失为9.44元，每生产一千瓦时电的生态环境成本为0.10元，以此而论，山西能源基地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资源损耗以价值计算，每年约达27亿元。

世界银行在《碧水蓝天——21世纪的中国环保报告》中指出："根据支付意愿价值估计，目前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价值损失为540亿美元/年，约占1995年GDP的8%。"也就是说，1995年中国GDP所增加的8%，全部被污染损失抵消了。山西是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省份，那么，每年的环境价值量损失是多少，这个数字怕是要让人触目惊心的。

因此，要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改进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状，就必须首先改进传统能源产业一业独大、大而不当、大而不强的状况，培育和发展一批强大的战略支柱产业群体，形成群马拉车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格局。

二、比较优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选择依据

山西究竟应该选择哪些产业来重点培育，加速发展，形成自己的战略支柱产业群，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但是，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另一个问题，即：选择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根据什么做出选择。事实上，在这个标准明确以前，我们任何仓促的决定，匆忙的选择，都可能是失当的，都可能事与愿违。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某一产业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其它产业的吸引和获得要素资源的能力。能力大就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就是比较劣势。比较优势越大，那么，该产业吸引和获得的要素资源就越多，发展就越快；反之，吸引和获得的要素资源就越少，发展就越慢。一般产业是这样，战略性支柱产业更是如此。由于其在产业体系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一项产业，要真正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在更大的市场半径内具有足够大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任何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都是以比较优势的存在为前提的；它的衰退也都是以比较优势的丧失为条件的。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产业的比较优势此消彼长、支柱产业不断更替的历史。以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而言，耕作农业相对

于原始采集业、狩猎业，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最终成为农业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工业相对于农业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于是工业逐步替代农业，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工业发达国家社会服务需求迅速增长，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并迅速超过工业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推动各工业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值得强调的是，支柱产业的更替，并不只是意味着产业比较优势的获得或丧失，往往还意味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变化。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支撑了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领先于世界。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孕育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便成为世界的中心。有资料表明，棉纺织工业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产业部门，英国生产的棉纺织品约有80%远销海外，所消耗的棉花几乎全部靠国外供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电力、汽车制造、钢铁和化工等重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英国由于产业转换相对较慢，原来所形成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得不让位于在生产电气化、汽车工业以及化学工业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和德国。

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选择是事关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选择得好，就有利于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发展；选择得不好，则将无助于山西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选择，必须严格坚持比较优势的原则。

必须说明，比较优势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概念。因为，在计划条件下，要素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计划来配置，各产业不

存在通过市场吸引和获取要素资源的条件，也就无所谓比较优势。所以说，比较优势主要还是一种市场比较优势，是一种由市场来比较、来判定的优势。市场比较优势的本质则是利益比较优势。因为，市场总是通过资源使用效率、资源回报率的高低进行资源分配的。也所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必然是一项能够提供更多产出和更多回报的产业。

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简单地比较就可以笼统地说出比如生态农业相对于石油农业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通过较为复杂的比较我们就能够得出某一产业相对于另外的一种产业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话，那么，站在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这个时点上，要为山西选择一项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运用复杂得多的知识进行复杂得多的比较。因为，经济发展到今天，一项产业往往具有某几个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其它的方面却是比较劣势；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项产业往往在地区市场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却毫无优势可言；更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一旦某个产业或行业出现了大于其它产业、行业的盈利空间，就会马上引发资源流动，形成洼地效应，引发新的资源迅速、大量地注入，将其填平。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日益成为一种优势、劣势共存的相对性优势。特别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更使得原有的产业比较优势日益成为一种稍纵即逝的短暂的优势。况且，一项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培育、成长，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新产业、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涌现，都可能使该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被迅速地削弱。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对山西诸多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较

为客观地界定，并据此提出山西未来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体的构想。

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界定，至少应当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比较：

首先，要在省内各产业间进行产业关联度的比较。

在不同产业间进行比较优势的比较，由于诸多方面的不可比性，因此这种比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选择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在不同产业间进行各方面的比较。这种比较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就是产业关联度及关联效益。关联度越高，关联效益越好，越具有比较优势，也就越具有成长为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潜力。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的历史中，大都曾经把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汽车工业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及关联效益所使然。根据日本的资料，汽车工业对其它产业的直接关联度为1:2.4—2.7，汽车的消费带动其它产业1.5倍以上的需求。美国的汽车工业使用了本国25%的钢铁、60%的橡胶、50%的锻铁、33%的锌、17.5%的铝和40%的石油消耗。经销汽车的商行的收入占美国批发商业的17%和零售商业的24%。西方学者玛丽安·凯勒在《汽车大战——占领21世纪的竞赛》一书中就说："汽车业是一个需要有自己的基础结构的巨型产业，包括能源、技术、电子、电脑程序、工程和各种学科，以及许多不同的系统与材料——塑料、橡胶、石化材料、机床、金属压铸、输送设备和油漆装潢系统。为了制造汽车，必须聚集各种资源及人才，构成一国经济的重大部分。没有汽车，许多工业无法生存。"

战略性支柱产业之所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就

是因为它具有带动全局的功能，正如汽车工业在许多国家曾经起到过的功能那样。一项产业要成为山西的战略支柱，同样必须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度和关联效益，必须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的发展。综合省内诸多产业的比较优势，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关联效益，能够成为未来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首推旅游业，其次是机电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信息产业等。

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度和良好的关联效益。另外，机电工业由于其在工业体系中的基础性、手段性地位，也与诸多行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明显的关联效益，在上游有利于带动山西材料加工业的发展，在下游则有利于山西整个工业体系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整体效益的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信息产业则是推动山西经济信息化、知识化、高新技术化的重要力量，关系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其次，要在国际国内范围进行相同产业的多层次的综合比较。

一项产业是否具有成长为山西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潜力，必须进行多层次的比较：一是在区域市场范围内要有强大的比较优势；二是在国内市场要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三是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同一产业的比较总是具有较高的可比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的简易性。相反，要确定一项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就必须在各个层次都进行错综复杂的综合比较，包括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成本、价格、环境、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比较。一项产业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优势，而在其它方面却是比较劣势。比如山西的煤炭，就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但在水资源、环境资源等方面都是明显的比较劣势。但是，综合各方面的情

况，旅游产业、清洁能源产业都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市场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山西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煤炭资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强的资源优势；冶金产业、重矿机械产业、新特材料产业则是山西具有一定国内市场比较优势的产业。

再次，在国际国内范围进行市场成长性的比较。

必须强调说明，我们在这里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山西的未来选择战略性支柱产业，是就产业未来成长、发展的可能性大小的比较，而不是现状的比较。所以，这种比较必然是以未来市场为导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一项产业要成长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成长空间，有良好的市场预期和良好的成长性。没有良好的市场成长性的产业，不可能成为山西未来的战略支柱，不可能促进山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可能带动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信息产业是最具有市场成长性的产业（不过，对山西而言，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信息产业，不是有没有优势、能不能发展的问题，而是必须发展，必须加速、大力发展的问题）；清洁能源产业、旅游业、冶金工业、新型建材业、机电产业、生态农业，则既是山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也是具有良好市场成长性的产业。

三、重点培育八大产业
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体

根据对全省诸产业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结合对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把握，山西应重点发展八大优势产业，并努力使之成为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体。

1．*发展煤炭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

目前，世界能源消费市场的构成大体为：石油占40%，煤炭和天然气各占25%，核能、水能等约占10%。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有限，石油只够开采45年，天然气只够开采65年，所以，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用煤炭作为能源，相同的发热量，其成本相当于石油的30%，天然气的40%。有专家预测，到2010年，使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能源的成本将是煤炭的8倍，甚至更高。且石油和天然气的70%集中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前苏联。所以，受市场价格、能源安全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日益加紧寻求新的清洁能源的支持。从长远看，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能、植物能等新型、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能源必将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但是，新型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利用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煤炭则由于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资源总量、市场价格的优势，必将成为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能源。

我国缺油、少气、富煤，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基础能

源的国家之一。煤炭在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水煤浆项目工程时就明确表示："从战略上看，中国煤炭资源丰富，要充分发挥煤的作用，中国的燃料在相当长的时期要依靠煤，要把水煤浆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有资料分析认为，到2010年，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然占到60%左右；至2050年这个比例也不会低于50%。在国家有关部门编制的《能源发展专项规划》中，到2005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2000年也只是下降了3.88个百分点。

山西是全国煤炭生产和输出的第一大省。统计资料表明，从1980—1999年，山西累计生产煤炭50.24亿吨，约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0%；累计出省煤炭外调量为35.58亿吨，年外运量占到全国煤炭净外调量的80%以上；火电年发电量占全国的5.43%，出省外输电量却占到全省发电量的近20%；焦炭产量占全国的40.2%，出省外运量占全省产量的38.6%；焦炭出口占全国的72%，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40%。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山西作为全国能源基地的地位不会变，能源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也不会变，在近期内更无可替代。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山西能源产业由污染能源向清洁能源、由一次能源向多次能源、由低效能源向高效能源的转化情况，取决于山西由传统的煤炭能源基地向新型、清洁、高效能源基地转变的进程。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已限制高硫煤的调入，北京二环以内已撤掉所有的燃煤锅炉，改燃天然气。西安设立无煤区，彻底拆除区域内的燃煤锅炉并严格禁止原煤入城。国家在近年内也将关停一大批小火电、小

玻璃、小水泥等“五小”企业，这意味着全国将失去1.27亿吨的煤炭市场。一切都表明，清洁煤炭能源将是今后国内、国际煤炭能源市场的主导，传统的高污染、低效率的煤炭将逐步退出市场。

近年来，山东、河南、内蒙古、陕西、安徽、云南等产煤大省区都已经开始能源产业清洁化的进程，而且步子很快，对山西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速结构调整，狠抓洗选煤、型煤、水煤浆、煤化工、煤层气、煤炭气化、液化等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以洁净煤技术控制煤炭开发利用的全过程，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能源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清洁煤炭能源基地。

2. 大力发展旅游业，推动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强省转变。

旅游消费是当今国际消费市场的主流消费形式之一。国际研究资料表明，旅游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仅次于食品和住房的第三大消费需求项目。国际旅游消费市场的规模高达五、六千亿美元。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出国旅游已经成为普通居民的消费时尚。尤其是在德国、日本、美国等主要客源输出国，每年的出国旅游消费支出都高达五、六百亿美元。中国文化对于欧美等国的旅游者向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山西则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及独特的自然风景资源。所以说，发展旅游业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在国内，随着我国加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旅游消费也正成为城乡居民的一项重要消费活动。2000年，我国国内旅游收入高达3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高出GDP增长速度4.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小康社会

的继续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地区向富裕阶段加速挺进，我国国内旅游市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说，山西发展旅游业也有着一个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

旅游业是一项具有极高产业关联度和关联效益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将带动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饮食、轻工业、外贸、金融、房地产、邮电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旅游业与70多个行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旅游部门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收入就能增加4.3元；旅游部门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机会。有关专家对我国旅游产业发展资料的分析也表明，在我国，旅游游业每增加1元收入，服务业产值就会增加10元；旅游业每增加1美元外汇收入，利用外资金额就会增加5.9美元。

旅游业还是一项与自然生态环境冲突最少、亲和力最大的资源节约型产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许多旅游资源都是可再生性资源，大部分旅游资源都可以反复消费、永续利用。发展旅游业还有利于当地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另外，国际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旅游业是一项切实有效的脱贫致富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因发展旅游而实现脱贫致富的例子，举不胜举，五台县的台怀镇，就是山西发展旅游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典型。

我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全国部分省市早在“八五”、“九五”时期，就已经把旅游业列为支柱产业、重点产业优先发展。山西是全国的旅游资源大省，虽然有着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人

文资源和独特优美的自然风景资源，资源综合优势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旅游产业却长期滞后。所以，无论是从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角度；无论是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提高山西人民综合生活质量的角度，我们都必须把旅游业作为山西未来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来发展，推动山西尽快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强省转变。

3. *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高新技术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与国内先进省区相比，山西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处于比较劣势。但是，山西具有一批国家级的科研院所，具有一批技术水平很高的军工企业，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在特色高新技术（比如清洁能源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生物制药、生物制种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开发出了一批具有技术领先优势和一定产业基础的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国家有关部门编制的“十五”计划重点专项规划明确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布局目标就是在“十五”期间形成若干专业化分工、各具特色、具有一定产业集聚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山西的特色化的高新技术，大都与我省传统产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发展特色化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符合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目标，而且，能够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所以说，特色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完全有条件成为山西未来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4. 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山西工业化，提升产业结构水平。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21 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是以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世纪。离开了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支撑，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将难以实现。同样，离开了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支撑，山西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将化为泡影。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包含了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类专业信息网、建设基础性资源数据库和公共信息资源服务中心；推进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增加产品的信息技术附加值；推进企业上网工程，实施电子政务工程，引导企业与政府信息网络同步发展等内容。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山西“十五”计划《纲要》也将信息化列为“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八大战略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蕴含着落后国家或地区赶超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性机遇。当前，山西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上网、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果说，一项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必须具备比较优势的话，那么，把知识信息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发展，并不是比较的结果，而是山西抢抓机遇，以信息技术武装全省社会经济生活，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须的战略选择。

5. 发展特色机电产业，建设全国性机电工业基地。

当前，我国正处在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依靠机电装备工业来实现的，离开了机电装备工业，产业结构不仅不可能升级，而且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约束，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将趋于停滞。有资料表明，我国企业目前的设备水平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工业企业设备近 1/5 老化严重，超期服役率达 40%，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 25～30 年以上。可以说，装备水平落后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低、消耗大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大力提高机电装备工业的水平。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急需的许多装备，尤其是重要的大型成套设备，严重依赖国外市场，每年设备投资的 60% 以上用于进口。因此，发展机电产业，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此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机电产业，尤其是重型机械产业是山西的传统优势产业，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开发和生产能力较强。推进全省结构调整，这个优势不能丢，必须看准市场，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山西装备工业的整体水平，为全省、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提供更多先进、适用的现代化技术装备，以培育和发展机电战略性支柱产业为动力，把山西建设成全国性的机电装备工业基地。

6. 发展新特材料产业，建设全国性新特材料基地。

以不锈钢、特殊钢、铝、镁等为主的冶金材料工业，也是山西传统的优势产业。不锈钢、特殊钢是山西的特色拳头产品，产量占全国的 30% 以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山西铝矿资源储

量占全国的41%，居全国首位，氧化铝产量居全国第一，兼有丰富的煤电资源，成本优势明显。据有关专家测算，国内市场氧化铝、电解铝、铝材的需求年均增长将保持10%以上的幅度，一半以上需要进口。山西金属镁的产量居全国第一，在国际市场上都有很强的竞争能力。通过大力发展材料支柱产业，加速高新技术与材料工业的结合，山西完全有条件成为全国性的新特材料基地。

7. 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特色化生态农业基地。

农业结构调整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是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全省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气候干旱少雨，无霜期短等自然原因，山西发展传统农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山西多山地，山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0%，农业气候资源丰富，具有多样化特征，特色农副产品，诸如小杂粮、干鲜果、蔬菜、制种和中药材等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许多农副产品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落后，致使全省农业资源的开发严重不足，影响到全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农产品市场需求日益向食品保健、营养、安全、特色方向发展。从而也为山西农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抓住机遇，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性的特色化、生态化农副产品基地，实现山西农业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全省社会经济的大跨越，成为山西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

8.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硬环境。

基础设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八五”、“九五”以来，山西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在水利、交通、电信、城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仍然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能不能继续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是关系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缓，以及我国经济调整转型的发展，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战略。同时，也为山西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良好机遇。只有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水平，山西才能抓住这个机遇，为全省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山西加强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构筑具有山西区域特色的经济带提供基本条件。如大运高速公路的建设，可以构筑山西南北呼应、辐射两翼的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这对于山西推进经济结构布局调整，促进山西经济与东西部经济融合，展示山西新形象、新面貌，加快山西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山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任务。

十年"三步走"三年初步见效
结构调整的战略步骤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山西由于深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更多、更大。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恰当的战略步骤。战略步骤从来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战略步骤安排得当，就会促进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相反，步骤安排失当，或者欲速不达，或者前松后紧，势必影响战略大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要想取得应有的进展，就必须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可行的战略步骤。

一、潜力产品：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任何战略部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都是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突破口的选择事关战略安排的成败得失。突破口选择得好，选择得准，就会迅速取得战略性突破，有力地推进战略进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突破口选择得不好、不准，则势必事倍而功半，不仅影响整体的战略推进，甚至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战略目标的实现。山西以往的经济结构调整，之所以成效不大，当然直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战略目标、战略思路制定方面，也与突破口选择不当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

那么，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应该从哪里取得突破呢？

有些同志以为，既然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理所当然就应该从产业、行业上寻求突破，以重点产业、优势行业为突破口，加大投资力度，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

还有些同志则以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是别的，而是企业，所以，应该从企业方面寻求突破，以重点企业、优势企业为突破口，以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全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些意见都不无道理，但也都存在明显的不足。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一点，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资金实力为支撑的。所以，突破口的选择必须与资金实力相一致。山西目前的可用财力十分有限，利用社会资金的能力、手段也多有不足。以重点产业、优势行业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势必需要大规模的资金供应，远远超出山西的资金承受能力。所以说，从产业、行业的角度寻求结构调整的突破，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这些产业和行业包括了众多的企业、众多的产品，以此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操作难度相当大，面对的风险也相当高。

与此相比，以重点、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作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倒不失为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问题在于山西优势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不足以承担结构调整的重任。优势企业的产品多种多样，既有比较好的产品，也有面临被市场淘汰的产品，加之许多企业并未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以企业作为突破口，也存在一个操作难度大，风险程度高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基于对山西省情实际的把握，吸取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外省市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省委省政府确立了以潜力产品作为新一轮结构调整突破口的战略思路。

其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只能是产品,而不是产业、行业或者企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注意规避市场风险。相比较而言,产业、行业或者企业,由于外延过于宽泛,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大,因而风险系数也更高,规避风险的成本也更为昂贵。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对某一产业、行业的所有企业,或者对某个企业的所有产品,不加区别地予以支持。具体到产品,其面对的国际国内市场尽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是市场前景更易于判定,因而,以产品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风险系数要小得多,规避风险的成本也要低得多,成功的机会也更大。另外,以产品为突破口,也有利于降低操作执行的难度,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尤其有利于政府部门有效地控制低水平重复和雷同,避免出现恶性竞争,提高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所以说,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只能是产品,而不是其它。

其二,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并不是优势产品,更不是劣势产品,而是潜力产品。

潜力产品不同于优势产品。优势产品是指在现实市场中已经获得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潜力产品则是指还没有形成优势,但是发展潜力巨大的产品,而且我们又拥有发展这种产品的优越条件。之所以要强调潜力产品与优势产品的区别,意在说明:(1)在现实市场中,山西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不多,或者不如说是很少,如果以优势产品为突破口的话,很难有效地带动全省经济结构的调整。(2)山西的优势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山西现有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反映;是以现有经济结构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

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在现有经济结构框架内,在现有产品结构基础上的内部比较的结果,是长期资源导向的结果。如果以优势产品作为突破口,极有可能造成现有经济结构的固化,重复过去调而不动、越调越不合理的老路。(3)任何产品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山西的优势产品是相对于现有市场而言的。当然,不否认有些优势产品还具有一个较长的生命周期。但是,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目前的许多优势产品其比较优势将不断丧失,有的甚至将退出市场。所以,优势产品只能是山西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不能作为战略突破口。

其三,以潜力产品为突破口,有利于强化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未来市场导向性,促进企业改制进步。

潜力产品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产品,其着眼点是未来的市场需求。以潜力产品为突破口,有利于逐步克服和扭转山西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资源导向意识,克服和扭转山西以往那种有什么资源就生产什么产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问市场需求的落后的产品经济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以潜力产品为突破口,较好地契合了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在于对产业体系进行质的改造,推进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随着一个又一个潜力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投产、达效,通过量的积累,将逐步达到对产业体系的质的改造。由于这些产品都是以未来一定时期的市场为导向的,如果把握得好,实施得好,那么就会在未来一个时期形成一种巨大的累积效应,推动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全省经济结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正是由于潜力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

性,因而以潜力产品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还可以促进微观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

其四,潜力产品不仅要具有市场潜力,而且要具有产业带动力,要带动相关企业、行业、产业的发展,并最终达到对现有产业体系的质的改造。

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小产品完全可以做出大市场,成为大产业。2000 年 9 月份的《经济日报》曾登载一篇《"麻雀"变"凤凰"的奇迹》的文章,说广东中山市聚龙集团投资 1000 万元,从 1998 年 11 月开始生产"圣雅伦"指甲钳,如今品种多达 200 多种,热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销售额达到 4000 多万元,带动了当地的劳动就业及相关企业、行业的发展。一个小小的指甲钳尚且能够从"麻雀"变成"凤凰",山西的潜力产品更应该做出大市场、大产业。为此,山西省政府制定了选择潜力产品的标准:一是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带动性,一种潜力产品在生产规模化后,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以上;二是成长性好,市场空间大,国内外市场需求强劲;三是技术先进,核心技术起点高;四是附加值高,规模效益突出,能迅速增加收益,壮大全省经济实力;五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据此,全省共选择出 20 类 200 多项潜力产品,总投资 450 多亿元,完成后实现销售收入、利税等,都将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将使全省经济实力迈上一个新台阶,推动全省经济获得一个实实在在的跨越性的发展。

从三年多的结构调整实践情况看,以潜力产品作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是正确的,潜力产品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结构调整起始阶段目标：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任务。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这种长期性与紧迫性，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要处理好这一对矛盾，推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就必须做到长计划、短安排，既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也要有一个近期的战略安排。为此，省委、省政府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三年起始阶段的目标，即：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

我认为，这个三年的阶段性目标是比较合理的，既符合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战略的要求，也顾及到了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困难；既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也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同时还是一个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目标。

1. 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并不是在最近三、五年才形成的，而是改革开放以后 20 多年来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在当时及其以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国家政策、体制制度、经济发展压力、内部战略失误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这一切都决定了山西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说，要在三年之内使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其困难之大，任务之重，都是难以想象的。

其一，山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产业结构超重，而任何一种产业结构都是投资结构的反映。有资料表明，从1981年至1998年，在山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能源工业所占的比重为53.6%，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能耗工业所占的比重为29.7%，机械电子等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只有6.7%。正是这种投资结构推动山西产业结构不断向重型化发展。1978年，山西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为23.5:76.5，而到1998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发展为19.2:80.8；1978年，山西采掘工业与加工业的产值比例为68.3:31.7，到1998年则发展成为77.9:22.1。这种超重型的产业结构，其特性之一就是结构刚性强、惯性大、转换能力差。换句话说就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大。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屡屡徒劳无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是长期积累和形成的不合理的存量结构，然而，山西的存量结构规模十分庞大，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仅以煤炭工业为例，全省煤炭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占到全省固定资产原值的36.8%，煤炭工业的职工占到全省职工总数的25.7%，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到全省工业增加值的37%。全省以煤炭、炼焦、化工、黑色冶炼和电力为主的五大行业，其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产总值、实现利税的平均集中度高达71.78%。如此庞大的存量规模调整，涉及资产、人员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再加上整体资产总量大、资产的专用性强、流动性差，比如煤矿的矿井、大型冶炼设备等，都很难改做它用。所以说，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从增量结构的调整入手，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然而，山西政府财力及社会财力又都十分有限，以有限的财力投入增量结构的调整，并以此启动庞大、凝重的存量结构的调整，必然困难重重。

其三，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经济实力的大小强弱和所有制分配结构状况，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和条件，然而，山西企业的经济实力却普遍弱小。象南风化工这样的既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又具有较好经营机制、管理机制的企业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山西的企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在全省投资构成中，国有经济比全国高出 7.5 个百分点，而集体和其它经济成分比全国低 7.6 个百分点；在就业构成中，国有经济比全国高出 41.3 个百分点，集体经济和其它经济成分比全国低 41.7 个百分点；在工业产出构成中，国有经济比全国高出 33.7 个百分点。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 9%，比全国低 15 个百分点。这种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维护和强化着传统经济体制在新时期的延续，限制和制约着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直接造成山西不合理的分配结构，给山西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极大的困难。

其四，政府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然而，政府财力有限，职能转变滞后，制约着结构调整有效开展。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既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更需要政府职能转换所带来的巨大支持力。山西各级政府不仅财力有限，财力支持难以保证，政府职能的转换也严重落后。近年来，尽管我们把政府职能转换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也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方法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抓调产、下命令、压指标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其五，市场化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山西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着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进入新世纪，山西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行业封锁、地区分割，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相互恶性竞争，存在着非

常严重的内陆意识和保守观念。经济的发展要求要素资源的自由、快速、合理的流动，山西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把庞大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资产，通过流动、重组变成活的资源。但是，市场体系不健全，特别是要素市场不完善，极大地制约和阻碍着这种流动。以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例，资本市场是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获得资本动力的主要渠道，山西结构调整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但是，直到2000年底，山西也只有17家上市公司，累计上市融资仅仅107亿元，而此前上海市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114家，约融资540亿元。深圳市的规模与太原市相近，但上市公司达到67家，比山西全省还多出50家，募集资金约260亿元，比山西多出150多亿元。

以上种种情况都充分说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近期目标，确实是一个艰巨复杂、困难重重的目标。

2. 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近期目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和诸多问题，但是，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战略要求来看，从山西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三年初见成效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战略目标看，是要构建一个新型综合高效的产业体系和混合型、规范化的所有制分配结构体系。但是，山西经济结构体系的现实状况与这一目标相去甚远。所谓"万事开头难"，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看前三年。前三年是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整体战略打基础的阶段，是整体战略的起

步阶段,如果前三年能够在调整方面初见成效,这就为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前三年不能有所成效,那么,势必延缓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整体战略的进程。所以说,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三年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从山西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也是这样。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并不是山西调整结构的最终目标,我们不是为了调整结构而调整结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结构调整促进山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山西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遏制山西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与全国水平越拉越大的不良势头。

回顾山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除了能源重化工基地大规模建设期间及以后个别年份,经济增长高于全国水平外,1985 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山西经济增长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1978 年到 1998 年间,全国 GDP 年平均增幅为 10.8%,而山西为 8.7%;1980 年,山西全省人均 GDP 为 442 元,在全国排第 12 位,而 1998 年为 5090 元,排位下降至第 17 位;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 1980 年在全国排第 23 位,1998 年则排到第 29 位。1980 年山西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为 2.41%,排第 16 位,1998 年的比重下降到 2.01%,排第 19 位,全省工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收入等重要经济技术指标沦落到全国的末流地位。山西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遏制住这种下滑势头,然后才谈得上逐步追赶全国平均水平。要遏制住这个下滑势头,就必须使经济结构特别是其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在短期之内有所成效。

山西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也对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近期目标提出了异常紧迫的要求。根据调查,全省因煤炭开采

造成1300平方公里的采空区,地表塌陷面积达520平方公里,且仍以每年2.5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每年因采煤排放的矿井废水约4亿吨,平均吨煤排水量1.62立方米,大量废水排入河道,地表水系受到严重污染。全省每年因燃煤排放的烟尘为145万吨,二氧化硫为150万吨。太原市TSP日均浓度为国家二级标准的1.89倍,二氧化硫为国家二级标准的3.52倍。全省煤矸石堆存总量已达9亿多吨,电厂粉煤灰1亿多吨,且仍以每年3000万吨和450万吨的速度递增。目前,全省每平方公里大气污染负荷为全国平均值的1.6倍,焦炭生产地区则高达6~10倍,烟尘排放量为全国平均值的6.5倍。省会太原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四级,在被监测的43个大城市中,空气质量倒数第一,被国际环境组织公布为全球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首。近年来,山西省城乡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上世纪70年代上升了30—50%,恶性肿瘤占厂矿职工死亡人数的30%,各类呼吸道疾病、职业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明显增加。1989~1996年,全省仅国有经济单位的医疗卫生和丧葬抚恤费便增加了10.4倍,即使排除物价上涨因素,其涨幅也高达5.45倍,为全国同期的10.9倍。

长期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使山西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成本,山西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不能迅速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那么山西的自然生态必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而长此以往,山西将真正成为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要求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三年初见成效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当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成为现实,西部大开发也已经大规模展开,山西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如果不能在短期

内有所成效，那么，山西结构调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巨大的压力。因此，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角度，从山西在国际国内经济体系中定位的角度，经济结构调整在三年之内初见成效，也都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3. 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是一个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任何一个目标都可能存在三种情况，即：目标过高、目标过低、目标适中。我们常常说要“跳起来摘果子”。目标过低，不用跳，站着或者坐着就可以摘到果子，这样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跳起来仍然摘不到果子，这样的目标也不是一个好的目标，只有跳起来才能摘到果子，这样的目标才是一个科学合理恰当的目标。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年目标，就可以形容为“跳起来摘果子吃”。只有跳起来才能摘到果子，只要跳起来就能摘到果子。这是为山西结构调整三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经过2000年一年的努力，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功起步。概括起来讲，就是认识统一了，项目启动了，相应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

标志之一：工业结构调整已经整体展开。省里拿出7亿元贴息入股资金重点扶持了98个产业链长、带动作用强、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潜力产品项目，到年底全部项目均已启动，25个项目已经投产或部分投产，有些重点项目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11个地市也筹资3亿多元，重点支持了192个项目的开发建设。

标志之二：以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2000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加45.6亿元，贡献份额为34.2%。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接待海外旅游人数增长19.9%，国内旅游

人数增长21.9%,外汇收入增长17.3%,国内旅游收入增长22.5%。旅游业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突出。各类城乡交易市场发展到2000多个,8个地市的住房二级市场相继开放,辐射全省的商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通信业快速发展,广电网已成为省内第二条大型信息通道。

标志之三: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全省蔬菜和小杂粮面积增长35%和16%,干鲜果经济林新增150万亩,发展订单250农业万亩。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基地、商品粮基地和小杂粮基地开始形成。传统的粗放型农业正在向以小杂粮、干鲜果、草食畜牧、蔬菜等四大产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发展。全年省统计考核的29种主要产品,有15种增长幅度在20%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全省营业收入超亿元的加工龙头企业已达7家。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06元,增幅达9.5%。

标志之四:所有制结构调整速度加快。2000年底,全省私营企业发展到26万多户,注册资本比上年增长17.1%,总产值增长60%。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到2700多家,年产值和科工贸总收入达到70多亿元,上缴利税超过3亿元,安置下岗职工4万人。

标志之五:投资结构和产业内部增长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其中,更新改造投资扭转了连年下滑的趋势,当年增长38.7%,大大超过基建投资增幅。非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2%,比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出10.2个百分点。产业内部增长结构趋于优化,第二产业、社会服务业、科技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1.5%、25.1%和79.9%。

2001年是山西结构调整三年目标的入轨之年,我们也已经基本入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全省大中型企业正在加速走上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尤其是承担潜力产品项目的企业，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结构调整基本走上融资市场化的轨道。2000 年，省里用于扶持调产项目的贴息入股资金是 7 亿元。但是，调动银行和社会投入调产的资金达 100 亿元以上，大部分都是市场化融资。2001 年省里确定的扶持资金是 10 亿元，但是到 8 月份，列入计划的 34 个项目已落实 71.6 亿元资金，并完成投资 53.3 亿元。市场化融资已经成为调产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在加速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内涵发展型轨道。2001 年新开工重点 30 项目个，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所占比重比去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民营项目比重达 50%，投入产出比将提高 50% 以上。有些项目如太钢 40 万吨不锈钢冷轧薄板、关铝 20 万吨电解铝改造、山焦 30 万吨煤焦油加工、三维 1,4—丁二醇下游系列产品改造等初步列入国家第二批“双高一优”计划和国家第六批国债专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走向政企分开、良性发展的轨道。所有调产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选择项目、政府选择企业、银行独立审贷成为全省调产项目的基本运作模式。2001 年上半年，全省仅工业调产项目就有 101 项已经落实银行贷款意向，贷款意向金额 77.7 亿元。政府、银行、企业之间正在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

2002 年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三年目标的最后一年，也是初见成效之年。随着全省结构调整的平稳起步和顺利入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也已初见成效。

2002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1950 亿元，增长 10.5%，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年。

全省上下形成合力,大力实施"1311"调产规划,成功实现了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目标。特色农业结构初步形成,优质杂粮、干鲜果、草食畜、蔬菜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加快,半数以上的传统农业县初步转变为新型特色农业县。2002年经济作物的比重比1997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正在由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变。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东西两山杂粮和干果生产区、中南部果菜生产区的建设初具规模。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100户龙头企业有85户进入操作阶段,其中25户建成投产。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正在显现。工业多元产业结构体系初步形成。首先,传统产业的结构初步优化。64个工业重点调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等产业开发了一批新产品。煤炭产业关井压产,布局趋于合理,原煤洗选比例达到60%以上,洁净化、集团化、多元化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传统产业的关联度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煤～铁～钢和煤～电～铝两大产业链。其次,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形成。70个高新技术项目有53个开工建设,其中27个竣工投产。重点培育的新材料、生物制药、先进制造技术、环保技术、企业信息化等领域都有大的进展。全省工业结构初步形成了传统产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业为重点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初步形成。平遥古城、大同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鹳雀楼复建工程全部完成,全省有10个旅游景区列入国家4A级景区。太原、大同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2年与1997年相比,旅游企业增长3倍多,直接从业人员增长近50%,总收入年均增长20.3%。服务业的结构不断改善,传统服务业的规模和效益明显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逐步上升。民营经济发展加快,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全省涌现出一批规模大、档次高、效益好的民营企业，86户企业资产达亿元以上，12户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以上这些都是结构调整所带来积极效应。结构调整三年的最大成效就是一批潜力产品项目的启动，并且已有部分投产达效。据对全省规模以上增幅较大的100家工业企业的调查统计，调产项目达效所带来的增量约占全省工业增量的1/3。在2000年投产3个项目的基础上，2001年已有4个项目建成投产，确保投产的18个重点调产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可新增销售收入46亿元，利润7.1亿元，税金2.6亿元，拉动全省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全省结构调整的三年目标，经过努力初见成效。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到2005年明显见效、到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水平的目标，以及长期目标——新型综合高效的产业体系和混合型、规范化的所有制分配结构体系建立，实现全省经济社会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三、结构调整的总体战略部署："三步走"战略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国际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都证明，经济结构调整总是分阶段推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结构调整的这种阶段性规律，必然要求其战略指导必须科学地把握各个阶段的特征，紧扣各个阶段的主题。否则，战略指导就会失去它的指导意义，结构调整的整体战略进程势必被延误。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战略应该是分三个阶段来完成的，总体战略部署是实施"三步走"战略。通过实施"三步走"调整战

略,逐步实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从而构建山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新型经济结构,奠定把山西建设成为"绿色山西、节水山西、数字山西、信用山西"的新型经济基础。

"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是山西结构调整总体战略的第一步,只是一个三年期的工作部署。就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规律来讲,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到实现工业高级化阶段,再到"后工业化"即信息化、知识化阶段,至少要经过5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从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来看,山西"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安排,只是一个"小三步"走的概念,要最终实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体系的一体化、特色化、生态化、知识化和综合高效,实现山西所有制分配结构的混合型、规范化,山西还必须有一个10年左右的"中三步走"和30—50年跨度的"大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三轮"三步走"战略。

值得强调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只是山西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结构调整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安排必须立足于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及其本质的把握。否则,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的之矢。

今后50年,是我国"三步走"战略的最后一步,主要任务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这50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工业高级化阶段,二是经济社会的知识化阶段。这两个阶段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织、互为促进的,但总体而言,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高级化的实现要先于知识化。这既是全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也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基于这种判断,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战略安排应该是:经过三轮"三步走",到2050年,完全实现产业结构体系的一体化、

特色化、生态化、知识化和综合高效，建立起“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完全实现对所有制分配结构调整改革目标，建立起混合型、规范化、完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轮“三步走”：

第一轮“三步走”即“小三步走”，以3年为期，从2000年到2002年，使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第一轮“三步走”尽管更多地具有工作安排的性质，但这三年却是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启动阶段，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轮“三步走”：

第二轮“三步走”即“中三步走”，以10年为期，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工业高级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知识化和生态化为导向的新型产业发展阶段，初步构建起“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是以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和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型所有制分配结构调整发展阶段，初步建立起混合型、规范化的基本经济体制。第二轮三步走的第一步仍然是2000～2002年的“小三步走”。这一步可以称为局部重点突破阶段，即潜力产品、重点项目在培育、成长方面要有所突破，确保全省结构调整战略得以启动；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和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上，政策和环境要有突破，为下一步所有制和分配的改革调整创造基本条件。所谓“三年初见成效”，其意义应该更多地定位在战略启动的方面，而不应企求潜力产品项目创造更多的现实效益，也不应企求所有制和分配结构有一个明显的改观。

第二步是在三年初见成效的基础上，从2003年开始，到2005

年，再用三年时间，使结构调整明显见效。主要标志是：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镇化率、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提高，人均指标和结构性指标与全国的差距明显缩小；1311 项目做大做强，全省形成 32 个旗舰型企业，12 个国家级名牌产品，8 大支柱性产品；总量控制取得重大进展，环境生态状况明显改观。到 2005 年，要利用和发挥潜力产品项目的带动作用，使全省结构调整由以潜力产品为主的重点突破，发展为整体突破、跟进升级，形成重点与整体之间的联动效应，潜力产品、重点项目达产达效，整体产业体系的结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所有制和分配结构也进入加快调整的轨道。

第三步是在明显见效、整体突破的基础上，到 2010 年"十五"计划结束时，结构调整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水平，基本实现全省的工业高级化，初步形成新型高效的产业体系的框架；基本实现所有制分配结构调整改革的目标，初步形成混合型、规范化的基本经济体制。

第二轮"三步走"战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基本实现工业高级化为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则以初步形成新型高效产业体系的框架为目标。这两个战略目标看起来似乎有点高，但是，从国际国内实践经验来看，并非高不可攀。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欧美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开始到完成工业高级化大概用了 200 年左右的时间，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高级化阶段则用了大约 50 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亚洲"四小龙"从工业化开始到基本实现工业高级化，所用的时间则要短得多，大概用了 30～40 年左右的时间。比如韩国，其工业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到 80 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高级化任务，况且韩国工业化的起始条件尚且不如当时的中

国。

就国内而论，工业化起始于建国以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原原因，一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还没有完成初始工业化。如果以改革开放做为中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始点，那么，到进入工业化中期只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以深圳、上海等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开始进入工业高级化阶段。以深圳为例，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小渔村，现在已经是一座基本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这座城市的历史到现在也不过21年。山西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山西目前的条件与深圳建市时的条件相比要好得多，尽管两者具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工业高级化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只不过山西的工业高级化既不同于亚洲“四小”当时的工业化，也不同于深圳最初的工业化。亚洲“四小”当时的工业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目标指向是传统的工业化，而山西目前的工业高级化则具有更多的时代内容，是包含更多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内容的新型工业化。

同样，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初步构建起“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和混合型、规范化的所有制分配结构体系，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二轮“三步走”战略目标，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正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要求。

第三轮“三步走”：

第三轮“三步走”即“大三步走”，以50年为期，从2000年到2050年，建立起新型综合高效的产业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山西社会经济的完全现代化，建设一个全新的山西。

第三轮"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从 2000 年起，用 10 年左右时间，到 2010 年结构调整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水平，全省基本实现工业高级化，初步构建新型高效产业体系框架和混合型、规范化的基本经济体制，为山西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新型产业基础和体制基础。

第二步是从 2011 年起，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大约到 2025 年，基本建立起"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和混合型，规范化的基本经济体制，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第三步是从 2026 年起，用大约 25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改造，实现以建立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为主导的新型产业体系目标和混合型、规范化、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建设一个全新的山西。第三轮"三步走"战略，社会经济发展以新型现代化，即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和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产业体系发展也以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新型综合高效产业体系为目标。这两个目标与山西目前的经济体制及产业体系的现实相对照，落差更大，似乎是两个更加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纵观国际国内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这两个目标同样是可以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经典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工业高级化。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范畴。许多学者开始接受并运用诸如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数字化社会、智能社会等概念。有些学者把这种趋势概括归纳为第二次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1》(2001

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经过大量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保持1970～1998年第一次现代化发展速度不变，低收入国家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平均尚需18年，世界平均还需要9年；目前已有部分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起步期或发展期；如仍按此速度，到2050年，发达国家将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中等发达国家将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中国的三步走战略是要在205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那么，也就是说到2050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各地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实现一条水平线的现代化。按此报告，东部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发展较快的个别地区，在2050年左右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少数地区则接近于基本实现。

山西是全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山西真正落后于全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落后的原因多种多样，经济结构不合理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目前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结构调整就是山西摆脱落后、追赶全国水平乃至东部发达地区水平的战略进行曲。只要战略部署得当，实施得当，克服自身和外部的诸多羁绊，到2050年，山西加入全国第二次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不是没有可能的。山西在明清之际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富庶之地，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强省，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全国中上游的省份，今后如果我们结构调整的决心更坚强一点，方向把握得更准一点，眼光更远一点，思想更开放一点，创新更大胆一点，发展步伐更快一点、大一点，那么，在未来50年内，一个新型高效的产业体系必将形成，山西肯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一个全新的山西，一个绿色的、现代化的山西，将肯定能够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编

战略重点（上）：传统产业改造

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冶金、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为战略支柱的产业结构。这些传统产业的资产存量占到山西总资产存量的很大比重，它们为山西所生产和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税、就业人数等，都影响着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这些传统产业同时又都具有初级化、低效化、竞争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特征。从山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要求，首先必须把山西传统产业的重组、改造、升级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实现传统产业基地向新型产业基地的转型。



建设清洁能源基地　再造能源产业优势

煤炭能源产业是山西产业体系中高居首位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多年来,山西的煤炭能源产业,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煤炭能源产业也是山西产业体系中高居首位的问题产业,山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煤炭能源产业相关。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能源基地战略的西移,尤其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日益深入和煤炭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发展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抓住机遇,把山西建设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煤炭清洁能源基地,不仅是事关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关系到山西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重大课题。

一、煤炭能源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山西煤炭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确立了山西在全国的煤炭能源基地的战略地位。近几年来,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一些大煤田、大油田、大气田的相继发现,国家能源基地建设的重心也逐渐西移。但是,山西作为全国能源基

地的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山西产煤大省、煤炭能源输出大省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山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全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煤炭能源产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山西必须重点发展和调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是因为：

1. 从煤炭能源产业在山西产业体系的地位与优势来讲，煤炭能源产业是山西的龙头产业，对于山西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众所周知，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煤炭产业大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八五”计划末，根据山西资源禀赋特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基地建设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国家及省内各级政府对煤炭能源产业均采取了倾斜政策，由此逐步形成了山西以煤炭能源产业为核心支柱的、具有山西特色的区域产业结构体系。20多年来，煤炭能源产业在山西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其产值、利税、从业人员都是其他产业无可比拟的，冶金、化工、机械等高载能支柱产业，都高度依赖煤炭能源这一龙头产业。以2000年为例，山西省工农业总产值约为1200亿元，煤炭及相关产业产值就达380亿元，占到总产值的30%以上；煤炭及相关产业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占到1/3以上。煤炭能源产业对于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地位和龙头老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山西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效益的高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与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山西来讲，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重中之重，是煤炭能源产业的改造升级；煤炭能源产业能否通过调整，实现由初级化粗放型向高级化集约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山西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水平,并将成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2. 从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在全国的地位与优势来看,山西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对于支持国家经济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国多煤少油的能源状况,决定了煤炭能源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山西长期以来作为全国的煤炭能源产业大省,煤炭的产量和调出量分别占到全国的1/3和3/4,为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山西年产原煤3亿吨左右,占全国煤炭产量的1/3,年调出量占全国省际调出量的80%。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像神华集团、兖矿集团这样一些新的煤炭能源企业,但是,山西作为国家长期重点建设的传统煤炭能源基地,在全国能源产业格局中仍然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优势和创新开发优势。这决定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山西作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地位不会因此而改变,仍将在煤炭电力能源供给方面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山西正在规划实施建设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着力把原煤转化为清洁燃料,到2005年将形成3000万吨的水煤浆生产能力。这将极大地巩固和提高山西在全国煤炭能源产业格局中的地位。水煤浆成本低、效能高、污染小,可代油、代气燃烧,有着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山西有煤层气资源近10万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3,其主要集中地河东煤田、沁水煤田均靠近“西气东输”管线,可作为我国“西气东输”可靠的战略储备资源。山西新型煤炭能源基地的建设,对于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减少我国用于进口原油、重油的外汇开支,降低燃料使用成本,支持我国经济发展,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

此，山西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把煤炭能源产业作为重中之重，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整体需要。

3. 从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在世界的地位与优势来说，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在世界能源产业格局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开发前景。

我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山西又是我国第一产煤大省。山西年煤炭出口量达 3000 万吨以上，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山西炼焦煤储量达 1450 亿吨，约占全国炼焦煤储量的 56.8%；无烟煤储量 495 亿吨，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46%。这两种宝贵的煤种资源优势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山西焦炭业年生产能力达 5000 万吨，2000 年全球焦炭贸易量为 1800 万吨，其中我国出口焦炭 1100 万吨，而山西直接或间接出口就达 730 多万吨，占全国焦炭出口量的 70% 左右，占世界市场焦炭贸易量的 40% 以上，直接影响着国际焦炭市场。据专家预测，在全球石油天然气储量产量严重不足、核能安全性难以保证、新的可广泛使用的替代能源还未出现的情况下，煤炭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并有可能取代石油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主角。随着世界煤炭能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洁净煤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运用，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正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山西完全有条件抓住机遇，通过洁净煤技术的产业化运用，再造煤炭能源产业的优势，巩固和提高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战略地位。

二、高效清洁能源产业：煤炭能源产业改造升级的必由之路

从煤炭能源资源总量和现实生产能力而论，山西完全可以称

得上是世界性的煤炭能源基地。但是,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现在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的战略地位正在变得岌岌可危。山西传统的粗放型、初级化的煤炭能源产业,其发展已经难以为继。能源产品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主要是煤炭能源产品初级、单一,缺乏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山西输出的能源商品中,原煤占到72.64%,电力仅为2.7%,能源加工转化比仅为44.95%,煤炭能源产业综合利用状况差,资源回采率低下,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严重不足。以煤炭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基础而形成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率低下,经营粗放,产品低档,煤炭在终端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达62.67%,能耗水平高,能源浪费严重。这不仅使山西低度化的产业和低级化的产品在我国进入相对过剩经济时期后,市场竞争力日益衰退,而且更重要的是严重破坏了山西的生态环境,使山西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形势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成为世界级的能源消耗污染区,大大降低了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状况说明,煤炭能源产业作为山西基础性的战略支柱产业,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作出新的战略选择,追踪世界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潮流,用煤炭清洁技术全面改造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建设高效清洁能源产业。这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调整的必然战略选择。

1. 建设高效清洁能源产业是推动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和整个产业体系升级转型,实现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山西煤炭能源工业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已形成相当大的存量基础,其发展状况、运行水平和运行质量对山西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西产业体系特别是第二产业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以能源材料产业为主导，并高度依赖煤炭能源这一支柱性产业。作为山西基础性、支柱性产业的煤炭能源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含量低，产品初级化，发展粗放化，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这已成为山西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通过煤炭能源产业的改造升级，盘活这块存量，为其发展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提高其运行的水平和质量，是涉及山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情。山西传统的煤炭能源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关键在于实现煤炭能源产业由一次能源向多次能源、低效能源向高效能源、污染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化，全面转变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式，推动山西能源基地的整体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和加速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调整、改造、升级和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对于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讲，这一战略选择的重要意义在于：调整煤炭能源工业结构，通过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洁净能源产品，有利于发挥山西现有结构存量的优势，为能源工业的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为山西能源工业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并进而带动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通过建立能源工业清洁生产示范园区，促进科技进步，形成多能互补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建立起高效益的洁净化能源生产消费系统，提高能源效率，增加能源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形成一种高新技术产业孕育、发展、壮大的有效机制；搞好清洁生产，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在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清洁高效能源产品，实现能源生产自身清洁化的同时，确保能源工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实现能源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进一步唤醒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转换全社会的发展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通过建设若干能源发展的生态经

济带和经济区,加速完成对全省能源生产力布局的宏观调整和对现有能源开发利用企业的根本性改造,最大限度地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类能源资源,使全省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2. 建设清洁能源产业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适应国内市场、支持全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国内市场需求来看,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达72%左右,2010年这一比重为65%,2050年预计为50%。可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煤炭能源在以量的增长满足了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后,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由小康到富裕、数量到质量的转化,面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素质的提高,面对我国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大背景,国内煤炭能源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悄然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一方面表现出对煤炭能源需求总量的一步步减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高效、精加工能源产品的旺盛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洁净化、高效化开发无疑将成为我国在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时需要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从国家产业政策看,我国国民经济以粗放型发展的模式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第一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之后,国民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换,我国"十五"时期及2015年前能源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也由此转变为保证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保持生态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价值产业将会被低污染、低消耗、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所取代,具有一定创新、竞争能力和较高知识技术含量的新型产业将会成为新一轮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能源工业的清洁化和高科技化在所难免。从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取向来看，当我国以速度型、数量型的增长目标模式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迈进之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开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转化。在国民经济实现由小康向富裕迈进的过程中，以舒适、健康、环境为核心的生活质量目标将会成为重要的目标取向，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清洁高效的能源产业体系来作支撑。因此，山西建设清洁能源产业，不仅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改造升级、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在国内市场、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参与国内竞争，支持全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3. 建设清洁能源产业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适应世界煤炭能源产业发展趋势和潮流，迎接国际竞争与挑战的客观要求。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动力，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息息相关。人类能源开发利用的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 4 种：一是在较低水平上的可持续使用模式。这一模式是指人类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能源消耗还比较少，尽管也存在局部的能源短缺和环境破坏，但总体上未产生全球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人类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限制在较低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二是对廉价能源毫无节制的消耗模式。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以及价格低廉的石油，有力地支持了一大批工业化国家的振兴和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这一时期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说是掠夺性的，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只不过这种损害被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明所掩盖。三是节制开发和珍惜使用模式。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人类意识到矿物燃料总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开始节省能源、提高能效并积极寻求替代能源。四是环境容量要求人类对自己的能源开发消费行为加以限制的模式。人们意识到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人类不对毫无节制的能源开发消费行为加以控制,环境资源将先于能源资源而枯竭。因此,对能源的利用应该首先限制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发展将难以为继。可见,资源短缺特别是各类不可再生资源的日渐枯竭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能源开发利用的两大限制性因素。据统计,在近代工业化革命短短的一、二百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矿物燃料的消耗增加了30倍。更重要的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80%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生的,人类消耗矿物燃烧的能力的60%也是在50年代以后产生的。如果人类能源开发利用的模式不尽快改变,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近30年来,"石油危机"的发生和现代工业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使人们对不可再生矿产能源贮量的有限性及其使用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空间环境,迫使人们在合理利用常规能源及寻求可再生新能源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研究。近来年,能源科技与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工程、新材料研究等,共同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高技术群。世界能源由此步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以天然气、煤层气等气体能源为主体,以液化煤、气化煤等传统矿物能源的洁净化技术和核裂变技术为两翼,将共同构成世界能源消费的主体。其主要趋势和特点,一是高新技术成果在能源工业领域迅速推广应用,使整个能源工业迅速由低技术向高技术过渡。目前,几乎所有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成就都已迅速地渗透到能源勘探、开发、加工、转换、输送、利用的各个环节。如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设计、制造、监控、管理、信息处理

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各种高性能合金、工程塑料、合成树脂、高性能复合结构材料、光纤等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利用微生物探矿、控制有害物质含量和对煤炭用细菌脱硫的各种研究与工业性试验；利用航天技术进行资源普查、处理危险事故，建立高效率、高能量太阳能发电站等等。能源产量的增长愈来愈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二是能源产品正在向洁净化、精细化、高质量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常规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送和综合利用技术将会出现显著进展和重大突破。为了扩大煤炭的应用，煤炭地下气化、硫化床燃烧技术以及煤炭气化、液化技术正在得到高度重视。目前，利用煤地下气化上接燃烧发电的试验性电站，3 万千瓦的常压硫化床燃烧技术装备，日处理能力 70～120 吨煤的煤气化试验设备以及日处理 250 吨的液化试验装备均已建成。三是节能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国家除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工艺，应用节能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上积极努力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储能技术上的突破。目前日本正在进行 1KW 级～10KW 级～100KW 级电池的研究与试制。美国已设计成功最大储量为 10000MWH 的超导磁体储能装置，各种机械能、自然能、化学能、热能的储存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此起彼伏。四是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瞩目。在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以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研究最为迅速。就煤炭能源产业发展而言，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具备成熟的洁净煤技术，并已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运用，长期以来制约煤炭能源使用的环境因素正在被突破。美国目前 56% 的电力来自煤炭，由于采用先进的硫化床和烟道气脱硫技术，电厂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上完全达到了环保标准。德国的鲁尔区是煤、电、钢集中的生产区，由于先进的生产、

转化和深加工技术,所生产的原煤绝大部分都经深加工转化了,因而,尽管是产煤大区,那里却是一片蓝天。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开发和发展模式,仍基本处于粗放型、低级化、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阶段,所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是以原煤等初级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常常因为环保问题被拒之门外,或征收高额关税,严重制约了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与世界先进的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初级化的煤炭能源产业,必然遭受发达国家高级化煤炭能源产业的巨大冲击和挑战。拓展国际市场,迎接国际的竞争和挑战,就必须顺应世界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加快推进山西洁净煤技术的产业化运用,建设新型的高效的清洁能源基地,实现山西传统煤炭能源产业的整体升级和转型。

三、建设高效清洁能源基地的途径和措施

建设高效清洁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必须开展大规模的战略重组、体制改革、产销联合、信息化改造、综合开发和深加工转化,尤其要大力发展以清洁煤焦电油气等为代表的新型清洁能源,下大力气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

1. 制订山西能源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快山西清洁能源区规划建设步伐。

20 世纪 80 年代初,山西曾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对指导山西能源基地的发展建设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山西必须有效借鉴前 20 年山西能源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制订新阶段的山西能源工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以解

决能源工业长远发展的目标、方针、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解决能源与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各种交叉问题，解决能源工业内部煤炭、电力等各部门之间，开发、加工、转换、运销和利用各环节之间的各种问题，解决能源工业与其它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解决能源工业发展的政策、目标、运行效果和外部不经济状况的衡量评价等问题。

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必须尽快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布局调整，实现能源生产、加工、转换全过程的清洁化，努力建立能源新技术开发推广体系，促进能源产品结构调整，逐步建成以洁净煤技术、煤层气开发、醇基燃料生产为重点的洁净能源产品生产基地。必须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废弃物的资源化开发利用，积极发展绿色无公害产品，建成具有山西特色的环保产业体系。必须切实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实现能源消费过程的污染控制。要抓紧开发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形成生产能力。尤其是要搞好生态环境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基础和条件，增强全省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将山西建成中国以煤为主的系列化洁净能源产品技术的生产开发基地和清洁生产示范区。山西清洁能源区在经济功能上可通过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洁净能源产品，为山西能源工业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进一步增强全省经济发展的后劲；在技术功能上，可通过开发一批优质产品，建成一批示范园区，形成一种高新技术产业孕育、发展、壮大的有效机制；在社会功能上，可通过彻底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唤醒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转换全社会的发展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在生态功能上，可通过建设若干生态经济带域，完成对全省能源生产力布局的宏观调整和现有能源开发利用企业的根本性改造，使全省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清洁能源区的建设，

最终使山西成为全国煤炭系列洁净能源产品和技术的生产开发基地、全国能源开发利用全过程清洁化控制的示范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样板省,实现全省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的目的。

2. 调整产品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在企业改制、改组、改造的过程中,要根据市场需求,大力调整能源产品结构,积极加快战略领先产业的培育,尽快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经济效益。为此,必须将能源工业的发展切实转换到以科技进步为主的轨道上,以科技进步为先导,在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利用、节约及环境整治方面超前发展,最终在全国形成一个能源科技发展高地。能源产品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是:形成以电力、洗选、型煤、水煤浆、焦炉煤气、甲醇等为主体的高效清洁能源产品体系,大力开发利用煤层(成)气资源,加强煤炭气化、液化研究,积极开发研制清洁高效的先进燃烧工艺、技术和装备。按照这一目标,要大规模发展大型机焦,提高焦化产品综合回收能力,并延续生产焦炉煤气、甲醇等洁净二次能源;利用煤矸石、煤泥、洗中煤进行循环硫化床发电和燃用、提供电力、热力、蒸汽等二次能源;积极开发研制甲醇、二甲醚等汽柴油产品的燃烧替代技术与设备;推广各类洁净能源产品及其燃烧利用技术。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选择建议从下述几方面考虑:一是清洁能源产品开发。应通过建立能源新技术创新开发推广体系,促进能源产品结构调整,逐步建成以洁净煤技术、煤层气开发、醇基燃料生产为重点的洁净能源产品生产基地。山西洁净煤技术产品的开发要从以干法和省水型洗选,发展多品种、多用途型煤为重点的

煤炭加工技术；以气、液化和大型机焦为重点的煤炭转化技术；以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硫化床燃烧、固硫脱硫、水煤浆、配煤燃用等为重点的煤炭燃烧及后处理技术等方面展开。煤层气开发利用应考虑向发电、化工、居民燃用领域内的开发及向周边地区的商业化供应。开发醇基液体燃料，包括醇基燃料炉具、甲醇洁净燃料汽车等。其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沼气等能源的开发利用。二是建设围绕清洁能源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和利用而形成的制造业。三是开发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实现污染物零排放的产品、工艺、技术和装备等。四是能源开发利用排放污染物治理及资源综合利用的工艺、技术、装备等。特别要重视围绕废弃物的资源化开发利用、绿色无公害产品等，建成具有山西特色的环保产业体系。五是开发能源储、运、用过程中的各种高科技产品，如燃料电池、光伏电池、电磁能、太阳能炉具等。

根据山西发展基础和现状，在近期内，要把焦炉改造及其排放物综合利用、洁净煤技术、高效节能产品开发和环保产业，作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切入点重点给予扶持发展。焦炉改造及其排放物综合利用建议抓好下述几方面工作：一是彻底取缔土焦生产，大面积推广先进高效炉型；二是调整焦化工业生产布局，联网向城镇居民供给优质焦炉煤气，从根本上改变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三是建立煤焦油集中加工中心，使之规模化；四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细化工。

洁净煤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建议从下述两个方面起步：一是洁净煤产品的开发，如干法洗选工艺设备、防水固硫型煤、煤炭气化、结合焦炉改造工程联网生产焦炉煤气、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燃料电池、煤制甲醇及其它液体燃料等；二是围绕上述产品而开发生产的各类配套产品及技术装备制造业，如型煤生产设备、粘结剂开

发、包装业、运输设施等,气体燃料的生产、运输、利用设备,大型焦炉生产改造的机械装备、新型耐火材料等,各类液体燃料生产装备、燃用炉具、灵活燃料汽车等。

高效节能产品的开发可在现有基础上,从下述几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是山西各类煤种高效燃烧利用的装置、工艺、设备;二是各种节煤、节电,节油、节气、节水的装置、工艺、设备;三是各类工业余热、废能综合利用的装置、工艺、设备;四是各种节能保温材料的开发。

环保产业的发展培育建议重点抓好下述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开发已有一定发展基础和较大市场空间,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环保产品,如汽车尾气净化器、高效节能环保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检测仪等;二是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面广量大、危害较大的废弃物综合利用,如煤矸石综合利用、粉煤灰综合利用、煤泥洗中煤综合利用、矿渣综合利用等;三是加强围绕上述领域的各类技术工艺和设备的开发生产。

3. 利用资本市场,加速能源产业的战略性重组。

集团化、规模化是煤炭能源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巨大推动力,一方面通过企业优化重组,以优势项目、优势产品为龙头组建优势企业集团,实行强强联合,优化企业资产的存量结构。如以拥有铁路专用线的煤矿为核心层组建集团;以区域性的煤炭运销企业为核心组建集团;以大型国有煤矿为核心组建集团;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煤炭集团等。煤炭产运销企业改组联合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集团化改造和公司化改组,逐步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的煤炭集团公司,通过资产授权或参股经营,使全省煤炭工业资产结构实

现重组,壮大产业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大跨行业的股权改造与重组的力度,鼓励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改组联合,鼓励上下游之间、各产品链之间的企业改组联合,使全省能源企业的产权结构在空间分布和行业分布上都发生较大变化;同时,还必须加强产学研之间、科工贸之间的结合,建立科技开发联合体。能源企业通过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以后,剥离部分优良资产,积极上市运作。要通过资本市场以多种形式将煤炭、电力、冶金、化工、建材、铁路、公路、港口等行业的企业进行联合发展,实现煤炭能源产业跨行业,跨地区转移;对有一定发展基础,人才、市场条件较好的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要加快非煤产业的发展,尽快培育可取代煤炭的新型产业,实现单一煤炭产业向多业并举的产业转移。鼓励煤矿与其它产业部门的企业以"煤电铝"、"煤电建材"、"煤电化"等多种形式进行联合,实现各产业间的相互参股、控股,拓展煤炭企业的发展空间。对那些优质煤炭资源开采已接近枯竭,后备资源接替较为困难,或煤质较差,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可按照国家煤炭开采战略西移的布署,有计划、有步骤地与有关地区以独资、合股、联营等多种形式,参与当地优质煤炭资源的开发,实现跨地区的战略转移。

4. 强化资源管理,规范开采秩序。

山西煤炭能源产业的开发、利用,必须本着"开采与保护并重,保持适度开发强度,进一步提高资源回收率"的方针,整顿资源开采秩序,强化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实行关井压产、关小扶大。对不达 30 万吨/年的小煤矿要逐步淘汰。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对能源资源进行适度开发,综合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对特殊稀缺的能源资源,应划定战略保护

区,实行保护性开采。

要通过规范产权,发育市场,加强调控,形成健康正常的能源资源开发秩序。应制定严厉的资源开发环境整治法规,努力减少能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代价。为此,必须明晰能源资源产权关系,引入市场机制,建立能源资源所有者与经营开发者之间的正常交易关系;完善能源资源开发保护和综合利用的法规制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大作用,明确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改革现行能源资源管理体制,建立能源资源产权制度,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使能源资源做到有偿开发经营,其开发权和经营权能够有序进行转让,使资源价值能够在能源商品价格中有所反映,形成良性循环的能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机制;对能源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和制度,对资源回采及其共伴生资源开发、土地复垦、矸石处理利用、矿井废水处理等均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考核评价体系,并借助政策和市场机制加以引导约束;要进一步完善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能源资源开发的环境损耗补偿制度,并使之在资源价格中得以反映,坚决取消不利于能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的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借助价格手段,实现能源资源在开发利用中的合理配置。此外,应改变矿产资源税的征收办法。目前,我们采取的是从销售的煤炭中征税的办法,应改为向领取矿产资源证的煤矿征税。

对优质主焦煤、优质无烟煤,必须划定战略性保护区,限定开采能力和资源回采率,实行保护性开发。在主焦煤产区,新建矿井能力不低于60万吨/年;在动力煤、无烟煤煤田,新建矿井能力不低于30万吨/年。严格限制新增矿点,严格禁止将优质煤种换牌转用、浪费资源的做法。在保持现有生产能力、产量、规模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本着改造一批、巩固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对现有乡

镇煤矿实施联营改造，革新采煤方法，实现规模生产经营，对逾期达不到的，要坚决关闭。特别是对一些稀缺保护性煤种，必须坚决采取严厉的法律、经济手段，限期达标。制定切合山西实际的各煤层回收率下限，限定时间进行采煤方法改革，实现正规开采，提高资源回收率。对劣质煤层配采，废弃矿区复采和解放呆滞煤量的煤矿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要加强全省能源发展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管评价体系的建设，加快能源地方立法，制订、修订、完善有关能源资源管理、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和消费利用的各项地方法规、实施细则及各行业、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建立各级能源经济制度，完善企业能源会计系统；建立政策方案、技术选择；建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研究总结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能源、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决策程序，在财务分析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环境分析与评价。

5.规范流通秩序，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源产品营销体系。

山西煤炭企业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条块分割，对外竞争无序，压价竞销，互相残杀，成为制约煤炭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强化全省煤炭销售的宏观管理工作，推动全省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以煤炭运销为龙头，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如可考虑由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和国有重点煤矿联合成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五大煤炭销售公司，与当地用户按规定的价格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然后根据原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的计划进行配额管理，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按配额将煤炭发往五大销地公司，由五大公司与用户进行结算，结算后按发

煤量将货款即时返还国有重点煤矿和省煤炭运销企业。还可考虑在全国煤炭主要集散地,如秦皇岛港、天津港和日照港成立由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和国有重点煤矿参加的煤炭销售公司,对全省经三个港口下水中转的煤炭,由这三个公司统一接收,然后转给销地的五大公司。集散地煤炭公司要负责全省经三个港口下水中转煤炭的配煤、质量检验、平仓价格协调,由物价部门核定控制一定的利润水平,除地方矿上交各项煤炭专项基金外,其余全部返还煤炭生产企业。各国有重点煤矿、地市煤炭运销分公司可以按区域、按煤种组建多种形式的煤炭销售联合体:一是以各矿务局运销公司和地市煤炭运销分公司以运销系统资产为纽带成立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二是以煤炭外销量作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三是按区域组建由国有重点煤矿和地市煤炭运销分公司参加的煤炭销售联合体;四是成立以洗精煤为主的焦煤销售有限公司;五是与煤矿签订煤炭销售契约,实行煤炭销售代理制等,在主要煤炭集散地和销售地与当地煤炭经营单位组建多种形式的煤炭销售机构,建立和完善煤炭销售网络。在上述基础上,待条件成熟后,煤炭产销还必须在资金、技术、人才、规模、市场等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尤其在售价上和决定售价之后的产量上,不妨学一学平衡世界石油贸易的"欧佩克",协商各自产量,统一对外售价,一个拳头出击。只有这样,山西焦炭业才会有新的天地和效益。要形成山西焦炭业的"欧佩克",一方面要压产,扶优汰劣,助大压小;另一方面要在营销上联合,或以产权为纽带组成产销一体的超大型企业集团,或保全多个法人实体,但在产量上协商控制,在营销上一致对外,以彻底解决现行体制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无序竞争的弊端。同时,要加快建立完善配套的用户支持服务系统,如通过建立研究开发部,帮助用户了解煤炭燃烧过程的机理,帮助用户解决煤炭利用过程中的各

类问题，提供从利用到环境治理的多种技术；通过建立销售部，帮助用户选择最佳运输方式、运输路线，以减少运输费用；通过建立市场服务部，为用户解决煤炭在称重、防冻过程中的各类技术工艺问题，搞好售后服务；鼓励企业尽快开发建立全面质量监视系统，实行计算机联网服务，以使合同煤保质、保量及时供应给用户。

6. 规范能源运输，加快能源运输业的发展。

山西作为全国能源生产基地，能源发展对交通运输有着较强的依附性。因此，完善能源运输方式，建立综合运输网络，降低能源运输损耗，提高能源运输效率，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环境损害，对缓解能源供需状况，保障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能源运输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加强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建立地区综合运输体系，改善能源传输方式，调整能源运输结构，增大洁净能源传输比重，提高运输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为此，必须加快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培育运输市场；规范交通运输部门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调整运输价格，增强交通运输发展潜力；大力推广代理制，积极组织铁路～公路～海运（水运）等联运服务；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配套能力，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电力、洁净煤产品、高耗能产品等二次能源外输与原煤运输相协调的能源传输结构；建立铁路、公路、管道、航空、索道、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的综合运输网络；搞好能源运输平衡调度，减少运力损失，实现运输动态平衡。

7. 拓展融资渠道，建立稳定可靠的能源工业发展资金保障体系。

转变能源工业的运行机制和增长方式，尽快调整投资模式，进

一步优化能源企业的资产结构,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机制,是山西能源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加政府对能源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政府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中的主导地位,确保一些优先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投资;要鼓励企业努力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多渠道投资,可考虑对能源企业建立资产登记系统,与国内其它产权交易市场联网交易,可将部分国有重点能源企业的闲置设备以入股的形式用于地方、集体企业的技术改造,也可采取托管的方式,将地方、集体的资产交给优势企业去经营;或者采取变卖、股权转让等形式,将国有资本逐渐从一些小型能源企业中置换出来,使之集中投向一些重大骨干项目。对外欠债务,可区别不同情况,或以入股形式解决,或实行债权债务转换;为保证山西能源工业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要尽快申请建立能源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效利用国内资本市场,促进能源工业持续发展;也可考虑在山西成立中国能源产业发展投资银行,发挥金融资本对中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的引导扶持作用,逐渐加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系;在一些改制、改组基本完成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组建集团财务公司,赋予其相应的部分金融职能,逐步开展投资业务。

8. 强化环境管理,正确处理煤炭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

煤炭能源产业是山西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解决山西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解决煤炭能源产业的环境管理问题。为此,必须在能源生产、加工、转化、消费领域,建立起全面科学的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形成系统完善、适应山西省情的能源环境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建成一批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点控制区、示

范小区和样板工程,使其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重点城市污染问题基本得到控制,能源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有效得到遏制,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初步形成。要逐步建立起有效的环境质量监测控制系统,制订颁布能源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办法,加强对各环节的环境监测,实施从勘探、开发、加工、转换、利用、传输的全过程环境管理;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收费制度和复垦保证金政策,减少环境代价;在全省范围内,根据不同地市产业结构特征和能源发展现状,结合国家双控区规划,划定环境控制区,分别制定不同的环境控制标准,明确水、气、渣的污染控制责任,在控制区内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推行控制区污染防治的行政负责人目标责任制;依靠科技进步,尽快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设备、技术、工艺,建立能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废弃物综合加工利用的示范工程;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组建环境与发展促进会,广泛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建立发展基金,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环保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建立有效的能源污染控制和管理制度:如建立并推广实行污染物排放申报和许可证管理制度,开征环境损耗补偿费,实行污染物有偿排放,对土地塌陷、地下水系破坏要建立起规范化的补偿管理制度,强化对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形成相应的制度,提高环境因素的决策权比重,使企业环境成本价值比和内部化,使环境损失在企业财务中有所体现。

9. 高度重视能源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煤炭能源产业都是山西的弱势产业,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制约煤炭能源产业的发展。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是山西煤炭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为

此,必须提高能源工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改善矿区社会基础设施,促进能源工业社区的发育完善,健全社会化服务网络;严格控制和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改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配套完善的职工就业、伤残、死亡、离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促进能源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运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必须改革现行能源投资管理体制和资金投入结构,在新建大型能源工矿区时,将基础设施和职工生活设施建设纳入其中,并给予合理的比例;对基础设施和职工居住条件极不完善的能源工矿区,要在有关政策上给予一定扶持,如在一定年限内,按吨煤或度电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工矿区发展基础设施、改善职工居住生活条件的基金;必须发挥政策和市场两种手段,引导能源工矿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针对多数能源工矿区地处农村,周围居民亦工亦农、工农杂居的特点,可将周围地区农村小康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相对集中规划与工矿区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速工矿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针对能源工业的产业特征,除建立正常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要考虑设立职工职业病防治基金、职工安全风险防治基金、职工伤残救护基金,以及企业转产和职工就业发展基金,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形成配套完善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

10. 进一步扩大煤炭能源产业的对外开放。

山西煤炭清洁能源产业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国内技术、资金、人才的支持。自从1992年巴西"地球首脑会议"以来,环境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环境项目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热点。山西初级化的煤炭能源产业和建立于其上的高能耗产业所造成的

生态环境污染世所皆知。山西建设清洁能源产业，一些环境保护项目如煤层气开发利用项目、水煤浆开发利用项目、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其它洁净能源利用项目，都比较容易争取到国际援助。因此，山西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加快对外开放交流的步伐。一方面要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围绕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企业，通过嫁接改造，加快企业的发展。如在煤层气开发利用领域、洁净煤技术开发领域、大型机焦建设领域、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等，均可广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及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际先进的煤炭生产、加工和转化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推广和应用，促进全省煤炭能源的清洁化改造、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切实鼓励和促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竞争实力，向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建设特新材料基地
实现材料产业群体升级

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山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山西具有发展材料产业的强大资源优势,经过多年的建设,也积累和形成了较为雄厚的生产能力。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及其在材料产业领域里的广泛应用,随着全球性材料产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山西材料产业的传统优势目前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如何推进材料产业的结构调整,实现材料产业的群体升级,创造新的产业优势,已经成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一、建设特新材料基地:材料产业改造升级的战略追求

材料产业,包括冶金、化工、建材三大类产业,都是山西工业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产值一般占到全省工业产值的 40～50%左右。所以,材料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标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合理化的问题,而且是要通过调整升级,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新的优势,最终把山西建设成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特新材料产业基地。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首先必须对国际国内材料产业发展升级的历史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充分的认识。

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一切工业之本。不难理解，没有高质量的材料，就不会有高效率的机器，就不会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在人类工业生产发展进程中，新材料始终是尖端工业生产开发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半导体、超耐热合金、光纤、超导体等材料的出现，那么，集成电路、喷气飞机、原子反应堆、光纤通信、磁悬浮列车等恐怕到现在都还只是一个美丽的科幻。在人类科技创新和进步过程中，新材料始终是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材料的不断更新、发展，人类技术进步和创新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就没有工业的不断进步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人类工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高新科技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人类日益进入一个新材料时代。在这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材料谁就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未来。为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发达国家，无不把新材料技术作为本国高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无不把新材料的研究和开发作为本国赢得高新科技竞争的关键。

美国是新经济的发源地，是高新科技的集大成者。1991 年 4 月 22 日，美国政府率先发布了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具体包括 6 个领域 22 项技术，首当其冲的一个领域就是材料领域，包括材料合成与加工技术、电子和光子材料、陶瓷、复合材料、高性能金属和合金 5 项技术。

欧盟提出的第四个“科技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了 5 大领域的 35 个重点研究项目，第二大领域就是工业与材料技术领域。

加拿大于 1992 年实施“关键技术支持计划”，工业材料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跟踪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发展，韩国政府提出了投入 60 亿美元的高科技研究与开发计划“G－7”。计划侧重研究 7 个领

域,首先就是新材料领域。

由此,以新材料研究与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材料产业的调整升级,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新材料技术成为全球高新科技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材料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结构材料和功能性材料。纵观全球材料产业发展升级的趋势,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结构材料向高性能复合材料方向发展。单一材料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陶瓷的脆弱性等等,但若把不同的材料适当组合便会产生比原有材料性能优越得多的新材料。金属、塑料和陶瓷是三大主要的结构材料,以它们作为基体材料,用连续纤维、晶体、颗粒等增强剂与之复合,获得高性能的复合材料,是结构材料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主要包括金属基复合材料、高级陶瓷、工程塑料、纤维复合材料等。当前,结构材料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趋势是纳米材料的发展。纳米材料被定义为颗粒或尺寸至少在一维尺度上小于100纳米,并且必须具有截然不同于块状材料的电学、磁学、光学、热学、化学或力学性能的一类材料体系。它包含所有的材料种类,如金属、陶瓷、半导体等。纳米技术就是组建和利用纳米材料来实现特有功能和智能作用的高科技先进技术。不少专家预言,纳米技术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它将使人类进入智能化的类生物体系的生产时代。

另一方面是功能性材料向特殊功能性材料方向发展。主要包括能源开发材料如温差发电机、太阳能电池等和节能材料,如超导材料。现在,功能性材料的智能化则成为功能性材料发展的又一主要趋势。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也更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智能材料能够灵敏地感应环境变化,在受损伤之后能够自动修复,具有生物体所具有的高级功能。智能材料由于其巨大的市场开发前

景日益受到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

以上就是全球材料产业发展升级的主要趋势。这些趋势不管名称如何，其本质都可以归纳为材料产业的知识化、生态化、高新技术化。完全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准大多取决于过去的"新"材料的发现，我们未来的生活也将主要建立在今天新材料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把研究、开发新材料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的材料产业则成为其淘汰、外移的对象。

应该说，材料产业尤其是新材料技术、前沿材料技术，更多的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容。事实上，新材料技术也正是我国"863"计划和攀登计划的主要领域。山西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绝不能因为某项产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绝对重要性，而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甚至以牺牲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代价，片面追求某一产业的畸形发展，重蹈把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视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覆辙。问题在于材料产业在山西国民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把冶金、化学材料、建材三大类产业合并计算，那么，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煤炭能源产业。以1998年为例，以上三大材料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就超过50%。山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当然要淘汰一批旧产业，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能力，发展一批新产业，建设新的先进的生产能力，但是，不可能甩掉现有的生产基础，重新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发展材料产业，推动现有材料产业群体升级，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然选择。

第一，山西具有发展材料产业的强大资源优势。

矿产资源是发展材料产业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山西境内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我国举足轻重的矿业大省。截至

1998年底,全省已发现的矿产达117种,其中有探明储量的矿产62种,矿产储量总潜在价值13.7万亿元,居全国第二位。保有储量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排序中位列前10位的矿产有32种,其中铝土矿、耐火粘土、铁矾土、沸石等矿产居全国首位。

第二,山西材料产业具有雄厚的现实生产能力。

目前,山西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达65种,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雄厚的生产能力。冶金工业是山西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在全国冶金行业中排第10位。主要产品包括生铁、铁合金、钢材、电解铝、氧化铝、电解铜等。化学工业在山西工业行业中居第四位,以煤化工为主,已初步形成化学矿、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料、有机化工、合成材料、橡胶加工、精细化工等门类较全的化学工业体系。建材工业也是山西工业的重要支柱,主要产品包括建筑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三大部分,共40余类,300多个品种,4000多个规格。

第三,山西具有发展材料产业的明显生产优势。

材料产业是山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尽管优势有所削弱,但在许多产品的生产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冶金工业为例。不锈钢、特殊钢就是山西的特色拳头产品,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山西铝矿储量、氧化铝产量居全国第一,竞争优势明显;镁工业产量和生产能力也居全国第一,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很强的竞争力。材料产业大都属于高耗能产业,山西具有丰富的煤电资源,同时又有雄厚的机电工业基础。这一切都为山西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必须明确,山西发展材料产业,绝不是要重复过去那种纯粹资源导向下的低水平平面扩张,而是要瞄准国际材料产业发展升级的趋势,瞄准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寻求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及

市场需求与省内产品优势的结合点，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特新材料产业基地。

根据这一目标，山西材料产业发展的现实重点是特殊钢(包括不锈钢、冷轧硅钢、汽车钢以及其它特殊钢品种)、铝电联产的铝材(包括建筑铝门窗、铝家俱、各种异型材、铝合金等)、新型建筑材料(包括耐火材料、墙体材料、装饰材料、玻璃纤维、玻璃钢、生态材料等)、化学材料(包括塑钢门窗、塑料管材如 PVC 管、PP－R 管、PE－X 管、铝塑复合管以及新型涂料、防水材料等)。

山西材料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发展高性能复合材料和特殊功能材料。比如：以铝、镁为基质，以石墨、碳化硅、氧化铝等为加固材料的轻质金属基复合材料；应用于半导体器件、多层电容器、传感器、光波导向材料、超导材料等方面的高级陶瓷；工程塑料，包括聚甲醛、聚碳酯、聚酰亚胺、氟聚合物等掺合聚合物和共混材料；以聚合物或橡胶为基质，以碳纤维、碳化硅、铝纤维等为掺入成份的纤维复合材料。功能材料则比如信息功能材料、超导材料、智能材料等。

高性能材料是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材料，也是山西材料产业发展升级的长远目标。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目标是山西无法达到的目标。这个问题应辩证地看。一方面山西的材料产业如果不瞄准世界材料产业发展的方向，跟踪世界材料产业发展的趋势，那么，山西材料产业的升级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最终将失去市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事在人为，只要紧紧跟踪世界材料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坚持不懈地推进山西材料产业的升级，那么，未来的国际材料市场，山西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以电子信息材料为例，高性能钕铁硼就是一种在计算机、马达、电动汽车、磁悬浮列车、油路磁化器、通讯电子等高新技术领域中具

有重要作用的特殊材料。山西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全国生产钕铁硼的企业有100多家,年生产能力5600吨,而山西仅运城恒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家的年生产能力就达2000吨,占全国生产能力的35.7%。山西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钕铁硼生产基地。

尤为可喜的是,在纳米材料这个当今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领域,山西也已经迈开了突破性的一步。据统计,全省已有17个正式立项和在建的纳米材料生产项目,投资规模近6亿元人民币。南风集团、兰花科创、太化公司、河津铝厂等大型企业已率先进入纳米材料技术领域,项目涉及碳酸钙、氧化锌、氯化镁、氟化钡、氧化硅、碳酸钡、洗涤剂、消毒材料等纳米材料制备和应用,技术档次均达到国内领先和先进水平。国家基础研究"973"计划纳米材料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立德评价:"山西的纳米技术产业化发展势头好,起点高,目前在纳米粉体材料领域已经形成一批在国内有显示度的企业,正在走出一条用产业化带动技术开发的路子。山西很可能在纳米技术产业化方面异军突起。"纳米技术是未来的启动技术。美国权威机构预测,20年后纳米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将抵得上整个20世纪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为此,美国政府于2000年出台了"纳米科技计划",由此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纳米热"和"纳米竞赛"。全球纳米科技研究投资在1997年还只有约3.5亿美元,2001年已骤升至约13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2001年在该领域的投入为4.23亿美元,2002年增加23%的投入。美国已有30多所大学成立了纳米研究中心。美国私营部门对于纳米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大致与联邦政府相当。在欧盟,纳米技术投入则占到欧盟公共资助经费总额的15%。除卢森堡外,欧盟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纳米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本从2001年开始实施"材料纳米技术七年计划",年投资50亿日元。

大阪61家公司联合组建了一个纳米技术研究所。韩国决定，在今后十年内投入1.48万亿韩元进行纳米技术开发。

山西纳米材料生机勃勃的产业化实践说明，山西的材料产业完全可以和世界前沿技术对接，创造出新的优势；山西也完全可以建设成为全国性、世界性的特新材料产业基地。

二、结构低度化：材料产业调整升级的主要障碍

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建设，山西材料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山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1999年为例，全省冶金材料工业的生产量已经达到生铁1454万吨，钢452万吨，其中不锈钢13.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29.20万吨的46.40%；钢材383万吨，其中不锈钢材14.8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40.46万吨的36.70%；铁合金16.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3%；电解铝1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265万吨的5.8%；氧化铝11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380万吨的30%。冶金材料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8.1%，已经超过机械工业，成为仅次于煤炭工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以煤化工为主的化学工业也已经成为全省工业体系中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1.22%，基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化肥工业独挑大梁的局面，形成了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化学工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全省化学材料、合成材料、化学建材也有所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山西材料工业的实力。

建材产业也不断上规模、上水平，产业地位稳步提升。尤其是近些年，全省相继建成了一批高标号水泥生产线，建成了太原玻璃

生产基地,发展了一批新型建材产品。全省大中型水泥企业中425#水泥的比例已达到了1/3以上。新型建材总产值的份额提高到1/4左右。山西正在成为国内重要的建材生产基地。

材料产业是山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山西具有着发展材料产业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和能源优势。除了丰富的煤炭资源、金属矿产资源外,还有丰富的非金属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储量大,而且分布广、品位高。在全省探明储量的各类矿产中,属建材非金属矿的就有24种,其中12种储量名列全国前10位,如石灰石、沸石、珍珠岩、耐火粘土、长石、玻璃用砂岩、石墨、花岗石、大理石、膨润土、石膏等。正是凭借着这些独特的条件,奠定了山西材料产业在全国的传统优势地位,促进了山西材料产业的不断发展。

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市场条件的变化,随着全球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型材料、特种材料的不断涌现,尤其是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的日益深入,山西材料产业的传统优势正在加速削弱、消失。绝大多数材料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山西材料产业要摆脱生存和发展的困难,挽回失去的优势,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加速推进材料产业的调整和升级。要使山西材料产业在调整升级方面真正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对目前山西材料产业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山西材料产业传统优势的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本的原因还是结构原因。结构低度化,不仅导致了山西材料产业传统优势的丧失,而且也是山西材料产业调整升级和建设特新材料基地的一个重大障碍。

1.,产品结构初级化,是山西材料产业优势削解的直接原因。

产品是产业的微观基础,没有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

就不可能有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的竞争力来源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档次,山西的材料产品恰恰是一般性大路产品多,高质量、高性能、高档次的产品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材料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情况下,山西材料产业的传统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

以冶金材料产品中的不锈钢产品为例。不锈钢是山西材料产业的拳头产品,其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但是,在省内,不锈钢占钢产量的比例还不足3%,不锈钢材占钢材的比例也只有3.87%(1999)。绝大部分产品还属于普通产品,如螺纹钢、普通小型材、线材、中厚板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西的钢铁工业主要还是一项炼铁、卖铁工业。世界平均铁钢比的水平在0.7以下,美国早在1979年就达到了0.68的水平,而山西1998年的铁钢比却高达3.54,在全国居首位。1998年,全国炼钢与轧钢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为1:1,而山西这一比例关系则高达1.26:1。

山西的建材工业也基本上是以初级产品为主体的工业。在建材工业的产值构成中,水泥及水泥制品、砖瓦、石灰和其它建筑材料的产值占到70%以上,但代表建材工业发展方向的生产玻璃纤维、玻璃钢等新型建材产品的矿物纤维工业,产值比重极其低下。全省墙体材料总产量约300亿块标准砖,而新型墙体材料只有约8%,为24亿块标准砖。

山西的化学工业基本上是以化工原料和化肥为主体的工业,其所占比重在60%以上,精细化工产品所占比重不超过10%。化工材料尤其是高性能的合成材料、新型化工材料成为山西整体材料工业的一个明显薄弱环节。

产品结构的初级化,直接导致了山西材料工业优势的逐步削

解。这种状况不改善,山西材料工业的调整升级就无从谈起。

2.技术结构低级化,是山西材料工业优势削解的内在原因。

产品结构的初级化源自技术结构的低级化,没有先进的技术,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高性能、高档次的产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的竞争优势首先就体现为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山西的材料工业基本上是以落后技术为主体的工业。这样,在全球新材料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山西材料产业传统优势的削解就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一是技术设备落后。技术设备是产品质量、性能的决定性条件,要生产出好的产品,必须要有好的设备。而技术设备落后恰恰是山西材料产品初级化的第一要因。以冶金材料工业为例。在国际上,钢铁工业技术设备日益向大型化、高速化、自动化、连续化方向发展,而山西在不锈钢冶炼与加工方面仍在广泛使用一些明显落后、国外已经淘汰的技术设备,如叠加薄板、复二重机、横列式轧机、初轧开坯机等,直接导致二次精炼配套性差、精炼比低(只占30%)、能耗高(太钢高出国际先进水平30～40%)、钢水质量差、连铸发展慢(连铸比仅为3%)、污染大,产品实物质量难以保证。

二是技术工艺落后。技术工艺也是产品质量、性能的主要保障,而山西材料工业的技术工艺水平也普遍落后。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国际上,炉外精炼、喷射冶金、连续铸锭及精整加工等先进工艺快速发展,尤其是欧美等钢铁强国,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在直接炼钢、连续炼钢和连铸连轧这三项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有效地缩短了工艺流程,减少了过多的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大型设备投入,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如日本川崎制铁应用铬矿石熔化还原法生产不锈钢,可以用独自开发的转炉从铬矿石直接

冶炼不锈钢，节约了 50～80% 的昂贵铬铁，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山西太钢则仍然广泛采用传统的模铸、开坯、叠压和单张冷轧等落后工艺流程，金属回收率、成材率难以提高。

再以化学材料产品合成橡胶为例。山西尽管只有氯丁橡胶一个品种，但是其产量却占到国内同类产品的 60% 左右，约 1.5 万吨，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竞争潜力的产品。然而，国际上生产氯丁橡胶主要采用丁二烯法工艺路线，山西采用的则是国际上已经淘汰的电石乙烯路线，不仅污染高、质量差，而且吨成本约高出国外 4000 元左右，致使其现实竞争能力大打折扣。化学材料 PVC 也是如此。山西是全国的电石生产大省，产量约占全国的 1/4，由于电石主要用于 PVC，所以山西的 PVC 理应具有较大的优势，然而，由于工艺落后，产品生产污染大、成本高、质量差，加上国际上已经淘汰了电石乙炔生产 PVC 的工艺，代之以更先进的工艺——乙烯氧氯法，致使山西 PVC 生产的传统优势消失殆尽。

再比如，水泥是山西建材工业的主要支柱，全省生产能力达 1800 万吨，然而，采用新型干法回转窑技术工艺的水泥生产能力只有约 180 万吨，占比约 10%。山西水泥生产绝大部分还是属于传统的落后的立窑技术工艺水平。

三是技术人才结构落后。技术设备也好，技术工艺也好，都是由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技术结构归根到底是技术人才的结构。山西材料工业技术结构的低级化，也最终归结为技术人才结构的低级化。一方面，材料工业企业职工构成中技术人才占比过低；另一方面，材料产业发展升级所需的掌握关键技术、具有技术创新和开发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尤为缺乏。正是这种人才结构状况，导致了山西材料工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的低级化、初级化，导致了山西材料工业优势的逐步丧失。

3.组织结构小型化,是山西材料工业优势削解的制度原因。

产品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技术、人才优势,一方面也来自于组织规模优势。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才能有效地降低产品的各种成本,包括技术、人力成本。也只有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先进技术和开发、应用,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培养,才是经济的和可能的。所以说,组织规模是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材料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然而,组织结构的小型化恰恰是山西材料产业的又一特征。

以水泥工业为例,水泥工业是山西材料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山西建材工业的主体产业,总体规模相当大,其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建材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然而,山西水泥工业的个体规模却严重小型化。1999 年,全省水泥产量 1427 万吨,水泥生产企业 600 多个,平均生产规模只有 2 万多吨。山西是国内水泥生产的大省,但是,600 多家水泥生产企业却无一进入中国水泥企业十强名单。即使最大的三家水泥企业——山西云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晋牌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狮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能力总和也只有安徽海螺集团生产能力的一半略强。1999 年,全省共有各类建材企业 1 万多家,工业总产值 125 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年产值只有 120 万元左右。

山西的冶金工业除了像太钢、河津铝厂、关铝这样的少数几个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外,也大多缺乏经济规模。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中前期发展起来的一大批小铁厂、小轧钢、小炼钢、小铁合金,如今多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山西金属镁的生产能力居全国第一,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一家达到象样的规模。

磁性材料是山西极具发展前途的优势产品,生产企业多达 20

多家，但是，除了运城恒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外，其它企业基本上也不具备规模。

4.布局结构分散化，是山西材料工业优势削解的体制原因。

产业发展的规律要求产业布局的一体化，然而，在传统体制下建设发展起来的山西材料工业，由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产业布局呈严重的分散化。实际上，山西材料工业组织结构的小型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布局结构分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布局结构的分散化，必然降低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降低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一方面是行业分割。材料工业既被人为地分割为冶金材料、化工材料、建筑材料，互相之间界线分明，又与行业外的产业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和协调。山西材料工业的优势，一部分来自于资源优势和本身的生产优势，另一部分则来自于行业以外的煤炭能源产业以及机械产业的协作优势。材料产业从布局到发展，只有密切注意与行业外产业的联系，才能真正形成、保持和发挥这种优势。但事实是，山西材料产业的布局基本上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为主，而较少考虑与行业外的协作。比如，铝工业是一个高耗能工业，煤—电—铝联营应当是山西铝工业的一大优势，但是，提出“煤—电—铝联营”也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而要真正做到煤—电—铝联营恐怕还要费一番周折，才能协调好这方那方的利益。材料工业与机械工业具有明显的产业链条关系，但是，事实上山西的材料工业与机械工业，即使不能说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但至少是缺乏应有的紧密协作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地方分割。山西材料工业的资源许多都是遍布性的，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布局的科学合理性。但是，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山西材料工业的布局却走上了一条平面扩张、低水平重复建

设的路子。各地有什么资源就上什么项目,不管技术、不问市场、不求规模,最终导致一哄而起,又一哄而下。有资料表明,从1999年至2001年,仅全省关闭的小高炉就达400余座;取缔的小水泥企业405家,关闭企业53户,压缩生产能力628万吨。

另外,即使在行业内部,生产力布局也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不配套。比如,钢铁工业的布局就明显存在采、选、烧不配套的问题。冶炼能力过大,矿山选矿跟不上,采矿大于选矿,烧结跟不上,选又大于烧,烧结又小于冶炼。太钢、长钢等企业在建设规模上都是按照接近铁矿资源的原则,按比例搞出来的,但由于矿山建设普遍跟不上,致使不得不大量从外调进矿石原料。有资料表明,1998年,山西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调进的金属矿石有627万吨,是调出金属矿石的4倍。这样,势必加大原料投入的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

以上就是山西材料工业的主要结构状况。正是这种结构的低度化,导致了山西材料工业优势的逐渐消失,也正是这种结构的低度化,成为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和特新材料基地建设的一个重大障碍。

三、改组、改制、改造:构建新特材料产业基地三部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世界材料工业进行结构大调整的一个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也不断涌现,材料产品高性能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历史趋势迅速形成。这个时期,也是山西材料工业迅速壮大的一个时期。然而,由于山西材料工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平面扩张、低水平重复的路子,由于忽视了世界材料工业发展的趋

势，致使山西材料工业在总量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发展质量却不断下降，建国以后长期积累形成的产业优势，在八、九十年代犹如昙花一现，便迅速消失，最终导致山西材料工业大而不新、大而不优、大而不强的现状。山西材料工业要想重获新生，就必须切实把握全球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历史趋势，改变平面扩张、低水平重复的思想，发展特新材料工业，把山西建设成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特新材料工业基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现有材料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改组、改制和改造。

1.改组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重要基础。

如前所述，材料工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即使有好的产品，也难以获得现实的竞争优势，而组织结构小型化恰恰是山西材料工业的一大症结。以不锈钢为例。有统计资料表明，太钢的不锈钢生产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 14.07%，造成太钢不锈钢生产成本明显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规模的问题。国际上一般不锈钢企业的规模都在 30 万吨以上，大的超过 100 万吨，太钢 1999 年的不锈钢生产规模只有 15 万吨。所以说，山西材料工业要发展升级，首先就必须解决组织结构小型化的症结，进行战略性改组。

一是必须坚决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坚决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设备。结构性过剩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全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一大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结出一句话：差的死不了，好的就活不下去。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山西，尤其适用于山西的材料工业（当然还有煤焦工业）。1999 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整顿，关闭“五小”，这个问题已经有所缓解，但还不等于真正解决。比如小水泥问题，山西还有一些新上水泥项目

属于日产1000吨的小型预热器回转窖工艺技术,还有不少水泥企业仍在进行立窖扩径、新建立窖。再比如电石企业的出路问题,电石乙炔工艺生产PVC、合成橡胶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二是必须加速推动材料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联合、兼并。资产重组是解决企业规模小型化问题,推进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的有效经济途径,也是世界材料工业结构调整的一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钢铁工业进行了一轮波澜壮阔的资产重组浪潮。在欧洲,仅在被人们称为"欧洲钢铁工业的兼并年和合理化改造年"的1997年,购并活动就涉及到欧洲的10家公司,这些公司的产能合计达4300万吨,占到欧洲产量的30%。1998年,宝钢、上海冶金控投公司、上海梅山冶金公司合并成立宝钢集团,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专家预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钢铁行业将掀起一轮声势浩大的企业资产重组热潮。近几年,山西钢铁行业的资产重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相比较而言,建材行业和化学材料行业的资产重组还显得非常滞后。山西材料工业不进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就难以真正迈开调整升级的步伐,就难以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山西材料工业资产重组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打破行业界线和地区分割;另一方面则在于排除行政干预,走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重组之路。

三是必须推动材料工业与相关工业的一体化协作。材料工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绝不仅限于在材料工业内部,山西材料工业的优势也不仅仅来源于材料工业。为此,必须推动材料工业与相关工业的一体化协作,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格局,实现煤电能源优势和机械工业优势、相关产业优势与材料工业优势的联合。在这方面,关键之处仍然在于打破行业封锁和地方分割,打

破行政干预。

2.改制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根本前提。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一个普遍而重大的障碍。山西材料企业,甚至包括不少已改制上市的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都相当滞后。现代企业制度不能真正建立,企业机制不能真正转换,企业的改组只能是虚假的改组,企业规模再大也只能是大而不优、大而不强。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根本前提。

一是必须加速推进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主要是政企职能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政企不分开就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政企不分恰恰是山西材料工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的一大根源。主要表现就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企业办社会、办学校、办医疗等现象大量存在。以太钢为例。根据1998年底的数据,太钢共有各类学校31所,在校教职工1638人,年教育经费支出3100万元;共有医院7所,职工1981人,年支出经费6910万元;共有离退休人员25941人,平均每2.55名职工就要负担一名离退休职工的各项费用支出。这种政企不分现象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太钢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宝钢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为91.8吨/人,太钢1998年的水平则是42.2吨/人。在国外,各钢铁强国的这一水平分别是:日本740吨、美国541吨、韩国662吨、德国412吨。难以想象,以这样的状况,太钢怎么去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剥离企业办社会、办服务的职能,交还给社会,交还给政府,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干企业自己的事,就成为山西材料工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是必须加速推进材料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造。产权多元化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而山西材料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恰恰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应该说,产权结构单一化,是政企职能不分的产权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政企就难以真正分开,企业的资产重组就不可能摆脱行政的干预,实现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重组。为此,必须结合材料企业的重组、兼并,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特别是要推进煤电企业、机械工业企业以及材料工业内部不同企业间的相互投资、参股、持股、控股。这也是提高山西材料工业与全省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形成和发挥联合优势的重要途径。

三是必须建立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由于政企不分和产权结构的束缚,山西材料企业恰恰也缺乏这么一套法人治理结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企业领导仍然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企业家选择机制。包括已改制上市的企业,也仍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制衡机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任,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的现象普遍存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要落脚到企业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在推进材料企业政企职能分开和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企业治理结构。其关键一方面在于,要加速培育企业家市场,形成由市场主导的企业家选择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构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制衡的治理模式,推进企业决策机制的科学化。

3.技术改造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核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时代,土地是经

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可以说，山西材料工业传统优势逐步消解的时期，也正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经济要素在全球材料工业领域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的时期。山西材料工业与世界材料工业的差距，从本质上讲就是技术的差距。所以说，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和特新材料工业基地建设的核心。

一是要加强先进材料技术的引进，用先进材料技术改造山西传统材料技术。材料技术尤其是新材料技术，是世界性的前沿技术，山西要建设特新材料基地，如果不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研究开发来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山西在材料技术引进方面的支出，尽管不能说是很多，但相对于山西的财力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问题在于我们往往重视了硬件技术即设备的引进，而忽视了软件技术的引进；重视了现实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忽视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尤其是忽视了代表世界材料工业发展方向的先进新材料技术的引进，忽视了技术的配套。太钢不锈钢的冶炼与加工，在技术上就处于一种二元结构状态，既有引进的国际先进技术设备，也有大量国际上已经淘汰的技术设备，技术配套程度差，而且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严重欠缺，更谈不上创新，以至于每年都不得不花费约 300 万美元进口设备维修所需的备品、备件。祎达不锈钢公司虽然引进了美国普莱克斯公司最新一代计算机智能控制的 AOD 炉，全国仅此一家，世界上也只有 6～7 家，但同样由于缺乏消化、吸收，由于配套性差，先进的设备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说，今后山西材料工业技术的引进，必须既要重视硬件

技术的引进,更要重视软件技术的引进;既要重视引进技术的先进性,更要重视技术的配套;既要重视技术的引进,更要重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既要重视技术的引进,更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通过引进人才,达到提高山西材料工业技术结构的目的。

二是要就关键技术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技术的引进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山西材料工业的发展升级,山西特新材料工业基地的建设不可能建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从长远讲,山西材料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主要还是要通过自身的研究开发来解决。这就必须针对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关键技术、针对世界材料工业发展的技术趋势,组织产学研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必须明确的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近几年的科研院所改革,不少材料企业都拥有了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这更有利于依托企业展开技术研究与开发,增进技术研发与材料工业发展的一体化程度。结合山西材料工业企业的实力状况,政府应当对事关全省材料工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予以研发资助,政企联合投资,通过招标方式或委托研究开发的方式,解决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重大技术障碍。

三是要重点发展生态材料技术。山西材料工业的发展必须指向世界材料工业发展的方向,诸如发展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功能材料、智能化材料、绿色材料等等,发展相关技术也是山西材料工业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山西而言,尤须发展生态材料技术。众所周知,传统的材料工业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对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影响。山西又是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省份。造成这种状况,传统落后的材料工业自有一份责任。有资料表明,在全国仅仅建材工业的粉尘排放量就占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72.3%,其中水泥就占到60.5%。山西作为全国的水泥生产大省,80%的水泥

产量属于高污染、高排放的立窖工艺技术，加之砖瓦、石灰等建材产品占据建材工业的主体，基本上是以高污染为代价换取低水平发展的。这种技术状况不仅是国际国内市场所不能接受的，更是山西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山西材料工业要继续生存和发展，技术的生态化、绿色化就是当务之急。传统落后的建材工业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但在发达国家，建材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化废为宝、化害为利的产业。值得欣喜的是，我省一家科技型民营企业——吕梁广厦特种建材有限公司，为全省水泥工业的绿色化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经过多年努力，他们成功地研制开发出了“GH-PC环保胶料”及无熟料砌筑水泥技术。环保胶料既可大量节约水泥熟料的使用，还可大量消化废渣；无熟料砌筑水泥技术则是以工业固体废渣为基本原料（约占80%）生产优质水泥。这说明，山西传统材料技术的绿色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对此，有必要把山西材料工业技术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省政府重点资助的研发项目，列入议事日程，以加快推进山西绿色材料、生态材料工业的发展。

四是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技术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技术的落后，说到底是材料工业人力资源的贫乏。知识经济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人”的经济。如果说，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山西材料工业发展的核心，那么，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是山西材料工业升级的灵魂。人力资源贫乏、高级科技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山西材料工业发展的一大致命缺陷。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山西材料工业仍在面临着人才流失的严峻考验。以太钢为例，过去已经有一批技术人员流向温州地区的不锈钢企业，目前，太钢面临着核心技术人员进一步流失的危险。人才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人才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山西材料工业

而言，留不住人才、引不来人才，一切都只能是空谈。实质上，山西材料工业人力资源的贫乏，并不表现为人才“质”的或“量”的贫乏，而是一种人才机制、人才环境的贫乏。对此，在进一步加大职工技术再教育的同时，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出台更有吸引力的引才政策，必须舍得人才投入，给企业以更加灵活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企业也必须创造更好的留才、用才环境，改变人才观念，从片面强调奉献精神，转变到以人为本的、更切合实际的市场化人才机制上来。总之，抓住了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引进，也就是抓住了山西材料工业发展升级的根本，也就是抓住了山西特新材料基地建设的根本，抓住了山西材料工业的明天。

发挥机械行业优势
做强特色机电产业

机械产业是山西的优势产业，具有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生产开发能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优势，而不能放弃这一优势。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其在机械产业领域里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全球机械产业迅速向光机电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发展，山西机械产业的传统优势正在加速弱化。能不能把握机遇，实现山西机械产业的优势再造，推动其融入全球机械产业调整升级的历史潮流，是山西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的又一重大战略课题。

一、建设特色装备产业基地：机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机械工业既是产业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结构体系升级的手段性基础产业，是产业结构体系调整升级的内源动力性产业和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载体性产业。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推进经济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首先就必须推进机械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没有机械产业为经济体系提供先进的、高质量的技术装备，经济结构的整体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都只能是画饼充饥。

机械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的核心，是工业的心脏。世

界各国都把发展自己的“先进制造技术”视为国民经济的“生命线”。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竞争,而技术的竞争主要还是制造技术的竞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并不在于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而在于怎样生产,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生产。正如中国可以生产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能够生产的产品,但并不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高;许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也并不因为不能生产出只有少数国家才能生产的产品,就表明其经济发展水平就低。一切都在于以什么样的技术来生产。在第44届国际生产工程学会上,日本的吉川教授就指出:世界各发达工业国经济上的竞争,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竞争。制造技术的水平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关系到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培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此,发达工业国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专家都将制造科学与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一起列为当今世界四大支柱性科学。

当然,我们并不以为由于机械制造技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山西作为一个省也必须大力发展机械工业。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山西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山西之所以要大力发展机械工业,是由于机械工业乃是山西经济比较优势之所在,是由于山西机械工业经过大规模改造升级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特色机电产业基地。山西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支柱产业单一,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推动支柱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而机械产业恰恰是山西除煤炭清洁能源产业和旅游业以外,最有希望成为山西未来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产业之一。只要方向对头、措施得力,山西完全有希望成为全国性的特色机电产业基地。

1. 国际国内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山西机械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持。

良好的市场成长性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国际市场来说，各发达国家一直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机械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为了追赶美国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实现本国产业的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高新技术化，其它发达国家许多传统产业都大量外移，机械产业就是其中之一，保留的少量传统机械产业正朝着光机电一体化、全自动化、机器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一方面为山西引进先进、适用的机械制造技术，改造传统的机械产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山西传统机械产业的发展升级腾出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是传统机械产业的重要市场。山西的许多机械产品诸如农用机械、重矿机械、机械零配件等，在这些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为山西传统机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支持。

从国内市场来说，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结构大规模调整升级转型的阶段。结构能否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械制造产业能否为其提供足够的符合其要求的产品、技术和装备支持。山西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是全国重要的机械制造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山西制造基地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国重矿机械、冶金机械、基础机械以及诸多机械零配件等机械产品的生产基地。另外，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加速融入产业知识化、信息化、高新技术化的国际潮流，其机械产业正在显现出向中、西部转移的迹象。尤其是象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机械产

业的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规模展开,必将为山西机械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持。

2.全省结构调整升级的展开,为山西机械产业的调整升级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支柱产业单一化是山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山西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一大根源。对此,山西已经有了一个深刻的明确的认识,即经济结构要合理化,支柱产业必须群体化。机械工业历来就是山西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在山西工业体系中的地位曾经长期居于第二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其位次逐年有所后移,但仍然稳居三甲,仅次于煤炭能源工业和冶金工业。因此,发展机械战略性支柱产业是山西的现实战略选择。随着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发展,必将为山西机械产业的发展升级扫除指导思想上的障碍。

较高的产业关联度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成长的又一必要前提。尽管我们还缺乏关于机械产业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准确的关联度系数的统计资料,但是,从以下这个比喻中,我们不难对机械产业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高度关联性得出一个质的判断。这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看作是一部巨型的从资源到产品及服务的转化器的话,那么,生产这个转化器的就是机械工业。不难理解,各行各业的生产都离不开生产工具,而生产这种工具的就是机械工业。所以说,机械产业是具有极高的产业关联度的产业。山西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离不开机械产业的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机械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在产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巨大资源优势的材料产业,不仅与机械产业有着

极强的关联性,而且为山西机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支持。即使只从发挥山西矿产资源优势,壮大提升山西材料产业,提高材料加工度,获取较高综合效益的角度而言,发展和提升机械产业都是山西必需的战略选择。甚至可以说,没有机械产业的升级、发展、壮大,山西综合高效的产业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

3.在全国机电产业的布局结构中,山西特色机电产业基地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

山西机电产品有110大类,6200多个品种,全行业工业企业2500多个,职工50余万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重型矿山机械、冶金机械、煤炭机械、汽车、农用机械、基础机械以及机械配件、电子基础件等为特色的机电产业基地的雏型。一批机电产品如起重机设备、挖掘设备、轧钢设备及锻压产品等,其技术水平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主要包括:

以太重、太行为主提供的各类线材轧机、大型冶金起重机、油膜轴承等产品,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高速线材轧机、大型冶金起重设备、油膜轴承、各类轧机等,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都在50%以上。

太重的火车轴生产能力,热加工达到17万支,冷加工达到15万支;火车钢轮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2万副的轮对生产线也进入建设阶段。

山西微型汽车发动机、重型汽车变速箱总成、汽车转向助力泵、汽车消声器、汽车扭杆总成、进排气门等产品技术领先,且已达到适度规模。

山西已开发出的300万吨级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180万吨

级煤炭洗选成套设备、装药车等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作为全国液压行业排头兵的榆液集团生产的各种高档液压阀、高中压柱塞叶片泵、转向助力叶片泵等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山西生产的系列数控大型卷板机、经济型数控机床、CK－300超高速数控机床等产品,都达到国际20世纪90年代初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占有较大的国内市场份额,并出口东南亚各国。

山西棕刚玉生产能力已达到6万吨,是国内最大的刚玉块生产基地。

光纤面板、光纤倒像器是用于微光夜视系统的重要产品,具有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预计国内外市场每年需要量在50万件以上。太原长城光电子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光纤面板5万件、光纤倒像器3万件,基本上垄断了国内市场。

作为全国较大的11家强排热水器生产厂家之一的785厂,率先研制开发出的电脑全自动强排热水器系列产品,成为国内市场的主流机型,市场前景看好。

山西无线电厂年产50万台彩星电视,目前发展势头强劲,已逐步占领华北、西北市场。

以上情况表明,机电产业完全具备成为山西未来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条件,山西也完全具备建设全国性特色机电产业基地的条件。根据山西机电产业的现有优势,其发展的现实重点应该是矿山机械、铁路运输机械、液压机械、纺织机械、汽车零部件和精密铸造等特色化机电产品;其发展途径应该是根据国际机械产业发展升级的趋势,以及国内、省内市场需求,进一步突出特色,按照机电一体化的要求,以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机电产业。总之,只有真正抓住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山西机电产业才能真正再造优势,机电

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山西未来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特色机电产业基地。

二、内外因素双重制约：特色机电产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机电产业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涌现出了如前所述的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产品和企业。但是，同样不能否认，与省内其他产业相比，与省外同类产业相比，尤其是与机电产业作为山西未来战略性支柱产业，与山西建设全国性特色机电产业生产制造基地的要求相比，山西机电产业的发展都远远不足。与国际机电产业发展升级的历史趋势相比，差距悬殊姑且不论，改革开放之前山西机电产业所拥有的相对优势不仅未能发展、保持，相反却大大地削弱了。具体表现为：

一是产业地位不稳。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8 年机电行业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1.86%，1985 年下降到 17.43%，1994 年又下降到 12.72%，1999 年进一步下降到 8.56%。1978 年，山西机械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18%，稳居全省工业行业第二把交椅的地位。但是，“七五”以后这个比例就不断下降，位次也不断后移，到 2000 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 13.6%，位次滑落到第三位。

二是产品结构不优。

1992 年，山西机械工业适销对路的产品占到 70%，平销产品 20%，滞销产品还只有 10%。然而，在短短五年之后，情况却发生

了大逆转,到1997年,适销对路的产品所占比例下滑到10%,平销产品占到50%,滞销产品却急剧上升到40%。

三是产业素质不高。

山西机械工业依托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全国机械行业相比,在技术要求相对不是很高的传统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山西的产值比重高出全国近20个百分点。即使在这些领域,近几年来山西在全国所占市场份额也逐步为国内外其它企业所蚕食。在代表机械工业发展趋势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仪表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山西所占比重又甚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

四是经济效益不高。

1998年的数据显示,山西机械工业内部七大行业中,除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外,其余五大行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表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工业均呈现亏损。机械工业经济效益低于工业行业整体水平。

五是市场竞争乏力。

机电产业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2001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188亿美元,比1985年的16亿美元增长73倍多,年均增幅达31%,机电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5%左右。而山西机电产品的年出口额1998年只有8339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5.74%,与1997年相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7个百分点。

因此,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前20年间,是山西机电工业获得相对发展的20年,但更是山西机电工业原有优势逐步丧失的20年,是山西机电工业必须认真反思和总结的20年。

山西机电工业发展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首当其冲的是山西长期以来单打一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尤其是“七五”以后，山西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了一条单打一的“能源基地”战略的道路。在当时全国经济高速发展形成的对能源市场的巨大需求推动和省内片面的能源资源经济思想指导之下，山西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向煤炭能源产业，形成了煤炭能源产业畸型发展的局面。有资料表明，“七五”期间，全省技术改造投资 57.6 亿元，其中，43.7% 的技改资金 25.16 亿元用于能源原材料工业，而用于装备工业的只有 6.97 亿元，占比仅为 12.1%。“八五”以后，由于煤炭产业单兵突进，使得省内本就紧张的交通运力资源和水资源更加紧张。为此，山西又把重点放在“引水、修路、挖煤、输电”上，大量投资继续投向能源交通产业。从 1991 年到 1998 年，全省国有单位累计完成投资 1835 亿元，上述领域的投资就占到 58.1%。全省新建项目投资比重由 1990 年的 38.4%，到 1998 年上升到 67.7%，而改扩建项目投资比重则由 1990 年的 57.3% 下降到 1998 年的 24.5%。应该说，引水、修路、发电，政府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其他行业资金、政策投入的严重不足。这是山西其他各行各业包括机电行业发展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部因素无疑是山西机电产业发展缓慢、原有诸多优势不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外部原因远非山西机电产业发展不足的全部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机电产业内部，包括内部体制、运行机制、技术开发等等多个方面。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电企业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机制不活。

全省国有机电企业占全行业企业总数的 89%，国有资产比重占到全行业资产总量的 96%，绝大多数企业运行机制落后，不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普遍缺乏活力。

全省 2500 多个机电企业,尽管绝大多数都进行了改制,但是,由于产权单一,国有产权比重过高,事实上离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相差甚远,政企不分的现象普遍比较严重。

三是企业规模过小,分散化、大而全、小而全严重。

根据统计资料,1995 年,山西 2387 户机电企业,平均每户企业有职工 198 人,完成工业总产值不到 54 万元,实现利税平均只有 3 万多元。另据一份对 1998 年全省 624 户机电企业的统计资料,平均每户企业也只有职工 320 多人,平均每户年产值 1954 万元,平均利税 63 万元。

四是企业技术水平低下,技术开发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绝大部分产品技术水平属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水平,只有约 15% 达到 90 年代初的水平,更有部分产品属于 70 年代以前的技术水平。

五是一体化程度不足,与其它工业的发展缺乏有机协调。

比如,冶金工业是山西仅次于能源产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到全部工业产值的 18.1%(1999 年),但在机电工业内部,冶金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及其它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值仅占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值的 5% 弱,和山西冶金工业的发展严重脱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矿山设备制造业占到了 95% 以上的产值份额,充分体现了山西机电工业为山西资源采掘工业服务的倾向,严重弱化了机电工业与冶金、电力等部门配套协调、一体化发展的功能。

另外,还有长期以来机电行业管理体制不顺、部门分割、地方封锁等等一系列原因。近年来,尤其是新一轮结构调整启动以来,

制约机电产业发展的一些障碍已经或正在解决，但整体而言，进展力度不大。山西机电产业发展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全国性的特色机电产业生产制造基地。但是，以上种种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山西机电产业发展的目标就只能是一场空想。山西机电产业要想真正实现这一宏伟的发展目标，就必须加速解决这些问题，扫除发展成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三、加速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
推进特色机电产业基地的建设

山西机电产业面临的种种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竞争能力缺乏上。尽管山西也有太重这样的上市公司和榆液这样的一些既具有一定规模、也具有一定市场竞争能力的机电企业，但是，就山西机电产业整体而言，竞争能力严重不足。以山西机电产业目前的市场竞争力，机电产业要想成长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要想成为全国特色机电产业的生产制造基地，是难上加难的。因为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山西机电产业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来实现。山西机电产业竞争能力严重不足，难以立足于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虽然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山西的重型机械、冶金机械、铁路运输机械、煤机、起重机、变速箱、磨具磨料、电缆及中小型拖拉机等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问题在于产品优势并不必然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对于山西具有一定技术密集度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诸如机床、工程机械、汽车、高压电工电器、大型拖拉机等产品；由于平均关税的下降，进口许可证、配额、出口补贴等措施将逐步取消，因而面临强烈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山西机

电产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产品优势能够转化为一时的竞争力优势,也并不代表机电产业就可以顺利成长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因为,这并不代表机电产业的发展方向。光机电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也就是高加工度化、高新技术化、信息化、知识密集化才是机电产业发展的时代潮流。因此,建设全国性新特材料产业基地,山西机电产业的发展必须瞄准全球机电产业发展升级的历史潮流,着力打造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归根到底还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高度凝聚和有机整合,而企业竞争力不足恰恰是山西机电产业竞争力缺乏的根源。因此,通过改革、改制、改组、改造,打造企业的竞争力,乃是山西机电产业成长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山西建设全国特色机电产业基地的根本出路。

1.改革机电产业管理体制是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的前提。

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部门分割、军地相争、内耗丛生,是山西机电产业发展面临的难题。现在,尽管体制不顺的问题基本上有所扭转,不过,遗留问题也还不少。这些问题不解决,山西机电产业就难以轻装前进。在体制不顺、多头管理等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深化机电管理部门的体制改革,推进管理部门的职能转换,就成为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必要前提。管理体制不改革、部门职能不转换,山西机电产业同样无法轻装前进。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加速改革政府部门对机电产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山西机电行业长期以来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但是,许多国有资产却存而不活。根据有关的资料,全国机械工业半数以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山西的情况比这更糟:一方面

大量国有资产闲置浪费；另一方面一些比较好的企业、比较好的产品、技术，却由于资产不足而难以发展、壮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陈旧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做怪。可以说，山西机电行业庞大的国有存量呆滞资产是其发展、壮大的一笔宝贵财富，但是，体制不改，财富会变成“包袱”。体制改革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把国有资产管理的重点从具体的物质资产的层面上，转向国有资产的价值层面上；把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从物质资产的拥有上，转向价值增值上，推动国有资产在行业内、行业外，省外、国外流动起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要加速转换政府政府管理部门职能。机电产业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里的特殊产业功能和重要地位，尤其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大力扶持。为此，世界各国政府都给予了机电产业以极大地支持。如果不是《机械工业振兴法》，日本不大可能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机械工业强国；如果不是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恐怕也不会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其机械工业的大发展、大升级。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机电产业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机电产业确定为长期的战略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予以支持。在这里，政府支持绝不只是意味着政府投资，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为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产业政策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山西政府部门对于机电产业的发展，是“管”得多，服务得少，一句话，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变过来。政府部门职能不转变，山西的机电产业就难有希望。加速政府职能转换，主要是进一步细化、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并根据山西机电产业发展的实际及其目标，制定山西机电产业促进政策，设计、制定山西机电产业的发展规划，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微观管理为宏观协调，变行政化管理为规划管理，变审批式管理为服务型管理，变政府投

资支持为公平政策支持、政策促进。

三是改革机电产业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机电产业基本上采取“适应性”的发展模式,即:机电产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发展。这种模式片面强调机电产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一面,忽视了机电产业素质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是造成我国机电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的一个重大原因。改革开放以前,山西机电工业是以适应全国经济建设的要求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这是山西机电工业传统优势得以建立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山西机电产业的发展逐步转向适应省内经济发展,尤其是能源工业发展的要求,反而减少了其开放性,而更多地具有了封闭性,从而造成山西机电产业传统优势的逐步削弱。机电产业固然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民经济提供服务,但是,机电产业特殊的产业功能,赋予机电产业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带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特殊使命。当前,结构调整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主线,我国机电产业也日益转向“素质性”模式。现在看来,“素质性”模式既是工业发达国家机电工业发展的一条主要经验,也是工业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升级的一条主要经验。全球机电产业发展的趋势其核心是“高素质化”。山西机电产业要想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融入全球机电产业发展升级的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实施“素质性”发展战略。实施这一发展战略,关键是要确立山西机电产业战略性支柱地拉和建设全国性特色机电产业生产制造基地的战略思想;树立通过提高机电产业的技术素质推动机电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全省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观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产业发展原则,瞄准全球机电产业发展的潮流和结构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立足山西的传统优势产品,重点抓住

技术带动性强、关联度高、需求量大的重要技术装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不是在省内、也不仅仅是在国内)确立山西机电产业的特色和比较优势。

2. 推进机电企业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重要保障。

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企业制度、机制的竞争，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竞争力的制度来源。山西机电企业尽管大多都进行了改制，但还没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山西机电产业竞争能力缺乏的一大制度原因。没有机电企业现代制度的真正建立，就没有山西机电产业的发展、壮大。为此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要推进山西机电企业的产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没有产权的多元化，就不可能有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合理化、科学化。目前山西机电企业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国有产权，国有资产占到全行业资产存量的96%。很难想象，在产权单一化模式下，山西机电企业能够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能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许多方面的资料、经验都表明，越是国有产权集中的行业也越是竞争乏力的行业，机电产业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推进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机电企业产权多元化主要通过兼并、联合、控股、重组、出售、租赁等手段，引进行业外、省外甚至国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山西机电产业来实现。

二是推进机电企业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前提。山西机电企业国有产权单一化必然导致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运行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企业办服务、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尤为突出，诸如职工就医、职工子女就学、就业、职工住房等

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仍然由企业来负担。企业背负沉重负担参与国际国内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为此,必须结合机电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改造,进一步加速山西机电企业政企分开的步伐:一方面,政府要从企业逐步接收就医、就学、住房等职能,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企业也必须自我减负,通过承包、租赁、出售等手段,将企业办"三产"的职能转向社会。

三是要推进机电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其决策制衡机制、执行监督机制等等,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往往"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这方面的教训举不胜举。山西机电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就必须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山西机电企业普遍缺乏应有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尤其是大型企业,领导由组织部门考查、任命,甚至中层领导也需要政府部门审查批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结合产权多元化改造和政企分开的进程,逐步建立企业家人才市场,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企业家聘任机制;另一方面,还必须逐步打破企业的行政级别制度,打破"官""民"不分的体制机制,消除"企而优则仕"的现象。

3.推进机电企业战略性改组,壮大企业规模实力,是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主要途径。

国际国内间的企业竞争,是企业规模和实力的较量。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和实力,较量必然处于下风。在这方面,我国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基本上不是同一档次的竞争,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竞争。因为,彼此之间规模实力相差过于悬殊。以位居我国汽车行业销售额首位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

例，其2000年的销售额为560亿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排名世界500强第一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额的2.1%。我国具有一定市场优势的传统产品，比如普通机床，全国90多家生产厂家的年生产规模也只有5.8～6万台左右，而日本森精机床公司一家数控机床的年产量就高达4500万台左右。山西机电企业的规模实力，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以外，普遍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与世界性跨国公司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而散、散而低、散而乱的现象在山西还在继续。比如，钕铁硼生产在山西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000年钕铁硼生产量达2000吨以上，占全国的近1/3。但生产厂家却多达20多家。山西机电产业要发展、要升级，不能回避国际竞争，相反，只有积极参与、主动迎接国际竞争，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山西机电企业的分散化、小规模状况，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国际竞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推进山西机电产业的战略性改组，通过联合、重组、兼并、收购等手段，迅速壮大企业规模。

战略性重组是国际间迅速壮大企业规模实力的一个主要形式。当今排名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没有哪一家没有实施过战略重组，没有哪一家是靠自己逐年积累才取得现有的行业地位的。可以断言，山西的机电企业不是在实施战略重组中获得新生，就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衰亡。山西机电企业非重组无以发展，非重组无以壮大，非重组无以参与国际竞争。根据山西机电产业的实际，可以考虑：以太重集团为平台，通过联合、兼并等手段使重型矿山机械行业的优质资产向太重集中；以榆液集团为平台，促进全省基础机械优质资产向榆液集中；以大众集团为平台，促进全省电子信息高科技产品向大众集中；以刚玉集团为平台，促进全省机械基础材料的优良资产向刚玉集中。

通过重组、联合,一方面壮大骨干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在适当集中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联合重组,组建山西机电行业的“联合舰队”,实施高度的专业化协作。

山西机电产业的战略性重组,也可以考虑采取在业界内外寻求横向、纵向的联合,甚至向国际跨国公司寻求战略重组,以借船出海、借风扬帆、借力发展。但不论何种方式,必须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企业的意愿,切实避免行政式的“拉郎配”;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以组织成套产品为重点,以壮大企业规模实力为目标。政府一方面要制定促进国有资产流动重组的有力政策,另一方面要主动解决好重组过程中的各种难点问题,比如,下岗职工安置、各种遗留问题处置等;还要特别注意避免新的小而散、散而低、散而乱的现象出现。政府是山西机电产业战略性重组的关键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推动机电产业资产重组的决心有多大、思路有多宽、心胸有多广,那么,山西机电产业发展的潜力就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宽、前途就有多广。

4.推进机电企业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创新、开发能力,是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核心。

企业的规模大小,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的竞争力除了与企业规模大小紧密相关外,更主要的取决于企业的人才和科技,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开发能力的大小。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国际竞争还主要是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的较量的话,那么,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演变为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的竞争。国际间企业并购的历史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国际并购遵循的还是丛林法则,

即：以强吃弱、以大吃小；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以小吃大、以快吃慢的国际并购。对此现像惟一的解释就是市场竞争力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单纯的大规模变为现在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有关部门1999年对我国514家机械制造企业2009种正在生产的主导产品调查统计，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0.5年，平均开发周期为18个月，而美国一些机械企业早在1990年就已经做到了“三个三”，即产品的生命周期为三年，产品的试制周期为三个月，产品的设计周期仅为三个星期。两相比较，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但山西机电产业的主体技术水平仍然停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这样的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是不能迎接国际市场竞争与挑战的。因此，加快技术更新改造，提升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是山西机电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核心。为此要在以下方面把工作做好：

一是要加大技术开发和投入的力度。投入是产出的前提，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技术开发同样如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今天，加大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投入，是形成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是世界各跨国公司长期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主要原因。世界上的大型机电企业，其研究开发费用一般都占到年销售额的5%左右，我国这一比例大约为1.5%左右，山西则更低。就其绝对额来讲，举山西全省机电行业一年的研究开发费用，恐怕还不如一家大型跨国机电企业的投入。如果不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即使把全省机电企业都联合起来，也不能有效地提高其竞争能力。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方面是政府在研究与开发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瞄准一些关键技术和关联度高、技术溢出效应大的共性技术，通过项目招标与企业联合投入、联合研究等途径，加大资金扶持支持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制定政

府投入的资金来源政策及投入增长制度;规定企业技改及研发投入与销售额的最低比例;鼓励企业加速折旧,对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研发投入资金实行免税政策等。另一方面企业也必须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研发投入在销售额中的占比。

二是改革政府科研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山西政府部门尽管每年的科研投入数额不是很大,但这些也都是政府在财政还处于"吃饭财政"的困难情况下挤出来的宝贵资金。由于机制不活,这笔数额不大的资金还往往撒了胡椒面儿,甚至变成了福利资金。机制不改,再多的投入也买不来竞争能力的提高。企业是技术研发的主体,是技术运用的终端,政府投入必须围绕企业、围绕企业的项目来进行。鉴于机电工业技术在国民经济技术体系中的基础性、关键性重要地位,政府有必要从每年的科研资金中,切出一大块专用于机电技术研究与开发,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形成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展开技术研发的新机制。

三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当前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涌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自己的力量来研究开发机电产业技术,不注意借鉴、吸收外部的技术成果应用于自己的生产实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迅速有效地提高机电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的。前些年在我国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由于不了解外部信息,科研人员耗费大量精力研究出的一项技术,拿到国际上一看,却原来是人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古人云:"君子御风而行,善假于物也"。山西机电产业要想迅速赶上全球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就必须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路子。对此,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优化引进技术的结构。山西和全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往往舍

得花钱引进硬件设备,但舍不得花钱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结果花钱不少,效果不大。实践证明,靠引进硬设备难以引进真正先进的制造技术。优化引进技术结构,既要引进必需的硬设备,更要注意引进先进的软技术,尤其要注意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智力成果。另一方面,要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技术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和创新。即使是引进硬设备,也不能只是为了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必须组织产、学、研各方力量协同攻关,真正掌握先进技术。有资料表明,在日本实现经济赶超期间,其用于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远远超过技术引进的费用。可以说,这是日本成为机械工业强国的一大秘诀。山西也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上。否则,山西机电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技术体系,必然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既要引进,还要消化、吸收,更要提高、创新。这才是山西机电工业乃至山西经济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捷径,是山西机电工业调整、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特色生态农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山西产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山西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山西初级化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使得农业基础不稳,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收入提高缓慢,极大地制约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制约着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考虑。

一、推进农业"五化"发展 建设黄土高原绿色农业产业基地

农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诸多产业中最为古老、也最具有产业弱质性的产业。为此,世界各国对于农业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农业的发展和本国农民的利益,都为之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政策和技术支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不断得到改善,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生物农业等新型农业产业形式不断涌现,全球农业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一股势不可挡的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产业化的时代潮流。农业这一最为古

老的母体产业正日益焕发出朝阳产业的青春气息。这既是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的一大历史机遇,也是山西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对此,山西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只有顺应世界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和产业化的时代潮流,明确确立农业调产的战略目标是建设黄土高原特色化生态农业产业基地,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

1.农业国际化是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历史大舞台。

农业的国际化,通俗地讲就是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流通,在国际市场上确立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是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比如美国、法国、荷兰等农业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是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国际化为这些国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全球性的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持,其农业发展也主要是满足国际市场消费。有资料表明,荷兰的花卉占据了全球花卉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国内消费的比例几乎微不足道。美国的农产品绝大部分也是用来加工出口。如果没有农业的国际化,没有全球市场的巨大支持,荷兰的花卉业、美国的农业,恐怕都要破产。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农业必须直面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意味着农业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不可回避的时代潮流。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山西农业都必将在国际化这个大舞台上来唱戏,在这个舞台上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生存、发展空间。只有在国际化舞台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农产品,才是山西农业未来发展的重点,才是山西解决农业问题的希望。

2.特色化是山西农业国际化、生态化、知识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内容。

文学创作领域有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农业产业的国际化,即: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也越是具有国际市场的产品,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由于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严重依赖,由于自然条件的多种多样,导致农产品的品质、风味的多姿多彩,所谓“桔生淮南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仍然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参与农业国际化竞争的重要立足点。任何国家和地区,即使科技发达的美国,都不可能在所有农产品领域占尽优势。像山西这样的落后地区,要在农业国际化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资源条件的潜力,走农业特色化之路。山东的大葱、大蒜、香茹之所以能够占领壁垒森严的日本市场,特色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山西地处世界三大玉米生产黄金地带的其中一条,玉米产量高、品质好。玉米又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发展前途的高产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原料。所以,山西玉米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山西多山地的地理特征,带来了山西多样化的气候资源,小杂粮粮种植历史悠久,生产位居全国前列,素有“小杂粮王国”之称。比如沁州黄小米、汾州香小米、山阴莜麦、恒山蚕豆等都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较强的竞争优势的产品。山西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干鲜果区之一,各种干鲜果如稷山板枣、汾州核桃、运城名优苹果都具有相当优越的自然条件。多山地和牧坡地的地理特征,又为山西发展畜牧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以上这些都是山西农业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山西农业在国际化舞台上的角色定位所在。只有唱好这些角色,山西农业才能在国际

竞争中立足。特色就是市场,特色就是优势,只有抓住这些特色,山西农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升级。

3.农业知识化是山西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生态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国际化也好,特色化也好,关键是要解决农业的竞争力问题,没有竞争力,农业的国际化就意味着被淘汰,农业的特色化就意味着农业的"褪色"化,而农业的竞争力、农产品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来源于科技知识含量的高低。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凭借其高科技含量维持其农业竞争优势的。相反,山西农业和全国农业一样,基本上是在国家高关税的保护下生存的,尤其是山西许多山区,农产品甚至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知识含量、科技附加值严重低下。以这样的状况,山西农业根本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知识化是山西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的前提,是山西农业调整、升级发展的根本。

4.农业生态化是山西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和产业化的根本方向。

纵观历史,人类农业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七千多年前的原始农业阶段;约三千年前的传统农业阶段;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农业阶段。目前,人类则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生态农业阶段。所谓生态农业就是指遵循生态学原理按照生态规律进行生产的良性循环农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农业。生态化,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升级的一大趋势。但是,相比较而言,农业的生态化尤为令人关注,因为,农产品作为人们直接入口消费的产品,其安全性自然受到人们的极大重

视。多项国际国内的调查资料都表明,消费者大都倾向于花费较高的价格购买生态食品,甚至花费较为昂贵的价格消费无公害化的食品。这标志着农产品消费绿色化浪潮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天的滔滔大河。石油农业(以化肥、农药的使用为代表)正在逐步为市场所抛弃。山西的农业基本上是以石油农业为主体的与传统农业、生态农业并存的结构。农业生态化的大趋势意味着石油农业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山西农业要适应市场需求,不是退回去搞传统农业,而是跨越一步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山西已有60%的县开展了生态农业建设试验,有24个县被列为国家和省的重点扶持县。据调查,开展生态农业的试点,粮食产量以40～120%的幅度增长,经济收入增加一两倍,光能利用率提高20～30%。由此可见,生态化既是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根本方向,也是山西彻底解决农业问题,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5.农业产业化是山西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的基本途径。

所谓农业产业化,通俗来讲就是指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开发从分散走向联合、集中,从无组织状态走向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的过程,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式农业走向企业化、公司化的过程。山西农业,无论是国际化还是特色化,无论是知识化还是生态化,哪一化都离不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离开了产业化,山西农业的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为农业的国际竞争,绝不是单一因素的竞争,而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是农业产业化水平的竞争。产业化程度越高,竞争能力也越强,反之,竞争能力

就越弱。这种竞争具体体现为企业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占尽优势,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农业企业实力庞大,它们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有资料表明,世界上最大的20家种业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种子的研究、开发和销售。世界上最大的200家食品加工公司的产值,已经占到全球食品部门总产值的1/3。正是这些跨国公司,支撑着发达国家在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优势地位。

近些年来,山西农业产业化也有所发展,形成了一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骨干企业,尽管其规模和实力明显落后于全国,与国际大公司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要抓住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山西农业的产业化仍然潜力无限。同时,也只有加速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只有借助农业骨干龙头企业、集团公司的迅速成长,山西农业才能真正融入全球农业国际化、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的潮流,山西农业的种种理论优势才能转变成产业发展优势,建设黄土高原绿色农业产业基地的目标,才有可能从美好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二、农业产业现状
及调整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和保障工业建设,山西农村和全国农村一样,基本上是单一农业结构,而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山西长期形成的单一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农业内部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种植业总产值中,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重构成已由1978年的74.9:

25.1,调整为近几年的60.5:39.5,非粮作物播种面积和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业比重由1978年的82.6%下降到1998年的69.5%,而林牧渔业所占比重则由17.4%提高到30.5%。

农业产业的特色化、知识化、生态化、产业化等都有所发展。目前,全省各地都已经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比如运城的水果蔬菜、吕梁的红枣、长治的小米、晋中的蔬菜、晋北一带的小杂粮等。全省规模化经营面积达13万公顷,建成了26个国家级商品粮基地、7个商品棉基地和一个商品糖基地,形成了一批规模不等的家庭农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镇企业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正式组建了八大农业产业化企业集团——山西陈醋集团,年产量在4万吨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食醋生产企业;山西厦普赛尔集团,年产黄梨汁3万吨,是全国最大的黄梨汁生产企业;山西粟海集团,年加工肉鸡2500万只以上,是华北最大的肉鸡生产企业之一;山西古城乳业集团,年产乳品3万吨,在全国乳品行业中排名第4;山西苹果集团,每年都有大量苹果远销国内外,成为运城苹果的销售龙头。另外还有吕梁红枣集团、偏关万家寨全羊加工、大同南郊区生物饲料、沁源县食用菌开发、太谷县种鸡繁育等一大批龙头企业也在稳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农业产业生态化的建设近几年取得了尤为可喜的成果。目前,山西已有包括粮油、小杂粮、蔬菜、果品、肉制品、水产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在内的九大类近150种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其中,初级产品占40%,加工产品占60%。绿证总数由2000年居全国第20位一跃升至2001年的第6位。全省知名企业如古城乳业集团、穗穗甜玉米集团、厦普赛尔集团、

山西陈醋集团、别样红集团、绿是金公司、沁州檀山皇小米公司等，均在使用或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但是，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农业的发展，可以说，纵向比成效突出，横向比差距明显。与全国农业发展平均水平相比，山西农业许多指标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不仅如此，这种趋势还在持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水平低。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农业尽管有所发展，但与全国水平相比，其发展速度明显缓慢，生产水平明显偏低。农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29.01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323.3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平均每年递增只有 4.5%。人均农业产值由 1978 年的 119.7 元提高到 2000 年的 995.4 元，虽有较快增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呈扩大的态势。2000 年山西粮食人均占有量为 263 公斤，全国人均占有量则为 357 公斤；棉花山西人均占有量为 1.4 公斤，全国平均水平则为 3.4 公斤；油料山西人均占有量为 14 公斤，全国平均水平则为 23 公斤。

二是农业生产效益偏低。以山西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的 1998 年为例，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林牧渔业产值为 5609 元，生产肉类为 95 公斤，这两项指标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74.6%和 54.3%。山西每公顷耕地粮食产量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72.9%，棉花为 84.7%，油料仅为 67.6%。山西农业资金的产出效率也明显偏低。以 1996 年为例，按农业总产值和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近似计算的资金产出率，全国为 303%，山西为 249%；按农业增加值和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资金增加值率，全国为 180%，山西为 140%。

三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偏低。以 1995 年至 1997 年的平均值为例，按当年价格计算山西目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绝对值为

331.03亿元。产出能力仅占全国的1.5%,在全国排22位。选取六大类25个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要素指标通过计算,山西相对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指数值为0.71,即相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副产品加工业薄弱。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山西现有食品工业企业1100多个,从1998年到2001年,食品工业年产值只有50多亿元,分别为50.52亿元、51.9亿元、53.77亿元和54.26亿元,占全国食品工业产值的比例只有0.6%,居全国26—28位。目前国外农副产品的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2—4倍,我国占到20%,而山西仅占到16%。山西的农副产品基本上还是卖"原果"、"原菜"。

种植业偏重的结构与山西的资源优势大不相称。山西的种植业产值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牧业和渔业产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以渔业为甚。其中,种植业内部结构中粮食种植比重偏大,制约了种植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山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是华北地区粮食作物比重最大的一个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5个百分点,但成本却高于河北、河南、吉林等产粮大省。这种粮食偏重的种植业结构,直接影响了种植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1998年山西种植业产值为124.2亿元,每亩平均198.4元,低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山西有7000万亩宜林荒山荒坡,黄土高原的地理特点为果品的储藏提供了良好条件,发展干鲜水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水果以其色泽好、糖分高驰名中外;同时,山西牧草、牧坡面积有6800万亩,发展畜牧业的潜在优势也很大。但目前山西林、牧资源优势还远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产品优势和

经济优势。

种植业产品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农村改革以来，山西农业结构经过由数量型调整向效益型调整转变，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粮、畜、果、菜四大主导产业，农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由市场决定产量，由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来决定品种、结构和质量的新阶段。面对这种新形势，山西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粮、果、畜、菜四大主导产业全部遇到了新的困难。种植的品种多的不好，好的不多，大宗农产品普遍积压，主要产品库存大大超出正常水平，中低档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受此影响，全省农业效益明显下降，耕地库产值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一半，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全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农业发展基础脆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山西十年九旱，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增速减缓，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逐年下降，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山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煤炭资源的低水平、超强度开发和能源产业的粗放型发展，致使全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山西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农业支持体系不健全。

与其它产业相比，农业是一个具有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产业。山西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要承受更多的自然风险和农产品价格放开后的市场风险。山西目前还缺乏诸如宏观调控市场价格等引导农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同沿海省份相比，山西在农副产品市场建设上起步晚、规模小、档次低、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程度

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直接制约着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

第四,科技服务推广体系不健全。

山西的农业科技成果储备不足,明显滞后于农业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如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优势的小杂粮种植,许多地方仍然使用多年不变的老品种,品质和产量的提高受到很大制约。由于资金不足,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服务功能差,农村科技推广人才匮乏,严重制约着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制约着农业特色化、产业化、生态化的进程。

第五,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落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必须适应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要求,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的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水平。而现阶段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方式,难以抵御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不适应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变化的要求,不利于农业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和实现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劳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以结构优化推动山西农业向国际化、特色化、市场化、产业化、生态化转变,成为山西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三、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重点

加快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山西

的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以国际市场为立足点求得生存。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较量，产业化水平高，竞争实力就强，相反，竞争实力就弱。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乃是山西农业参与并赢得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山西实现农业产业国际化、特色化、生态化和知识化，把山西建设成为黄土高原绿色农业产业基地的根本途径和保障，因而成为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任务。

1. 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理顺农业管理职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山西农业面临巨大的市场考验，而且山西农业的管理体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山西农业，要在更广阔的空间优化配置农业资源，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政府支持服务农业的能力。体制不顺、职能不合理，农业支持乏力、农业服务短缺，恰恰是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建立综合统一的农业管理部门。农业内部各产业、农业生产的各环节、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农业生产的投入与扶持、农业科技的开发与推广、农产品的加工与运销、食品的安全与国内外市场的开发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建立综合统一的农业管理部门，才能适应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保证整个农业产业链条的有机协调和管理。山西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理顺农业管理职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农业管理职能分散、人为分割农业产业链条、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状，建立一个综合统一的农业管理部门。

二是要尽快重新划分各级农业管理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目前我省农业管理部门机构设置重叠，管理职能交叉，分工不明，不仅

造成资源浪费,而且降低了农业管理的效率。为此,山西农业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能定位不一定与中央政府完全对应,而应根据山西农业发展的实际来确定。部门工作的重点是根据山西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落实中央农业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和政策,制定山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政策。政府部门要从山西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出发,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结构调整规划;制定分区域、分行业、分品种的调整规划,确定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项目,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农民把握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农业产业结构。

三是要保证农业管理职能与政策手段的高度统一,有效落实农业管理部门职能。在明确农业管理部门职能的前提下,要赋予相应的政策手段。政策手段配套,政府预算保证,是实现农业管理目标和任务的有效保障。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政策和服务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对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外贸、保险等经济手段的运用,才能做好农业管理与调控工作;只有保证农业管理部门管理职能与政策手段的高度统一,才能真正打破部门限制,提高农业管理部门支持服务农业的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全省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2. 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化政策支持体系。

农业是一项弱质产业,农业产业化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经验就是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山西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差,要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更要求政府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农业产业化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一是要推动土地流转，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保障。山西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经营规模问题。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是矛盾的，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大障碍。土地政策上没有突破，农业产业化经营就不会有突破，更无法适应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为此，必须在坚持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积极探索，逐步建立符合国情和省情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在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通过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明确在农民的承包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可转让、出租和继承，也可作贷款抵押。坚持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偿、期限、本人自愿”的原则，按照“允许试点、积极引导”的方针，支持各种土地流转形式的合理尝试，保证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还必须切实加快全省的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生活保障渠道，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经营权逐步向少数专业户集中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二是要重塑投入机制，加大投资力度，努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农业的发展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农业结构调整要打破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农业资源的重新组合，就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山西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环境差，自然灾害频繁，更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搞好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种树种草、扩大植被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公路、电网、供水、通讯、能源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为结构调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是要发挥农户的微观主体作用，引导各种要素投入。着手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结，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使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在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和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农业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促进农业的对外开放。“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经营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辐射型、主导产业带动型、专业合作社带动型等等。不论哪种形式，只要能与农民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走向市场，我们都应予以大力扶持。

第二，要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农业组织体系的中坚，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导性力量，没有强有力的龙头企业，就不会有健全高效的农业组织体系；没有强有力的龙头企业，就不会有农业产业化的强力进展。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山西已经崛起了一批具有相当潜力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诸如古城乳业集团、厦普赛尔集团、别样红集团公司等。但是，无论是从公司经营规模、经济实力，还是从公司管理水平、市场开发能力等各个方面来讲，这些企业的带动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都还显得明显缺乏。从全省的角度来讲，龙头企业的数量、质量都严重不足。这既是山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山西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的一大原因。为此，山西一方面要立足现有基础，采取各种手段、措施，推进现有龙头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充分培育、发挥其龙头带动功能；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培育和发展更多的形式多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第三，切实完善企业、中介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

稳步发展的核心机制。农户离开了企业,其利益就无法保障;同样,企业离开了农户,其发展就失去了基础。所以说,建立这样一套机制,是山西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核心任务。现在看来,缺乏这么一套机制也正是山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又一大障碍。既有农户不遵守合同约定的现象发生,也有龙头企业损害农户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不消除,山西的农业产业化就无法健康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监督,形成诚信经营、遵法守约的良好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还必须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借鉴外地成功的经验、做法,采取诸如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推进企业和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4. 建立农业产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性工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社会必须为其提供高效的社会化服务。山西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不足、实力弱小、规模有限、市场开发能力和带动能力都明显缺乏,如果仅靠公司和农户的力量,缺乏强力的社会服务体系的支撑,山西农业产业化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推进山西农业产业化,必须构建起一整套农业产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

第一,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支持力度。通过科研、教学、推广的有机协调,通过科研部门、大专院校与农业生产的有效结合,确保农业科研成果的针对性;通过公司招标方式确定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及承担人,促进农业科研成果在山西农业生产的有效运用,使农业科研对农业增长贡献率得到较快的提高,增强山西农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要积极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的有序流

通，减少农民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困难和风险。鼓励和支持发展农业技术和经济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第三，建立农产品信息网络，指导农业生产和流通。政府通过加强农业科研、生产、市场等方面信息到乡（镇）、进村、入户的工作，及时指导农民掌握和应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变化，提高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第四，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立健全农田保护区制度、粮食储备品级和粮食风险基金、粮食保护价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支持和保护体系；积极创造扶持发展农业保险的条件，建立一整套包括自然灾害保险、市场风险防范和灾害紧急救济等方面内容的农业产业化的风险保障体系。

夯实基础
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

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托,也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山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果没有服务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难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但是,基础设施滞后,服务业素质不高,仍然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由此,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水平,成为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要求强化基础支撑

基础设施是经济建设的先行领域,是经济运行的骨架。服务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先导产业,是经济运行的主要依托。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要想实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持续地提升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水平。

1.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水平是山西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结

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由于其特殊的产业功能，因而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调整升级，还成为山西整体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基础平台。没有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的调整升级，山西结构的调整升级是难以想象的。

以基础设施而论，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水利电力设施、通信设施以及供气、供水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都是为经济运行提供基础服务的部门。基础设施差，必然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整体质量和效率。经济的运行，大致可以分解为四大流程，即物资流、信息流、人流、资金流。四大流程顺畅通达，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就高，相反，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就差。这四大流程，没有一个能够脱离开基础设施的支撑。山西经济运行的效率低、质量差，原因固然有很多，基础设施滞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这种滞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础设施总量不足；另一方面能够为经济运行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尤其是在占全省国土面积80%的山区，基础设施缺乏历来就是当地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比如，水利设施、电信设施、公路设施的不足，就严重影响到全省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产业化农业的发展，影响到全省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城市，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量和质的不足，也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发挥，从而影响城市经济整体升级的一大障碍。因此，发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乃是山西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服务业而言，虽然山西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构成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由于山西经济总量并不大，所以山西服务业的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且存在着结构不优、效益不高、功能不强的问题，基本上是以商业零售、餐饮服务、货物运输等传统服务业

为主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科技教育、会计、法律咨询等层次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育严重不足。服务业,顾名思义,就是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产业,山西一、二次产业及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进行得怎么样,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服务业为条件的。事实上,山西服务业结构不合理及其整体发育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一、二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制约了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单以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而论,一方面资金严重短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全国倒数的水平,另一方面居民银行存款却高居全国前列,这就不能不说是金融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表现。说到底,山西农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仰仗农村服务业的发育以及城市服务业向农村的渗透;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样要仰仗服务业的调整升级。因此,发展、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是山西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

2.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是优化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步骤。

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山西经济发展环境的好坏,取决于山西经济发展环境对于市场要素资源的吸引力的大小。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环境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优化山西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必须提升山西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服务业的发展层次。

基础设施构成状况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硬环境的优劣。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山西的硬环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尽管如此,山西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仍然难以适应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仍然缺乏对市场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比如,水力基础设施的缺乏,就制约着社会资金向农业产业化领域的

投入;旅游服务设施尤其是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的不足,严重影响着山西旅游资源对国内外资本、游客的吸引力,从而成为这一新兴支柱产业成长和发展的一大障碍;环保基础设施的短缺,不仅加剧了全省环境的污染,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整体环境的改善,降低了山西经济对于生产要素资源的吸引力,而且加剧了山西经济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的流失。所以说,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是优化山西经济发展整体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

山西经济发展环境不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软环境建设上。服务业是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讲,山西软环境不优的问题主要出在政策环境、体制机制环境、政府服务环境等方面,但是,服务业结构层次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经济的发展日益依赖服务业为之提供高质量的现代化的服务,投资者考虑的重点也已经不再是仅仅考虑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物质资源;投资者是否投资,主要考虑的是当地社会能否为其提供完善的现代化服务,比如迅捷方便的资金融通服务、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总量、较高的知识化发展程度、优质的保险服务等。山西产业结构要调整升级,就必须吸引一大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项目。这些项目尤其需要山西的第三产业提供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服务。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新兴服务业严重滞后的山西服务业远远不能适应这种新要求。因此,持续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着力发展新兴服务业,是优化山西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

3.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是山西经济的现实增长点。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

消费,三是出口。山西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投资。纵观山西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经济发展,凡是投资力度大的年份,经济增长速度就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 年到 1984 年,大规模建设能源基地期间以及 1995 年到 1998 年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期间,山西的经济增长率就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它绝大多数年份投资力度较小,经济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 年,全省经济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投资的推动。根据当年前 8 个月的统计数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22.3%,增幅比上年同期高 13.3 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比全国分别高出 6.5 和 12.6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基础设施建设和潜力产品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领域就成为全省投资增长的主要领域,从而也就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现实增长点。

4.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是化解和消除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障碍的一个重要途径。

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很多,能不能有效化解这些障碍关系到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着力推进服务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是有效化解和消除这些障碍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广大农村地区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直接改善农村经济的发展条件,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投资放大效应将直接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改善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生活水平,增强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从城市地区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

将直接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和社会文化生活品位。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升级、是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就业问题、保障城市社会安定的一条主要出路。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升级,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增强人口吸纳能力,还是加速全省城市化进程,解决一系列城乡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和传统服务业水平,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有效化解各种障碍重要前提和途径。

二、发展迅速、差距明显: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直是山西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山西展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通讯、电力、城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省基础设施面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一是交通设施尤其是公路交通设施建设成就巨大。到 2001 年底,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2511.7 公里,其中复线里程、电气化里程、自动化里程占总营业里程的比重分别为 63.3%、62.3% 和 67.5%。公路等级里程达到 5452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584 公里。2002 年全省公路等级里程达到 5657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1068 公里。省城太原对外航线 27 条,可直通全国 31 个城市。

二是邮电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到 2000 年底,全省长途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 8295 皮长公里,比上年增长 14.6%;全省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394 万门,比上年增长 26.2%;净增住宅电话用户 108 万户,净增移动电话用户

25.16万户;计算机互联网络用户达到8.71万户,增长4.4倍;数据通信总用户达到9.85万户,增长2.8倍;已通话的行政村达到20260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62.5%,比上年提高9.4个百分点;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9.64部。

三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总投资130多亿元举世瞩目的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自1993年5月开工以来,工程建设进展迅速,2001年10月底,总干、南干各泵站首台机组试通水成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全省农村饮水解困工程经过两年的努力,共投入资金6.19亿元,建成饮水工程6153处,解决了7629个自然村、181.94万人的饮水困难。其中,51个重点解困县共建成饮水工程4731处,完成投资5亿元,解决了5951个自然村、145.7万人的饮水困难。按照省定标准验收,全部工程都达到了优秀等级。(《山西日报》2002年3月3日第2版)

四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全省仅2000年,就完成污染治理项目1291个,总投资9.8亿元。竣工项目形成废水处理能力424万吨/日,废气处理能力2394万标准立方米/小时,固体废物处理能力18万吨/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61.9%,工业废气处理率77.9%。全省大中型项目"三同时"执行率保持100%。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244个项目有227个完成了治理任务,海河流域内的重点工业污染源基本实现排污达标。2000年,全省城市共新建烟尘控制区13.1平方公里,噪声达标12.2平方公里。年底,全省共建成13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134平方公里。另外,电力基础设施、体育、科研、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基础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全省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00年底,全省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636.4亿元,占GDP总量

的 38.8%;2001 年上半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39.94%,成为全国不多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接近 40%的省份之一。

交通运输业持续发展。2000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 3156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8.2%。其中,铁路客运量 2744 万人次,公路客运量 28821 万人次。全省全社会货运量 8.6 亿吨,比上年增长 6.8%。其中铁路货运量 2.8 亿吨,公路货运量 5.8 亿吨。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增长 7.4%,旅客周转量增长 9.4%。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2000 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75.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8%。

对外贸易强劲增长。2000 年全省海关进出口总额 17.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7.1%。其中出口总额 12.4 亿美元,增长 47.4%;进口总额 5.2 亿美元,增长 17.8%。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全面增长。全年全省海关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14.1 亿美元,来料加工贸易 2983 万美元,进料加工贸易 7850 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59.7%、26.3%和 8.2%。其中,出口一般贸易 11.6 亿美元,来料加工贸易 2219 万美元,进料加工贸易 5689 万美元,分别增长 50.8%、28.9%和 7.1%。

金融保险业继续稳步发展。2000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2628.39 亿元,比年初增加 267.89 亿元,增长 11.4%。各项贷款余额 2453.15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1.23 亿元,增长 10.4%。全年全省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4778.82 亿元,现金支出 4932.38 亿元,收支相抵净投放现金 153.56 亿元。全年全省承保总额 3361.6 亿元,保费收入 28.9 亿元。支付各类赔款 10.6 亿元。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2000 年,全省共登记科技成果 444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科技成果132项,获国家奖励的2项,省科技进步奖176项;受理各项专利申请1475件,授权专利968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9.3%和5.2%;技术市场日趋活跃,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90份,成交金额5257.8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和32.9%;全年科研机构通过技术市场向工业企业转让科技成果计162项,比上年增加28项,增长20.9%,合同金额达2855.9万元;太原和长治两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82.1亿元,比上年增长28.3%;实现利税8.4亿元,增长23.5%;创汇5500万美元,增长83.3%。

总之,经过多年努力,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省新一轮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实现新的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但是,横向来比,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其整体水平仍然难以适应山西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础设施总量不足,对山西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支撑功能仍显疲弱。

山西基础设施许多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以通信设施为例。2000年底,山西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占全国1.79亿门的2.2%;全国电话普及率已达到20.1部/百人,山西比全国水平低10.46部,不足全国水平的一半。全国互联网用户已达900万户(不含科技和教育网),山西这一指标不及全国的1%。山西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不足0.7%,社区服务中心只占全国总数的0.53%。

其二,基础设施结构不优,高等级设施极少,低档次设施居多。

以交通设施为例。公路是山西交通建设的重点,但目前山西

交通仍然是以低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公路运输体系，2000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占全部公路线路里程的比例只有0.93%，60%左右的公路为标准很低的四级和等外公路，超龄油路达4000多公里，80%左右的大中公路桥不适应15吨以上大吨位汽车的通过标准；全省80%左右的铁路干线处于饱和或超饱和状况，且大多技术标准低、车站股道少，站线短、坡度大；航空运输设施也是如此，尽管机场设施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但运输机型普通落后。

其三，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不健全，存在明显的缺陷和薄弱环节。

基础设施只有提高组合程度，形成完整的网络体系，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单个的基础设施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山西基础设施体系恰恰存在明显的缺陷和薄弱环节，组合程度和网络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基础设施体系构成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水利基础设施和环保设施的严重短缺。山西之苦在于水，山西之大害在于污染。山西水资源严重短缺，环境污染严重，迫切需要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和环保设施来缓解和解决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水利、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一方面严重降低了山西基础设施体系的整体功能；另一方面又使得山西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山西水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根本的出路是在坚持清洁化生产的同时，加强植树造林和自然生态建设。因而水利基础设施和环境设施建设绝不仅仅是打几口井、建几座库、修几道渠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资料表明，2000年全省共完成造林面积404.86千公顷，比上年仅增长0.36%。这样的生态建设速度和山西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目标的要求相距甚

远。2000年底,山西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比例大约为0.7%,与全国9.9%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只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9821万公顷的0.116%。全省环保设施质量和能力也都远远跟不上环境防治要求,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等处理、利用能力与排放量根本不成比例。当前,环保投资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投资热点,但是,在急需大量环保投资的山西,环保投资几乎还是一片被人遗忘的领域。以2000年为例,全省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总投资只有区区9.8亿元,只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57%,比炼焦工业(11.8亿元)少2亿元,比化学工业(12.3亿元)少3.5亿元,仅仅是冶金工业(28.6亿元)的34.3%,机械工业(18.4亿元)的53.3%。

从基础设施的城乡分布来看,主要是城乡网络化程度低,城市较为完善,农村地区则严重滞后。全国农村电话入户率平均超过4%,山西不足3%;全国不通电话的行政村占农村总数的15%,山西却达40%(《山西日报》2001年8月28日第8版)。山西是全国电力输出大省,但在省内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农村,电力设施却严重缺乏,人均用电量严重低下。从基础设施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是平川地区较为完善,山区严重不足;中部地区较为完善,东西两侧较为滞后;中部、南部较为完善,北部地区较为滞后。全省基础设施多集中于太原、临汾、运城、长治、大同等经济较发达的几个盆地地区。基础设施在全省分布不均,一是影响基础设施体系功能的发挥,二是影响全省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从基础设施内部各部门来看,主要是网络化程度低。基础设施只有形成网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但从现实情况看,全省基础设施网络化程度还很低,只是在基础设施较为密集的几个地区内部基本形成网络,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网则远远不够,覆盖全

省的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还远没有形成。

其四,服务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功能低下。

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为一、二产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产业。山西服务业尽管占 GDP 的比例较高,但服务功能却严重低下,突出表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高质量的现代服务功能的低下。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是涉农服务业发展滞后。传统耕作方式的农业与相对现代化的大工业并存,服务业发展重点长期向第二产业严重倾斜,涉农服务功能严重不足。根据 1998 年的有关统计,全省第三产业中农林牧渔服务业提供的增加值不足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的 1%。

二是传统服务业比重高,新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1998 年,以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等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占到服务业全部增加值的 3/5 以上,支柱地位牢固,而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服务业包括邮电通信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等在服务业中所占份额大约只有 5%,从业人员也只占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5%左右。

三是科学技术及综合技术服务业发育滞缓,1998 年占服务业增加值的份额只有 1%略强。

四是产业带动能力较强的房地产业与全国水平有很大差距,1998 年占服务业的份额只有 3.8%,远远落后于全国 6.2%的平均水平。

五是为能源重化工基地服务的特征明显,仅煤炭运输和仓储业就占到服务业产值的 19%。

这种状况,近年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改观。根据山西省统计局 2000 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所列有关数据,2000 年全省邮电业务总量只占全国总量 4725 亿元的 1.6%,增长率也比

全国41.9%的平均水平低3.1个百分点;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只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162亿美元的0.31%;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全国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元的0.37%;保险业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1596亿元的1.81%;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则只有全国成交额630亿元的0.08%。

这些数字说明,山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尽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结构层次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发展的质量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技术培训、技术推广、金融服务等农村、农业和农民急需的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严重阻碍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现代服务功能也非常薄弱。据报道,山西省农科院姚建民副研究员发明的渗水地膜可使一亩旱地达到一亩水地的产量,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利用该技术,1亩旱地可比普通地膜多开发100m^{3}的降水,相当于浇地2—3次。国家非常重视这项技术,1999年11月授予其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渗水地膜中试与转化"项目列入2000年"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成为山西惟一入选的项目,并给予170万元资助。2001年,又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这样一项技术,对于连年饱受干旱之苦的山西,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农利省的"甘霖"技术,在山西却倍受冷落,产业化进程阻碍重重,技术推广艰难异常,只能靠姚建民等科研人员逐村逐乡地宣传,贴钱赊账销售。山西城乡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就是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现状。这一切都表明,山西产业结构要调整升级,山西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三、提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发展水平

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和面临的诸多问题与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投资的原因，也有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表现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体制机制原因。只有实施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才是提升山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根本出路。

1.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构建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运作市场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新体制。

山西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沿用计划经济模式，投资主体单一化，投资运作行政化，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基本上是靠财政拨款来实现的。这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与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山西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原有的投融资体制，难以适应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要求。为此，必须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拓展投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构建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运作市场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一是要明确界定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领域。一般来说，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应坚持以财政投资为主。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于纯公共产品领域的界定，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因地区各方面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的。比如，高速公路在西方国家兴起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认为是只宜由政府投资经营,但现在高速公路却是市场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再比如,在发达地区可以由社会投资完成的基础设施,在落后地区却只能由政府来完成。所以,对山西而言,纯公共产品领域只能是极少数社会投资不宜进入的领域以及社会投资不愿进入、而又必须投资的领域。纯公共产品领域,就行业而言,主要是为基础设施产业提供基础条件、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部门;就地域而言,则主要是在农村,如农村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在此范围以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由社会投资或以社会投资为主体来完成。

二是要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式。投融资方式滞后同样是山西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一大原因。目前,各省市在多元化投资、多样化融资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高速公路、路桥建设、机场建设等项目通过上市直接融资,利用外资、吸收民间资本,采用 BOT、逆向 BOT 方式融资等。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由于山西基础设施基本上还是以财政投资、银行贷款为主,因此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障碍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此,必须进行投融资方式的创新。比如,对于大型的公共工程如水利设施、高等级公路,可以采取上市直接融资的办法,也可以把已建成的项目如太旧、原太、运三等高速公路捆绑起来上市,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用于新项目的建设。对于中小型的项目,可以采取 BOT 方式解决。区域型项目则可以采取联合投资的方式建设,谁投资谁受益,也可以通过逆向 BOT 的方式融资,即先由政府投资建设,然后转让给民间资本经营,并将转让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新项目的建设等等。

三是要提高投资效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投资效率低下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顽症。有资料估计,全国每年因“豆腐渣”

工程造成的投资损失高达上千亿元。山西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要切实有效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水平，切实提高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公开度、透明度，实行阳光操作，公开竞标，杜绝暗箱操作。

2. 改革和创新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构建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营原则市场化、管理制度化协调化“管运分开”的新型经营管理体制。

经营和管理是提高基础设施效率、发挥基础设施功能的一个主要环节，没有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既使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基础设施原本就缺乏的山西，构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是提升全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一是基础设施管理要制度化、协调化。管理制度化是指根据不同基础设施行业的自然垄断性和规模经济特点，区分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合理状态。管理协调化则是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整体规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比如城市电力、电信、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但是，由于各自为政、管理职能分散，致使许多地方一条马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不仅人为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造成巨额浪费，而且互相干扰，造成了地下管道线破损率的上升，严重影响到城市交通、环卫、市政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此，有必要组建诸如地下管网公司一类的机构，对地下管网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管理。

二是基础设施运营主体要企业化，运营原则要市场化。运营

企业化、商业化,实质上就是管运职能分离。山西基础设施运营主体目前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既使是已经实行企业化运营的,其企业化的程度也非常低。管理与运营职能不分,这是基础设施运营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要真正提高效率,最根本的还是要对运营部门实行企业化、公司化改造,与政府部门真正脱钩,合理界定并赋予其相应的企业自主权,使其按市场化原则来运营。

三是基础设施产业内部分工要专业化。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产业升级的一条重要途径。分工过粗,恰恰是制约山西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由于分工过粗,一方面基础设施各系统内部生产经营多样化、专业化分工协作难以展开,从而影响其效率;另一方面又造成垄断经营、各霸一方的局面,降低了其优化升级的动力和意愿。这既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也是山西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基础设施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是垂直分工。如电力产业可以分为电力生产、电力传输和电力销售;燃气产业可以分为气源、管道输送和销售;铁路也可以分为铁路建设、铁路线路和铁路运营业务;另一条是水平分工。比如电信业可以分为无线电信和有线电信业务,市话业务和长话业务也可以分开;铁路运输也可分为货运、城市间客运和国际间客运等等。

3.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起点发展、跨越式追赶。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加之现代科学技术更新淘汰速度加快,所以,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防止边建边落后、边建边淘汰的现象发生。山西基础设施短缺是山西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这也使得山西有可能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跨越式追赶；有可能使山西通过高标准的规划和建设实施，最大限度地带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全省结构调整升级。比如阳城电厂不久前投入商业运营的1＃、2＃、3＃、4＃机组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标准；太旧高速公路、原太高速公路也是技术水平较高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之中的大运高速公路和引黄工程也都采用了比较先进的工程技术，大运高速公路在建设中全面推广应用菲迪克网络化工程管理系统，预计可使工程总成本节约3—10%。尽管如此，山西基础设施低水平规划、建设的问题仍然大量存在。比如像太原这样的省会城市，市内交通却呈严重的平面化状态，道路年年修、年年宽，交通堵塞却始终难以缓解。

今后，山西基础设施建设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本着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起步发展、跨越性追赶的路子，采用国际上先进适用的技术，使全省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一步到位，向前发展。要重点发展通信、交通、环保等设施。根据国际国内基础设施技术发展的趋势，山西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关键，是引进先进的通信技术，建立信息网、数字同步网和信息管理网等支撑系统，实现电信网的数字化、综合化、宽带化和智能化；电力设施装备现代化，要沿着大电网、大机组、高压电、高参数和高自动化的技术方向发展，提高全省电气化程度；公路建设向高等级、标准化、分层化发展，发展网络化运输、联合运输；环保设施要引进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备、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以及先进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等，提升环保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4.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升服务产业发展水平。

山西服务业的发展同样面临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要解决服

务产业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信、自立、自强,树立服务产业兴省的新观念。

客观地说,山西的农业和南方的农业大省相比,和北方如河北、山东、河南、东北等地相比,都不具备竞争优势。这是山西农业之所以在GDP总量中比例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的工业和东部相比,和周边省份相比,在诸多方面处于劣势。山西要依靠一、二产业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赶超全国先进水平存在很大难度,必须付出更大的辛苦、更多的耐心、更艰苦的努力、更大的追赶成本才能达到。但在服务产业领域,山西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却要小得多,山西更容易追赶。信息革命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以代表服务业发展方向的信息产业为例,山西的计算机与北京的计算机是同一档次的,山西银行系统电子化办公手段与北京是相同的;山西的互联网技术方式与北京是相同的;山西的广播电视对本区域的社会效能同北京也是同类的等等。不仅如此,山西发展信息产业在许多方面的成本费用要比北京低得多。如在山西架设一公里光缆的费用不及北京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信息革命、信息时代带给山西跨越式发展服务产业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山西要实现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必须把握住这一历史性机遇。

然而,面对机遇,山西的许多干部和企业在思想上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许多人对山西发展信息产业表现出种种莫名的胆怯和畏惧。有人以为,信息产业连发达地区搞起来都很困难,山西怎么能行?有人以为,山西连农业、工业都搞不好,服务业更搞不好。还有人认为,信息化建设是高新技术项目和高投入的过程,所以,山西搞信息化建设肯定要比其他行业难度大、投入高。事实并非如此。信息产业说到底是一个知识、智力、技术密集型的

产业。山西的教育水平、科研水平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当然有差距,但和东部其他省份相比差距并不大,或者说在大多数领域并没有什么差距。有关的调查资料表明,山西的教育、科研在全国来讲,处于中上游水平。山西发展信息产业、发展服务产业的条件与其他省区相比并不差,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现代市场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的。作为一个省,山西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认为自己必须生产、制造出市场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服务同样是生产,同样是可以带来收入和利润的产品,甚至是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利润的产品。大力发展有山西特色的服务产业同样可以立省、兴省、强省。

为此,山西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协调全省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这个前提下,要切实转换政府职能,拓展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渠道,从政府办服务转向政府"管"服务,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离。投资障碍不除,政企、政事职能不分开,山西服务业就难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服务领域正在成为国内外资本竞相投资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消除进入障碍,拓宽投资渠道,迅速从政府办服务的"藩篱"中走出来,从政府经营服务转向政府主要管理服务,成为山西服务产业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各行业的管理部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本着"及时起步、尽快发展"的原则,用足用好国家开放服务业的有关政策,制定好行业改革和发展规划,把管理的重点放在全行业宏观管理上;另一方面,在已经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的领域,除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积极创办服务类企业外,还必须以租赁、承包、股份合作、股份制改造和出售等方式,改革由政府经营的第三产业。暂由政府经营的也必须实现政企脱钩、政事分开,提高企业化程

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另外,暂时仍然限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的领域,有关部门也必须认真研究好国家有关政策,把握好国家政策趋向,提前做好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此基础上,山西服务业发展的重点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及城市涉农服务业。整体而论,农村服务业和城市涉农服务业是山西服务业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也是山西服务业发展的主战场。发展农村服务业和城市涉农服务业,必须以发展传统服务业为主,解决农村的隐性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必须注意提高其经营规模和附加价值,提升乡村服务业的整体层次;必须建立与完善城乡间的物资和信息流通网络,推动与之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较高素质的金融服务;必须着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服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二是协调新兴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新兴服务业是山西服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山西发展新兴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关键是要处理好与传统服务业的关系,不能为了发展新兴服务业而抑制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相反,是要加速新兴服务业向农村、向传统服务业的渗透,通过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传统服务产业素质的提高,比如推动传统商业服务业的升级,发展现代物流业;推动传统餐饮服务业向连锁经营发展等。

三是重点大力发展科研教育服务产业。科研和教育,是知识经济赖以产生的丰厚土壤,也是山西实现社会经济赶超的主要依托。许多研究美国新经济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依赖科技教育的发展。因此,科研教育不仅是山西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当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发

展，科研教育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投资热点。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也是山西社会经济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历史契机。山西要把握这个机遇，推动全省科研教育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加速现有科研教育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利用，推进科研教育改革，实施资源重组、整合；另一方面必须用足用好国家放开民间和外资投资的政策，大力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面向全球和全国市场，发展山西的“大科研”、“大教育”，推动山西科研教育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科教兴省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才有真正的希望。

四、打造大运经济带
充分发挥交通干线整体带动效应

正在建设中的大运高速公路，北起山西大同，南至山西运城，纵贯山西南北，全长 666 公里，穿越山西 8 个地市 25 个县市区，是山西省最重要的经济大动脉。大运高速公路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二连浩特至河口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西部开发的重要通道。大运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全线通车。修建大运高速公路，总投资 188 亿元。对山西来讲，用这么大的投资修建高速公路，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修一条路，跑几台车，而是要通过这条路带动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要以大运高速公路为依托，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全力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促进生产要素向大运高速公路沿线集聚和优化配置，形成产业和企业相对密集、城乡一体化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和南北呼应、中轴启动、辐射两翼、点线结合、综合利用、整体推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1. 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依托大运高速公路,对沿线资源进行整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关系山西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山西的形象工程、生命工程,对于促进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依托用高科技打造的现代化高速公路,运用市场机制对沿线资源进行科学整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其时空效应、高速效应必将渗透到各行各业,并激发出新的生产力。这必将大大提高山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产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拓展发展空间,为山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机遇,创造条件。从高速公路上流过的不仅有人流、物流,还有信息流、资金流、文化流等,可以使山西丰富的资源优势与省外、国外的技术、资金、人才、文化等优势直接进行配置和重组,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山西省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可以改善沿线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形成代表山西形象的科技走廊、绿色走廊、文化走廊;可以使沿线形成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大型商品集散地,形成与此相辅的广大中小城镇,形成农村地区的商品营销网络和统一开放的市场格局。因此,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有利于促进汾河黄金谷地的经济腾飞,带动两侧山区城镇致富,有利于改善沿线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利于优化城镇布局、加速资源整合、促进经济发展,有

利于缩小区域内差距，实现全省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实惠，符合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其次，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山西省委七届十次全会和省人大九届四次会议提出，“十五”期间山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八大战略工程”，构建“六大支撑体系”。实施资源整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就是贯彻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大运高速公路穿越山西产业集中区、资源富饶区、经济发达区、人口稠密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建成后，将大大缩短全省各地与外地的时空距离，有利于打破市场分割，发展大商业，搞活大流通，促进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大大加速产业化步伐，促进沿线区域的产业、企业间的合作与渗透，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带动沿线土地、矿产、旅游、文化等资源的开发和产业化，形成沿线经济开发带，形成集约化经营的格局；将出现一批规模大、技术水平高、装备先进、效益好的企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使沿线农村与城市、农业经济与城镇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提高大中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农村城镇化水平，推进山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再次，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促进山西经济与东西部经济融合，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地理条件的制约与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瓶颈”之一。大运高速公路是国家确定的西部开发重要通道。它的建成，将使东西部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中西部资源优势同东部的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和相互融合，无论对于东部的进一步发展，还是中西部特别是

山西经济的崛起,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实施资源整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必将进一步打破山西的封闭性,促进全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相对集中的对外开放新局面,为山西经济未来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开放打通出入口。大运高速公路北端直抵即将形成的以北京为核心的奥运经济圈,东接环渤海经济带,南联黄河经济协作区,必将带动山西经济全面参与省内外的经济大循环,进而与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接轨,使全省经济发展走上"高速"之路。

最后,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已经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紧紧把握高速公路发展带来的机遇,优化生产力布局,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形成以高速公路为轴心的产业、产品开发带和区域经济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日本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建成后,仅在 14 座立交桥附近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就新增工业企业 900 家。其中,爱知县的小牧市由一个小镇一跃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和陆上运输枢纽。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经罗马至佛罗伦萨高速公路建成后,使 17 个省的经济收入平均增长了 3%,一些山区的工业产值增长了 81%,被誉为意大利的"太阳道"。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英国的苏格兰电子中心等,都是沿高速公路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新崛起的经济大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路立省、以路兴省。济青高速公路建成后,使山东形成了"半日生活圈",沿线五地市因地制宜建起了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综合生产基地、建筑材料市场等,区域内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其两侧集聚流动,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成为一条横贯齐鲁大地的经济走廊。太旧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对沿线城乡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十分

明显。可以完全预料,大运高速公路和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建成,对于山西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将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因此,以大运高速公路为依托,充分发挥高速公路的功能和作用,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沿线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和有序开发,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2. 实施"绿色大运、科技大运和人文大运"战略,打造全新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

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要以新大运、新山西为主题,展示山西新形象,反映山西新风貌、新发展,全力把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打造成为"绿色大运、科技大运和人文大运"。

(1)建设绿色大运,展示山西新形象。

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主题之一就是"绿色大运"。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将大运高速公路建设成一条纵贯全省南北的绿色长廊,使之既可改善生态环境,又可改善投资环境和旅游环境,还给世人一个山清水秀的山西。

实施"绿色大运"战略,营造"千里绿色通道工程",就是以大运高速公路为轴线,抓好中央分隔带、路基边坡及沿线两侧的绿化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大规模地种树、种草、种花,乔、灌、草、花、果合理布局,带、林、网、片、点、景相互配合,将沿线地带建成春花、夏荫、秋果、冬青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使大运高速公路真正成为展现山西新风貌的重要"窗口"。

按照规划,大运高速公路沿线绿化工作共分三个部分,即中央分隔带、路基边坡及公路两侧绿化;互通立交区和服务区绿化;沿线地带绿化。中央分隔带绿化以观赏型灌木为主,辅以常绿耐寒优种草坪,局部地段栽种长花期花卉;中基边坡绿化以各种形状的块状草坪为主,两侧营造不同宽度的乔木绿带;沿线地带绿化,重点是荒山造林和平原绿化,形成具有一定宽度的绿色走廊。原则上,平原微丘区以农田林网化工程为主,辅以一定的经济林和生态园区;在山地丘陵区第一山脊线以内,大力种草种树。在进行绿化工作的过程中,要用足、用活、用好退耕还林政策,要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做到既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和旅游环境。

大运高速公路全程有9个服务区、48个互通立交区,这些都是绿化的重点。对这些重点区域进行绿化时,要结合规划生态产业园区,使之形成每个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岛",然后逐步扩展生态建设的范围。立交区以绿地、绿三角为主,辅以花卉、观赏型大树冠乔木和造型化绿篱。服务区以生态岛、绿洲和绿环为主要绿化方式,辅以绿色停车场和绿色加油站。以服务区的加油站为例,晋南和晋中区域的自然气候条件较好,可采用台阶状覆土斜顶种植攀援植物,突出绿色主题;自然气候条件不理想的晋北地区,可采用钢梯架上托彩色钢板为顶面的折板式造型,在气候条件较适宜的季节钢梯架上摆放时令花草。依照国际惯例,加油站内附设小型超市与公共厕所,围合成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型庭园或广场。

(2)建设科技大运,支持山西新发展。

国内外许多成功的经验表明,一条高速公路就是一条隆起的经济带。大运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山西以交通

为骨干的主要经济带。其长距离、远辐射的运输优势，不仅能够加速区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体内循环，而且还会通过支线公路将全省各县区连接为一体，既可以带动跨区域的体外循环，又能从根本上缓解公路交通对山西经济的“瓶颈”制约，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作为大运经济带战略的深刻内涵之一，“科技大运”的实施，必将实现大运经济带的大范围功能跃升，促进沿线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转变，创造山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以路兴省”的战略构想。

“科技大运”的主题，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将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建设品位提高，培育新型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使之成为山西的“经济走廊”。按照规划，将根据大运路上的48个互通立交所处的地形、地貌、人文地理环境和工农业发展水平，分别设立多处形态各异的生态农业园区、旅游度假园区、现代物流园区、科技工业园区、自然生态园区和综合规划园区。其中，科技工业园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山西智力资源最为丰富、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最为集中的地段，非常有助于发挥轴带沿线科技资源优势，有利于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廊道，加快山西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步伐，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率先突破。

在大运高速公路沿途的各处科技工业园区里，新材料技术、生物与制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能源洁净化和高效利用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环保与生态技术等被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领域。同时，还将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重点支持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行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流动；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鼓励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与产业扩散，推进工业资源重组，促进高精尖技术向周边地区

的辐射。各大生态农业园区将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绿色农业基地建设,把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地方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运经济带穿越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农业生产条件有利,区位条件优越,是山西农业生产的主要基地和布局重心。在农业生态园区建设过程中,要立足区位优势和气候条件,以特色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科技、良种、加工、市场四个关键环节,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有效增加农业投入,争取在特色农业、都市农业、生态农业、绿色产品开发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率先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业园区,以制种、干鲜果、蔬菜、草食畜等特色产业为重点,全面实施特色农业工程,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产业化,使大运经济带成为科技含量高、集约化程度高、经济效益高的绿色农业区。

现代物流园区的建设,将会极大地缩减沿线城镇和企业之间的时空距离,显著提高通达深度和运输效率。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沿线各类交通设施的运输效能,全面整合沿线现有的交通运输企业、仓储站场设施、信息通信设施、供应采购企业及批发商贸企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使之尽快成为大运沿线地区重要的产业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建设物流园区的过程中,要把物流中心与公路主枢纽、陆地口岸建设结合起来,把物流园区与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结合起来。在太原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大同、侯马建设两个物流平台,沿大运线在各大中城市互通附近或服务区内规划建设若干物流服务站。在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同时也要建成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宽带网”。在大运高速公路建成后,可充分利用高速公路丰富的通讯资源,建设交通专业网络,搭建各种应用平台、数据库,研制应用软件和硬件,全面推广使用 GPS 系统,

实现交通管理智能化，搞好社会服务。

(3)建设人文大运，体现山西新特点。

山西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人文大运”这一战略理念，就是要将大运高速公路建设成为像明星城市那样的明星高速公路，同时将沿线的旅游资源联为一体，创建十大旅游景区。

创建一条明星高速公路需要精心策划、规划和设计。大运高速公路要想成为“明星”，重点在沿线从北到南的9个服务区上。按照规划，9个服务区首先要绿起来，要用密集式的绿化来营造旅途绿洲的环境意象，以解除高速公路旅行中的枯燥感。从进入每个服务区的引道起开始，要设立标志性雕塑灯柱，辅以色彩鲜明的弧墙与丰富的绿化配置，以及多样化铺面的引道，强调进入服务区的领域边界，使旅行者从充满速度感的道路心理状态顺利过渡、转换到较为稳定的休憩状态。各种建筑、设计、建筑色彩都各具特色，同时兼顾大运路系列服务区的整体形象。服务区9组院落在空间上要富于传统神韵，造型和色彩又不失时代精神，从而共同形成现代化的系列“汽车驿站”。

大运高速公路沿线的各种标志，也是“人文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确认”、“里程牌”、“停车处”、“匝道”、“服务区”等交通标志、标识在设计上要新颖、独特，让人一目了然、铭刻在心；要在两侧搭建山西名品广告长廊和三晋风光导游橱窗，充分展示山西改革开放新形象。

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范围内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以晋北古建佛教文化、晋中晋商民俗文化、晋南华夏根祖文化等三大旅游精品和云冈石窟、晋祠、平遥古城、壶口瀑布、关帝庙、鹳雀楼、绵山、芦芽山、恒山、五台山等十大重点旅游景区最为突出。大运高速公

路建成后,为三大旅游精品和十大旅游景区的发展进一步突破了地域界限,为实现更大范围的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人文大运"中的旅游资源整合,其要义就是要依托大运高速公路等快速通道,充分利用和合理开发各类特色旅游资源,搞好客源市场开拓、旅游景点建设、旅游通道建设和旅游接待设施建设,加强旅游形象塑造和宣传,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旅游产业成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新兴支柱产业,使大运沿线地带发展成为国内旅游开发的热点地区,成为山西新的经济增长点。

晋北佛教古建旅游区要依托云冈石窟和临近的五台山两大王牌景点,打响"佛教文化圣地"品牌,实施"大旅游产业"战略,大幅度提高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晋中晋商民俗文化旅游区要以名城、名宅、名山、名祠为重点,统筹开发,形成晋商文化产业体系和旅游服务产业体系。晋南华夏根祖旅游区要以黄河文化、华夏文化为龙头,努力增加旅游的文化品位,大力发掘重点景区的深层旅游价值,形成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互动发展的格局。同时,在交通方便、临近主要景区的地点,可依托现有服务设施,兴建一批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化服务水平的旅游度假区,提高各景点景区的旅游接待能力。

大运经济带内串珠状分布着8个市地的25个县(市)所在地,这些城市的建设普遍存在规模小、功能不全、集聚效应不高等问题。因此,大运高速公路给山西创造了建设城镇组群的大好机会。按照规划,山西要采取城市组群形式,尽快形成功能分工合理、空间一体发展的区域发展核心。按照山西各城市的布局,重点是要抓好大同——朔州、忻州——原平、太原——晋中——古交、介休——孝义——汾阳、临汾——洪洞——霍州、侯马——新绛——闻喜、运城——永济等七大城镇组群的发展,建成规模各异、功能有

别、等级不同、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在中西部地区有较强区域影响力的城镇密集地带,以此来抗衡周边省份由大城市整合而成的资源群。太原大都市区可规划建成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制造产业和材料产业基地,使之成为环渤海经济区及沿黄经济轴带上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重心区域;同朔都市区可建成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和煤炭工业基地,全省重要的乳制品、陶瓷、建材生产基地,具有北魏文化特色的旅游经济区;忻原城镇组群可建成省内重要的轻工、食品、化学工业基地,以宗教古建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经济区;介孝汾城镇组群可建成煤焦、酿造、食品工业基地,以晋商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经济区;临汾城镇组群可建成焦化、冶金、轻纺工业基地,以根祖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经济区;侯马城镇组群可建成商品粮棉基地和商贸批发市场集散区;运城城镇组群可建成全国重要的盐化工基地,全省的粮棉果生产基地,晋陕豫金三角重要的商贸流通基地,以关公文化、黄河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经济区。

总之,建设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要以"新大运、新山西、新风貌"为主题,使大运高速公路建设成为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方便快捷、用高科技打造的现代化高速公路,成为千里绿色长廊,成为既体现山西传统文化特点、又体现山西现代文明的文化走廊,成为带动辐射强的经济走廊。通过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使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山西厚重的人文历史,感受到山西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的新鲜气息,感受到山西在大踏步地前进。

3. 用超前意识和创新精神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

大运高速公路及经济带的建设,不仅给山西人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而且还给山西人民带来全新的思维、超常规的意识和创新的精神,带来快节奏和高效率,带来人们工作、生活和

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省委、省政府对于建设大运高速公路,从一开始就在工程建设中坚持做到观念创新、金融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工程高质量,管理高效益。在资金筹措上,采取资产置换、资本运作等市场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在工程建设上,实行了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建立了政府监督、项目法人负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四级质量保证体系,实行质量、安全、廉政一票否决制等等。所有这些,完全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运作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核心是培育产业基础,开发高新技术,力求在经济发展上实现大突破。要将大运高速公路沿线土地、矿产、旅游、文化、资金、技术、产业、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快沿线地区工农业、商贸、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邮电通讯等行业的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若干产业群,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逐步升级,从而使大运高速公路形成产业相对集中、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生态环境好、带动辐射强、发展潜力大、各具特色的经济走廊,逐步形成南北呼应、东西联动、沿线开发、整体推进的格局。一是旅游产业区,加快把三大旅游精品、十大旅游景区紧密地跨上大运高速路,形成旅游产业链;二是高科技工业产业,以高速路为纽带,打破行业和区域界限,建设科技工业园区,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三是特色农业,要根据各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条件,搞好农业、林业、畜牧业,建立优质高效并具观赏性的农业园区;四是运输物流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要向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转变,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搞好中介服务,增加就业渠道;五是小城镇建设,要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建设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新型

城镇,缩小城乡差别。

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关键是实施三大战略工程:一是努力改善大运高速公路沿线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构建经济带的基础工程,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二是努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经济发展后劲,构建经济带的主题工程,实施资源整合科技战略;三是努力提高园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水平,构建经济带的支柱工程,实施园区化和城市化的人文发展战略。通过实施三大战略工程,把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建成山西的绿色走廊、经济走廊、文化走廊。

实施资源整合,打造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用创新的办法制定方案,全省的方案要原则、宏观、指导性强,有关厅局方案和沿线各市地的方案要细、实、操作性强,起点要高,看得要远,想得要深,坚决防止短期行为;要统一规划,突出重点,明确责任,分步实施,坚决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加强领导,协调配合,以点带面,按市场化运作。

实施大运高速公路沿线资源整合,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是关系山西未来的大事,各地各部门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凝集各方面的力量,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团结进取,把握机遇,实事求是,争先发展,以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带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面实现山西"十五"蓝图,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人民富饶的新山西。

第四编

战略重点(中):发展新兴产业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和趋势表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仅仅依靠传统产业自身渐进式的改造和调整,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将是十分缓慢有限的。只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对此,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在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重点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接续产业,把培育、形成和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接续产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先导和重点,逐步实现山西战略支柱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换代。



加速旅游产业化开发
培育新型支柱产业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传说尧、舜、禹都曾经在山西建都。悠久的历史为山西大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山西发展现代旅游业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山西一向有"表里山河"的美称,又有"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中国古建筑文化宝库"之誉,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然而,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却长期滞后。如何推进山西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旅游经济强省转变,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一、旅游业:重点发展的新型战略性支柱产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发展新兴产业,是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战略重点。但是,发展新兴产业,绝不只是为了改变山西传统产业比重过大、新兴产业比重过小的结构不合理状况,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群,形成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综合比较各方面的因素,在诸多新兴产业中,最有条件、最有希望成为山西未来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首推旅游业。之所以为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旅游业是永远都不会衰落的"朝阳产业"。

良好的市场成长性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巨大市场需求的支持,任何产业都难以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正是由于其空前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被称为永远都不会衰落的"朝阳产业"。

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需求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需求。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论断,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便会逐步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人的旅游需求则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既包括物质生活需求,又包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内的综合性、高层次的需求。有关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300 美元,就会产生现实的旅游需求,形成近地(主要是国内)旅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000 美元,就会产生近国旅游需求;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3000 美元时,就会产生远国(洲际)旅游需求。可以说,科技越进步,经济社会越发展,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就越多,旅游需求也就会越旺盛。因此,旅游业是一项伴随人类社会经济进步而不断成长、发展的产业,是一项永远都不会衰落的"朝阳产业"。

目前,全球人均 GNP 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 300 美元;大多数国家的人均 GNP 指标也已经超过 1000 美元;我国人均 GNP 的水平也正在突破 1000 美元,在许多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则已经远远超过 1000 美元的水平。旅游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食品和住房的第三大消费需求项目,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居民消费的一种主要形式,也正在成为我国居民越来越重要的消费支出渠道。山西发展旅游业,具有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空间,而且这种需求还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因此,旅游业有希望成为山西未来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其次,旅游业是极具产业关联带动功能的产业。

高度的产业关联带动功能,是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必备条件。一项产业,如果缺乏与其他更多产业的关联性,不能带动其他更多产业的发展,那它只能是一项普通产业,不能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恰恰是一项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带动功能的产业。

"食、住、行、游、娱、购"被称为旅游业的六大要素,通过为旅游者提供一条龙服务,旅游消费直接投向这六个部门,促进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饮食服务、外贸、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并间接影响到金融、保险、通讯、医疗、农业、环保、印刷等 70 多个部门。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1992 年的统计,全球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乘数为 2.5,其中包括额外为旅游业增加 0.50,为相关行业增加 0.517,诱导其它部门 0.48。关于旅游与就业的函数关系,世界旅游理事会根据直接就业与间接诱发就业的数量关系得出的就业乘数则为 2.4～3 之间。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旅游部门每直接收入 1 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 4.3 元;旅游部门每增加 1 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至少 5 个就业机会。根据对我国旅游业相关数据的研究则表明,旅游业每增加 1 元收入,服务业产值就会增加 10 元;旅游业每增加 1 美元外汇收入,利用外资的金额就可增加 5.9 美元。这充分说明,旅游业是一项极具产业关联带动功能的产业。

旅游业是二战以来全球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了一批新产业的出现,比如滑雪旅游在法国的兴起,就导致了法

国滑雪用品制造业包括滑雪板、滑雪鞋、高压制雪设备、低压制雪设备等一批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一项极具产业扩张性、渗透性、融合性、改造性的产业。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展，旅游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领域不断扩张。旅游业向农业的扩张，产生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这样一种旅游与农业相融合的新式产业，从而极大地改造了农业，提高了农业这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提升了农业的产业层次。旅游业向工业扩张的结果则是旅游与相关工业不断融合，出现了集旅游概念与工业生产概念为一体的全新形式的产业。旅游业在第三产业内部的加速扩张，产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形式，诸如会议旅游、修学旅游、体育探险旅游、科学考察旅游、节庆旅游等等。

旅游业还是一项全球著名的"造城"产业。世界上因旅游业的发展而造就出来的新兴小城市不下千余座。所以说，山西要推动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就必须大力发展旅游业，培育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

再次，旅游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资源可永续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又一重要前提。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过去 200 多年的工业化历史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得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人类今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一项产业，如果违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仍然以牺牲环境求发展，以破坏生态求增长，是必然要被淘汰的，更不可能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是在诸多产业中最具有环境亲和力的产业：一方面旅游业提供的是服务产品，而且产品就地销售，不需要直接输出宝贵

的物质资源,不需要进行多环节的远距离运输;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旅游资源并不通过旅游消费产生损耗,而是可反复消费、永续利用的。许多旅游资源比如人造景观,就是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许多旅游资源比如民俗风情资源等,不仅不会产生损耗,相反,消费量越大,开发程度越深,资源总量也越多越丰富。另外,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业还有利于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和整体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旅游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最具有环境亲和力的产业。

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是山西整体经济发展环境不良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带动山西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的增加,加速对污染产业的淘汰力度,从而改善山西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仅此而论,旅游业也是山西最有希望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第四,旅游业是山西的资源优势产业。

山西是全国的旅游资源大省,无论是历史人文资源,还是自然风光资源,都非常丰富。

根据国家文物部门的统计,山西境内目前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的地面文物就达 30401 处,其中古代建筑有 18118 处。在这 18118 处古代建筑中,属于辽金以前的木构建筑就有 106 处,占目前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型遗产总数的 72%以上。在山西现存古建筑中,以古代佛寺为最多,保存也最为完整。其中列入国家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序列的即达近百处,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知名度,堪称"中国之最"的约有 60 处。比如曾经发生过《西厢记》故事的永济普救寺、佛教净土宗祖庭交城玄中寺、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菩萨顶和与洛阳白马寺建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洪洞广胜寺等。山西古代彩塑与古代壁画现存数量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均排在首位。其

中，彩塑12712尊，古代壁画230602平方米。山西保存的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数量居国内第一，而且其个体品味之高、珍稀精品之丰也无出其右，比如浑源悬空寺、应县木塔、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等等。建国以前，国外曾有人断言，在中国要找到唐代建筑实物已根本没有可能。事实上，我国目前仍然完整保存有四座唐代建筑，而且全部座落在山西境内。山西不仅仅古建筑众多，而且还拥有其他多种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比如全国三大石窟之一的大同云岗石窟、现存四座完整古城之一的平遥古城、关羽故里的解州关帝庙以及万里长城上的众多险要关隘等。山西人文旅游资源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文物古迹、佛教文化和佛教圣地，其中最负盛名的有五台山佛教圣地，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华侨中有很大影响；玄中寺被视为是日本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日本人对它极为敬仰；云冈石窟对许多国际旅游观光客则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山西的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山西自古多名山，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是惟一同时拥有五岳之一、五大镇山之一和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省份。目前，在山西境内有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3处，省级风景名胜区6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被列入国家森林公园序列的已有18处，列入省级森林公园序列的9处。山西还是我国北方地区石灰岩溶洞穴最为密集的一个省区，目前已确知的岩溶洞穴已多达百处以上。山西自古多疗养温泉，目前已有十多处对外开放。山西还有一些稀有的自然景观资源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比如，蟒河自然保护区就是一处鲜为人知的“仙境”，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塑造了一座天然的美术博物馆。一位学者在游历蟒河之后由衷慨叹，蟒河风光不亚于桂林山水。我国当代旅游地理学家卢云亭教授在游历北武当山后写道，在我国诸名山中，它是具有泰山雄、华山险、

黄山奇、峨嵋秀、青城幽等综合美的典型代表。

综合山西的旅游资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山西自然风光之美、景区数量之丰、人文旅游资源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价值之高,在全国是少有的,发展旅游业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旅行家,如徐霞客、李白、顾炎武、郦道元等以及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域外著名观光客,都曾经游历过山西,也都曾经无一例外地被三晋大地那极为富丽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所倾倒。山西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必将为更多的国际国内游客所关注,成为国际国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旅游业是山西未来最有条件、最有希望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二、旅游资源大省与旅游产业小省: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山西旅游业全面快速增长,呈现出势不可挡的锐气和蓬勃向上的活力。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入轨之年,山西旅游业再传捷报,全省旅游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00.04亿元,比上年增长22.97%。接待海外游客突破20万人次大关,全年累计接待海外游客20.14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6032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84%和20.84%。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50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95.0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和23.04%。

但是,横向比较,山西旅游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旅游业还远远没有成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是全国的旅游资源大省,然而这种旅游资源优势还远远没有转化为旅游产业的优势,

相反,山西的旅游产业在全国却一直扮演着"小么弟"的角色。以2000年为例,全省全年共接待国外游客16.53万人次,占全国入境旅游接待总量的比例只有大约0.21%;全省当年共接待国内游客2905万人次,占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量的比例大约只有3.87%;全省旅游外汇收入4991万美元,约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总量的0.32%;国内旅游收入77.21亿元,约占全国国内旅游收入总量的2.34%;全省全年旅游总收入81.35亿元,占全国旅游收入总量的比例大约只有1.8%。旅游业总收入占全省GDP的比例为4.96%,旅游业综合排名居全国第27位。

旅游资源大省与旅游产业小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全国旅游产业大省广东相比,山西旅游业的许多指标大约只有广东省的十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与周边的陕西、河南等省相比,许多指标也相差悬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西旅游业的这种现状呢?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首先是旅游产业化进程起步晚。

就全国而言,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大部分省市区就已经陆续完成了旅游从事业化到产业化的转变,而山西旅游产业化的进程大约起始于90年代中期,比全国落后了至少5～10年。

其次是旅游产业发展速度缓慢。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旅游业经过三轮高速增长,即1978—1981年的快速起步阶段,1983—1988年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1995年的迅速起飞阶段,1995后全国旅游业已经进入全面稳定增长阶段。但是,从各方面的数据分析判断,直到1995年,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才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比全国至少落后10年。在此之前,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基本上游离于全国旅游业高速兴起和发展

的历史进程之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山西旅游业在全国的排名大约在 20 位上下,90 年代初期已经滑落到 26 位,90 年代中后期又进一步滑落到 27 位。

再次是旅游业生产能力低。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1995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旅游企业单位 8896 个,山西省为 320 个,占全国总量的 3.6%;但是,全国旅游从业人员约 600 多万人,山西则只有 6 万多人,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只有 1%左右;1996 年底,全国旅游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为 1547 亿元,山西只有 8.28 亿元,仅占全国总量的 0.53%;全国旅游企业同口径固定资产净值为 1159 亿元,山西只有 6.32 亿元,仅占全国总量的 0.54%。生产能力不足,必然导致产出水平低下。1996年,山西在全国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中的比重只有 0.52%,在利税总额中的比重只有 0.39%。在纳入统计范围的饭店、旅行社、车船公司、定点商店、定点餐饮及其他旅游企业单位的多项指标中,山西绝大多数指标均只有全国的 0.5%左右,有的甚至更低。

第四是整体旅游资源技术开发水平低,宣传力度小。

在旅游资源开发上,一是重资源、轻市场,旅游资源开发,基本上仍然处在资源导向型的技术开发阶段,有什么资源开发什么产品,缺乏市场意识、市场导向。二是重资源、轻产品,把旅游资源简单地等同于旅游产品,缺乏开发深度和层次,许多产品甚至以原始资源状态面世。尽管许多资源尤其是人文景观,具有着极高的品位和很深的文化内涵,但是,在高品位、深内涵的旅游资源产品与一般的、大众旅游的欣赏层次之间缺乏应有的介质,缺乏对一般旅游者欣赏高品位、深内涵旅游产品的有效服务手段。三是重个体、轻整体,缺乏对资源的整体开发。旅游产品配套程度低、组合性

差，要么有景无路，要么有景无店，要么有景点无服务，尤其缺乏景点和景点之间的组合，加剧了景点的分散化，降低了整体的吸引力。四是重文物资源，轻自然资源；重实物资源，轻历史文化风情资源，从而弱化了山西旅游资源的整体形象，给人以单调感。比如五台山，给许多游客的印象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在旅游宣传方面，既缺乏灵活有效的旅游推广宣传手段，又缺乏应有的推广宣传力度，旅游宣传多局限在本范围省内，市场开发严重滞后。特别是山西更缺乏大旅游的观念，缺乏把周边旅游资源与本省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施借力发展的手段，致使山西旅游在北京、西安两大旅游区的阴影下，难有作为。

第五是旅游交通滞后，各旅游景区、景点可进入性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的交通建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山西交通滞后的状况，基本解决了从周边省市区进入山西的问题。但是，从交通干线进入各旅游景区、景点的交通“瓶颈”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景区与景区之间，景点与景点之间的交通链接仍然严重缺乏。交通滞后问题，同样加剧了山西旅游产品分散化、孤立化的倾向，降低了产品的可组合性，影响到旅游的整体效益。

第六是旅游中心城市支点功能薄弱。

旅游业是一项具有极强依附性的产业，城市是旅游业的主要支点，旅游业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的功能，主要由旅游中心城市来完成。但是，山西各旅游中心城市对旅游业的支点功能却异常薄弱。像太原这样的省会城市旅游业支点功能都严重不足，其他城市更可想可知。旅游中心城市功能不足，旅游产业的发展必然乏力，这不能不说是山西旅游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七是环境污染严重，旅游目的地形象不佳。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之一，然而，山西

长期以来煤炭能源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片面发展,加上植被稀疏、水土流失等,都加剧了山西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状况,严重破坏了山西在旅游市场上的形象。

第八是经营管理混乱,整体旅游环境差。

许多旅游景区、景点,小商、小贩、小摊、小点无序设置,无证经营屡禁不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强买强卖。

另外还有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组织结构分散化小型化、经营方式低级化、技术人才缺乏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所有原因,归结到根本的一点,即山西旅游产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的严重滞后。可以说,山西旅游产业发展的落后,主要表现为旅游产业化、市场化、企业化进程的滞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主要表现为:

一是行政化、事业型、分散式的管理体制,阻碍旅游产业化的发展。许多景区景点,仍由政府部门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投资靠政府、管理靠政府,收入交政府,政府甚至直接运作企业,政企不分、权责不分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企业的活力。特别是重点景区景点,基本上实行事业型的管理体制,旅游景区缺乏按市场需求开展市场化经营充分的权利和条件,缺乏市场化、企业化的起码意识和动力。全省旅游资源按行政区划被人为分割,甚至同一景区被分割为多个行政利益主体所有,人为破坏了旅游资源的一体化性质,割断了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链条之间的有机联系,加剧了景点分散乱的状况。旅游产业多头管理,旅游、文物、建设、林业、环境、水利、园林等部门各管一摊、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内耗丛生、互相掣肘,更加剧了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难度。

二是传统的非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阻碍旅游投资的增长。现代旅游业是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其发展日益依赖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山西旅游基本上仍然沿用传统的投融资体制,旅游

产业投融资功能严重弱化,投融资规模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0家,山西直到目前尚无一家主营旅游业务的上市公司。政府投资由于规模有限,又缺乏必要的集中和责任约束,人情投资、关系投资、经验性投资时有发生,有限的投资许多都撒了胡椒面,甚至变成了负向投资、破坏性投资。社会投资则渠道不畅、效益不高,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引导,加上鼓励政策不落实,基本上处在自发状态。这一切都严重阻碍着山西旅游投资的增长和产出能力的提高。有资料表明,"九五"头三年,全省旅游投资只有约10亿元,而按全省旅游规划大纲的匡算,到2010年,要实现山西旅游规划的基本目标,约需投资200多亿元。另有资料表明,"七五"、"八五"十年间,全省旅游投资仅相当于同期煤炭投入的0.6%,电力的0.8%,冶金工业的1.6%和化学工业的6.5%。

三是旅游业经营体制滞后,阻碍旅游企业化程度的提高。旅游企业是旅游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旅游企业的根本方向。没有旅游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山西旅游企业不仅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普遍落后,而且许多旅游单位还没有真正实现企业化,还是事业单位。全省整体旅游企业化的程度十分低下。"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非常严重,既缺乏开发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更缺乏开发产品、开拓市场的动力、压力。

这一切都说明,要推动山西旅游产业的发展,要加速山西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产业强省的转化,要发展旅游这一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

三、体制创新: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出路

国内外旅游产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旅游作为一项开放性、综合性的产业,要想取得大的发展,必须构筑起与此相适应的制度体制基础,必须对旧的体制、制度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山西构建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强省转变的必由之路。

1. 改革政府对旅游业的管理体制,推动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

旅游产业综合性、关联性、依附性强的产业特点,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前期,必然是一项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产业。缺乏政府的主导和强力推动,旅游业不可能获得快速的发展。山西旅游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管理体制是否适应旅游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政府管理职能是否科学合理,对旅游业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就山西旅游发展的现状来看,从 1995 年以后,山西旅游业支柱产业的地位在各级政府的指导思想和经济决策中已经确立。正因如此,1995 年以后山西旅游业才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尽管如此,政府旅游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转换滞后,仍然是山西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只有加速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才能不仅获得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动力,而且获得来自体制的强大推动力。只有这样,山西旅游业才能一步步成长为支柱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才能一步步由旅游资源大省转变为旅游产业大省、旅游产业强

省。

一是在管理形式上，要变分散管理、多头管理为相对集中管理。山西旅游业涉及到旅游、文物、城建、林业、水利、环境等多个部门，处于一种谁都管又谁都管不好的局面。这是山西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痼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相对集中的管理。为此，应该考虑在省、市一级设立由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旅游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旅游重大决策事宜。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依托现有研究机构，或者专门设立研究机构，根据旅游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就有关问题独立地开展调查、分析和研究，供旅游决策机构参考。县级可根据具体情况，或将相关职能合并到旅游局，不设旅游局的可合并到文化或林业部门。

二是在管理方式上，要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管理部门直接管理旅游企业、景区、景点，是山西旅游市场化、企业化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要提高市场化，企业化程度，关键是要实施管理方式创新，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宏观调控，把管理的重点从具体的企业、景区身上，转移到产业规划、政策法规制定、市场促销、协调指导服务、资源调查、环境整治等方面，进一步弱化行政部门对旅游企业的行政干预。

三是对具体的旅游企业、景区景点，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灵活多样的管理体制。对省级重点旅游区，不宜由景区所在县或乡政府管理，而应由省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直接管理，并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对于跨地区的重点旅游景区，如历山景区涉及沁水、翼城、垣曲三个县，晋城、临汾、运城三个市，开发管理都存在协调问题，应由省政府组织成立联合管理机构，共同规划、开发、管理。

四是建立地方旅游规划和重大旅游项目的预审制度，强化旅

游管理规划职能。要先规划、后开发,杜绝随意开发,防止和查处破坏性开发,增强旅游规划的硬约束功能,切实保护旅游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的原则,确保山西旅游资源的可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改革旅游业的投融资体制,推进旅游投资的市场化。

投入是产出的前提,有投入才有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任何产业都是如此。人们往往以为,旅游业是一项投入省、回报好的产业。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单从经济效益而论,旅游业是一个前期投入大、回报低的产业,只有在产业的发展越过投入产出平衡点以后,旅游业才是一项投入省、回报好的产业。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旅游业发展早已经越过投入产出的平衡点,所以表现出良好的产业收益。我国整体上还处在旅游业发展的前期,少数地区在投入产出平衡点附近或刚刚越过平衡点。我国旅游企业整体效益不佳,固然有经营管理水平低的原因,但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乃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而言,还远远落后于全国的水平,要达到、跨过投入产出的平衡点,还需要大量投资的积累。山西旅游业目前的投融体制很显然不适应这种要求,投融资功能远远不足。要加速山西旅游业成长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进程,加速山西从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转变,必须改革山西目前的旅游投融资体制,推动旅游投融资的市场化步伐。

一是改革旅游产业投融资审批制度,建立以服务功能为主的旅游产业投融资管理体制。山西目前的旅游投融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以审批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审批制度控制旅游投资,而不是促进旅游投资。为此,必须彻底改革审批制度,建立以促进投融资增长为目

标的投融资服务型管理体制。要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投融资管理的方式要由具体的项目审批,转向由政策引导、规划调控,为投资者提供综合性、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投融资管理的重点要由具体的项目转向整个行业投融资方向的协调和调控。投融资管理的目标要从具体的项目审批、行政化控制转向吸引多方投资,促进旅游投融资规模的增长。为促进山西旅游投融资管理职能从审批型向服务型的过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必要建立山西旅游投融资项目信息服务库,为各类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高度综合性的信息服务。

二是改革政府投资旅游产业的方式,推进政府投资的资本化、市场化。政府投资是山西旅游投资的重要引导力量,但是,多年来政府投资的行政化、分散化操作方式,严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导向功能,影响了政府投资的使用效率。要推动山西旅游投资规模的增长,优化山西旅游的投资结构、投资方向,就必须改革政府投资方式,推动政府投资的资本化、市场化。要变政府多头投资、分散投资为集中投入;变行政化操作为资本化、市场化操作,建立明确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构建政府投资的市场化退出渠道;杜绝政府无偿投入的作法,追求政府投资的滚动增值,严格控制政府投资的范围,政府投资的重点要转向市场促销,转向旅游产品的配套设施、基础设施,转向形成完整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产品的网络化链接。宜由社会投资进入的全部由社会投资来承担。

三是改革山西旅游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推进旅游产业投资的社会化、多元化。社会投资是旅游产业投资的主体力量,没有多元化、社会化投资的活跃,不可能有山西旅游产业投资的增长。山西目前一方面旅游业急需大量投资,另一方面投融资渠道又严重阻塞,融资方式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缺乏灵活多样的投融资机制。

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投融资理念,树立经营旅游、经营资源、经营山西的理念,推动山西旅游产业投融资从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要充分发挥现有上市公司的"小银行"作用,吸引上市公司投资经营旅游业;重大旅游项目采取债券融资的方式,向社会直接融资;设立山西旅游产业发展基金,辅之以必要的、合理的政策,吸引、调动和运作境外、省外、业界外资金进入山西旅游业;采取出售、转让经营权、开发权的方式引进社会资金;以省政府原有的旅游事业投资和增拨的调产资金为启动资本,吸引各方投资组建山西旅游投资公司,提高山西旅游的资本运营水平。

3. 改革旅游业的经营体制,推进山西旅游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旅游企业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没有旅游企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山西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旅游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没有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依托,旅游企业的发展就缺乏基本的动力。目前,山西旅游经营体制还没有完成从旅游事业型向旅游产业型体制的转化,许多旅游景区景点,尤其是重点景区、景点,还属于事业单位,其它企业也大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企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化程度严重低下。可以说,山西旅游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经营管理粗放、技术开发水平低下、市场开拓乏力、整体旅游环境不佳等等,其实都源于经营体制的滞后。这种状况不改变,山西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形成,山西由旅游资源大省向产业大省、强省的转化,就只能是水中之月、空中楼阁。为此,必须下大力气加速推进山西旅游经营体制的

改革，加快山西旅游企业建立现代制度的步伐，提高山西旅游产业的企业化、市场化程度，从而加快推动山西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实现旅游产业在全省产业体系中的战略支柱地位和作用，实现山西旅游经济强省的目标。

一是改革事业化的旅游经营体制，推进旅游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运营。要对全省旅游企业分步进行改造、改制。第一步是对仍然实行事业型经营管理体制的旅游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造，与政府部门脱钩，提高全省旅游产业的企业化程度。第二步是对全省旅游企业进行公司化、股份化改制，建立健全规范的、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依法规范经营。

二是改革小而散的旅游经营方式，推进旅游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经营。规模化、集团化是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根本要求，要提高山西旅游发展的整体水平，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小而散、散而低的粗放经营方式，走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道路。为此，必须结合全省旅游企业的改制、改造，加大产业重组的力度，以资产、资本为纽带，组建山西旅游企业集团，发挥联合的优势、专业的优势、配套的优势，通过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化的资产重组，壮大旅游企业实力，盘活呆滞资产。集团公司既可以是服务型的、投资型的、开发型的、管理型的，也可以是兼而有之综合型的。

三是改革旅游企业经营理念，提升山西旅游的经营层次。资本运营是企业经营的高级形式，是现代旅游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要提升山西旅游的产业水平，就必须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层次，开展资本运营。为此，在对全省旅游企业进行改制、改造、重组的同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山西现有上市公司的融资投资功能，通过引入上市公司参与旅游产业重组，实现旅游企业间接上市，通过吸引省内外上市公司介入旅游开发经营，打通山西旅游与资本

市场的联系通道;另一方面,必须加速推进旅游集团公司的上市进程,进一步拓宽山西旅游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面。

四是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推进旅游多元化经营。旅游业是个开放型的行业,发展旅游也必须采取开放性的政策。特别是在山西旅游业产业规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必须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除国家有专门规定的行业以外,其它行业均应允许和鼓励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和竞争。对山西旅游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比如景区开发、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等,要通过承包、兼并、租赁、出售、合资、合作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引入省内、省外甚至国外多种经济成分投资经营山西旅游业,彻底改变山西旅游产业经营单一化的状况。

五是转变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促进山西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995 年以后,山西旅游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旅游业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讲,山西旅游的这种快速增长是依靠大量景区、景点的粗放式开发建设所取得的,是一种外延增长式的发展。旅游业要成为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要成为旅游产业的大省、强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就必须从外延型转向内涵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转向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坚持旅游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原则,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形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避免资源浪费破坏。开发重点必须从实物资源层次逐步转向非实物资源层次,从历史文物、自然风光资源转向山西民俗风情、民间文化等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培厚山西旅游资源的总量。必须树立大旅游的观念,充分发挥山西旅游在北京、西安两大旅游区间的居间效应,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实现借力发展。要从具体的资源开发、产品开发,逐步转向重点开发市场、开发市场需求,实

现市场需求与产品供给的高效对接。要加深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度和层次，延伸产品链条，实现旅游产品的系列化，创名牌、出精品、树形象，提高山西旅游的综合效益。

加速培育信息知识产业
开拓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必须把信息化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加速培育知识信息产业,抢占新兴产业的战略制高点,以信息化带动山西工业化,推进山西经济知识化、生态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所谓信息化,是指在电子计算机、通信和网络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并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浪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头羊。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以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21世纪，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仍然是科技发展的核心主题。第二，信息产业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信息技术正成为当代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力，信息产业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主要推动力和新兴支柱产业。在经济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比如美国，1998年仅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就达8.4%，而广义信息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50%；目前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5%以上。据1998年的统计数字，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如果考虑到信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的因素，实际贡献率应在25%左右。第三，信息社会、网络经济时代来临。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络用户达2.6亿，预计到2005年用户总数将超过10亿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数字，截止到2001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计算机已达1002万台，网民总数增至2650万。网络已把经济活动密切地连接在了一起，信息成为核心经济资源，全球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据有关机构分析，1998年，发达国家30%左右的生产经营活动部分全部经由电子商务实现，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0%。

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不可回避的。要么乘浪借势，做一个弄潮儿，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尽优势，要么就被淹没抛弃。山西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省区，绝不能错过这次机遇，省委省政府已明确将“实施信息化工程”，列为“十五”计划的“八大工程”之一。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网络设施的建设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山西在1997年成立省政府信息化领导小组以来,加大了信息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力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一些项目甚至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目前,基础网络的升级改造和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上形成天上有卫星,地上有覆盖全省的SDH的宽带高速光纤传输网和数字微波网,以及ATM+IP宽带多媒体网络为主体的综合业务城域网络。网通电信网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以京太西、济石太银、呼太北等3条一级干线为轴线,省内SDH光缆自愈环为主体,光缆PDH、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助,光缆、微波和卫星多种传输综合利用的立体网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广电网上联国家广电超干网,下通全省11个地市,是全国第6家建设本省有线电视光纤网络的省份。目前,广电网采用光缆加数字微波并结合卫星广播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多层次的全省广播电视和多媒体综合数据传输网络主干网。其中,晋城市有线电视光纤网已敷设到行政村,太原市有线电视网拥有用户40万户。联通网近几年已完成投资36亿元,163省级网和互联网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吉通网1999年12月最先开通互联网业务,拥有50多家DDN专线用户。此外,山西电力、煤炭行业还建有自己的专用光纤和微波网络。总之,山西的基础网络设施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技术水平看,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山西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政务信息化方面,以省政府计算机网络为中心节点的办公业务资源网基本建成,还开发了山西省情系统、山西省综合国情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了国务院文件、省政府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资料、请示报告、法律法规、领导活动等30多个共享数据库;专业领域有山西经济信息网、统计信息网、外经贸网、科技信息网、教育科研网、医疗卫生网、农业经济网、交通信息网和测绘3S系统等十几个

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网络系统也已建成，还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山西省地域经济、农业经济、国土经济、地理信息、旅游资源、人才数据、新华社快讯、报刊、要闻等一批大型数据库。

基础网络设施建设的高覆盖率，各种信息网、信息系统的开通，各种信息数据库的建成，为推动山西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支撑力，打好了基础。

尽管山西在信息化的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山西的信息化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信息、网络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山西追踪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为了全面推进山西省的信息化建设，山西省政府已经制定了“十五”期间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奋斗目标：围绕“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制定并实施“信息强省战略”——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完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提高网络功能和水平，为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打下坚实基础；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全面推进政务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家庭与社区信息化，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逐步确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山西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部分产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初步建成相当规模、比较完整的山西信息化体系，为提高全民素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做出显著贡献。

“十五”期间，山西省信息化建设的工作重点是：完善一个网络、建立两个平台、形成三个中心、发展四个领域、把握五个方向。

所谓“完善一个网络”，就是按照国家推出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首先解决不同主干网之间还没有实现本地的互联互通问题，追求统一标准、互联互通、资源整合的目标。其次是加速

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使山西的基础网络真正成为宽带高速、多媒体、安全、畅通、服务优良的现代综合网络,成为山西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

为完成"十五"信息化战略目标,山西省的信息化建设还必须把握好五个方向:第一,信息基础网络建设要坚持统一规划、联合建设、互联互通的方向。第二,信息化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来,特别是要开发应用信息资源创造财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标。第三,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要量力而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但要充分认识到,发展信息产业,不能按部就班,必须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引进与创新相结合,打破常规,适度超前,实现高起点跨越式发展。第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化运作的模式,加快推进全省的信息化进程。第五,加强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加快高级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步伐,建立山西信息产业研究开发机构,开发信息技术和产品。

二、发展信息知识产业
抢占新兴产业战略制高点

1. 信息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

早在1980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在他的那本风靡世界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之后,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即将来临。果不其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数字化革

命推动着全球信息化浪潮滚滚而来。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技术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以英国为核心。这次工业革命以1733年发明的飞梭为始点，以瓦特蒸汽机为标志，带来了纺织业、交通运输业、钢铁和机械工业的大变革，把人类从手工业时代带到了机器时代，工业文明代替了农业文明；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电力代替体力、蒸汽动力使生产力再次发生了质的飞跃，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新时代的支柱产业；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能源革命和材料革命为主要领域，以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空间技术和计算机首次革命为标志，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高级化；第四次技术革命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以计算机的二次革命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特别是计算机的二次革命，使知识信息产业成为新时代的支柱产业，信息时代取代机械时代，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人类从工业社会由此迈向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崭新时代。

计算机革命的实质是信息革命。计算机的首次革命，首先是在硬件领域展开的。1946年诞生了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1954年创始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64年开始出现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第四代计算机由于微处理器——芯片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个人电脑革命”的发生。特别是1986年以英特尔公司80386芯片为“心脏”的386个人电脑的上市，形成了电脑产业的市场开放标准；1990年486电脑与微软的“视窗”操作软件相组合，将电脑性能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大大推动了个人电脑的普及。

硬件革命的巨大成功为以软件革命为核心的计算机二次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软件革命促成了第五代智能模拟计算机的问

世。更重要的是,软件革命将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组成信息服务技术,使信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

计算机革命推动了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计算机的首要功能是使信息数字化。以前的信息是采用模拟的形式来生成、处理、储存和传输的,而计算机则将信息用"二进位制"进行数字化处理。这就是"数字化革命"。随着计算机的不断升级换代,其处理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特别是个人计算机革命与互联网诞生之后,推动了"通讯革命",信息传输能力空前膨胀,"信息高速公路"将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

信息化浪潮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何给这个新的时代定义,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有人称之为"信息经济",有人称之为"新技术经济"。1996 年,经合组织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1997 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份报告中使用了"知识经济"的提法,"知识经济"由此流行开来。世纪之交,我国学者对知识经济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知识经济的特点主要有四: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信息化浪潮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你是否愿意,都会被卷入其中。如何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挑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世界范围而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工业社会早期,以英国为代表,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和钢铁业;中期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

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机械制造业和汽车业;工业社会后期,主导产业逐步转移到信息产业,引领这一世界潮流的典型代表便是美国。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推行支持与发展新兴知识产业的战略,电脑、通信、航空航天、金融等产业代替建筑、汽车、钢铁等产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当今全美前6名的富豪中,有5人是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士。据有关资料,高新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5%以上。仅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角度而言,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受由美国发端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世界各国都在世纪之初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经济。这种调整的大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知识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二是知识、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新知识、新技术向传统产业部门渗透,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逐步提高。

什么是知识产业,现在学术界似乎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甚至还不能准确界定知识产业包涵的领域。但处在知识产业核心地位的计算机与软件、信息、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等)、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的相关行业,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作用越来越大,它们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知识产业将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知识产业,就是知识及其产品的创造、生产、传播、应用的产业。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使知识产业的地位大大提升,信息产业也成为知识产业的核心。

信息革命带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这种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于是提出了“第四产业”的说法。所谓第四产业就是指信息产业。信息是知

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知道是什么”和“知道为什么”类知识的范畴。信息产业在本质上说就是知识产业。信息知识是知识经济的最高级形态。

说到信息产业,人们往往将其与计算机产业划等号。其实这是一个错误。所谓“信息产业”,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从事信息技术、设备、产品的生产以及提供信息服务的产业部门的统称,是一个包括信息采集、生产、检测、转换、存贮、传递、处理、分配、应用等众多门类的产业群。

根据我国学者的理解,信息产业可以分为两大部门:一是信息技术和设备制造业,包括微电子技术与器械制造、计算机技术与软硬件制造、通信与网络设备制造、多媒体技术与设备制造、视听技术与设备制造、缩微复印技术与设备制造、电子出版技术与设备制造等。二是信息服务业,包括传统的以文本式的科学信息(图书、文献、档案、专利等)服务、公共信息服务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和咨询业,以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软件生产、电子出版物、通信与网络系统、办公自动化等各种新兴的电子信息服务和咨询业。更具体地说,信息产业包括 7 个主要领域:(1)微电子产品与元器件的生产与销售业;(2)计算机产业;(3)信息材料业,如半导体材料、信息记录材料、敏感材料、光导纤维等;(4)信息服务业,主要是通过信息和数据收集、情报检索、查询等对用户提供信息咨询的产业,如商业咨询、商业信息服务、销售研究服务、法律咨询服务;(5)通信业;(6)与各种制造业有关的信息技术;(7)大众传播媒介及图书情报业等。

目前,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电视、广播、新闻机构、出版社、教育机构、娱乐场所等传统文化产业和政府公共机构、金融经济行业等。在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支撑下的新大众媒体时代,企业、各种

组织和个人可直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信息主体。由于信息产业的带动，广电、新闻出版、教育、娱乐等在我国也逐步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部门，而日益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产业部门，成为知识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山西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的战略对策。

知识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主导产业，是一种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能够起到催化剂、粘合剂、倍增剂作用的产业。在山西这块老工业基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同样离不开知识信息产业的发展。山西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加快知识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对策。

第一，以发展有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起步，加强对世界信息技术与制产造业的跟踪研究，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开发，培养山西的信息产业尽早成为战略支柱产业。

信息技术与信息产品是信息化的支撑和保障，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是要大力推进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装备和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加快发展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支持新型元器件、计算机网络产品、数字视听产品的发展，提高信息化装备和系统集成能力，满足市场对各类信息产品的需求。

发展信息产业，不能再走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老路，而应以企业为主体。要重点扶持一些本省有优势、有特色的信息产品项目的发展，支持开发这些项目的企业做强做大。如生产高性能和高耐热钕铁硼材料的恒磁集团和刚玉集团、生产光纤面板系列产品的太原长城光电子公司、开发防泄漏技术及产品的33所及机顶

盆、GPS定位仪的生产企业等。这些企业的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的优势。支持这些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在于支持它们提高信息技术与信息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跟踪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山西的信息产业集团。

第二,办好软件园区,发展软件产业。

软件产业在我国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太原软件园区要加快建设,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发展软件产业的经验,重点发展应用软件开发。发展软件产业,最主要的支撑是人才。印度软件产业这些年来异军突起,发展很快,最主要的原因是依托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批高质量的软件人才,不仅有高级的系统分析员(高级设计师),而且有大量的代码编写员、程序员。印度的计算机职业教育机构遍布全国各大中型城市,一般的中等城市也有上百家,每家机构的学员都在200人以上。山西发展软件产业,也应从加速人才培养入手,大力发展各类计算机职业教育机构,同时依托山西大学计算机系、太原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和省科技厅网络中心,建成三个信息化培训基地,组建信息技术学院,培养高级计算机人才。

发展软件产业,要鼓励软件公司向规模化发展。我国软件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平均规模是75人左右。

山西发展软件产业,应重点发展软件加工业,承接外来“发包”。这就要首先搞引进,从怎样产生文档、怎样编码、怎样保证质量、怎样测试等基础工作入手,引进成套生产线。

总之,软件产业前景无限,从培养人才这个基础工作入手,推动软件产业化发展,是山西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

信息服务产业主要指信息、数据和情报的检索与查寻，以及对用户提供信息咨讯的产业。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大体包括数据库和咨询两类。

数据库是为客户提供信息查询的。如美国数据资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数据库，供世界各国用户查询使用。还有一些信息公司，是通过从大型数据库或信息企业承租一部分信息进行深加工，以光盘等形式提供给特定用户。山西亟须推进信息服务产业化。

咨询业是信息服务业的高级形态，常被称为"头脑产业"或"智业"、"知业"。它们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为客户的决策提供依据。咨询业分专业咨询与战略咨询两种。专业咨询如建筑咨询公司，多局限于企业生产领域；战略咨询是为企业经营决策及管理活动提供综合咨询，通过分析市场状况、企业现状、外界环境等，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同时也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经营决策及管理活动出现不断专业化和外部化的趋势，掌握知识和信息的专家制定政策和方案，掌握资本和资源的管理层负责实施政策和方案。这种分工日趋明显，并成为咨询业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发达国家目前咨询业发展很快，像日本、法国都有两、三千家咨询公司。

山西的咨询服务机构，大多是官办的，政府职能与服务职能混在一起。有几家独立的咨询公司，规模也太小。山西亟须大力支持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为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三、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在我国的信息化战略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

信息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一个十分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山西的“信息化工程”必须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列为战略重点。实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途径是什么?这是研究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回答的问题。

传统工业在山西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是一个工业省份。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建材是山西的支柱产业,煤炭、电力的生产能力在全国居于前列。如果用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工业结构度等指标进行分析,山西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山西的传统产业中,产业集中化的步伐加快,生产技术广泛扩散,企业间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利润日趋平衡化。由此判断,山西传统工业再走数量扩张的老路已无前途。当前山西传统产业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素质低、市场竞争力弱、可持续发展能力差,不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已经难以为继。山西传统工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加速培育发展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并坚定不移地坚持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信息化与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一方面,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需求之源,是新经济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最新发展阶段的“引擎”,它赋予工业化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和现代化意义,是现代的工业化或者说是“工业化”的“现代化”。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是工业化的现代形式,工业化包含信息化。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应用,对传统产业有催化剂、粘合剂和倍增剂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应把信息化和工业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那么，在山西这样的传统老工业基地如何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呢？

1.要紧紧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在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纺织等领域的应用。

要大力促进采掘业、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敏捷化方向发展。要重点抓好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业模糊控制、交流变频调速、工业过程控制自动检测和系统管理五大项关键共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传统工业产业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能耗、节约资源、提高效益、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品升级和结构优化。比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可以使企业技术人员甩掉图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值。山西机械工业有一定基础，国家提倡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推进机电一体化，为各行业提供先进和成套的技术设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山西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提升机电工业大有可为。

2.要积极推动企业信息化进程。企业信息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所谓企业信息化，重点是指通过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开发和应用企业内外的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水平、开发能力和经营水平的过程。一是要推动企业上网，开发和利用外部信息资源，同时通过自己的网站、网页宣传自己，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产品的知名度。二是建立内部管理网，特别要借鉴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信息管理系统与模式——企业资源管理规划系统(ERP)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实现内部管理机制和市场

运营的整合,大力提高管理水平,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三是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的核心就是信息技术与现代管理技术和制造技术相结合,广泛应用于企业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全过程,通过信息集成、过程优化及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集成和优化,提高企业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

3.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国际上新兴的一种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我国传统企业中广泛推广电子商务还比较困难。因此,我国在"十五"期间,还只是强调"重点实现在外贸领域、信息产业领域的电子商务,积极推动钢铁、汽车、建筑、纺织等行业电子商务示范应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电子商务在传统企业中的光明前景:首先,使用电子商务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其次,使用电子商务可使传统企业的市场范围得到拓展,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再次,使用电子商务可以推动企业管理创新。一方面,使用电子商务可以使企业实现"无厂房、无店铺、无众多员工"的经营方式,使产品供应链更快捷、更透明、更易互动;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可改变传统企业的垂直结构,使其向水平型开放结构转变,减少了信息的中间阻塞,使上下更易于沟通。因此,发展电子商务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山西必须尽早作好充分的准备,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步伐。

山西发展电子商务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是建设中国煤焦数字交易网,进而有计划地推动生铁、钢材等原材料产品加入到电子商务中,使山西的传统工业融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市场中去。这对提高山西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是大有帮助的。

四、实施文化强省战略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信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指以经营性、赢利性为特征，按照工业化标准进行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现代传媒业、出版发行业、文艺演出及培训业、音像业、大众娱乐业、体育业及地方特色文化产品。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可谓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发展文化产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基础。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理所当地成为山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

1．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山西文化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往初具规模。2001 年全省广播、电视、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社会福利业增加值为 71.72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超过 4%。其中，出版业、广电网络、体育用品生产销售业、教学辅导类报刊、演艺业等综合竞争实力与全国横向比较排位居前；具备较大规模和发展潜力的行业、企业不断壮大，如报刊业、广电业、大众娱乐业、航空体育开发业、体育健身及培训业等；有传统品牌优势、群众基础、产业开发基础和市场前景的区域特色行业和产品发展迅速，如锣鼓业、万荣笑话等。

从整体上看，山西文化产业存着规模偏小、比重偏低、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一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文化产品、文

化单位、文化产业在注重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认识不足;对文化产业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战略目标和相关政策仍然缺乏共识。二是管理体制不顺。突出表现在缺乏全面系统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使文化产业发展难以形成统一的方向和系统的政策;"办文化"向"管文化"职能转变滞后,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严重,文化市场零星分散,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困难重重。三是文化产业单位转制慢,规模小,产品竞争能力差。四是政府投入不足与社会资金进入难并存。一方面投资主体单一,政府投资仍是山西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制约,山西文化产业投入总量偏小;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管理体制和政策等因素,社会资金进入文化产业仍存在很大障碍。这种状况造成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目前山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机遇来看,一是文化产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极为迅猛。英国 1995 年文化产业净收入约 250 亿英镑,超过了该国任何一种传统制造业所创造的价值;1998 年文化产业总产值接近 600 亿英镑,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 1993 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产值。美国 2000 年的版权交易额高达 4572 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出口产品,超过了汽车及配件、飞机制造、农业产品的出口。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正处在需求迅猛拉动阶段。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文化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将日益广阔。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发展水平突破人均 1000 美元阶

段，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文化消费占消费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我国最近几年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1996年—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从9.57%提高到12.28%。据预测，未来5年全国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2500亿元左右扩大到5000亿元左右。山西城镇居民家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也由1995年的9.7%上升到2001年的13.77%，省内消费需求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拉动也日益增强。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已经把加强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兴晋富民目标的重要途径。三是文化产业自身具有诸多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即回报率高、产品生产周期短、产业增长爆发性强、知名品牌产品市场存活期长、新产品开发与消费空间无限。文化产业的这种特性，通过特定载体与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晋文化"相结合，山西文化产业具有极强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从挑战来看，山西文化产业面临着国外国内同行业的激烈竞争。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省(市)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信息传播技术和日新月异，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在获得国际、国内市场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来自国际、国内同行业的激烈竞争。山西文化产业发展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山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极为严峻。

2. 进行三项创新，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一是观念创新。要站在贯彻"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要透过国际、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认清文化产业在山西经济结

构调整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增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紧迫感、危机感。要确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念,纠正以文化产业特殊性将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鼓励文化企业和单位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以此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打破地域局限、行业垄断和所有制偏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借鉴、利用国内国际能为我所用的政策、措施以及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进山西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二是体制创新。要以实现行业管理为方向,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快政企分离、政事分离的步伐,从"办文化"的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向"管文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模式转变,实现以行业管理为主,通过各种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市场,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对文化属性进行科学分类,区别行业内、产业单位内事业与产业、公益性与经营性不同领域,根据不同特点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体制改革,打破地区部门、行业分割,实施产业重组整合,组建现代企业集团,如出版集团、广电集团、演艺集团等,促进各种生产要求的优化配置,推进文化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融资渠道,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鼓励社会资金及外资进入文化产业。要加强和改善对文化产业的管理,强化整顿市场秩序的力度,打击违规、违法经营;转变政府管理部门职能和工作作风,清理、废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 WTO 规则不相符的政策、文件,减少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和环节,依法行政,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要围绕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目标、重点及其特色,加强协调和宏观指导,实现各部门、各地

区在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相互配套和系统化。

三是机制创新。要加快国有文化单位改制步伐,促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促进民营文化单位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及运营机制。国有大中型文化单位及纳入政府扶持的重点项目单位要先行完成改制,形成多元产权,鼓励发展高新技术在文化产业的推广和应用。要改革人才管理使用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鼓励和支持人才引进,允许和鼓励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入股和参与利润分配;鼓励和支持文化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及文化经纪人队伍的发展。

抢占“新经济”滩头阵地
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

世纪之交,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正在进入一个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以生命科学、超级材料、航天技术等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产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国都纷纷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抢占“新经济”的滩头阵地,是新世纪之初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发表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由此起步,茁壮成长,为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追赶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增强综合国力,仍然是我国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核心战略。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山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抢占“新经济”的滩头阵地,构建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体,推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确立新世纪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战略支柱产业单一、老化问题,选择新型战略主导产业,构建新世纪新兴战略支柱产业群,带动山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终实现战略支柱产业

的平稳转换和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经济日益融合，货物、资本、人员、知识的全球流动加强，经济的依赖程度加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已不再是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或省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战略目标都必须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条件下，紧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追踪世界技术革命潮流，推动经济现代化。

中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迎接挑战，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加速经济高新技术化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经济结构战略支柱产业单一、滞后的问题。

1. 新技术革命是推动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力量源泉。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力量源泉。每一次技术革命在带来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群体的同时，都会导致一些传统产业的衰落。于是，不同的产业就有了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区分和说法。比如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对原来的材料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碳纤维等高分子材料的出现，铝合金生产的扩大，沉重地打击了对钢铁的需求；而钢铁需求的萎缩，又使采掘、冶炼、加工等一连串材料工业部门失去了市场发展动力，铜材工业也因光导纤维被大量用作电缆材料而变得举步维艰。这是说，每次技术革命都会造成支柱产业的转换与替代，推动产业结构的变革。

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由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群，不仅是产业间的置换，而且是上档、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知

识技术密集型提升。第一次技术革命产生的战略支柱产业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战略支柱产业——汽车、化工、钢铁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在第三、四次技术革命中诞生的朝阳产业——计算机与软件、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核工业等,均属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人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产业技术素质的提高,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趋突出,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是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选择,中国不能例外,山西也同样不能例外。

2. 产业结构初级化,战略支柱产业单一化,是山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根本原因。

在新一轮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我国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的产业发展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在一些先进省市,如北京、上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已超过50%。

进入20世纪90年以来,在全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山西经济明显地落后了。主要表现在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都比较靠后。1999年,山西人口占全国的2.54%,而GDP仅占全国总量的1.87%,位居全国第20位;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第19位;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07元、437.7元、1511.4元,分别列第20位、第22位和第31位;全国GDP增长7.1%,而山西仅增长5.1%。全国财政总收入增长15.9%,山西则下降0.5%。经济不景气,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竞争力不强,已

经成为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么，原因何在？省委、省政府和学术界都已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山西产业结构初级化、战略支柱产业的单一化，不适应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山西目前产业结构的基本框架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初，马洪同志受中央委托，带领一批科学家论证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要把山西建成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按照国家通过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山西经过“六五”、“七五”和“八五”十几年的建设，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导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电力、交通运输业、高载能工业优先发展的畸重型产业结构。可以说，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形成的畸重型产业结构，使山西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益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投资大、效益低、竞争力不强，战略支柱产业单一，必然会造成山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历届省委、省政府都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90年，省委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了工业结构调整的“14888”工程。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后，山西省委、政府在《关于促进经济上台阶的建议》中再次提出要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二次能源和煤炭深加工。1993年，又提出所谓“三基四重”战略，就是强化农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搞好挖煤、输电、引水、修路四个重点工程。1996年，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又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速培育四大战略带动产业，发展十大系列产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三件大事来抓。山西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成效不大，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调产的思路还是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上,忽视了主导产业的转换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当前山西产业结构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一是缺少能带动山西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导产业。山西的支柱产业比较单一,煤炭、电力工业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和较大的规模,其他产业如冶金、机械、化工、轻工行业受资金不足等多种因素制约,发展比较艰难,全省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支柱产业体系。山西过去的发展思路是以煤炭为依托,搞煤炭转化(煤变电),发展高耗能工业。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煤炭、冶金行业都陷入了市场萎缩、生产过剩、价格跌落、产品积压、货款拖欠的恶性循环圈。山西传统的主导产业萎缩了,新的优势产业又没有形成,使山西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缺乏发展后劲。二是产品结构初级化,缺乏带动产业升级的名优产业和高技术产品。据统计,在山西工业领域,初级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 64.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仅占 4% 左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三是企业的技术素质低,技术创新能力弱。据 1998 年的统计数据,山西只有 1/3 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并有稳定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来源;中小企业大都没有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组织。大中型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只占销售收入的 0.57%。而国家十五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制定的目标是高新技术企业 R&D 经费投入要达到占年销售收入的 5% 以上。企业是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太弱,产品更新能力就很差,产业的技术素质也就提高的很慢,企业效益就低,自然很难有发展后劲。

在新的形势下,山西单一化传统支柱产业不断衰退,是一种不

容忽视的现象，调整山西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新的支柱产业群，就成为山西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讲产业结构调整，过分强调资源优势的转化与再生，使传统产业结构不仅没有得到调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强化，这一历史的教训必须总结。产业战略调整，不能过分注重经济存量与眼前利益，而要有战略眼光、战略高度。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山西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的问题。

3.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山西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劳动驱动阶段、资本驱动阶段和技术驱动阶段。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20%左右，五、六十年代的40—5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60～90%，而我国现在的这个比率平均还不到30%。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创新技术及其所增加的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是在夹缝中寻找创新机会和寻求发展空间。就我国及山西的情况而言，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谓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也就是内涵扩大型增长方式，是一种依靠知识、技术等内涵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尽快实现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因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成为山西经济发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山西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经济结

构调整真正进入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时期。1998年新一届政府组成时,提出山西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大力气培养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和优秀企业家,形成新的增长点。1999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后,充分认识到了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不力、传统产业萎缩、新的经济增长点成长迟缓,造成全省经济竞争力弱、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问题,召开了全省调整经济结构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一增三优"为主攻方向,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推进全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日趋明确。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山西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文献。《建议》提出:"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抓好五项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人才机制创新、环境创新、观念创新),实现'三个提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议》还明确提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要坚持以'一增三优'为主攻方向,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积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由此,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路得以确立。

这里要注意的是,《建议》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思路,突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已明确认识到:山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就是高成

长、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比重偏低。因而,《建议》特别强调:"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重点是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选择某些高新技术区域进行重点突破;突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争使我省现有支柱产业的素质明显提高,竞争力明显增强;重视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着力培育处于中试阶段、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这说明,山西省正在把构建新世纪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列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

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构建特色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

"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是山西省十五期间的"八大战略工程"之一。在山西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科技发展水平极低的省份,能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途径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明确山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重点。

1. 新技术产业的概念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

"高新技术产业"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直到目前为止,关于其涵盖内容,并无统一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在当代尖端技术和下一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技术产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另外的观点则倾向于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的标准,有的用产品中的技术比重,有的用研究和开发费用占销售值的比重,有的用科技人员的比例等。大体上说,高新技术产业就是指建立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工艺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

国际上通常把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创新群落——计算机、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光导纤维、激光、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工程、空间工业、机器人工业共 9 大类,列为高新技术。我国在 2000 年制定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划定的高新技术范围有:(1)电子与信息技术;(2)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3)新材料及其应用技术;(4)先进制造技术;(5)航空航天技术;(6)现代农业技术;(7)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8)环境保护新技术;(9)海洋工程技术;(10)核应用技术;(11)其它在传统产业改造中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把传统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包括在内,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处理好“共性”与“特色”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是以科技发展为前提的。我国的《十五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提出的指导方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即,力争在主要领域跟进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差距;在有相对优势的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局部可跨越领域,实现突破。科技部负责同志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五期间,我国将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争取在信息、生物、现代交通、现代农业等具有相对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实现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具体地说:

在信息技术领域,将充分利用以 Linux 为代表的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兴起和我国广阔的市场需求优势,大力发展新型操作系统、相应软件平台和嵌入式 CPU 芯片,迅速提高我国的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将充分利用丰富而稳定的生物种资源优势，重点开展功能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以及生物工程药物、生物遗传育种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力争在国际生物技术前沿——生物医药产业占领一席之地。

在交通领域，中国将开展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研究，并通过攻关，掌握总体集成技术，为磁悬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奠定技术、产业和人才基础。针对轿车广泛进入中国家庭的基本趋势，研究开发电动汽车产业化技术，我国力争在电动汽车关键单元技术、系统集成技术及整体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工艺水平跨越式发展道路。

2．山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发展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与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发展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山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两翼。两翼齐飞，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山西产业的技术水平，使其迈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山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认识到，山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就是高成长、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比重偏低。因此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突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选择某些高新技术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具体说，要以农业、煤炭、环保、电子信息、新型材料、医药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为依托，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上述列出的几项高新技术重点中，电子信息、新型材料、新医药、环保属于“新经济”领域的新兴产业。农业、煤炭等属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时期，作为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山

西,传统产业煤炭、电力、冶金、机械设备以及农林牧业在社会经济所占的比重极大。目前,山西的传统产业受买方市场和内需不足的影响,处于一种效益低、发展停滞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山西的传统产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成本高等问题,导致产品结构失衡,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很弱,缺少新技术的支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开发严重滞后。因此,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山西都必须把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素质的全面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传统产业面临更大的压力。由于技术含量低,我国传统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上传统产业中的某些高技术产品就严重依赖进口。比如,我国数控机床市场的95%、轻纺机械的70～80%、化工产品的一半为国外产品占领。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一方面年产钢突破1亿吨,钢产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普通钢铁产品严重积压,价格走低,而冷扎薄板、冷轧带钢、冷轧硅钢、镀锌板、镀锡板、不锈钢薄板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用材却严重缺短,自给率平均不足50%。我国作为年产300万吨的乙烯生产大国,高档乙烯却每年要进口400多万吨。所有这些,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产业的困境;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发展空间十分巨大。山西省把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的战略突破重点,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发展、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矛盾。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能够渗透到一切传统产业并对传统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过去几年

美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带动。据称，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5%，信息技术使全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6.4%。因而，我们必须在战略意义上重视培养、构建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问题。

在构建山西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方面，山西选择农业、煤炭、环保、电子信息、新型材料、医药(生物制约与中医药)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为突破点。在农业中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在煤炭行业中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在机械工业中推广光机电一体化与自动化技术，通过在山西的传统产业中开发高技术产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针对山西“三废污染”严重的现实，在污染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节水节能与清洁生产、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城市垃圾、污水的处理等领域，开发高新技术，发展环保产业，市场潜力极大。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是21世纪科技发展的主题，新材料是高技术和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石，这些都是属于“新经济”领域，可以说是关系21世纪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对经济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在这样的领域，山西这样的落后地区不可能全面开花，必须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分步骤地在一些重点项目、重点产品上实现技术跨越，形成新兴主导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前文已做了阐述，这里重点讲医药和新材料。由于生物技术的革命，医药产业也成为一个高技术领域。山西的医药产业，一是中医药产品要在加大中医药传统产品(如龟龄集、定坤丹、小儿七珍丹)开发力度的同时，开发新的医疗、保建、养生、抗衰老等方面的中医药产品；二是重点在生物制药技术方面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在已开发出的转移因子、高纯度蛋黄卵磷脂、核酸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生产。在新材料方

面,21世纪重点发展的是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等陶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等。山西的材料工业有较雄厚的基础,稀土永磁材料——钕铁硼材料在计算机、数字视盘机、磁悬浮列车、自动化高整公路系统等方面,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山西的稀土低钛硅铁合金系列产品,技术性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1.4——丁二醇",是当今世界上50种重要合成产品系列之一。太原理工大学许并社研究开发的"电致发光材料及系列产品"、与山西中通工贸公司合作开发的"特种复合材料及其产品",以及许教授在纳米材料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新材料工业是一种多学科、多行业协作的产业,产业关联度高,能够成为山西新世纪的主导产业。

抢占"新经济"的滩头阵地,关系山西经济未来的命运,再难也要上,这是绝不能回避的。

三、提升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核心竞争力

早在几年前,江泽民同志就讲,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孕育基地,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龙头。目前,全国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山西国家级开发区只有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另外山西还有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省、市级开发区,统称山西九大高新技术开发区。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1年7月,总面积24平方公里。截止到2000年底,开发区入区企业总数达到82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08家。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总投资112亿元人民币,项目总数累计610项,其中高新技术440项。经近十多年的发展,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在

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环境保护、高效节能、生物医药、航天航空、核应用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聚集起了一批企业群。其中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分别占到总产业的37.6%、22.1%、16.1%、4.6%、11.6%。

据统计，2000年，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72亿元，实现利税8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7555万元，增长速度快，发展势头良好。可以说，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已成为山西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排头兵，对全省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典型带动和典型推进的作用。

必须看到，山西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全国一些先进的开发区相比，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仅就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出口创汇三项数字与全国5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平均值相比。2000年太原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出口创汇分别为72亿元、8亿元(实际为利税总和)和5000万美元，而同期全国53个国家级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出口创汇的平均值分别为173.75亿元、8.68亿元和3.5美亿元。可以看出，山西惟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技工贸总收入也仅是全国平均值的10%左右。这充分说明，山西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需要加大力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大好机遇，我国各产业开发区都热情蓬勃地掀起第二次创业高潮，纷纷出台一批新的政策、措施，积极争夺技术、争夺投资、争夺市场、争夺人才，希望能够重塑自己的竞争优势，在新的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

新的竞争的焦点主要是在新经济领域。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以生命科学、超级材料、航天技术等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基础的

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机遇。目前,新经济在中国只是初显端倪,对于各省市、区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一轮决定21世纪经济发展命运的竞争。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西高新技术开发区来说,这是一次重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好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利用山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提供的各种资金、政策方面的保障与推动力,是山西高新技术开发区能否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

重塑山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竞争力,最主要的是解决好以下几问题,即发展模式创新与营造一流投资环境。

第一,山西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必须要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走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道路。

在山西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科技教育水平发展低下的省份,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人们总有畏难、退缩情绪,人为地降低起点、降低标准、降低要求。这样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打狼,很难有什么竞争力,也很难让人能够看到希望。

高新技术开发区应是山西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比如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该成为山西发展新经济的桥头堡,所以,它应该在已有的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环境保护、生物医药等几个产业的基础上,把战略重点放在抢占新经济滩头阵上,选择一两项适合成自身情况的新经济范畴的产业作为战略重点,建设一个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高新技术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第二次创业,绝不能走经济存量简单扩大的路子,而必须实施发展模式的创新,走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的路子。要实现这一点,首先是要把产业开发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

础上。科技创新，一方面要依托本省的科研院所；另一方面要积极内引外联，广泛和全国中央及地方的科研院所实现合作。要大胆、有效地引进外来人才，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先进产品、先进项目。其次，要想方设法把国内乃至国外的跨国公司引进到我们的园区中来。引进两三个世界五百强的跨国公司入区，一是要有良好的环境；二是要靠产业政策来吸引；三是要积极主地工作。这样才能把看似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办成。没有跨国公司入区，要说我们的开发区是一流的，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营造一流的投资软硬环境。

要建成高标准的开发区，要从抓环境与服务体系上入手，既要有一流的硬件设施，更要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一流市场经济软环境。

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一区多园"的建设方针指导下，山大、理工大、日化所、中幅院、电脑软件园等科技园区已初具规模。马坡工业园建设区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六通一平"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水、电、路、供暖、电缆的疏通、铺设工作全面展开，投资硬环境日趋完善。生物园物业中心大楼项目主体工程已峻工。还在筹建的有小店区科技园、尖草坪科技园和电脑城。

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山西的开发区还要加大力度。重要的是要用创新的思维下大力气创造优良的市场经济环境，建立成熟的服务体系。首先开发区政府的职能要创新，要确立"一切以投资企业为中心"的服务新理念，把投资企业的需要当成开发区管理者自己的需要，把企业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对投资企业要搞"一条龙项目"服务，使企业从政策咨询、注册登记、规划用地、基地建设到运作，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还要想方设法降低水电费、

地价等各种费用,降低入区企业的运作成本。其次要大力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开发区要配备一支年轻精干、有专业知识的管理队伍。管理者必须要有创新观念,有一种引领山西乃至全国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气魄和信念。第三,开发区要建立现代物流配送与后勤服务管理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业务发包为特色的供应链管理改变了企业的竞争方式,"适时生产"、"零库存"等供应链管理形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现代物流配送和后勤服务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产业,在网络经济时代更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开发区的管理者,必须从构筑竞争优势的高度,培养和加强以现代物流配送和后勤服务管理为主体的服务产业,实现对基础设施管理服务功能的整体提升。

与此同时,山西的开发区必须在企业进入、人才进入、资金管理、物流配送等环节上,与国际惯例尽快接轨,形成一流的市场经济环境,才能在机遇面前占得先机,在第二次创业中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大企业的规模效应。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是主体。目前山西开发区内的企业存在的问题,一是机制不规范;二是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入区企业的规模小,有些是民营小企业,企业的运作不规范,创业者还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素质,现代企业制度落实不到位。所以企业改制的任务还很重,开发区的管理者要帮助企业尽快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全国来看,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众多分散的小企业难以形成产业合力,也很难与国外上百亿、上千亿的大型跨国集团抗争。山西的开发区也要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有的企业有好项目,赚了钱慢慢发展,怕肥水流入外人田,不敢引进投资,这很危险。现在

竞争日趋激烈,失去的发展机会很难再找回。所以,开发区要重塑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坚持高起点;另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企业有好项目,要尽快找合伙人,找投资者,尽快扩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形成了规模经济,可以使单位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提高内在经济效果,同时还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相关产业发展了,又能降低消耗与成本,提高外部经济效果。

企业改制与升级上档,要结合起来抓。即通过有效、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资产重组,通过人才、技术重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推动企业上规模、上档次。

第四,创办企业浮化器,发展风险投资,在开发区建立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层次融资源渠道和多功能的资本市场,为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支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模式一般都是"技术创新 + 风险投资 + 资本市场",即技术拥有者通过风险投资扶植成长,再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壮大,风险投资在进入股票市场的过程中退出。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造血机制和动力机制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是以资本市场为重要条件的。

高新技术开发区还要在科技成果、项目的商业化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创建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山西省在1992年就积极改革、大胆创新,成立山西省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作为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孵化器。在"九五"期间,企业中心建成4400平方米的企业孵化大楼,形成了集办公、开发、生产经营及商务、展览、会议、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孵化基地,为小型高技术企业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创业环境。目前,创业中心累计孵化企业54家,在孵企业32家,毕业企业12家。

创业中心建立企业孵化基金(种子基金)以来,提出了要把自

己建成风险投资型企业孵化器的概念。制定了一套科技风险投资工作规范,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山西实际情况的风险投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同时,创业中心还积极探索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和增殖机制。

近年来,我国企业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在北京就有几十家。美国每周有 4 家赢利性孵化器诞生。可见,企业孵化器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相比较而言,山西的企业孵化器还太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首先,应鼓励各种投资主体到开发区创建全新机制的有生命力的企业孵化器。我国最初的企业孵化器都是政府创立的公益性科技服务机构,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孵化器是依靠创业者自己的专业背景、优势,为创业企业全方位服务。建立一个有项目、有资金、有退出机制的平台,早介入、早受益,实现双赢,是创办企业孵化器追求的目标。今后,山西新的企业孵化器必须实行一种新机制,省创业中心也要加速改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不管是已有的创业中心,还是新建的企业孵化器,都要规范化。要有高素质的兼具管理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提供全面的优质服务。初创业的企业,往往缺乏市场、销售、公司操作方面的经验,孵化器就是要帮助他们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解决种子资金。此外,还要帮助他们解决诸如股权怎样分配、投资预算、法律咨询、客户资源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企业孵化的成绩应根据孵化企业的数量、成活率、成长率等客观标准来评价。再次,企业孵化器不能仅靠自己的种子资金来支持创业企业,还必须积极帮助企业引入风险资金广泛介入自己的孵化企业,帮助其高速成长。所以,发展山西的风险投资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国，目前还缺乏大规模的资本运作和风险投资管理的经验，风险投资也刚刚起步。在2000年，山西省科技厅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配置和科学使用科技经费，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益，成立了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总公司把探索风险投资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通过对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考察，认定技术产权交易所可成为科技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结合的桥梁，可为科技成果、科技企业、成长性企业引进战略性投资伙伴，同时还可以为科技风险投资提供进入和退出机制，促进风险资本的良性循环。总公司成为上海技术产业交易所的会员，同时在山西省内建立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在风险投资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高新技术开发区应积极与其联合、协作，抓住风险投资的机遇，积极推动区内企业的高速成长。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风险投资的增值、退出机制上日趋完善。高新技术开发区要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强化自己的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创新的功能，进一步重塑自己在新世纪初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编

战略重点(下):构建混合型所有制分配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还是生产关系结构的调整。山西所有制和分配结构调整改革滞后——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大而不当,民营经济比重过小,发展步履艰难,适合山西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分配结构上平均主义严重,按要素分配的体制和机制发育不快,同时又存在着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的趋势。这种所有制和分配结构,既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又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下大力气调整所有制和分配结构,构建适合山西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混合型的基本经济体制。这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又一战略重点。



调整优化国有经济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上，山西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而其他非国有经济比重过小，发展缓慢。这是制约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关键性的体制障碍。因此，山西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关键乃是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山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步伐，建立山西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一、所有制结构调整中民营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反映在所有制结构上，突出的变化和趋势是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所有制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和趋势，可简明地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

就山西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进程来看，其民营化的趋势勿庸置疑。但是，如果把山西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进程放到全国的背景中去比较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山西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特别是工业部门的民营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全国的民营化

进程。

从城镇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情况看，1980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3.8，1985年全国为29.8，1990年全国为37.7，1995年全国为41，目前大体为50%左右。山西直到2001年，公有制经济就业比重仍然高达75.65%，非公有制经济就业比重只有24.35%，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水平相当。由此可以看出，20年来，当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过程的同时，山西城镇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却进展缓慢，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情况看，20多年来，山西工业部门中的非国有经济比重虽然有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样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全社会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情况看，20多年来，虽然山西非国有经济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有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从1998年到2001年，山西非公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约为33%，这一水平相等于全国1990年(33.9%)的平均水平。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发展缓慢，直接导致山西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山西经济发展民营化进程的滞后？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已有不少分析，诸如思想观念滞后、融资难度大、环境不优、政策不宽松等等。这些认识都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问题在全国许多省市普遍存在，并非山西所独有，但为什么其影响在山西特别强、特别突出，使山西经济发展民营化进程如此严重滞后呢？

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山西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发展民营化的进程和特点,我们不能不说,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山西建立和形成了国有经济比重大、战线长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根据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对内陆省份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将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进行长期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强化了山西传统的所有制结构,使其更加具有"刚性化"的特点,从而加大了山西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使山西所有制结构改革调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突出表现在:

一是不同的产业发展目标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维持和强化着山西传统的所有制结构。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放开搞活轻工业、严格控制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的产业政策。山西作为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整个工业中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还有继续加大强化的趋势,工业总产值轻重工业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23.5:76.5 变为 2000 年的 16.8:83.2。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认为能源重化工产品是一种基础原料产品,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国家对山西能源重化工产业采取了强有力的国家控制、计划干预,从投资到生产,从运输到销售,行政性的指令性计划强烈地左右着山西能源重化工工业。同时,国家对山西能源基地的开发建设,又以占将近 2/3 的投资份额决定并影响着山西基地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民营经济比重过小、发展缓慢的状况得以长期维持甚至强化,从而迟滞了山西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

二是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必然伴随高度国有化的土地和资本占用结构,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较多地被国有经济所占有,

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资源较少，必然影响山西经济发展民营化的进程。

高度国有化的经济结构，要求新的资源不断支持，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对新的资源要求就越多，吸纳能力就越强。以资本投资为例。投资对经济结构、经济布局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据统计，1981年至1990年，国家基本建设累计向山西投资272亿元，占全国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如果再加上地方投资，10年中，山西能源基地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800多亿元。其中，用于能源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达189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3.6%。1995年，山西国有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占76.5%，高出全国平均比重22.1个百分点，与江苏的33%、浙江的29.7%相比高出许多，山西国有投资比重在全国属于最高的省份，相反民营经济投资规模和速度远远落后于其它省市。1995年，山西集体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占9.4%，比全国的平均水平少7个百分点，与江苏35.1%、浙江29.7%相比低了许多，山西集体投资比重在全国属于最低。个体投资1995年在全社会投资中占9.8%，比全国平均比重水平低3个百分点。联营、股份等其它经济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比重比全国的平均比重低12.1个百分点。这样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政策，既是山西经济结构现状的反映和要求，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畸轻畸重的产业结构，强化了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缓慢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山西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

三是高度国有化的经济结构，必然形成并强化传统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体制和工作作风，阻碍山西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

这种传统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体制和工作作风，是

不会随着领导的几次讲话和决策部门的几个文件就能迅速消失的,常常有形和无形地顽强表现出来影响山西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由于非国有经济天生就与传统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体制和工作作风相对立,因而这种传统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体制和工作作风,对山西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显得特别明显。当全国许多省市开始迅速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布局的时候,原来作为国有化程度"领头羊"的山西,却困于传统僵化教条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体制和工作作风不能自拔,经济发展民营化进程也由于观念保守、行动迟缓、措施不力而进展缓慢。

当前,山西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必须下大决心、加大力度,采取有效途径和措施,推进山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改革,推进山西经济发展的民营化进程。

二、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以退为主: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按照经济结构的调整目标,从山西国有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山西国有经济必须坚持"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以退为主"的方针,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措施,进行战略性布局调整。这不仅是推动山西经济发展民营化进程的需要,而且也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提高国有经济对重要行业控制力的需要。

1. 退而有序、以退为主,山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当务之急。

中央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与经济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退的调整,做到进而有为,退而有序,抓大要强,放小要活。”这是搞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指导方针。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中,“进而有为”和“退而有序”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是,根据山西所有制结构的实际状况,从解决制约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突出因素出发,抓好国有经济的“有序退出”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在十五期间,山西国有经济“退出”的步子要大一些,速度要快一些,使山西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大降低,达到或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基本体制障碍。

山西国有经济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要发展壮大山西的国有经济,增强其控制力,首先必须从那些不适宜由国有经济经营的行业和领域中逐步退出,集中资源,强化必须或适宜由国有经济经营的行业、领域。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据此,在2000年山西1791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除110户中央企业外,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684户中,属于或接近于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的企业,主要包括大型煤矿、金矿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通讯、供电、供水、供气等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部分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些企业不足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10%。也就是说,约有1500余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中小企业可以逐步退出国有经济行列。这些需要退出的企业涉及国有资产800多亿元,净资产约300亿

元,占全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值的43%。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按照山西国有经济降低到200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来计,即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及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降低20个百分点,山西约有70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需要退出国有经济行列,涉及国有资产500多亿元、净资产约180多亿元,占全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值的27%。按山西国有经济比重调整到沿海省份目前20%的水平计,则约有1100余户国有企业(占总数的约60%)需要退出国有经济行列,涉及国有资产700多亿元、净资产约250亿元。

如果从迅速解决当前影响全省国有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看,根据国家提出的"对那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以及技术落后、污染环境、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劣势国有企业要加大淘汰力度"的要求,那么,全省约有500户左右(占现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近30%)的国有企业需要退出国有经济之列,涉及国有资产约400亿元、净资产约80亿元。

针对以上几方面的情况,借鉴沿海省市的经验,结合山西的承受能力,山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当务之急,是要迅速解决近30%的劣势国有企业的调整问题,要该破产的破产,该关闭的关闭,采取多种方式,使山西国有经济比例在几年之内达到甚至超过全国2000年的平均水平,从而迅速改变山西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力量分散、缺乏活力的状况,使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合理,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实现这一目标,山西国有经济的退出要按以下两条基本途径来进行:一是通过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兼并、重组、拍卖、出售等形式,使原来国有企业的国有

资本退出生产领域，原有企业以其他所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政府收回相应的国有资本，用于其他国有企业或社会事业的发展。二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及《破产法》等，对国有中小企业中的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五小”企业，以及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关停或破产，使之完全退出市场。

为此，山西国有经济的调整必须多管齐下，针对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主要包括：

一是对产品有一定竞争力，资产负债率不高，经营状况较好，在全省经济发展中起支柱作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通过公司制改造，建立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对一些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国有资本保持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或吸引外资及其他法人参股以及内部职工持股等方式，变单一的国有制为多种所有制的资本结构，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改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对已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可根据需要，采取减持国有股的方式，逐步降低国有股的比例。在全省1684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技术比较先进、产品竞争力强、资产负债率低、经营状况良好的50～60户大型骨干国有企业可采取这些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对大多数不需要国家控股的一般国有企业，可大量吸纳各种所有制投资者以及内部职工入股，形成国有参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

二是对整体生产经营困难、负债高、亏损严重，但部分产品仍有一定市场，技术仍有一定优势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采取兼并重组的办法，由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对其进行兼并或收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和优势互补。

三是对资产负债高、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要坚决通过出售拍卖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完全退出。

四是对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的国有企业，要坚决依法予以破产，并要争取列入国家企业兼并破产计划，享受国家有关破产核呆的政策。到 2000 年底，在全省 1684 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资产负债率达到 100%以上的企业有 328 户，连续 2 年以上亏损的企业有 294 户，这两类企业有很大的重合性。对这 300 户左右的劣势国有企业应依照《破产法》积极实施破产，使这些国有企业彻底退出市场。

五是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行业过剩生产能力。对那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国家明令淘汰的"五小"工业企业和产品总量过剩、国家要求调整退出的国有中小企业，应坚决予以关闭。我省列入国家关闭名单的一批国有小钢厂、小糖厂、小水泥厂和小煤矿、小电厂、小玻璃厂、小造纸厂、小焦炉、小铁厂都需要通过关闭，不仅使其退出国有企业行列，而且要使其彻底退出市场。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手段，都必须坚决克服那种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发生；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必须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保证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要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必须发挥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建立完善规范的资产转让制度，确保国有资产转让公开、公平、合理、合法的进行。

一是要加强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建立国有资产转让备案制。

要将政府的协调指导与市场的自主选择结合起来，使国有资产转让的市场行为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政府在备案审查时应对资产的评估价值、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包括公证机关意见）、国有资产流向等内容进行审查。

二是规范国有资产转让程序。在国有经济调整过程中，资产转让要引入竞争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避免行政手段“拉郎配”和暗箱操作。加强对国有资产转让各环节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营私舞弊、幕后交易、非法侵占或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

三是充分发挥企业职工的监督作用，建立国有资产转让通报制。对于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各项重要事务，要及时向职工代表大会通报，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对职工反映的有关问题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处理。

2. 改革创新、进而有为，发展壮大山西国有经济。

山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退而有序，以退为主，并不是要消弱甚至抑制国有经济的发展，动摇甚至抹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国有经济的“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是为了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创新，更好地达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提高国有经济对关系国计民生重大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有效控制力的根本目的。

一是要加快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

国有经济改革创新、进而有为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加快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构建山西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主要途径和措施包括：

(1)进行股份制改造。国有独资公司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单一拥有公司产权,并且要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山西企业集团中国有独资公司占的比重达 20.8%,而且所在行业多数并不是国家必须垄断的行业,因而通过股份制改造,可以使企业从技术、服务、资本全方位进入市场、面向市场。通过规范上市,逐步实现国有股的流动与国有股的减持,改变国有股独大的局面。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得国内外企业法人、合资企业法人、金融机构、职工等多种形式持股,真正使企业股权多元化、分散化,使企业出资人逐步到位。这是国有企业集团资本运作的发展趋势,使企业不仅考虑大股东的利益,而且也要保护小股东利益,保护企业相关者的利益,从而激励与约束经营者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的治理结构实质上是所有者对经营者实施最大限度的激励机制与公正的约束机制。股东会要真正代表股东的利益,使投资者享受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增值保值、职工利益、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方面的权益。要规范监事会,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企业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中的贯彻与执行。要避免董事会与高层经理兼职,将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形成股东会管好董事长和监事会管好总经理的内部制衡机制。这样,动力与机制驱动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都处于激励与约束的状态之下,迫使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都处于游戏规则的规范之中。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主要的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和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国企产权多元化,形成产权制约机制。通过实施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实现治理结构的民主化、规范化;通过全面转变经营机制,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

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管理经营科学化的新机制。

(3)创新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创新包括资产重组、产品重组和管理重组的创新。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资源融合,强化企业能力,盘活企业的资产存量。处于不同性质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实施资产重组、并购等外部购买方式进入战略性、公用性产业,通过内部股权多元保持公用性产业的竞争性和效率。产品重组可以实现产品结构的合理性,提升产品档次,根据消费导向或超越消费导向实施产品创新。国有企业在产品重组中要区别不同产品性质实施不同战略。管理重组则是国企走出困境的有力杠杆。通过管理重组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学习性组织,高效率公司,实现人本管理。管理重组涉及企业共同愿望的构建、领导方式的变革、激励机制的健全、组织构架和企业流程的重构。管理重组的成功将使国有企业从自身激发起内在的活力。

二是要加快推进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国有企业自主权迟迟不能完全确立,国有经济改革长期滞后,根子都在政企分离不彻底上。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最终突破"政企分离"这一国有企业改革难点的关键所在。没有自主权的企业很难有市场竞争的活力。一旦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承担起对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职责,现有的任何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就再也没有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任何理由了。正像任何类型企业的资产所有者那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履行的仅仅是资产管理者的权益与职责,而不会去干预企业法人的经营管理与自主权。因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要制订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

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肯定国有资产产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拥有管资产、管人与管事相统一的绝对权威,从而为政资分开、政企分离提供了现实的政策依据。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无论是独资的还是控股公司,只要有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要能拥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充分权利,其市场的竞争力绝不会逊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对此,山西要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本人格化的经营管理体制,彻底实现政企分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形成以产权链条为纽带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党的“十六”大有关精神,具体办法是建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构成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实现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离、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国资委是专门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领导决策机构,资产经营公司是由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是独立法人,拥有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运作。上一层级依据产权关系,选派董事进入企业,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行使所有者职能,并通过规范的监管办法加强监督。企业则自主经营,在董事的选派和经理选任上,实行“管人与管资产结合”的原则,以避免“多头管理”和“责任主体缺位”。国资委向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经营的集团公司委派董事和监事,总经理由董事会选聘;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经营的集团公司向所控股、参股企业选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或提出罢免董事、监事的动议,依据持股比例参加投票表决。企业经理由董事会选聘。通过这些产权关系链条和人事管

理环节,改变政府对企业日常经济管理活动和人事问题不合理的“行政化”干预,确保国有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的利益。

三是要大力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技术、产品、管理、文化等综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反映,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仿效、并能带来持续盈利的独特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保持长盛不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山西国有企业既有加快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山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差,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突出表现在:企业转制缓慢,大多数企业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一支职业化、高素质的企业家,企业经营理念仍处于传统水平,管理水平低;企业规模不经济,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产业大集团,规模竞争能力弱;企业普遍缺乏自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产品竞争力差;企业普遍缺乏具有个性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凝聚力差,缺少一支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等等。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因此,加快培育山西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推动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

培育山西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是:

(1)全面、深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培育山西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提供理想的制度资源。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清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创造体制环境;杜绝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依法规范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完善市场体

系,健全市场主体,让各类企业展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把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到培育规范、有序、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秩序上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山西现行的企业经营者管理制度,基本上还是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的管理制度,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察培养、选拔使用、监督制约、激励奖惩等方面基本上还是按党政官员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运行规律的要求。其主要弊端在于:选拔任用机制僵化,难以将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选拔到国有企业经营方面来,形成一支真正职业化、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激励机制缺乏,国有企业吸引不来也留不住优秀的经营人才;监督机制弱化,成为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特别是这种"行政化"的管理制度,行为价值取向"政府化",难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竞争主体,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国有企业经营者行政化的管理制度,正是山西国有企业转制缓慢,难以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的深刻原因之一。这种"行政化"的企业家管理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成为国有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深刻原因之一。对此,要加快改革山西"行政化"的企业家管理制度的步伐,建立市场化的企业家管理制度,坚决破除企业经营者"官本位"的思想和国有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观念,将企业经营者由"官场"推向"市场",由行政配置转变为市场配置。要以企业家双向选择为基础,打破地域、所有制、行业和个人身份限制的企业家选择机制,真正放宽视野,从省内外甚至国内外选聘政策把握能力强、资本运营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策划能力以及综合管理能力强的企业经营者。不同的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选人方法。对

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引入竞争机制，把组织推荐和公开竞争结合起来，通过考任、竞选产生企业经营者。不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要让企业出资人或股东自行选择经营者。

(2)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和发展一批核心能力强的大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捷径。因此，应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界限，在有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走联合之路，构建各产业的“航空母舰”。

(3)以创新精神推进企业自身建设，不断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保证，文化创新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技术创新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首先，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建立合理的内在机制，当务之急是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的监督制衡机制、运营机制和创新机制，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应变能力，实现运营机制科学化、柔性化。

其次，发展先进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念、企业行为准则、企业目标等。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最深厚的底蕴，它通过蕴藏于企业活动背后的心理、伦理、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影响着企业行为。企业文化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范围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企业应注重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结合本企业的实际，创造性地建设先进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归宿感、认同感，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企业不断实现更高的目标。

最后,提高企业技术研发、创新的能力。领先于他人的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制胜法宝,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内核。山西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对最新技术的掌握运用,不断提高生产、服务水平,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3. 山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五个结合。

山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很大的系统工程。搞好山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和办法,做到以下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要把国有经济的退出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创新,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形成一大批投资主体多元化、经济相当规模、经营机制灵活、市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

二是要把国有经济的退出与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新要求,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给予国民待遇,使民营经济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使之成为承接国有经济退出的主要力量。

三是要把国有经济的退出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通过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形成一大批有能力承担产业结构调整重任的企业载体,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是要把国有经济的退出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结合起来。通过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等运营方式,使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骨干企业集中,改善国有资本结构,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和国有企业活力的增强。

五是要把国有经济的退出与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措施、其他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结合起来。如建立补偿机制和下岗职工教育培训机制，妥善解决好退出国有企业的职工身份置换，建立健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资产转换机制，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的步伐等等，保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有序退出"任务的顺利实现。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有经济改革提出了很多富于创新的指导性意见。只要我们方向对头、措施得力，坚持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能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艰巨任务，形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序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三、积极引导、多方支持、加快发展：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加快山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步伐，是山西所有制结构改革创新的另一重大任务。山西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差就差在山西民营经济的比重不高。因此，毫不动摇地加快发展非国有经济，是山西加快所有制结构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任务。

1."十五"期间要建立起不分所有制差别的经济发展政策。

近几年来，为了推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山西与全国一样，出台了不少鼓励、引导和促进的政策。这些具有针对性、保护性、促进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无疑是对原来所有制歧视政策的否定，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用新世纪的眼光看，从推动非国有经济长期发展看，这些政策背后，仍然存在着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符合的差距，即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仍然

没有彻底突破所有制的框框。如果说当前这种对不同所有制的保护扶持政策是在现实条件下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在进入“十五”时期后，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精神，全面贯彻关于私营经济的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放弃传统的以所有制差别为基础的政策思路，让民营企业在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上都能得到“国民待遇”，建立起不分所有制差别的经济政策框架，把所有不同的所有制企业都放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框架之中。

毫无疑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间的所有制身份差别仍将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必然要带着所有制的烙印。对于不同企业，政府的经济政策还将保持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将不是针对不同所有制的差异，而是针对不同产业的差异、区域的差异和企业规模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制定和实行无所有制差别的经济政策，是从发展的角度着眼的，并不否定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制定和实行无所有制差别的经济政策，也并不意味着对国有经济的放弃，而只是要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放到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去。如果总是把国有经济放在特殊的政策保护伞下，那国有经济永远不会提供更高的效率，因而也永远不会发展壮大。

由此，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没有对非国有经济的专门保护扶持政策，代之以对民营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就是对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持和保护。

2. 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有关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以降低民营经济运行的“体制成本”，促进其快速成长。

首先,必须给予民营经济以平等的法律政策地位,正确认识非国有经济在“兴晋富民”中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逐渐放开,并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政策上却难有完备的、可操作的措施真正让其享受应有的待遇。山西长期作为国家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国企大省”,是对非国有经济管制时间最长、管制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由此,山西排斥非国有经济的思想观念意识比沿海地区要强烈的多,而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相应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基础条件要比沿海地区紧缺和落后的多。我们看到,山西民营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待遇。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政策、户籍、职称评定制度、工商注册登记、项目审批条件等等方面,都要面临繁琐苛刻的各种政策规定的阻拦。在投资领域,连外资都能进入的金融保险、石油、汽车等行业,个体私营企业却不能进入;民营企业需要生产场地、盖厂房,却不能征用土地;在申请自营进出口权上对民营企业条件苛刻,门槛过高,民营企业的不少出口商品必须通过中间商才能出口;山西各地几乎都有限制户口迁入的规定,民营企业引进人才和子女入学、就业困难重重;由于渠道不顺,目前基本上不给进入个体私营企业的员工评定职称,成为大学生不愿进私企的原因之一;按照工商登记管理的现行规定,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在 50 万元以上才能冠以县名,500 万元以上才能冠以省名。私营企业集团必须有 5 个以上子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以上规定的限制,山西全省大约有 2/3 的民营企业集团公司在工商年检登记时被取消公司名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因此,山西发展非国有经济,首先必须不断消除对非国有经济

由“成分”歧视到政策歧视的偏见,真正落实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平等和政策平等,不断完善推进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政策环境,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平等、机会均等、服务平等的平等性政策,提供促进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鼓励性政策,提供促进产业调整、产品升级的指导性政策。

其次,政府引导,资本运作,构建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融资体制,为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创造条件。融资不畅、人才匮乏、信息不灵,严重影响着山西民营经济的发展。资金犹如企业的血液,而资金短缺恰恰是山西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困难,仅目前受困于资金短缺而无法正常经营的个体私营企业就占到全省同类企业总数的50%以上。有资料显示,山西个体、私营企业在银行获得的贷款不到全省贷款总额的1%,绝大多数企业不得不靠自身的积累滚动发展。

山西加快发展非国有经济,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调整和完善融资制度,改善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要深化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将资金投入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可以安排一部分财政性资金,用于民营企业投资于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的贷款贴息,或用于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补贴等。另一方面,要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局面,大力发展面向民营经济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有效启动民间资金。城市商业银行等非国有金融机构本应是依附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而建立起来的,民营企业就是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建立一批中小商业银行、特别是民营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可以打破“官营”金融垄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大大拓宽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除此之外,还可以积极探索个体私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各种途径。对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山西经济发展要求并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帮助其发行企业债券、股票。要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建立起以企业、经营者、中介机构为主体，以信用登记、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为主要环节，服务于企业经营活动的信用制度，为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建立信用基础。

对于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来说，进入的最低资本规模门槛越来越高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山西非国有企业的规模还都比较小，这对于其进入现代工业经济是一个明显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一制约，企业发展的途径一般有两条即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前者是指单个企业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步成长，最后达到相当规模；后者则是指若干分散的小资本通过联合、合并等方式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就两种资本扩张方式比较而言，资本集中方式的优势是不言而语的。从山西目前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在单个资本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从银行大规模取得资金支持的现实条件下，要突破进入资本门槛高的限制，比较现实的途径之一就是实现民营投资者的联合。然而，山西民营经济发展还处在依靠自我积累的阶段，企业间的联合兼并困难重重，很难找到一例民营企业家之间通过联合实现资本集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成功案例。其原因除了民营企业家本身素质的限制以外，主要是政府的引导和管理服务工作没有跟上。由于资本集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主要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当政府不能提供一个公平、规范、透明而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时候，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集中就很难有效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不是什么为非国有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而是创造和提供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和优良的政策服务。只有做到了这一点，非国有部门的资本集中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起来。

再次,创造政策环境,放开民营经济的行业和市场准入政策,加大鼓励、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一步一步对其开放各种竞争性领域密切相关。目前,在各竞争领域,非国有经济进入的制度性障碍基本消除,但在传统上由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公共部门,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表明,政府每一次对民营企业开放新的领域,都会激起民营企业新一轮的投资扩张。从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看,民营企业进入公共部门已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如浙江义乌市早在 1995 年就将自来水公司 80% 的产权向社会公开出让,1998 年又向社会出让已经建成的机场路五年的收益权。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国有资本金管理的试行办法》,规定政府不对以赢利为目的的一般经营性项目、有稳定收益的盈利性基础设施项目部分以及部分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实际上为各类企业进入公共部门开放了绿灯。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这种范围的扩展还远远不够。20 多年来,民营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领域主要局限于初级服务业、流通领域以及一般制造业,而其他领域则主要为国有经济所垄断,并存在普遍性的行政性垄断。打破这种行政性垄断,放开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因此,必须加大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力度,放宽非国有企业的行业和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开放的行业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都应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允许不同所有制依法经营,共同发展。凡鼓励和允许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原则上也应允许民营

企业进入,其优惠政策对进入该领域的民营企业同样适用。即使在传统上被视为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垄断的层次、范围和环节做出充分论证,将能够市场化经营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分解或剥离。在开放的投资领域,允许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进行投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同时还应制定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用足、用好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在这方面应突破以往那种"战略性"、"重要性"、"公益性"等笼统的产业划分的局限,只要是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都应对非国有经济开放。

在"十五"期间,山西面临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应该认真考虑有关公共部门发展的政策调整,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进入公共部门。如可以参照上海的做法,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政府预算投资的范围,逐步弱化国有经济在公共部门的垄断地位,明确规定预算投资退出行业的范围、方式和时间表;尽快制定并公布面向所有内资企业的公共部门各有关行业的准入规则、特许经营原则、申报审批程序及其其它有关政策,表明政府开放公共部门的决心,使投资者感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增强其投资信心。

最后,要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强化政策服务意识,为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建立绿色通道。政出多门,政府行政管理不规范,是加重非国有企业负担、削弱其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执法不规范,主要是执法部门人员素质差,执法随意,法纪不严,借故吃、拿、卡、要的现象严重。社会上有种说法是"执法就是收费,检查就是罚款",执法不规范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令人深恶痛绝。山西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的问题同样令人吃惊。这从近几年的个体税收情况就能看出。1997 年以来,山西个体工商户连年大幅减少,2000 年底比 1996 年底减少了一半还多,

但个体税收却以每年26.3%的速度超常增长,从1996年的11.2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28.73亿元。山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周边省区,但山西的个体税收占全省工商税收的比重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周边省区。2000年,全国这一水平是9.2%,周边较高的河北是15%,山西则达到16%。受税费负担重而到省外谋求发展或干脆放弃的个体私营企业为数不少。

对此,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必须严厉制止管理部门"三乱"和"吃、拿、卡、要"等不正当的行为,用依法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国有企业的合法经营,把强化纳税意识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统一起来,通过规范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强化政策服务意识,以构建新型的政企关系,树立全新的政府管理部门形象,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另外,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名义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非国有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因此,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必须在行政审批、工商、税务注册登记等各个环节,坚持从宽、从简、从快的原则,做到能备案的不审批,能简化的不烦琐,能限时的不拖延。对于再就业的个体户和商业摊点,以及二次创业的非国有企业,可以实行免审批备案和"零收费"登记;对于企业用自有资金或利用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的产业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不再报政府审批;对于有预期收益或通过建立收费机制可获得收益的项目,都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开招标,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投资。要在政策上借鉴、吸收外资的做法和经验,制定吸引社会投资办非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另外,政府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也

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需要联系和接受管理的部门非常之多,但是,真正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却又非常之少。一方面政策宣传出现空档,国家和省、市发文不少,可真正能让民营企业看到、了解到的却不多,致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盲目状态;另一方面中介服务严重不足,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急需的融资、技术、政策、信息等方面的中介服务组织严重缺乏,使个体私营企业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对此,有必要成立山西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协调领导组",为全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高层次、更有效的宏观协调和服务。领导组的主要职能就是定期研究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协调解决矛盾,督查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宏观指导。

山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承载着山西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各级政府要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加快山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改革步伐,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发展中协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改革调整分配结构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综合分析山西在分配领域的种种不合理表现,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现象同时并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低效化、缺乏按要素分配的政策与市场机制,导致收入不足,新形势下的平均主义严重,不能有效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调动拥有管理、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和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不健全,导致收入差距出现越来越突出的趋势,埋下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的隐患。收入分配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必须改革调整分配结构,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扩大社会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一、分配结构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山西分配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和制度不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和市场机制还没有确立。

从山西分配结构的现状来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格局基本形

成，但是包括技术管理在内的知识智力劳动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格局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一方面，社会缺乏对知识智力劳动价值的高度认同和客观评估，缺乏知识智力劳动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也缺乏知识智力劳动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政策条件，即使有少量的政策，也缺乏落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年有大量中高级知识技术人才调离山西，为数不多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因为人才缺乏而纷纷到外地发展。知识智力劳动也是劳动，而且是更高级的、能创造更大效益的劳动。事实上，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等等，都将更多地依赖知识智力劳动。这种智力知识劳动等生产要素理应在分配领域占有应得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目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并存的基本格局还远远没有形成。

二是分配关系不顺，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宏观收入分配中，分配过度向国家和企业倾斜，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足。

以 1999 年为例，1999 年山西以初次分配收入为主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 109.2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7.2%，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 9 位，高于人均 GDP 排序 11 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3%，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 4 位，高于人均 GDP 排序 16 位。而人均 GDP 排序位于山西之后的安徽省，其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年 GDP 的比重为 6%，排全国第 17 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财政预收入的比重为 42%，在全国排 27 位。人均 GDP 排序高于山西一位的重庆市，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5.2%，在全国排第 24 位，上缴国家的增值税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50%，排在第 16 位。

宏观收入分配在向国家倾斜的同时，也向企业倾斜。根据有

关资料,从1992年到到1998年的7年中,全国企业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平均水平依次为:13.3、16.2、16.0、16.7、13.6、16.1、14.3;山西则依次为:21.6、26.4、16.8、20.0、13.5、15.9、18.1。山西只有1996、199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1和0.2个百分点,其余年份均比全国高,最高年份1993年,山西比全国水平高出10.2个百分点。

这种分配结构,必然导致个人收入比重严重不足。仍以1992年到1998年的有关数据为例,全国个人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依次为:67.7、64.6、66.0、66.8、69.3、67.9、68.1;山西则依次为:67.2、60.7、66.1、64.6、65.6、63.9和60.4。山西只有1994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其余年份都比全国低,差距最大的是199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达7.7个百分点。

三是分配调节功能不健全,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比如,以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农村居民的纳税比例就远高过城镇居民。据1995年全国的调查数据反映,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但支付的税款却相当于城镇的9倍,如果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在农村,也并没有实施对贫困人口的税费减免政策,过高的税费负担更加重了他们的贫困程度。另外,现行的税收分配政策,对大部分垄断性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也缺乏调节功能和手段。这种分配制度,在客观上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当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也是山西分配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表现。

四是个人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化,且分配政策不落实。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以及山西畸重畸轻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导致了山西居民个人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化。农村居民收入来

源仍然主要靠农业。以2000年为例,第一产业提供的收入占到农民全年收入的69.5%,农业仍然是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来源则主要是工资。有资料表明,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7年,山西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都比全国水平高,大多数年份在70%以上,非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一直都比全国水平低。1998年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但工资收入仍然是山西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由于山西国有经济效益差、亏损大,增资乏力,国家规定的分配政策许多都难以落实。比如从1999年7月开始,国家给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每月增发120元,企业参照执行,但据抽样调查资料,全省有2/3的企业只是把职工增资部分作为档案工资记录在册,未能兑现。这些年来,企业拖欠或减发职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对太原、大同等6个城市的初步统计,仅1999年,接受调查的860户城镇居民家庭1300余名国有集体职工中,就有977人次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涉及金额达42.7万元。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由于国有经济普遍不景气,山西城镇居民的贫困面比较大。按照2000年的数据,贫困户率高达12.6%,比东部地区高10.2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还高3.3个百分点;人口贫困率14.4%,比东部高出12.4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3.7个百分点。山西还是全国城镇贫困线最低的省份之一,为每人每月100～120元。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大多数城市尽管已经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实际保障人数还不到应保障人数的5%。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低水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所述,是山西分配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只有解决了

这些问题,山西分配结构的现状才能逐步改善,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分配因素才能逐步消除。

二、改革创新分配结构:调整分配结构的基本措施

优化山西的分配结构,从长远看,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入手。解决山西的分配问题,乃至一切问题,都要靠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有分配调节的余地。否则,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就会进入死胡同。然而,经济的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是分配的基础;分配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影响生产和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指望山西经济在三、五年内赶上东部地区,我们更不能指望等到山西经济发展了,再回头来解决山西的分配问题。山西分配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健康快速的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山西经济发展甚至就会出大问题。因此,必须立足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既保障效率优先、又能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

1.山西分配结构改革创新的重点,是建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特别是加大建立按要素分配机制的力度,以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持。

一要建立健全企业家的分配激励机制。通过实现企业家的收

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实行规范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同时实行企业家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企业家决策失误追究制度，以激励企业家以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感来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

二要建立健全科技人才的分配激励机制。通过实行知识产权入股、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的分配激励机制，同时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如创业风险基金、项目补助基金等，对科技人才在生活、工作等方面提供优厚的政策待遇，以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国内外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支持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三是要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生产离不开市场，分配同样也离不开市场。要加大建立按要素贡献大小参与分配机制的力度，必须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为此，要打破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改变政府职能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搞强制性交易和不合理分配，以及公用企业或其它依法具有独立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强制交易、限制竞争和不合理分配的行为。要拆除地区壁垒，使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够在统一的市场内自由流动。要重点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为按要素分配提供基本的市场机制和条件。

2.必须调整宏观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个人所得三者比例，使初次分配格局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宏观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持续是否能够健康发展。一般来讲，政府所得比例应当与其所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达的省份，可供政府集中使用的剩余价值多，政府分配占 GDP 的比

重较高,反之亦然。据近几年的资料分析,山西这一比例一般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个百分点,但从山西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看,显然政府分配比例不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才能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应使政府所得比例调整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位,适当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分配比例,以增加企业活力和个人收入水平。这是山西必须要认真考虑解决的一个问题。

政府财政不仅要把眼光放在收入方面,更要把政策调整的重点放在支出上,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由此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优化税、费收入政策,取消不合理的税费征收项目,缩小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山西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1.30%,居全国第 4 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42 个百分点,也远高于江苏 0.63%、安徽 0.64%、浙江 0.77%、山东 0.86% 的水平。山西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必然增加财政负担,削弱建设能力。因此,必须根据山西实际,确定合理的税费收入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扩大政府税费收入的规模,增加政府财力,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山西宏观收入分配调整的重点应该是适当提高个人收入的比重。长期以来,由于山西特殊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绝大部分,或是通过流通渠道流向了外省市(尤其是东部地区),或是通过增值税渠道上缴了国家财政,剩下的则通过税费征收流向了省市县财政,一部分留在了企业,个人收入所占比重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山西经济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获得公平合理的份额。按照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山西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应该长期在全国倒数第一、二位的位次,山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应该是现在的状

况。党的“十六”大强调，分配制度既要讲效率，又要兼顾公平。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山西分配调整的重点都应该适当地向个人倾斜，提高个人收入所占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对山西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增强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正确认识和处理。

3.必须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增加财政的可支配能力。

政府收入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失败和缺陷的弥补纠正。目前政府收入由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其它收入三部分组成。从山西政府收入的内部结构来看，三者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平均水平上，大体上各占 1/3。从国家来看，预算内财政收入一般占到一半左右。可以看出，山西的这种现象加大了政府不规范收入，削弱了政府收入的集中使用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分散面广、数额巨大的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各种收费和基金挤占了税收，侵蚀了税基。其结果不仅使很大一部分规范的国家税收即预算内收入，变成了非规范或不甚规范的预算外收入，从而减少了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而且这些“费”或“基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财政的运用与监督范围之外，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往往给某些财经违规乃至腐败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大力整顿和规范预算外收支，改革税费制度，已迫在眉睫。

4.必须落实国家现有的增资政策，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提高山西现有工资水平，主要是增加奖金、津贴和补贴项目。

目前，山西绝大部分县市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调资政策没有

足额落实,甚至有的地方因为财政吃紧根本没有落实,只进入档案中,实际领到的工资与档案工资差别很大。另外,1993 年以后,中央允许各地在执行中央增资政策的原则下,再行出台地方性的增资政策,各地执行这一政策的力度不一,也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落实现有国家增资政策是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要根据山西的特殊情况出台一些地方性增资政策。据资料分析,山西与全国工资分配上的差距,首先表现为工资表上的差距,山西比沿海和周边省份的补贴项目相对较少、较低。如东部省份的奖金、津贴和物价补贴等普遍较高,西部省份也有边疆补贴、高原补贴、民族补贴和风沙补贴等。山西可参照其它省市增加午餐补贴、空气污染补贴、水电费补贴、风沙补贴等。这些补贴项目有的早已在山西部分行业实行,现在可全面推开,以达到持久性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如果山西城镇居民各种补贴项目每人每年增加 150 元,而不考虑其它省市的增资因素,那么按 1999 年统计资料计算,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位可上移 3 位,排第 28 位(1999 年山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倒数第 2 位的吉林、倒数第 3 位的甘肃、倒数第 4 位的宁夏分别相差 137 元、140 元、147 元)。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全省每年需 13 亿～17 亿元(按第 5 次人口普查山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1133.51 万人估算,每年需 17 亿元;按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 875.76 万人估算,每年需资金 13 亿元)这部分增加的支出可由财政、单位和企业共同消化,并逐步由财政全部解决。

5.必须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目前我国开征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征管手段欠缺,工薪所得的税款占个人所得税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在调节收入差距

方面的"杠杆"作用尚未发挥出来。况且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因此,一方面要在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推行税务代理制度的基础上,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另一方面要逐步考虑增加对除工资以外的所得征税,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遗产和赠与,要通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同时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率进行控制,加大对非工资收入的管理力度,提高收入的透明度,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有效堵塞税收漏洞,抑制过高收入,调节行业收入差距。

6.逐步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加速全省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

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绝不只是在收入上的调整,政府的支出同样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山西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农村收入水平低。这和政府对农村长期投入不足,或者多取少予,甚至只取不予有着直接关系。为此,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目前首要的是增加对农村科技教育、道路、供电、供水、基本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调整农村的税收政策,使农户纳税率与其收入水平挂钩。针对山西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的实际情况,应积极争取国家对贫困户采取必要的税收减免政策的支持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政府在加大对农村资金投入的同时,必须加大政策投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是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最突出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多大的改变，已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山西在这方面尤其滞后。为此，必须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增加农民收入。为了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各级政府有责任研究并及时提供劳动力供需信息，建立规范的劳务市场和中介机构，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条件。与此同时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并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

三、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途径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六”大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之一，要求“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对于山西来讲，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既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又是解决山西分配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过低问题的重要途径。

实现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结构调整愈益加快的形势下，促进就业、缓解失业和对陷入贫困的失业者实行社会保护措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就业。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将减少失业作为解决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

的重要政策,把促进就业作为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使就业问题面临巨大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应当更加重视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且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水平,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山西是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经济结构国有经济面临的退出任务十分繁重,长期亏损低效益的产业从市场退出的任务也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力总量过大、整体素质低下的矛盾将会十分突出,就业和促进再就业问题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和更大的压力。解决就业和促进再就业问题,对于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山西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成败、维护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此,必须从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把扩大就业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位置来抓,重视解决山西的就业和促进再就业问题。各级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力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的关系,处理好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关系,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市场就业,实现充分就业。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是山西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根本出路。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要靠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靠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扎实的推动,靠改革开放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

(1)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通过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容量;通过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就业和再就业空间;通过加强旅游产业开发,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扩展就业和再就业领域;发展第三产业和社区服务业,拓宽就业和再就业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基础产业,联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城乡劳动力融合;加快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加快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吸引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

(2)调整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拓展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的经济渠道。对于国有经济,要通过改革调整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减轻下岗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通过组建企业集团,以产业联动促进社会就业,消化缓解就业压力;通过利用企业内部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兴办产权多元化的经济实体,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转制,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从经济成分看,中小企业、城乡集体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新增长点。近几年来山西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一直占到新增新增就业岗位的90%以上。更重要的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国退民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吸纳就业的潜力巨大,今后必将成为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3)对外开放"走出去",扩大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的地域空

间。放眼省外天地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打破了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全国就是一个统一开放的就业大市场,劳动力在全社会大范围的流动是一种正常的事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实施“走出去”战略,组织劳动力在省外甚至国外实现就业,是山西扩大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广泛开展省际间的劳务合作和与国外的劳务协作,采用劳务派遣公司或劳动力代理等形式,大力发展劳务中介组织,建立在劳务输入地、劳务中介机构和劳务基地之间互通信息、密切协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工作机制,帮助劳动力成批地“走出去”易地就业。

2.采取积极优惠的扶持政策,是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重要保障。

下岗失业人员是社会的特殊群体,政府要给予特殊的关系和扶持,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调节他们的就业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积极优惠的扶持政策,实行保护性再就业。

(1)要把采取积极优惠的扶持政策,纳入政府工作的总体规划,摆在重要位置。要把控制失业率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各级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净增就业岗位、解决困难群体就业、落实再就业政策和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作为政府的具体工作目标,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同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和支持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转变观念,自强自立,依靠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社会帮助和自身努力,尽快实现再就业。

(2)落实积极优惠的扶持政策,促进再就业。对于企业主辅分离和辅业转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而兴办的经济实体,以及吸纳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服务型企业,要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下岗人员

从事个体经济要给予减免收费、小额贷款担保贴息等政策;对于困难的大龄下岗人员,要实行就业援助,如政府对下岗人员的培训教育的援助,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或市场摊位,优先安排大龄就业困难对象的援助等;对于上述经济实体、企业和下岗人员从事个体经济,要在工商登记、资金信贷、税费减免、场地规划等方面以优先和照顾。

(3)加强监督检查,创造宽松的就业和再就业环境。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对于非法中介组织和各类欺诈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企业招聘人员不签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随意拖欠工资和克扣工资、拒交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条件。

就业和再就业与社会保障密不可分,只有建立起完善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为就业和再就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良的"避风港"和"减震器"。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制度的"三条社会保障线",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要在目前已建立的医疗、养老、失业社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财力允许范围内,首先确保提高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领取救济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要采取新的可行的办法,加大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投入,强化征缴力度,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由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要在继续强化对贫困

地区的扶贫工作的同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给予生活补助，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保证山西稳定顺利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分配结构和体制的改革调整，同样是关系山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大事情。改革调整分配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就业，有利于保护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必将更好地推动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第六编

动力机制:全方位创新和建立复合型支撑体系

作为老工业基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任务极为艰巨,面临的困难很大,调整的壁垒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山西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体制、金融、科技、人才和政府等多元化、复合型的战略支撑体系,才能保证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保证战略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加快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



体制创新
构建多元化的推进机制

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不同于以往的适应性调整，不是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而是结构性、发展性、跨越性的全局调整。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政府，或单纯依靠市场，都难以保障山西结构调整战略的顺利推进，必须构建一套多元化的动力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企业、资金、人才等合力推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要构建一套复合型动力机制，最大的障碍还是体制障碍。因此，推进山西结构调整，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结构调整推进机制。

一、结构调整必须构建多元化推进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结构调整的历史。从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逐步调整到基本协调；从国有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调整到国有经济主导，国有与民营协调共进；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结构层次逐步提高，结构功能逐步完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结构基本上都是沿着从低到高、从劣到优、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的逻辑线路前进。各省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次排列尽管也有涨有落，但是，像山西这样结构调整似乎越调越被动、越调结构功能越低下、经济位次一滑

再滑的省份，在全国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现象被理论界称为“山西现象”，并被列入许多研究经济问题人员的研究课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山西以往的结构调整“调而不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机制不健全，动力机制单一化、行政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总结山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时，许多人都把山西经济发展的滞后归结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归结为把“能源重化工基地”这一国家层次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同于山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容否认，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决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在这一战略框架下，20 多年间山西也曾提出过不少颇有见地的调整思路，比如“六五”时期的“调整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七五”时期也曾提出，加快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加速教育科技发展，加强技术改造和环境保护力度等战略调整重点；进入“八五”以后，山西又提出了能源重化工基地整体创新和综合开发。不能不说，山西是较早认识到并提出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省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也不能说是错的，但为什么越调越被动、越调越不合理、越调越落后？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只落实到口头上、书面上，而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什么没有落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推进机制不健全。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决不是简单地安排部署工作的问题，需要资金、技术、人力、政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推动，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联手。

纵观全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尽管结构调整有快有慢、有好有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就其推进机制而言，基本上都是政府与市场复合式、多元化的推进机制。这种复合

式、多元化的推进机制,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政府与市场让渡过程中的市场化取向。在经济结构调整之初,都无一例外地由政府发动,由政府主导,但随着调整实践的发展,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逐步让位于市场主导;政府微观层次的积极参与角色逐步让位于政府宏观层次的协调调控角色;政府行政推动手段逐步让位于经济政策手段;市场动力由资金动力、单纯的物质资源动力逐步让位于人才、科技、知识等多要素资源动力。正是在这种复合式、多元化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经济结构由低到高、由劣到优、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不断发展,由贫困型到温饱型到小康型不断转型升级。

反观山西,过去单一的行政化的动力机制则使得全省结构调整的动力严重不足,结构调整调而不动,结构调整由于推进机制的单一化而屡屡成为事实上的"空调"。

"六五"时期曾经是山西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其间,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不仅吸引了国家大批投资,为形成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山西的发展整体跃居全国中上游水平。"七五"以后,全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明显加强;二是整体经济逐步告别短缺,进入买方市场;三是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数量型、外延式增长向集约式、质量效益型转变;四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确立。体制条件、市场条件、增长方式以及发展观念的变化,要求结构调整的方式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

但是,事实上山西从"六五"起,政府就一直是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能源重化工基地从规划到建设都采用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关键是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质的变化的情况下,山西仍

然束缚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政府强制性行政手段来推进结构调整，有悖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这种单一化的政府行政推进机制只能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与能源基地战略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业已存在的矛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构调整，是政府力量逐步让位于市场力量的调整，最终必然是市场力量主导的调整。缺乏市场力量校正的政府包揽一切模式的调整，寄希望于通过确定一批项目、投入一大笔资金，就能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就能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过来，实现升级转型，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对山西企业 20 多年来的兴衰变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一批又一批政府重点支持投资的企业、项目，大多问题重重，而较少政府背景的企业和项目，却气象迥异。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一切都说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要想从书面文字变为实际行动，要想实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在政府推动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更强大持久的动力——市场动力，就必须进行推进机制的再造，构建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复合式、多元化推进机制。

二、推进机制不健全
是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障碍

1999 年下半年开始的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汲取以往推进机制单一的化历史教训，注意了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整合，实行政府推动与市场带动相结合，全省结构调整的动力大为增强，复合型的推进机制初步形成。三年多来的结构调整取得的巨大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初步多元化的动力机制的保障，没有市

场力量的带动，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不可能实现平稳起步，更不可能实现顺利入轨、初见成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山西结构调整的多元化推进机制已经建立。相反，推进机制不健全，结构调整的动力不足，仍然是山西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构建一套健全的复合型、多元化的结构调整推进机制，仍然是我们必须付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才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山西结构调整推进机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力仍然是山西结构调整主要的现实推进力量。

市场力量成为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山西产业结构调整要从战略的角度入轨，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志。不可否认，在山西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低下、市场发育严重不足、企业实力普遍弱小的经济落后省份，在结构调整的初始阶段，政府必须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问题在于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是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还是以科学合理的调控方式。现实情况是不少地方沿用过去的那一套，靠发文件、下命令、压指标的纯行政化的手段搞调整；不是主动的调整，而是被动的调整；不是有目标的调整，而是盲目的调整；不是瞄准市场需求搞调整，而是眼盯着省里的那一点点调整扶持资金搞调整。这种情况，与全省结构调整的战略诉求严重相悖。这样的地区不在少数。照此以往，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将不免中途夭折，已经取得的一点成就也将不免付诸东流。

2. 结构调整的动力结构层次低下，主要依靠有形资本，即资金的投入，知识、科技、人才、管理等无形资本的动力严重不足。

人类正在加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电力，不是石油，也不是核能，而是知识。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将爆发出比核能更为巨大而持久的经济推动力。目前，全球性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知识。没有知识资本的投入，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将举步维艰；没有知识动力的推动，结构调整将遭遇到难以跨越的战略障碍。尤其是像山西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没有知识作为结构调整的动力，没有科技作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支点、新支持，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当前山西传统的物质资源性动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而知识、人才、管理等软资源性动力的作用被严重忽视。这种情况不改变，山西结构调整的推进机制就谈不上健全、完善，结构调整的困难就会更多、更大。

3.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结构调整的动力严重不足。

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主角，结构调整最终都是通过企业的行为来实现的，因而企业参与结构调整程度的大小，对结构调整发挥作用的强弱，关系到全省结构调整战略进程的快慢好坏。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山西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结构调整的主体角色仅由少数企业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来承担，占企业总数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的动力及现实作用都明显低下；二是民营经济参与结构调整的渠道不畅，对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十分有限；三是外资在全省结构调整中近乎无所作为。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山西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整体推动力严重不足。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的推动作用，也要高度关注中小

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对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就业机会、维持社会稳定、提高经济效率、改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方面,中小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起着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山西多元化的调产动力机制,就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就不能仅仅关注几个重点工程,必须同时关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增强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结构调整的推动力。

4.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结构调整的推动力仍显弱小。

经济的生态化、绿色化、无公害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全球性产业升级的趋势。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压力,也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压力还没有真正转化成动力。不少地方仍然把一些低级的煤焦初加工项目定为自己的潜力产品项目;煤炭市场形势刚刚有所好转,私开滥控现象就大面积反弹;环保产业发展缓慢,环保设施大面积闲置,环保规章不落实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对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需求,还没有真正成为山西结构调整的动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山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依托和应得的权利,山西人民没有理由必须生活在一个生态被破坏、大气被污染的自然环境里,没有理由不对此大声说“不”。完全可以说,对改善自然环境的需求,如果不能成为山西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之一,山西就不会有一个健全完善的调产动力机制,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实践,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理性的实践;就不是一个可以预期能够取得伟大成功的实践。

5. 动力整合机制不健全。

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需要多元化的动力来推动实现，但是，多元化的动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加速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必须经过有机的整合，把所有动力因素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形成多力联动、多力合一的格局。否则，多元化的动力很可能还会彼此抵消、互相掣肘，不但不能增强整体动力，反而削弱整体动力。从现实情况看，山西结构调整的多元化动力恰恰缺乏高效的整合，恰恰缺乏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整合机制。比如，有些地方搞结构调整不是经过市场调查，结合本地实际，而是大搞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仅没什么效益，连巨额投资也血本无归，严重损害了市场积极性，行政推动力损伤了市场带动力。有些地方为了结构调整而调整，甚至是为了向上要钱而调整，结果是劳民伤财。再比如，有些地方只顾埋头调整，不顾抬头看路，囿于所谓的本地优势，不了解市场需求，不了解产业发展升级的知识化、生态化方向，结果是产品没有市场、产业没有前途，多力抵消，毫无成效。

以上就是山西结构调整推进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就难以继续稳步推进，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解决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机制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多力推动、多力合一、有机整合的复合型多元化推进机制，即由政府推动力、市场带动力、知识拉动力、企业促动力以及科技、人才、管理、生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机制。只有这样一种机制才是山西结构调整的理想的动力推进机制；只有这样一种机制才能保证山西结构调整战略实施获得最大限度的动力，使山西的结构调整尽快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并一步步推动山西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强化体制创新
构建复合型多元化推进机制

山西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的现状，概括起来讲就是政府力量主导，市场力量不足。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企业实力普遍弱小、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利用外资不足等等。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化程度低下，对外开放度不高。

市场力量是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结构调整升级的主导力量，山西这种以政府力量主导结构调整的状况与之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问题，也不是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高低的问题，实质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与否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快与慢的问题，是不同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全面比较。不得不承认，在体制改革转型方面，山西远远落在了全国的后面。正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传统的体制严重抑制市场要素的流动，压抑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山西目前的结构调整推进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形容为——用计划经济的体制，解决山西经济结构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种种不适应问题；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手段和思维，解决山西经济结构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调整、升级问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和山西的经济体制有关。山西要彻底解决结构调整的动力问题，构建复合型、多元化的推进机制和高度有机整合的动力机制模式，就必须实施体制创新，加速体制改革转型，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1.建立结构调整行政责任制，强化和规范行政动力。

市场力量取代行政力量成为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是山西结构调整的必然，也是山西结构调整从战略意义上实现入轨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行政推动力仍将是山西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而在此之后，行政推动力也将是山西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客观地讲，当前推动山西结构调整的行政推动力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全省各级政府都把结构调整作为核心工作来抓，结构调整的思想和观念大大增强。但是，也不必否认，全省对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还缺乏更深入的认识，急功近利的思想还普遍存在；全省对于结构调整目标的认识也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把结构调整当作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把调整庸俗化，借调整之名，伸手向上要钱，借调整之名树形象、显政绩、图升官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些都使得全省结构调整的行政动力作用大大降低，甚至与市场动力相互冲突、相互抵消。因此，全省结构调整的行政动力还必须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一是必须在全省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确立结构调整要打持久战的思想，克服急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意识，促进各级政府潜下心来，扎扎实实抓调整。二是要规范各级政府的结构调整行为，立足市场调查和研究，依法行政，依法调整，杜绝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动辄发文件、下命令、压指标的纯行政命令的调整方式和手段。为此，可以考虑在全省各级政府中建立结构调整行政责任制，一是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各级政府把调整作为自己的长期工作目标和任务；二是以制度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的调整行为，避免政府包打天下、越俎代庖，避

免行政推动力与市场动力相冲突、相抵消。

2.转换政府职能,培育和释放市场对结构调整的带动力。

市场力量是结构调整的最终决定力量。尽管在山西目前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市场力量有限,政府必须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着政府力量可以代替市场力量。政府这个第一推动力施力的重点是如何培育和释放市场力量。实际上,政府对于结构调整的行政推动力的大小就是指政府调动市场资源参与结构调整的能力的大小,而不是其本身直接参与结构调整能力的大小。山西市场力量之所以弱小,并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结构调整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介入太深的缘故,是因为政府职能转换滞后。这不仅抑制了市场力量的成长,而且抑制了行政推动力的放大效应。完全可以说,山西政府职能不断转换的过程,就是市场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不断入轨的过程。所以,实施政府职能创新,加速政府职能转换,培育和解放市场力量,乃是构建多元化调产动力机制的一个根本途径。对山西而言,转换政府职能,关键在于:一是政府实施经济管理和推进结构调整的重点,必须从微观介入转换为微观放开,宏观调控;二是经济管理和调产的方式,必须从行政命令过渡到产业规划和政策指导上;三是必须从管理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效廉洁的服务,为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重点推进企业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的调整推动力。

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没有企业的推动,结构调整不可能起

步,更不可能深入。山西结构调整中企业整体动力不足,表面上是因为企业实力普遍弱小,但实质则是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有资料表明,尽管全省绝大多数企业都进行了企业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些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实质问题。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是全省企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动力不足的一个根本障碍。主要是产权多元化制度不落实,企业治理结构不规范,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稳定发展壮大的前提。为此,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要把企业是否已经改制作为省里是否予以支持的必备条件。从实际情况看,省里支持的潜力产品,都是企业改制完成比较好的企业。这为提高政府资金的投资使用效率,推进结构调整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这些企业毕竟是少数,全省绝大多数企业不是改制不充分、不彻底,就是纯粹假改制。以这样的状况,全省结构调整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将是十分困难的。对此,要增强全省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就必须推进企业真正改制,彻底改制。一是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政府管理的重点要转向产业、行业的宏观管理;二是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造,促进资产流动,吸收民间资本、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进入国有企业,优化所有制结构,舍得让出控股权,甚至彻底退出;三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的企业家选择、激励与约束机制,按照产权多元化的具体情况,建立规范的、符合产权制度要求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4.改革创新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强化资本推动力。

结构调整不是“无本买卖”,结构调整是需要大量资本的,没有一定量的资本的投入,山西的结构调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山西财政也只是一个“吃饭财政”、“糊口

财政”。这使得山西结构调整的资本动力的严重不足。从实质上讲,山西经济社会贫困的背后,是体制的贫困;资本、资金不足的背后,是制度资源供给的不足。在结构调整资金缺乏、资本动力不足的同时,陈旧过时的投融资体制仍然阻碍着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放眼国际国内,资本短缺都已经成为历史,资本过剩已经成为现实。要增强资本推动力,就必须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一是要抓紧清理投融资障碍,改革审批制度,提高办事效率,凡国家允许放开的一律要放开,暂时不放开的也要及时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放开;二是要拓宽投融资来源渠道,制定和落实鼓励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三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发挥上市公司“小银行”的作用,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债券融资比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结构调整进程;四是要改革财政资金的投入及运作方式,变分头管理、分散投入为统一管理、集中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资本化、市场化运作水平;五是推进投融资体制由管理型、审批型体制向综合服务型体制转变,向投资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综合服务。

5.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推进存量结构调整。

山西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这是一条由易到难、从简到繁的路子。几年来的结构调整,增量结构的调整成效较大,但存量结构的调整几乎原地不动,增量调整并没有带动存量调整。从战略意义上讲,存量结构的调整不启动,山西的调整战略就很难说是真正启动,没有存量调整的入轨,调整战略也很难说真正入轨。阻碍存量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增量投入少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恰恰也是体制因素,是僵化保守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结构调整的本质就是各种要素在市场上、产业间的有效流动。我们一

方面着力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陈旧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却阻止这种流动。因此,改革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是推进山西存量结构调整的根本途径。一是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的方式要从条块分割的模式转向集中统一管理经营的模式;二是管理经营的重点要从实物资产的层次转向价值资产的层次;三是管理经营的手段要从传统的行政控制手段转向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资本化运营,推进国有资产的流动、重组、增值、变现。

6.构建智力支撑体系,建设知识政府,增强结构调整的知识推动力。

知识化是当今时代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知识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动力。山西目前的结构调整基本上还处在传统的经验式、行政化推动阶段,知识对于山西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十分有限,从而使得山西的结构调整与国际国内的结构调整的潮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山西缺乏人才、缺乏知识、缺乏知识的创新和生产能力,而是山西经验式、行政化的结构调整模式缺乏对知识的有效吸入机制,缺乏一个健全的智力支撑体系。

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在体制。一方面结构调整进程急需知识动力的强力推动,一方面落后的体制又导致缺乏知识进入决策通畅的渠道。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于政府决策的知识化程度。政府决策知识化,也就是政府依托知识进行决策。建立决策知识化机制和强大的智力支撑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政府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国外比如美国,国内比如上海,在政府主要决策者周围都有一个由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强大“智库”。

山西各级政府的知识化进程无疑是比较低的。近年来，省政府及个别地市政府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政府知识化的进程也只是刚刚开始，政府决策的知识化机制和智力支撑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政府知识化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必要前提。没有政府的知识化就没有经济的知识化，就没有结构调整的高效率。结构调整是山西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那么山西结构调整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什么？在国际国内的结构调整中，有哪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有什么教训我们必须汲取？和周边地区相比，我们的优势、劣势是什么？我们靠什么来指导结构调整？靠什么来制定政策？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凭经验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凭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知识、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要推进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构建多元化的调产动力机制，增强知识推动力，就必须加快推进山西各级政府决策的知识化进程，建设知识政府，推动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摆脱经验性、命令式结构调整的桎梏，走上靠知识决策、靠知识调整结构的轨道。为此，一是有必要聘请省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组建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作为省政府的进行结构调整的智慧库、外脑，为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性、权威性的咨询服务。二是采取政府资助与机构自筹相结合的方式，组建市场化、社会化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调产信息服务与研究机构，开展山西结构调整的专题研究，提供有科学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三是建立山西结构调整进程的跟踪研究评估机制以及必要的激励、奖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全省全社会包括各级领导、各级部门、各研究机构，深入开展山西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意见建议。

7.建立生态动力机制，建设生态政府，强化结构调整的生态推动力。

生态化是当今全球经济的又一主要特征，是全球性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主要动力和发展潮流。生态化是山西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但是，从山西结构调整的实际进程看，生态化问题仍然是山西结构调整的一个巨大压力，这个压力还远远没有转化为推进结构调整的现实动力。可以说，每一个山西人对于山西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都有着切身的感受，都有着切肤之痛，都无不急切地期盼着山西的自然生态环境尽快好起来、美起来。但是，为什么生态化、绿色化还不能成为山西结构调整的巨大动力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尽管各级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信誓旦旦地写入了自己的施政报告，但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在许多时候干脆不要。这是说，在现有体制下，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还缺乏一套把生态压力转化为生态动力的机制，缺乏一套把美好的生态意愿转化为自觉的生态行动的机制。当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占了上风，而生态化的问题则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说到底，就是生态考虑还没有真正进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体制。当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全行业陷入亏损泥淖的时候，人们似乎看到了煤炭这一夕阳产业的末日，然而，当煤炭市场由于关停压产而出现好转的时候，煤炭产业又不约而同地成为各个利益主体趋之若鹜的一顿美食。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事关地方经济发展整体环境的问题，是一个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存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企业、个人的自觉意识所能根本解决的。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化

问题必须靠政府,也只有靠政府。生态维护职能是当今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能,生态政府也是全球性政府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山西要真正推进经济的生态化、绿色化,要真正改善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生态考虑就必须真正进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体制,就必须着力塑造生态政府,顺应全球性政府生态化改革与发展的潮流。对此,山西必须加速政府管理体制的生态化改造。比如,改革创新分散化、分割化的政府采购体制,实行集中采购、招标采购,节约政府支出;推行生态化、绿色化行政办公模式;改革创新城市环卫管理体制,推进环卫事业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改革创新城市水务管理体制,建设节水城市、节水社会;把重点支持、资助环保及与环境有关的产业发展作为全省结构调整的重点等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改革创新对各级政府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为内容的考核评价机制,代之以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等指标在内的、综合性经济自然社会发展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以提高山西各级政府调整结构的生态推动力,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推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金融创新
构建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有赖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撑。山西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功能弱化，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迅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能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取决于金融创新的力度和深度。

一、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和依托

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比作一个人体的话，那么，资本就是市场经济这个人体的血液，而金融就是市场经济这个人体的心脏。对一个人而言，如果心脏功能不健全，血液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人体疾病丛生，甚至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没有充足的资本供应，市场经济也就难以正常发展。所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各地频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82 年，以墨西哥政

府宣布不能按时偿还外债为先导,拉开了拉美国家长达数年之久的债务危机,拉美经济受到重创;80年代初,在阿根廷发生的金融危机几乎摧垮了这个国家整个经济体系,国民生产总值损失高达55%;1997年7月,发生在泰国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蔓延到东南亚、东亚地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在数月之内贬值48%,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也都大幅贬值。10月以后,韩国金融危机骤起,韩元大幅贬值,股市严重受挫,许多大公司纷纷破产。11月初以后,日本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倒闭,引发日本乃至全球股市暴跌,日元汇率跌至五年来的最低点。港元、台币、新加坡元等也相继被卷入,并引起欧美股市大幅震荡。

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对于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显得更为重要。结构调整,或者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调整,或者是主动寻求结构的优化升级,都说明现有的经济结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能否实现,与金融体系是否健全高效有着很大的关系。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在谷底运行,而日本经济则一枝独秀,经济总量直追美国,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不仅每年吸引大量国外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美国政府连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投入巨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里根政府任内后期,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达到2000多亿美元,最高时甚至接近3000亿美元。正是80年代的结构调整,使美国经济在进入90年代以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创造了美国经济史

上少有的连续近10年的经济奇迹。总结美国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功不可没，它为美国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金融支持，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元保障。以风险资本机制为例。我们知道，风险资本机制是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从孵化、发育、成长到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机制。美国多数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如微软、网景、英特尔等，都是在风险资本机制的支持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到1993年，美国的风险资本已经高达50亿美元，1999年更是猛增到250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与因特网投资有关。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开放、健全、高效的风险资本机制，就没有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发展；如果没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发展，也就没有美国的新经济，也就没有美国90年代的经济奇迹。风险资本机制说到底是一个金融机制、金融功能问题。因此，开放、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是推进美国结构调整、创造美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之一。

反观日本，其经济发展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路高歌猛进，大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的势头，但是，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在80年代末迅速跌入低谷，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日本的结构调整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的结构调整却鲜有成效。十多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且出现了连续几年的负增长。日本成为整个90年代经济最不景气的发达国家。总结日本结构调整的历史，其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金融体系不健全，结构调整难以获得金融体系强有力的支持。仍以风险资本机制为例。日本尽管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是全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但是风险资本机制却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且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向老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而不是向创业型企业提供支持。1998年度，日本用于

创业的风险投资仅占2%。这成为日本金融体系的一个致命缺陷，与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风险资本机制不健全，高新技术企业缺乏资金，大量资金滞留于传统产业，是日本结构调整历时十多年而成效寥寥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日本长期实行封闭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与世界金融发展的自由化趋势相悖，致使金融成为横亘在日本结构调整升级道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美国和日本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立足于金融体系的强有力支撑。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地区同样如此。山西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解决大都依赖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撑。

山西金融体系的现状大体可以概括为：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运行效率低。

首先，体系不健全。

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必然是一个金融结构健全的体系。山西的金融体系尽管已经形成基本的框架，但还不健全完善。在机构组成方面，金融体系以银行机构为主，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有限，实力弱小。银行金融资产占据了全省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银行机构又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小银行为数极少。仅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量就分别占到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的68%和54%左右，中小银行只占大约6%和5%；在机构所有制构成方面，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非国有制金融机构数量严重不足，经营实力弱小；在机构类型方面，以经营型金融机构为主，为社会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在金融市场体系发育方面，以银行信贷市场为主，其它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发

育严重滞缓。截止 2001 年 6 月底，虽然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 2892 3 亿元，贷款余额达 2287.8 亿元，但是根据人行太原中心支行提供的资料，从 1996 年到 1999 年的 4 年间，山西发行各类国债总计只有 118.67 亿元，企业债券只有 16.1 亿元。

其次，功能不完善。

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必然是一个金融功能完善的体系。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就是投融资功能。山西金融体系的投融资功能恰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投资融资功能严重不足。山西是全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一方面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本短缺日益成为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山西每年却有大量资金流出省外。这充分说明山西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严重不足。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从 1995 年到 1999 年，全省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逐年上升，由 1995 年的 61.5 亿元，扩大为 1999 年的 448 亿元。

截止 1999 年底，全国各省市平均有上市公司 30.6 家，平均融资 143.8 亿元，而山西到 2000 年底，只有上市公司 17 家，累计融资额 107.45 亿元。

到 1999 年底，山西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只有 9.87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3.91 亿美元，占全国的比例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九五”前四年，在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集体和个体投资分别占 15%和 13.5%，而山西分别只有 6.8%和 11%。“九五”期间，全省固定资产比“八五”时期增长 1.1 倍，但也只有 2467 亿元，仅相当于上海市同期水平 9600 亿元的四分之一。

第三，运行效率低。

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必然是一个高效率的体系。由于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山西金融体系事实上长期处于低效运行

的状态,对全省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支撑乏力。山西金融体系低效运行,突出体现为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经营效益低。根据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山西分行提供的资料,到2000年三季度,省建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4.68%,当期经营账面利润只有区区3亿元;省中行本外币折合人民币亏损2.05亿元;省农行常规业务亏损5亿多元,专项业务亏损近2亿元,合计亏损7亿多元。有关专家估计,山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低也在30%以上。国有商业银行是全省金融业的主体,从以上三家银行的情况看,全省金融系统资产质量差、经济效益低的状况可见一斑。

山西金融体系的低效运行,还体现为对全省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缺乏协调支持。许多调产项目由于资金不落实,致使项目难以启动;一些项目则由于找不到合格的担保单位,资金难以真正到位,项目启动一拖再拖,市场机会一失再失。由于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把眼光盯在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上面,众多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久拖不决。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以山西目前的金融体系,根本难以支撑经济结构大规模的调整和升级,更难以支撑山西社会经济跨越式、赶超式发展的需要。

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都迫切要求必须迅速着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构建强有力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核心是构建一个健全开放、安全高效的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

首先,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市场化的体系。

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一个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事实证明,山西现有的带有更多行政色彩的投融资体系,是无法适应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要求的,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造。

其次,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高效的体系。

效率是经济的生命，金融体系是否高效，不仅关系着金融本身的发展，而且，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金融的效率更关系着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所以，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高效的体系。

再次，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安全的体系。

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隐患，也是山西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颗“定时炸弹”。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埋藏的风险将加速显形化。只有金融的安全，才有金融的真正高效。所以，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是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

第四，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具有健全功能的体系。

金融系统是否高效，是否安全，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功能是否健全。山西金融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功能问题，是一个功能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金融功能弱化、结构不健全完善，由此导致金融体系投融资效率低、效益差及金融资产结构差、不良贷款率过高、金融风险日积月累、金融安全形势严峻等等诸多问题。所以，健全山西金融的功能体系是山西未来金融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

第五，山西未来的投融资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一个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功能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也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说，没有金融体系的开放，就没有金融体系的安全高效，就没有金融体系功能的健全和完善，也难以形成真正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山西金融发展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与开放度过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突出表现为金融企业产权单一化，经营主体性质单一化。通过开放，实现金融企业产权和经营主体的双重多元化，吸收社会性的产权投入和市场主体的进入，正是山西构建未来金融体系的基本途径。

只有构建这样一个健全开放、安全高效的市场化投融资体系，才能提高和实现山西金融支撑体系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强力支撑作用，也才能有力推动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二、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最根本的是加快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体制。金融体制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不能不看到，金融领域的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几个进展较为缓慢的领域。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大致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阶段，计划体制正在打破，但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计划手段已经丧失其功能，但还有不同程度的遗留。如果在全国范围对金融体制改革进行细分的话，那么，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东部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计划体制已经打破，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逐步走向完善；二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计划体制接近于打破，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接近于基本建立；三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计划体制正在打破，但计划手段还在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市场化金融体制的形成开始起步。这种情况说明，金融体制创新仍然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根本任务。

山西无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即：金融计划体制正在打破，但计划手段还大量存在；市场化体制开始形成，但推进进程缓慢。

首先，金融体制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行政化色彩逐步淡化，企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山西，金融发展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一是金融机构行政化。目前，在山西金融机构中，除全国性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在晋分支机构外，大部分是清一色的国有制，而且各类金融机构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产权单一化的制约，加之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使得山西金融机构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二是金融管理行政化。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山西地方政府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直接管理的渠道已经阻断，但是，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管理主要还是行政化的管理。比如领导的任命就是纯粹的行政安排，甚至中层干部的任用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三是金融运行行政化。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干预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营，比如贷款的投放；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投资领域，行政化操作仍然是主要的操作手段。

其次，金融发展的分散化倾向严重。

集聚化、规模化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全球各地不断发生的动辄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跨国金融并购案，就是金融集聚化、规模化趋势的最好反映。随着金融集聚化、规模化的发展，在全球金融领域正在形成“航空母舰”式的超级金融企业。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金融集聚化、规模化发展也不断加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已经双双进入全球最大的 500 家金融机构的行列。然而山西金融的发展，却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分散化的特征。一是各类金融机构小型化，抗风险能力、市场

竞争能力严重不足;二是受分业经营的影响,各类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分散,缺乏必要的集中和必要的协作,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三是受地方利益及多种因素的影响,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联合兼并、优化重组步履缓慢、困难重重;四是有限的政府资金,多头管理、多头投资,缺乏应有的、必要的集中。

再次,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相互分割。

经济金融一体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经济不可能离开金融的支持而获得发展,金融也不可能独立于经济之外单独获得发展。在山西,金融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却表现出分割化的倾向。一是银企分割。由于种种原因,山西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经营机制滞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差,加之普遍缺乏偿债意识,不少企业甚至借改制之名,行逃债之实,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用。商业银行则受商业化改革取向的影响,贷款多集中在少数大中型绩优企业,对一般企业则慎贷、惜贷,乃至拒贷。由此导致银企分割。二是政银分割。地方政府过分“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企业改制,忽视市场环境的建设,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企业的一边,有的甚至帮助、掩护企业逃债废债。由此导致了政府与银行的分割。银企分割、政银分割,带来的是金融与地方经济的分割。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急需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却闲置在银行,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出路,更有部分资金则通过市场渠道流出山西。

行政化、分散化、分割化的本质就是非市场化。在这种非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基础上,难以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现代金融支持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要求。正是这种非市场化的金融体制,直接导致了山西金融体系的诸多问题,造成了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金融障碍。

近几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直把金融创新作为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来抓，大力倡导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也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创新金融工具、发展新的金融产品等等。但是，客观地讲，目前山西金融的创新大多还停留在表面的、技术的层次，金融的创新的着眼点还是过多地放在融资上，还没有深入到体制创新的层次上。

体制的因素是根本的决定因素。山西的金融创新，离开了体制的创新，不可能真正构建起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不可能真正解决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金融障碍，金融体系本身运行低效等等问题更不可能彻底改变。要真正解决金融问题，推动山西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的持久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的创新。

第一，要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真正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无论是一般的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都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山西企业普遍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金融机构，企业化的程度都很低，而且普遍缺乏企业意识。所以说，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乃是山西金融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加速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府管理部门要克服过去那种把金融机构视作行政事业单位来管理的做法，真正把金融机构当作企业来对待，做到政企分开；金融机构要积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造，通过吸纳社会投资进入金融领域，通过形成恰当的产权结构模式，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要加速工商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一般工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金融体制的创新看似无关，但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商企业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工商企业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金融机构同样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多年来，山西的金融资源大量流出山西流向东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山西工商企业与东部地区工商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落差所造成的。所以，工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样是山西金融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大力推进金融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

国有资产是山西金融资源的主体部分，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也是山西金融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价值增值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一是要求国有资产必须价值化，即必须是可以用价值计量的，也就是国有资产的股份化、金融化；二是要求国有资产必须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即国有资产可以按照市场原则流动，并在流动中实现价值增值（当然也包括价值减损）。这些都要求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必须从实物层面转移到价值层面，从实物资产的层面转移到价值资产的层面。这种转变正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趋势。山西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由于条块分割、机制滞后、出资人缺位、流动性差，庞大而凝重的国有资产不仅保值增值难以实现，而且价值流失日趋严重。山西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从近期看，增量资产的调整是重点，从长远看，资产调整的重点必然要过渡到存量资产方面。所以，创新金融体制，必须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一是

要创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变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为集中统一的管理,即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管理国有资产;二是创新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按市场化运作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受托经营关系,承担国有资产的经营、流动职能,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推动政府投资的资本化、市场化运作。

扩大社会化、市场化投资比重,缩减政府投资范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东部许多地区,目前社会化、市场化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体。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市财政计划内项目投资每年只有 20 亿元左右,中央财政在上海市的直接投资更少,2001 年这个数字不到 1 亿元,但上海市“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达到 9600 亿元。在社会化、市场化投融资还很落后的山西,政府投资比重尽管逐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所以,要创新金融体制、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就必须首先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提高政府投融资的资本化、市场化运作水平。

从现实情况看,山西政府投资的资本化、市场化水平仍然远远不够,多头投资、分散管理、行政化操作;只管投资、不问效益、不问管理等等现象都有存在。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会严重阻碍山西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建立。为此,一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资本化水平,变无偿划拨为资本性投入,组建专门的政府投资经营公司,或委托有条件的投资经营公司专门负责政府投资资金的投资、经营、管理、回收及其保值、增值事宜;二是要提高政府融资的市场化水平,通过资本运营的手段,比如 BOT、项目招商、转让项目经营权等,引进社会性投资,扩大政府投融资能力。

第四，推进政府监管法制化。

政府监管法制化，是金融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市场化金融体制的重要内容。就全国而言，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市场准入限制、混业经营限制、利率市场化的问题等等。就山西而言，政府监管法制化核心是要解决一个金融环境问题。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与其说是缺乏资金，莫如说是缺乏环境。由于金融环境不良，缺乏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致使山西在资金问题上捉襟见肘，不仅难以吸引外部资金，本地资金都想方设法逃出山西。所以，山西金融环境问题不解决，金融创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政府监管法制化的重点，一是要确保依法监管、宽严适度，既要避免监管过宽，危害金融安全，也要避免监管过严，损害金融环境；二是要坚决依法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一切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和金融信用；三是要严格控制政府部门对金融运行的干预，确保金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独立自主权利。

三、加速推进金融产业化进程
构建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

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体系，首先必须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产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市场经济不可能获得健康快速的发展；同样，没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产业，就不会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取得健康快速的发展。由此，推动金融产业的发展壮大，乃是山西金融体系结构调整的第一要务。

发展金融产业，首先必须把金融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必须遵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山西由于计划体制的长期影响，由于改

革开放的滞后，人们习惯于把金融产业作为一项社会行政事业来对待，山西金融业的发展也确确实实更多地带有社会行政事业的色彩。推动山西金融的产业化发展，就成为山西金融产业发展壮大的一项重要任务。

金融产业化是我国一个独特的概念。所谓金融产业化，就是金融运行和发展的企业化、市场化、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的历史过程。通俗地讲就是金融业由过去的社会行政事业转变为一项独立的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个概念之所以为中国所独有，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原本就是一项独立的产业，根本不存在把金融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来发展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产业不仅是一个发达的产业，而且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有资料表明，在这些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比如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等等，金融保险业都是第一大产业，金融保险业提供的产值一般都占到其服务业总产值的 40% 左右。我国金融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营产业转轨的阶段，转轨速度的快慢，金融产业化程度的高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各地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分野。越是金融产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是金融产业和整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越是金融产业化程度低的地方，就越是金融产业和整体经济落后的地方。

纵观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段金融产业化的历史，就是金融逐步从行政事业走向经济产业的历史。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金融产业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行政事业型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 1979 年分离财政与金融机构及其职能起，至 1984 年四大专业银行恢复组建止。

第二阶段是企业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 1985 年国家实行

“拨改贷”起,至1993年提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设、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目标止。

第三阶段是商业化、产业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4年三大政策性银行的成立起,至1997年底取消金融机构贷款规模限制止。

第四阶段是金融产业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国家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实行全面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标志。

可以说,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金融业的行政事业的色彩便淡化一分,经营产业的色彩便增加一分。整体而论,我国金融正处在产业化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各地各方面条件差异较大,金融产业化及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较大。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金融产业较发达地区,比如像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城市,由于金融产业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金融产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上海市金融保险业实现的增加值已经达到690.15亿元,增长率高达18.1%,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2%,位居全市第三产业之首,金融保险业已经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二是金融产业发展中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此类情况,在这些地区金融产业化已经起步,并正在加速推进,金融产业在地方经济中已经和正在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三是少数金融产业落后地区,基本上处于金融产业化起步前阶段或起步阶段,金融产业也正处于形成和起步阶段。山西就是属于第三种情况。

对于山西金融产业的落后,一般人大概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即金融业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总是要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山西是全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水平自然不会很高。

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金融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绝不是一种被动的、低水平的适应关系。金融产业经营的产品主要是资金、资本、或者是资本化的资产。由于这种特殊的产业性质,使得金融业在整体经济体系中具有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特殊的产业功能,即市场要素资源配置功能、经济动力功能和经济导向功能。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产业发展水平互为因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金融产业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同样,金融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也会导致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落后。

山西结构调整、金融体系建设、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与金融产业发展水平的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山西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产业发展滞后既是一个主要的表现,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明清时期,晋商以金融和商业成为中国第一商帮,山西也以全国金融和商业中心而成为最富裕的地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必须加速发展现代金融产业,走金融产业化之路。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的改革发展,山西推进金融产业化、加速金融产业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区域金融资源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根据有关资料,到 2001 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2892.3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到 2287.8 亿元。这为山西金融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二是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基本形成了金融监管、金融运营和金融服务架构基本健全的组织体系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在内的大金融格局。

三是金融服务体系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完善,省级和几家地市

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已经组建完备。全省第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组建已经完备,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有望达到全国性券商的水平;由中元、晋元两大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合并组建了具有独立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服务中介机构——天元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四是区域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股票市场发展较快,截止 2000 年底,全省上市公司达到 17 家,上市股票 18 只,股票市场融资额 107.45 亿元;到 2002 年,全省上市公司发展到 21 家,融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债券市场也有所发展,从 1995 年到 1999 年,发行企业债券筹资 16.1 亿元;国债市场发展迅速,从 1996 到 2000 年的五年间,累计发行各类国家债券 139.07 亿元,2001 年上半年又争取国债资金 18.8 亿元,全年预计 25.98 亿元;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全省 3 家期货公司总资产 1.2 亿元,1999 年期货代理交易额 116 亿元,物产期货无论从注册资金还是交易规模都居华北首位,已跨入全国期货公司十强之列。目前,全省 2/3 的铝,1/3 的铜都通过期货市场来交易,粮食系统期货交易额也在逐渐地放大。这一切都为山西金融产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当前,推进山西金融产业化,加速金融业发展,关键是要抓好金融体系的"四化"改造。

第一,进行经营主体多元化改造。

经营主体单一化,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是山西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单一的、畸重的主体结构,一方面降低了山西金融市场竞争的合理性、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金融风险的过度集中;同时,也制约了山西地方金融的发展。为此,必须进行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改造。

一是要进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改造，充分把握和利用好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投资，积极发展山西地方金融机构，如地方银行、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产业发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壮大地方金融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机构并存的，大、中、小结构合理、比例协调、互相补充的主体结构。

二是推进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使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必须真正按照企业来进行，减少直至杜绝直接管理和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中，必须避免搞“拉郎配”，真正还权于市场，还权于金融机构，消除金融运行中的行政化色彩。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职能作用，降低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创造条件，加速金融机构企业化、商业化改革的步伐，真正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现代企业制度。金融机构自身也必须进一步强化企业意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种陈旧观念，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新兴业务，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是推进金融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通过出售、转让、引入社会投资、产业投资、相互联合、相互投资、控股以及重组上市融资等方式，对现有金融企业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造，实现金融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从而加速金融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程。

第二，进行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改造。

运行机制市场化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金融业发展的根本要求。没有市场化的运行机制，金融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壮大。为此，山西必须抓好金融运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造。

一是加速建立健全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市场体

系，是金融运行市场化的基本前提。山西目前的金融市场体系还只是个雏形，银行信贷市场一枝独秀，但由于市场体系不配套、不健全，银行信贷业举步维艰。为此，必须加速各类金融市场，诸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等的发展。

二是要加强金融运作的规范化。金融运作规范化是金融运行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山西规范金融运作，包括规范政府行为，减少乃至杜绝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对金融运行的干预；规范工商企业的行为，加强对工商企业改制的规范和监督，防止一些工商企业借改制之名，逃废金融债务，破坏山西金融环境和市场形象；规范金融企业的行为，严格实行全面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防止金融机构为盲目扩大市场份额而忽略经营成本进行低水平恶性竞争，防止新的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规范司法部门的司法行为，对借改制之名行逃债之实的企业、个人以及纵容庇护企业逃债的地方政府、部门，对金融部门以贷谋私等不法行为，要坚决进行打击，依法予以严惩，用司法手段维护金融债权、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环境。

第三，实施金融经营方式的集约化改造。

经营方式集约化是金融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山西金融产业发展滞后，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式经营发展模式。要促进山西金融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必须实施经营方式集约化的改造。

一是对山西现有金融企业实施集团化改造。推动山西金融资源的战略重组，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优化重组、联合经营，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组建松散型、紧密型或半紧密型金融企业集团，实现业务协作、优势互补，争取发展几个具有鲜明经营特色和较强核心业务竞争能力的金融龙头企业。实施集团化改造一方面必须坚持市场原则，避免行政化操作；另一方面还必须分步推进、有序进行。第一步可以考虑组建行业性集团；第二步组

建混合编队性质的金融集团，比如证券、信托、保险等混合编队，分业经营；第三步，组建山西跨地区、跨行业的金融集团。

二是大力加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发展，改善金融服务效率，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电子化、信息化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子银行、网络银行的出现就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体现。山西金融机构尽管硬件设施有所发展，但还远远不足，尤其是软件开发建设更为滞后，严重影响硬件设施效率，影响金融服务水平。所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软件硬件一起抓，增加金融服务的内涵质量。

三是突破传统业务的局限，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大力发展新兴业务、中间业务、特色业务。从国外金融机构的情况看，传统的银行业务早已不再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而是一项必要的补充性业务，现代金融业务已经成为其业务的主体。以中间业务为例，有关资料报道，国外银行中间业务利润一般占到其利润的 40% 左右，有的占到 2/3。山西金融机构要发展，要适应未来竞争的形势，就必须突破传统业务局限，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务；同时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多方面的政策，开展金融创新，扩大投融资规模，服务山西结构调整，拓展山西金融发展的空间。

四是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不良金融资产。大量存在的不良金融资产是山西金融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必须借鉴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企业、政府多方携手，以出售、转让、置换等方式，使死资产变为活资源。

第四，推进社会服务体系的知识化改造，提高金融发展的知识化含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为之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样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从山西社会

服务业发展的现实状况看,能够为金融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数量严重不足,且行政化色彩浓厚,市场化程度偏低,服务层次也较低,尤其缺乏战略性、知识型的研究咨询服务机构。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金融业作为一项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它的发展更离不开中介机构、研究咨询机构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山西金融运行长期低效,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要加速山西金融产业化的进程,推进山西金融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进行社会服务体系的知识化改造,提高山西金融产业发展的知识含量。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规范现有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切实保证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成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而不是成为准政府机构,成为行政意志的传声筒。

二是要重点发展一批社会化投资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并结合中介机构清理整顿工作的具体情况,引导和鼓励其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三是要采取政府资助、金融企业赞助、机构自筹资金相结合的办法,组建山西金融发展战略性、知识型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吸纳各方面专家学者为政府部门、金融企业提供战略性、专家化、知识化服务,进一步健全山西金融体系,提高山西金融发展的知识含量。

科技创新与人才机制创新
结构调整的致胜之本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崛起，全球性结构调整升级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日益依赖科技、人才的支撑，科技和人才日益成为全球性结构调整升级的主导力量。山西要融入全球性结构大规模调整升级的历史潮流，构建多元化的推进机制，就必须加速科技创新和人才机制创新。只有抓住了科技和人才，才是抓住了山西结构调整升级的致胜之本。

一、结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的推动作用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政策与资金等多元化的动力来推动。这些动力缺一不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论，这些动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科技、人才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内源性动力的主导力量，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与人才机制创新。

1. 科技创新是推动山西融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时代潮流的主导力量。

当前，全球性结构调整升级的浪潮方兴未艾。美国、日本、欧

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高新技术化的步伐日益加快，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大结构调整升级的力度，推动本国产业的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和高新技术化。我国东部地区也正在加紧融入这一历史性潮流。山西只有像东部地区一样，加紧融入这一历史性潮流，结构调整才能真正实现突破，才能全面实现优化升级。要融入这一潮流，山西首先必须走上靠科技调整、靠科技推动的内源动力主导型的结构调整之路。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科技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动力。发达国家科技在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一般都已经达到了 60～80%。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也已经有了很大程度地提高。我国这一比例尽管较低，但近年也已经达到了 3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超过 25%，在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更高，尤其是在智力资源密集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高科技园区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 60%。令人遗憾的是，科技进步在山西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到今天仍然很低。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这一比例只有不足 2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远低于东部地区水平，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以往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忽视科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巨大作用，走一条依靠外源性动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可以说，结构调整的内源性动力与外源性动力本末倒置，是以往山西结构调整调而不动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要想有所突破，要想真正融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历史潮流，就必须汲取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充分发挥人才、科技的作用，走一条内源动力主导型的调整之路。

2. 科技创新是山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根本出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山西结构调整的一大战略重点。20 世

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随着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及其向传统产业领域里的渗透,在全球范围内,一大批传统产业正在展现出“朝阳产业”的蓬勃活力。近些年来,科技创新对我国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发挥了巨大的、令人鼓舞和振奋的作用。比如,在农业领域,以袁隆平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杂交水稻在中国的推广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000万亩,累计增产稻谷35亿公斤以上,加上电脑农业专家系统的推广应用,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的现代化进程,相当程度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落后面貌,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在制造业领域,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显著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信息化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因如此,许多人都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传统技术,没有传统产业。山西的产业结构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结构。一方面,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绝大多数产业都集中在传统领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产业都是以传统技术为主体的产业,许多产业采用的还是落后的,甚至是面临淘汰的技术。传统产业,尤其是煤炭能源产业、机械产业、冶金产业、材料产业等,都是山西的优势产业,也是目前山西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产业。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只能通过改造、改组等手段,进一步优化、提升、发展这些产业,增强这些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不是要淘汰这些产业。寄希望于脱离开这些传统产业,重新构建新的产业体系,是不切实际并且十分有害的幻想。要使这些传统产业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要增强这些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靠科技创新,靠高新技术的改造。离开了科技创新,离开了科技的武装,山

西的传统产业只能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只能是一句空话,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流于空想。

3. 科技创新是山西培育、发展和壮大新兴产业的根本动力。

山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兴产业实力弱、规模小,整体发育严重不足。要调整山西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仅仅从产业结构比例合理化的角度而论,也必须加速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壮大山西的新兴产业。如果说,以往山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山西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落后,导致了山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等多重效益流失的话,那么,在当前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山西如果不能解决新兴产业发育不足问题的话,山西失去的将不仅仅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失去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失去山西未来发展、生存的权利和空间。所以,培育、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是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又一战略重点。山西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培育、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发展新兴产业,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靠科技创新。一方面,新兴产业是科技创新的结果,没有科技的不断创新,不可能有新兴产业的出现。大到世界是这样,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因为新兴产业永远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新技术、新知识的爆炸性涌现,今天的新兴产业,很可能明天就是夕阳产业。所以说,没有科技创新,山西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山西发展新兴产业绝不只是仅仅为了产业结构比例的合理化,而是要发展具有山西特色的、具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新兴支柱产业。这是山西发展新兴产业的根本目标。离开了科技创新,无论是要形成山西特色也好,培育竞争优势也好,发展支柱产业也好,都将一

事无成。所以,科技创新是山西培育、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根本动力。

4. 科技创新是山西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主要力量。

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是以人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消耗为基础的。它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就是用高新科技取代传统技术,进行清洁生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谐统一。长期以来,山西经济发展一直是依靠传统技术粗放式经营、以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的。低效率、高能耗、高成本、高污染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特征,它在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灾难。突出表现在:山西经济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市场占有份额日益萎缩,获取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山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支撑经济发展的环境能力日益低下。现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要改变这种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高新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把山西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建立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山西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增强和提高山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5. 人才机制创新是山西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支撑。

山西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说到底要靠人才。科技和人才从来就是一体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才是掌握了高新科技

知识、具有较强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力资本。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就无所谓科技,更无所谓科技创新。“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是新世纪国际竞争的需要。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将深刻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知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在全球范围的即时传播和利用,人才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竞争是新时代明显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社会生产力从整体上看,60%—80%要依靠开发智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事业。美国之所以能长久地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不仅十分重视对本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长期地保持着高于世界各国人力资本的投资比额,而且还把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全球市场上,不遗余力地吸引、招揽世界各国的各类优秀人才。可以说,着力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保持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实际上,我国一些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其结构的调整升级也无不依托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地区在进一步做好具有比较优势的教育科研产业的同时,还不断地加大对全国各地和国外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与投资举措,大力吸引、招揽优秀人才。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我国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高级人才几乎一半流向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地区。可以说,正是由于对现代产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大量培养和吸引,才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山西要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借鉴

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把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抓紧抓好。可以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山西结构调整升级的成败。

二、结构不优创新乏力：科技与人才机制创新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不容置疑，山西与全国一样，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以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创新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从过去的计划集成型向市场集成型转变，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在经济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开展科技创新与人才资源开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统计材料表明，进入新世纪，山西全省企业界人才队伍已达20.9万人，专业技术人才687253人，科技队伍的总量发展到了86万余人，比1978年增长了4.7倍；县(含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科研开发机构263个，普通高校23所，成人高校24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127所，研究生培养单位12个，博士点19个，硕士点175个。全省有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0人，省优秀专家累计为316人，博士生导师80余人，硕士生导师800余人。山西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在全国排名第11位；每万人口中科学家工程师人数为303人，在全国排第11位；科技人力资源综合评价在全国列第17位；科技活动人员指数0.442，在全国排第16位；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比重是50.24%，在全国列第18位；科技人力投入综合评价在全国列第19位。

但是,横向比较,山西目前在科技创新和人才机制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较大差距,科技、教育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仍然严重落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仍然缺乏高新科技与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有力支撑。主要问题表现在:

1. 科技投入强度低,科技活动能力弱。

为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世界各国竞相增加科技研究开发费用,科技投入呈不断上升趋势。山西的科技投入则不仅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在全国位于下游。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员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1997年为例,山西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筹资额为50576万元,从事技术开发活动人员人均经费17854元,远远低于全国人均34600元的水平。由于科技投入水平低,导致山西的科技产出在全国也处于落后状况。据测算,全国工业经济增长中来自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30%左右,山西不到20%;新产品产值率全国为14.33%;山西仅为5.15%;在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中山西仅占0.93%。

2. 科研开发机构行业分布不合理。

山西科研机构的行业分布与产业结构相比明显不对称,表现在为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业等行业服务的科研机构偏少,力量薄弱。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业等行业的增加值约占山西国内生产总值的58%,但为其服务的科研机构仅占科研机构总数的30%。一般来讲,科研开发机构的行业分布并不单纯地取决于产业比重,但科研开发机构的行业结构与产业比

重的相关性是评价其学科分布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二者的相关性差，说明山西科研机构远未形成对促进山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业发展产生巨大作用的科研体系。

3. 高校科技活动薄弱，科研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高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也是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生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孵化器、辐射源。然而，山西高校的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转化在全省几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无论从山西高校科研投入还是产出看，都只占全省很小的比重，仅起一个点缀作用。如 1995 年山西省技术市场各类技术合同签订总数为 493 项，其中作为卖方的高校仅提供 7 项，占总数的 1.42%，合同金额 6792 万元，占总金额的 0.37%。进入新世纪，高校的这种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与高校应有的作用与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山西高校科研开发投入严重不足，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平均经费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使得高校的科研开发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高校科研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可以说，山西高校至今还没有走出校门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因而也不能取得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强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够重视高校的科研力量，没有为高校的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强大的支持，各部门各企业与高校的科技合作意识淡薄，不能积极寻求与高校的联合，加强自身科技开发的能力。

4. 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严重落后。

在结构调整升级取决于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本的今天，人力资

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决定着科技创新与转化的状况,进而决定着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状况。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山西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人力资源结构性不合理、人才缺乏、人才流失是其存在的三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才拥有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才拥有量多。如国有工商企业的人才只占总量的30%左右,农业技术人才仅占专业技术人才的2.24%,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才拥有量占总量的60～70%;二是工程、教学类的人才分别占到人才总量的17.29%和47.88%,但生物技术、信息网络等高新技术人才严重不足;三是专业技术人员中高、中、初级职称比例为1:7:12,和发达国家的1:3:6的最佳结构相比相差甚远;四是人才老化问题严重,高级职称人才中50岁以上的占56.19%;五是人才地域分布不平衡,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六是人才资源分布"国涝民旱",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缺乏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人才政策框架,配置方式还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自觉不自觉的偏向国有部门,使得山西人才大多集中在国有单位。这种人力资源结构性不合理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全省的人才总量并不算少,素质也并不算低,但浪费严重,不能给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这不仅表现在山西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石——科研教育产业的落后,而且还表现在山西对国内外不断强化的人才争夺战反映迟钝,在主流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山西产业组织和政府部门引才招贤的举措。尽管我们的一些产业组织和政府部门也在开展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但手段相当落后,成效更差,不仅外面的人才招引不来,而且自身已有的人才还不断大量流失。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山西籍在外省高校毕

业生返省率逐步降低，到90年代末，山西培养的硕士生有七成以上到外省谋职求业，形成了本省培养的人才留不住，急需人才引不进来的落后状况。

三、科技和人才机制创新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山西人才、科技方面的落后，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还有自然环境的原因。但是，千条原因，万条原因，体制、机制的落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走上内源动力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路，就必须改革落后的科技、人才体制和机制。

1. 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山西科技体制及人才机制的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要推进山西科技创新与人才机制的创新，首先必须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是要制定明确的科技创新战略和规划，明确山西科技创新的目标、方向和重点，引导山西科技的集群创新，形成焦点与合力。科技创新战略和规划既要“上着天”，又要“下着地”，其成果的市场化必须从一开始就有切实可行的安排，科技创新战略与计划的实施，不能像现在这样由有关政府部门直接操作，而应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人大和政府等代表组建理事会和相应的工作机构，以平等竞争的方式来选择，特别是要向具有实力的优势企业和具有

潜在优势的企业全面开放,使企业更全面、更深层次地参与到科技创新战略和计划之中。

二是要尽快出台鼓励风险投资的管理政策和办法,解决科技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创新的融资问题。要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要制定政府采购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在技术指标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本省的产品;要通过政策和法规,制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带来的产业趋同和结构性生产过剩;要健全、完善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法规,努力创造和维护有利于科技创新、传播和应用的正常的市场秩序;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人才政策和激励机制,以吸引国内外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等等。

三是要保障产业关键技术,特别是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政府要根据产业创新战略,集中力量攻克一批产业关键技术,集中组织技术、资金、人才启动一批高新产业的发展,并利用高新技术的转移扩散和渗透功能对重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共性技术,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有较大的外溢性、超前性,涉及的产业层次和技术层次多,研究开发难度大,单个企业一般无能力也不会承担其研究开发任务,而必须由政府牵头加以组织和领导,依托国际国内和省内科技研究开发力量,搞好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共性技术。

2. 创新科研机制,加速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高等院校具有独特的人才优势、知识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在产学研一体化中起着孵化器和辐射源的作用。在今天,经济与科技、教育的运行机制日益进入一个创新变革的新时期,产学研密切结合成为其最基本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采取了"依靠高等院校和工业界相结合,发挥自己特长"的战略方针,迅速发

展了5000家软件公司;斯福坦大学与产业部门相互依托,互相促进,使得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形成了著名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我国在1985年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后,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高校在保持一支精干科研队伍加强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大部分科技力量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并集中一定的人财物从小到大发展起一批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近几年在市场的导向下,高校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了一批高技术企业。其中,北大方正、北大青鸟、清华同方、清华紫光、东大阿尔派、上交大昂立、云大科技等一批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已引起国内外的瞩目和关注。目前,我国高校企业总数达2097家,并以每年高于15%的速度发展,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达368亿元。高校科技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新亮点。如北京市正是依托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迅速形成和发展了大批高科技产业;华工激光已成为武汉发展中国“光谷”的主力;深圳科兴已成为我国新兴的药业基地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高等院校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山西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比重大,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更新升级慢,市场竞争能力差,调整结构迫切需要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新亮点,并对山西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山西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大力推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机制。一是高等院校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方法和专业课程设置,加强学科建设和专业改造,使其更加符合山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合格的创新型人才;要在办好高等院校基础教育的同时,

根据科技创新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多渠道造就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二是必须加快高等院校的科研技术成果直接转化为新产业项目的步伐。对此,山西应对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予以特别的重视和扶持,充分利用省内外高等院校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加速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对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在这方面,省城太原实现率先发展责无旁贷。三是必须推进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科研机构市场化、企业化。这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技链与经济链相衔接、科研机构与企业相融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山西改革科技体制,必须正确区分科技活动的市场领域与公共领域,除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科研院所外,其它科研机构都应走向市场,成为科技型企业,进入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

3.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成果最终要通过企业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促进大中型国有企业主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关键也在于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科研投入的主体。从山西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情况看,企业技术创新严重缺乏资金和高素质人才,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企业也没有将技术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上,缺乏技术创新的强烈意识和强大动力。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山西国有企业转制缓慢。一方面,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大量存在产权关系不明、产权边界不清等问题,企业远未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大多数国有企业自身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缺乏对创新者的激励机制。对此,山西必须深化以确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技

术创新和市场的主体。大企业集团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主动联合,建立自己的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小企业则可与科研院所搞技术开发联合体,逐步形成以大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自主进行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中小企业自主应用和转化为主体的、面向全社会的产学研联合技术创新体系。此外,山西还必须重视和加强以情报、信息、咨询、代理、评估等科技服务机构为主的创新支撑体系的建设,为加快科技创新提供完善的高质量的服务。

4. 深化体制创新,建设发展高新园区。

环顾世界,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建立科技园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聚集创新型科技企业的重要措施。美国硅谷、英国剑桥、法国索非亚、印度班加罗尔等科技园区,正在引导着所在国家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作为"火炬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相继建立了 53 个国家级高新区,初步形成了沿长江流域、环渤海、珠江三角洲以及沿亚欧大陆桥等高新技术产业带。实践证明,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有效途径。据 2000 年统计,北京中关村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500 亿元,工业产值 700 亿元,对北京市工业新增产值的贡献率达 63%;上海市实行"聚焦张江"战略决策,仅 4 平方公里的张江高新园就实现工业产值 50 亿元;重庆高新区在 2.5 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内完成工业产值 158 亿元;西安高新区实现工业产值 185.5 亿元,做到连续三年拉动市级经济增长的 1/3;南京、苏州、无锡、常州 4 个国家级高新区 2000 年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380 亿元,人均劳动生产率达 45 万元以上。由于高新区把各类创新要素聚集在一起,加快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孵化培育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有一定

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因而正在发展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目前,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已从当初主要吸收开发国外技术,发展到现在产值的86%来源于自有技术项目;高新区共拥有1.9万多家企业,220万产业大军,其中60%以上是科技人员,园区内许多企业是由海外留学人员创办的,90%的创业人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山西的高新园区起步晚、起点低,目前仅有太原高新技术园区为国家级高新园区。从山西高新园区的发展状况看,其工业生产总值、科工贸收入、出口创汇额均与国内兄弟省市高新园区存在巨大的差距,还不足以体现其成为山西地方经济发展“动力源”、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区”、优秀人才“聚宝盆”的作用。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管理体制的落后,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创新,许多高新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机构变得越来越臃肿,甚至出现“体制复归”的现象。要充分发挥高新园区推动山西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就必须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化高新区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要真正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职能设置,建立和完善“小机构、大服务”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在高新区内创造一个更加优化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局部环境,推动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要强化以科技孵化器为核心的高新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设软件园、留学生创业园、专业技术孵化器;要加强高新区投资融资体系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信息、贸易、人才交流与培训等中介服务机构,强化企业创新能力;要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从制度上吸引和留住人才。对于高新区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区创业,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激励科技人员从事高技术产业化的政策,对这些政策的可操作

性进行研究，制定实施细则，通过灵活的激励机制和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保护创业者的利益，吸引留学人员和高素质人才来山西创业；另一方面要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完善保险、教育体系，消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5.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

《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建立服务功能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投资是运用超常规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经济杠杆和便捷路径。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创新体系，而且需要大量高科技项目的研究与开发，需要有创新、研究、开发的物质支撑体系。中外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作为创新性的金融工具，不仅是高新技术项目付诸实施的孵化器，而且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和经济管理模式，能够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资源配置；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能够满足企业低成本、高扩张的发展要求；能够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美国近 10 多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支柱支撑：一是在资本市场上有大量的股票上市公司；二是数目庞大且源源不断的风险投资支撑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从国内来看，一些先进地区已经找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正确道路。发轫于 1985 年的风险投资这一新型融资机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骤然提速奔上了高速公路。进入新世纪，全国各个梯度的风险投资基金机构已达 100 多家，拥有资金规模超过百亿元。其中，深圳市在风险投资方面居于全国领先水平，有风险投资机构 20 余家，注册资本超过 30 亿元，市政府 2000 年 10 月颁布实施了《深圳市

创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此规定为国内风险投资第一部规范化的章程。风险投资的发展与完善,极大地支撑和推动了国内先进地区如深圳、北京、上海、广东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升级。

山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必须积极借鉴国内外风险投资的有益经验,发展风险投资,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只有这样,山西经济结构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走上超常规发展的轨道。对此,政府要制定完善的风险投资政策,建立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并重点扶植和推动风险投资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积极运作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推动上市企业涉足风险投资这一热点领域。在风险投资的方向上,要立足于发展煤炭能源清洁产业、高科技机电产业、特新材料产业和农业产业、高新生物制药产业、信息产业等。通过风险投资,在利用好省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和科研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著名高校、跨国大公司的合作,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的供应,支持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6. 构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

山西的发展,人才是关键。在人才开发利用上,山西要着力建设好世纪性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尤其是要抓好三支带头人队伍的建设。一是谙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精于运筹的各级党政队伍;二是精通市场规则,善于驾驭市场发展的优秀企业家队伍;三是能够带领科技队伍攻关的科技带头人队伍。对于领导干部人才,要创新用人机制,坚决匡正用人风气,努力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真正健全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举贤"机制和监督

机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对于企业家人才，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市场化的选择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培训储备机制，加快企业经营者市场化的步伐，建设形成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市场化的企业家队伍。对于专业技术人才，山西构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应该尽快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发挥社会及市场的人才调节配置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市场来调节配置资源。山西人才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落后的体制造成的。因此，山西人才工作要有所突破，使其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必须转变原有人事管理模式，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全面推进人才工作的社会化。一是要清理和废除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人事人才管理政策，转变政府职能，放权搞活，应由社会办的事情交由社会去办。比如：城市落户、编制指标、工资审批等管理措施，应该按照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全面放宽或放开。二是要尽快组建各种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把人事代理、人才测评、职称评定等人才服务工作由中介组织和行会去办理。三是要充分发挥人才市场的调节作用，打破人才交流壁垒，维护人才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则，由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自由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二，克服人才结构性矛盾要从教育方面抓起。要按照科教兴省的发展战略，把教育培养作为人才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一要加大大专院校深化改革的力度，面向市场，培养和输送社会急需的学以致用的各类人才，力求做到优势学科人才优先培养，尖端专业人才重点培养，紧缺岗位人才加紧培养，使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中人才结构矛盾尽快得以缓解；二要挖掘教育潜力，扩大招生特别是扩大定向生的招生规模，要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积极扶持人才短缺的地方和单位，有针对性地解决我省人才结构在区域方面的失衡

问题;三要加强与国内外大院大所的联系和交流,选拔一批有发展潜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出国出省进修学习,使他们将来能承担重任,成为山西技术创新和学术带头人,以弥补山西高层次人才的不足;四要多层次、多元化地抓好各类人才的继续教育。

第三,稳定现有人才,大力引进人才。首先,要尽快采取一切有力措施,使现有人才队伍基本稳定,避免因人才的大量流失而造成人才结构性继续恶化。其次,鉴于当前人才争夺异常激烈、山西吸引人才环境差的问题,要大胆制定一系列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抢占先机。如以项目定人才优惠政策,定资金支持等。山西现在大力引进人才,可以说恰逢其时。一是近几年全国有许多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因就业出现暂时困难,还有的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二是20年来我国派出去的留学生有三分之二滞留国外,有80%的留学博士、硕士研究生表示愿意回国创业;三是企业改制,有一大批企业人才需要转岗。因此,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山西就能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把需要的人才引进来,及时添补人才结构的短缺空白。

第四,重视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实现人才结构的动态平衡。要制定相应政策加以正确引导,在动态中实现山西人才结构的基本平衡。一是急需人才的地区或单位,要出台比较优惠的政策,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二是要提高其生活待遇,在工资、福利、资金、津贴等方面适当予以优待,使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三是要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学习环境,满足其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业心和成就感。特别要对高新技术人才实行"小灶式"的优待,采取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做法,为他们造创更多的成功机会。优惠政策的出台,既能引导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又能引导人才追求目标的转向,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建功

立业，最终使全社会人才结构失衡状态得到优化，得以提高。

第五，积极创新人才管理机制，促进人才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调整人才结构，开发人才资源，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必须以创新机制为前提。一要尽快建立领导机制，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以便统筹和协调各方面的运作；二要改革选拔任用机制，清除论资排辈的陈年陋习，提倡有序竞争，逐步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百舸争流局面，使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三要完善激励机制，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激励机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要给予重奖，提高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四要创建成果转化机制，比如建立创业风险基金、项目补助基金等，使专业技术人才的专利或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五要把以项目定优惠政策、定资金支持作为常规性的人才激励机制进行建设和实施，保证重点项目和优势项目的人才支持。

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政府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在山西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下，企业实力弱小等原因，政府更是结构调整起步阶段的第一推动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进行得怎么样，目标能否实现，关键看政府，看政府职能转变进行得怎么样。只有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和重塑政府职能，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才能获得来自政府更大的推动力，才能在政府科学合理的支持下，更快速、更健康、更有效地推进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

一、政府推动是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

毫无疑问，山西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追赶型、跨越型、发展型的调整。山西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避免被全国、全球经济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所淘汰，结构调整的力度就必须大点、再大点，结构调整的步子就必须快点、再快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乃至于个人等各个方面的推动力。但是，直到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不是太清楚，不少地方、不少人还在为到底是政府的作用大一点还是市场的作用大一点而争吵不休。

山西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必

须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至于不要政府的推动。恰恰相反，政府是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发动者和目前阶段的主要推动者。在结构调整的起始阶段，如果忽视政府的推动作用，听凭市场力量推动山西结构的调整，那么，由于身处落后地区，经济欠发达、市场化程度低下、企业实力弱小等等原因，山西结构只能是越调越不合理，越调经济越落后，社会越不发展，人民群众生活越贫困。因为，趋利避害是市场的本性；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极化"阶段，而这个阶段的"极化"效应总是趋向于吸引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资源为发达地区所用，而不是相反。由此，如果忽视政府的推动作用，任由市场机制主导山西的结构调整，那么，大批的市场要素资源势必流出山西，山西的经济结构势必在固有的基础上惯性发展，实现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山西的经济结构调整，至少是在起始阶段，只能是政府主导的调整，政府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这是与我国转型期的实际国情和山西的特殊省情分不开的。

从世界各国近现代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伴随着政府的退出和作用减少，而是恰恰相反。英国历来被看作是"自由放任"的典型，但根据学者的研究，事实上，19 世纪中叶以前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是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在英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改革为英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长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再如美国，尽管政府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干预，但它却通过制定法律(如《宅地法》)和政策为经济发展争得了大量的物质资本，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并且通过对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支持为美国

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扩张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日益突出。战后初期，日本为了迅速恢复经济，政府直接推行了"倾斜式生产方式"，把一切经济政策的重点都集中在煤炭的生产上，形成了以煤炭为中心的暂时经济，并以之为杠杆创造了提高生产水平的契机。韩国经济在战后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现了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并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有效地配置了资源。由此看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日益突出、日益强化。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一大历史潮流。不难理解；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规范化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而塑造和维护市场竞争环境最好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运用公共权力特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对市场竞争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冲突进行公正而强有力的仲裁，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有序进行。

从我国落后地区的情况来看，目前一般都存在着市场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公共管理方式滞后，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对外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晚，发展空间有限，因而选择最有利的发展路线，有效地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只靠市场调节是难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和优势。这既是现实逻辑的必然，也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比如，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山西要有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需要发挥政府第一

推动力的作用。

1.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持,而政府是政策的惟一供给者。

经济结构是一定经济政策的经济反映,是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任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从经济政策中找见其之所以不合理的原因。山西之所以形成以煤炭能源产业为主,大而不当、大而不强的产业结构,与长期实施建设煤炭能源基地的产业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山西新兴产业的落后,则直接和新兴产业促进政策的缺乏有关。同样,经济政策是经济实践的引导者,任何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都涉及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山西如果不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缺乏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指导,那么,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就只能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盲目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经济政策的惟一的制定者、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

2. 山西结构调整依赖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而政府是山西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推动山西结构调整,离不开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科技创新是经济体系保持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决定性力量。政府在促进和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之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政府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投资资助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从山西现有情况看,民营高科技企业

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较有限，许多重大的高科技项目只有政府才具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开发。另外，产业素质的迅速提高依赖“产学研”多种力量的合作，“产学研”多种力量的合作有赖高效的管理和有机的组织协调。在这方面，政府不仅具有当仁不让职责与义务，而且也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在研究制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战略，加大财政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机制、项目融资体制等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渠道等方面，政府不仅责无旁贷，并且在许多方面非政府莫属。所以，政府是山西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推动力。

3．所有制结构调整是山西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而政府则是山西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主要角色。

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制分配结构同样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所有制分配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结构调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非政府莫属。政府在体制转轨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造就平等的市场主体：一方面深化国企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主体；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真正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有的位置。山西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逐步走向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有资料表明，山西国有经济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上不去，山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上不去，

经济结构调整就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发展非公有经济，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关键还是要把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下来，有“国退”才有“民进”，“国退”是“民进”的必要条件。集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者于一身的政府，其意愿、态度自然就决定了这个“退”的进程。所以，政府是山西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主角，具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4.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政府则是这个环境重要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当然是经济质量、经济效率、技术素质等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但是，从地区经济的角度而言，地区经济的竞争并不主要是地区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而主要是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竞争。经济发展环境好，吸引的生产要素就多，经济发展就快；相反，经济发展就慢。山西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实体之间的差距，倒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环境的差距。由于整体经济发展环境不优，山西不仅难以吸引外部经济要素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相反，还日益成为包括资金、人才在内的诸多经济要素的流出地，成为东部地区经济要素资源的供应者。所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政府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它要求用各种法律、规则来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可以说，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一个以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核心的市场环境。政府既是诸多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又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它本身不仅要像其它机构、单位一样依法运作，更担负着法律所赋予的

执法职能。这样,政府部门是不是依法行政、执法守法,就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优劣的主要标准。所以,政府理所当然地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尤其是在转轨时期,计划与市场两种成份并存,它们相互磨擦与冲突,使得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混乱和无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经济结构调整,无疑也面临着这种混乱和无序。政府此时的最大作用就是减少无序状态,缓解矛盾冲突,将混乱的局面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尽量缩短体制转型过程。不难想象,忽视了政府作为环境创造者、维护者的作用,山西经济发展环境不可能得到改善,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5.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而政府正是现阶段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人都有益而私人经济部门不愿或无力去提供,或私人部门的提供容易造成垄断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比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水供电、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设施和基础条件,但在其生产和供应方面,市场机制却难以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支出进行投资来加以解决。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努力,山西公共产品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程度地改善。但是,基础设施短缺,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仍然是山西经济发展环境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环保、水利设施等方面。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发挥,太旧高速公路不可能建成,引黄工程不可能诞生,大运高速公路也不可能开工建设。山西“十五”规划中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

程”就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它们既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可以而且必须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这些方面无不说明，政府推动力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

山西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正是由于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全省结构调整才能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一年起步、两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目标。如果不是政府第一推动力的推动，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便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重大的进展。

二、政府管理模式的滞后
是制约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

政府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推动力。这种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性质如何，效果好坏，关键取决于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范围和方法，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山西各级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发挥的作用来看，政府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山西结构调整中遇到的诸多难点问题都和政府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密切相关，诸如整体环境不优、调产进展不平衡、国有经济比重高、新兴产业发展滞缓等等。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山西各级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的严重滞后。

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政府对产业管理模式的转变，恰恰是在这一方面，政府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全省结构调整的快速进展。

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模式选择离不开特定思想的指导和经济体制的制约。一般来说，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是部门管理模式，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产业管理模式。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

限制,山西的部门管理模式根深蒂固,产业管理模式远远没有到位。

产业管理模式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不再依赖行政机构与政府层级来管理经济,而主要依靠产业政策和法律手段对企业活动进行引导;这一模式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甚至不再直接地按产业中的行业划分或产品分类来进行管理,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不分地区、行业、所有制的差别,对整个产业的所有企业活动进行统筹管理、间接管理、宏观管理;这一模式要求政府不再按产品分类、甚至行业划分来设置管理部门,而是按产业、甚至跨产业设置管理部门,譬如将工业与商贸、生产与流通结合起来设置部门进行更为综合的管理。

产业管理模式与传统的部门管理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是对象不同。部门管理的特征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产业管理模式的特征则是宏观的产业管理,是进行无差别的、一视同仁的管理。这样就使政府超越具体的微观经济行为,真正从全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实施管理,从而扩大了政府管理的视野,提升了政府管理的层次。二是内容和手段不同。部门管理其实是一种微观管理,具体项目的管理,其管理的内容是简单的分钱、分物、批指标、立项目、审项目。这样就使得政府深陷其中,无力超脱出来进行宏观层面的"规划、协调、服务、监督"。产业管理模式则是以政府引导和法律规范为主进行管理的方式,它注重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维护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这样就使其管理内容和手段突破了狭窄的项目管理、微观管理,而着眼于整个产业活动的总量、结构、发展环境等因素进行大产业管理。这实际上是突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三是结果不同。部门管理是一种封闭系统中的管理,其管理之下

的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只能在自身内部进行。根据控制论理论，其结果只能是"熵"增，逐步走向无序状态。产业管理则是一种开放系统中的管理，它能够融入市场，融入社会，其结果是"熵"减，会使产业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和产业管理模式。客观地说，经过近几年的机构改革和撤并，山西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的转变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山西与其他省市相比，计划经济的意识更浓厚，部门管理模式的惯性更大。这使得山西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模式的重建，与东部地区和周边省份相比，与山西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要求相比，都明显滞后。可以说，三年以来山西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主要还是在传统的政府职能和部门管理模式条件下进行的。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影响和制约了政府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

1．政府第一推动力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越位"。

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无可替代，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在山西，在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法规建设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即使在主观上想极力摆脱过度的行政干预和传统的角色，在客观上都不得不事必躬亲。诸如在产权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资产重组、项目审批改革等方面，离开了政府，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无所不能，可以包打天下；相反，市场条件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是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发展，是双方职能的互补与合理让渡。政府与市场各有自己的职能与作用空间，政府超越自己的职能范围，企图包揽一切，必然导

致事与愿违。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全省各级政府中，尤其是在县、乡一级政府中，政府职能“越位”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常严重。比如，潜力产品本应是企业、市场选择的结果，必须经过深入的市场分析和调查研究，但在不少地方却是政府说了算，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潜力产品，什么不是潜力产品。有些地方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几个潜力产品就是没有政绩，就不好看，于是就生拉硬扯地人为制造几个潜力产品。其结果是一些潜力产品毫无潜力可言，潜力产品被无端地“庸俗化”。再比如，在农村地区，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是农民自己的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只能逐步地引导、耐心地指导、做好细致的服务。但不少地方的乡政府，甚至包括有的县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农民调产。凡此种种，都是政府职能“越位”的表现，其后果非常严重。

2. 政府第一推动力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位”。

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政府职能“越位”现象，而且存在着严重的政府职能“缺位”现象。“越位”是种了别人的田，“缺位”则是荒了自己的地。山西进行结构调整要求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到位，诸如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结构调整目标，完善法制法规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宏观管理和服务的能力等等。但现实情况远远不能让人乐观。比如，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科学合理的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吸引外部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的政策，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新兴产业促进政策，市场环境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多方面问题，人才流失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加以解决。然而，我们各级政府却把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在一些事务性的问题

中难以自拔。再比如产学研的协调问题。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是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支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靠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机制问题,是如何把与技术创新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单元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创新体系的问题。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长期以来山西企业总体效益连年滑坡成为制约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压力和能力,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其竞争力,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作为直接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科研机构,以及作为科技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则远离企业需要,不能植入经济领域中,直接为全省的结构调整服务,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人才和科技资源。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很多,但政府职能缺位,没有发挥好自己的协调服务作用并建立起有效的创新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 政府第一推动力在结构调整中“错位”。

“越位”和“缺位”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政府职能的“错位”。一方面,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仍然由企业承担着,企业办社会、企业办学校、企业办医疗、企业办报务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服务发展不足,许多本应由市场、社会承担的职能,却仍然由政府承担着,比如,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本应由企业家市场来决定,但我们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仍然实行任命制,由政府来任命;各经济行业内部的协调也应该是行业内部的事,也仍然由政府来承担;大量的社会中介服务,应该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提供,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中介服务也仍然是由政府来提供的。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角色上的错位,必然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低效。一方面,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

力所不及、力所不能的职能，从而加重了政府的负担，使政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难以集中精力履行自己的本职职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义务，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企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一些义务，反过来便有理由要求政府提供某种便利和保护。这不仅导致地方与部门的保护主义，也使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动力和压力，对政府提出的结构调整战略并不十分热心。就非国有企业或非公有制企业来说，尽管它们有较大的自主权，但由于政府管制范围和管制力度过大，使之与国有企业处于非公平竞争的状态，其发展空间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都受到了一定制约，因此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也十分有限。此外，政府职能角色的“错位”，还是造成诸多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有人说，南方省市的政府是放手让企业家折腾，我们这里是联手折腾企业家。话虽说得偏激，但也反映了山西的一些实情。

总之，特殊的国情和省情使得山西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由政府来推动，但这决不意味着政府因此可以替代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继续沿用传统的部门管理模式来组织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经济结构的调整，应是政府推动和市场调节互相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积极顺应体制转轨的需要，加快由原来计划命令型的部门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管理模式转变，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加速实现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任务。

三、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山西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最终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就

必须彻底改变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要改变这些现象，关键还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政府仍然沿袭传统的职能和管理模式，根本无法解决山西结构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许多新、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的本质在于变革陈旧落后的行政理念和行政精神。只有确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全新的行政理念的行政精神，山西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才算真正到位，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有望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保障，是山西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本目标。

1. 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环境。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经济进步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山西结构调整要想实现其推进经济社会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山西结构调整如果只限于利用山西资源，不能吸引大量外部资源的进入，那么，就无法实现山西结构调整的目标。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首先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经济发展环境。要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关键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政府不应该直接充当“资本经营者”去插手企业生产，而应该充当“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加强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主要包括产权保护、稳定宏观经济、组织协调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等。其中，产权保护是政府首要的基础性的职能，它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仲裁人要保护各种民间经济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当我们说一个地方“环境不宽松”时，相当程度上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的“产权保护”

职能缺位,甚至于发生“联手折腾企业家”的事情。环境问题更多的属于政府问题,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环境。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不佳,只能说明该地方的政府在履行其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方面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在不应履行的微观管理职能方面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强了。

就山西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注意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必须搞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这项改革虽然已在全省范围内大面积地开展了,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很多,如认识不到位,表面应付,避重就轻,不愿放权,标准不统一等,改革仍以公布削减了多少项审批和收费项目、削减比例达到多少、审批环节是否减少、审批过程是否公开透明这些外在的成绩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这些审批项目、环节的减少,透明程度的提高,的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决不是实质内容和根本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不简单是现有审批事项的“削减”,而是通过对审批制度的改革,政府在放弃了“不该管的”权力之后,以怎样的方式和形式把“该管的”事情管好。这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不是要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这种管理方式,而是要政府部门把工作的重心由“事前的审批”转向“过程的监控”和科学决策、管理服务上来,从而真正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必须强化宏观管理、协调、服务职能,改变政府职能“缺位”现象。政府职能的转变不等于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在微观领域从直接管理者,转变为宏观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市场制度的保护者、制度创新的推进者、公平竞争的维护者、

规模效益的管制者,承担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等管理职能。由此可见,转变后的政府职能与转变之前相比有着质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山西目前的状况是,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有所减少,但宏观管理职能尚未到位。这是山西政府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要努力寻找政府职能转换的根本途径。政府职能转变不是靠行政手段能最终实现的,它需要连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有能够承接被转移的政府职能的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维护市场秩序,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一个完善的媒介性的"中介组织"起协调作用。社会中介组织既具有宏观性、中立性,又具有民间性、独立性,因而是承接政府某种职能的必要而合适的载体。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行政改革中,许多政府职能被转移出来,交由中介组织来承担。如美国的独立机构和英国的准政府组织等,实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减少了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这种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要重新合理调整政府内部的职能结构。职能结构是指政府职能的构成及各类职能在职能总体中的比重和相对地位,它包括纵向职能构成和横向职能构成两部分。无论是在纵向职能构成方面,还是在横向职能构成方面,山西各级政府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从纵向职能构成来说,主要是市、县"事权大,财权小",导致有关职能部门有权无钱"逼上梁山"——这也是"三乱"现象难以根治的深层原因。所以,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如何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配置。从横向职能的构成来说,总的方向是要削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微

观职能,如具体项目的审批、投资等职能,强化宏观管理如决策、规划、协调、社会服务和保障等职能。

第五,要切实贯彻落实政务公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但迟迟转变不了,这是造成以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进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山西经济发展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与政府的一些行为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有很大关系。一些人把住手中的权力不愿放,不舍得放,把权力当饭碗,以权谋私,使得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难以真正到位。为此,必须切实贯彻落实政务公开的原则。这是政府职能转变最基本的要求。

2. 要转变管理模式,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效率。

旧有的部门管理模式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要求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体现为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没有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职能便无法落实。事实上,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恰恰是山西结构调整中政府职能产生"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有转变落后的部门管理模式,确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管理模式,才能逐步扭转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种种现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强化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第一推动力作用。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部门管理经济的方式必须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直接管理,即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是部门管理模式的一大特征,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丧失和政企不分。经过多年的改革,山西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现象已经基本得到改变,但是还远远没有根除,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比如,国有企业领导的任免,实际上仍然是政府说了算,企业的人事

调动、工资分配等，仍然受到政府部门的过多管制。政府只有彻底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也才有可能尽好自己的本质职能。

第二，管理重点必须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微观管理，即政府部门过多、过深地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过深地干预市场。这是山西部门管理模式的又一特征。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山西各级政府部门管理重点过分关注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虽然已经得到基本改变，但管理的重点还远远没有过渡到宏观管理方面。政府职能"缺位"的现象就主要发生在宏观管理领域。政府宏观管理的职能不落实，职能转变就是一句空话，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就难有质的突破。管理重点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要求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诸如规划的编制、产业政策的制定、法规制度的完善、市场环境的整治等等方面。

第三，管理手段要从简单的行政命令转向高效服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搞经济管理，是计划体制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搞经济管理在全国很多省市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受计划体制影响很深的山西，许多地方政府却对此乐此不疲。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许多地方政府不是潜心研究分析市场，不是靠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而是靠行政命令，靠发文件、压指标来搞调整，教训非常深刻。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要最终"入轨"，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政府的管理手段就必须走上靠规划指导、靠服务引导、靠政策鼓励的轨道上来。

第四，政府决策要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知识化。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集中体现。决策失误是政府最大的失误。有效避免政

府决策失误，就必须使政府决策走上民主化、科学化、知识化的轨道，建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知识化机制。在知识经济一日千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在新事物层出不穷、新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要有效避免决策失误，就必须广泛吸纳民智，在现有决策框架内建立智力咨询服务机构，推进政府决策的知识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决策的知识化，就没有决策的科学化，也没有决策真正的民主化。我们看到，在山西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政府，到目前为止随意决策、凭个人好恶决策、一言堂式的决策仍然随处可见。这种状况给全省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3. 要转变行政观念，培养公共精神。

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模式，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两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行政观念、行政精神的确立，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的转变就失去了灵魂和本质。正如许多行政学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政府的公共精神“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于其行政价值和精神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之间的趋同程度”。对目前我国的政府管理来说，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法则日益侵入公共行政生活之中，政府管理的公共原则日益受到损害，公职人员的公共精神日益淡化，其结果是政府权威的日趋滑坡。因此，如何使政府回归它应有的公共精神，可以说是政府管理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政府管理的核心。

对山西来说同样如此。只有抓住了行政观念的转变和行政精神的重塑，确立行政就是服务的新理念，确立公共精神，才能抓住

山西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灵魂和本质。

第一，要转变“为官”观念，强化服务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向导，没有正确的观念，就难有正确的行动。山西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尤其是政府机构改革遇到的诸多难题，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念在做怪。在全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机关干部、机关领导下海闯市场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在山西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千方百计往机关钻。“企而优则仕”的观念异常顽固。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领导，不是一门心思研究市场，扩大经营，发展企业，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要“官儿”当。全省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说穿了就是为“官念”服务的，并不是出于有效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的考虑。山西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首先是观念上的差距。观念不改变，山西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就无法缩小。要转变观念，关键还是要转变各级政府的观念，淡化“官念”，强化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的思想意识。这是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要大力培养公共精神。像世界上其它事情一样，公共精神的培养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甚至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来完成。社会对管理者有着特殊的要求，然而管理者同普通人一样也存在着人性固有的弱点。为了使管理者不至于滥用权力，由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主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以规范其行为。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除了各种制度化措施，严格立法，多方监督，设立专门的整肃机构外，还十分重视对官员的道德自律教育，以使他们养成自尊、自重、自律、自觉为公众服务的素养。就山西来说，培养政府的公共精神，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强道德修养、党性教

育,以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养成;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健全具体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完备而有效的监督体系。严格而明确的制度建设,强化养成"公共精神"的制度性力量,使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受到有效的界定和规范,使其不能、也不敢以身试法。

第三,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江泽民同志在《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中曾列举了党和政府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是形式主义严重,"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工作部署了,没有抓到底,口号提出来了,没有落实。结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实效。这种风气如果不纠正,不仅会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而且必然会出乱子,甚至会出大乱子"。必须看到,这些问题也是山西各级政府存在的严重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双管齐下。

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公职人员的作风教育,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坚决反对不思进取,敷衍了事,精神萎靡的不良习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知民、爱民、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谋利益,坚决制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执法犯法的违法行为;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坚决反对工作飘浮弄虚作假、愚弄群众的恶劣作风。

另一方面,要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规范行政行为。依法行政就是政府机关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使行政行为本身受制于法,做到既不越权也不失职。在行使法定职权时,既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而不是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违背;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不得违反。既要以廉政建设、整顿纪律、严肃执法为重点,加强司法和执法队伍建设,使他们强化法治意识、公仆意识,努力培

养依法办事的习惯和能力；同时又要提高普通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疏通他们依法监督的渠道，使他们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普通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也就无形中起到了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

山西结构调整的现实进展及其态势

从1999年底开始新一轮结构调整至今，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难点和问题。认真总结3年来的经验、教训，充分把握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走势和未来前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克服存在的难点和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结构调整的主要进展

几年来，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1998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为12.9:53.5:33.6。到2000年，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为10.9:50.4:38.7。两年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则上升了5.1个百分点。这一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这一速度纵向来比也是较快的，从1978年的20.7:58.5:20.8，到1998年的12.9:53.5:33.6，20年间农业的比重下降了7.8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了12.8个百分点。2001年，山西三次产业结构情况进一步优化，一、二、三次产业构成演进

为9.7:51.4:38.9,而全国水平为15.2:51.2:33.6,山西农业比重比全国低5.5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则比全国高5.3个百分点。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业人员比例也发生了积极变化,由2000年47.6:25.4:27.0,调整为2001年47.3:24.8:27.9,2002年进一步调整为47.3:24.7:28.0。

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在所占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下降,而服务业则持续上升,并超过工业成为主导产业,这是三次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山西的三次产业结构情况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优于东部绝大多数地区,尽管我们并不能据此否认山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事实,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推动下,山西三次产业结构正在加速优化。

二是产业素质逐步改善。

产业素质低下是山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在新一轮结构调整的驱动下,全省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已经迅速提高到35—43%。山西产业素质低下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就农业而言,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全省以特色农业为重点的农业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特色农业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的比重在逐步下降,而以小杂粮、草食畜、蔬菜、林果业等四大优势产业为代表的特色农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三年来,特色农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提高到43%;农产品商品率由50%提高到58%;粮经作物种植面积比从

82∶18 调整为 77∶23；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从 37.8%提高到 42.8%；获得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增长了 10 倍，达到 200 余种，排全国第 3 位。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太行吕梁两山杂粮干果经济区和中南部果菜经济区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大县，10 万亩以上的水果大县 17 个(其中 20 万亩以上的 4 个)，10 万亩以上的蔬菜大县 14 个(其中新绛县无公害蔬菜达 23 万亩)，万头以上的养牛大县 16 个，10 万只以上的肉羊大县 7 个，20 万只以上的绒山羊大县 11 个。100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 34 个建成投产，占全国重点龙头企业的数量由 1999 年的 4 户增加到 2002 年的 9 户，销售收入超亿元的由 4 户发展到 12 户。特色农业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县域经济竞争力大幅提升，2002 年全省有 19 个县列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百县名单中，高居全国之首。第一产业基础不牢的问题，正在得到有效解决。

就工业而言，多元化的工业产业结构初步形成。首先是传统优势产业结构初步优化，产业关联度、集中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批调产项目相继投产见效，并开始发挥作用，使工业产品结构有所改善，运行效益水平明显提高。三年来，传统优势产业 64 个调产项目全部建成，其中 55 个达产达效，后续预备的 35 个项目也已开工。三年工业销售总额翻了一番，实现税收增长 1.7 倍。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由 1999 年 13 户增加到 22 户，利税亿元以上的由 17 户增加到 32 户；工业重点调产项目对全省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到 30%以上。全省优势传统产业基本上形成了煤焦化、煤铁钢和煤电站三大产业链。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100 个高新技术项目有 75 个开工建设，其中 55 个建成投产，重点培育的新材料、生物制药、先进制造、环境技术、企业信息化等有了明显进展。全省高新技术产值 2002 年比 1999 年增

长6.3倍,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由2000年的2个发展到2002年的22个,已建和在建的75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有12个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1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5个国内领先,7个国内先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在全国的排位由1998年的28位上升到12位,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在全国的位次由21位上升到12位。全省工业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传统产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的问题已经有了明显改观。仅以2001年为例,由于工业结构的改善和素质的提高,全省工业经济效益在上年大幅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全年全省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275.22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实现利税144.91亿元,增长27.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06.92亿元,增长27.9%;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84.8%,在上年提高10.9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提高5.3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22亿元,比上年减亏1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额17.72亿元,减亏9.8%。经济运行效益的提高和全省工业素质的改善不无关系。据测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通过调产项目投产达效和新产品开发新增生产能力带来的增量占全省工业增量的30%左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新科技项目加入山西结构调整进程,以及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不断渗透,都使得全省工业产业素质呈现加速改善和提高的景象。纳米粉体材料、微硅机械、L-乳酸、大麻纺织品、现代中成药等一批高新技术产品迅速涌现并开始产业化、规模化。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型装备产业等初见雏型。有资料表明,在2001年的结构调整项目中,高新技术项目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传统项目也大都采用了信息控制

技术。

服务业的产业素质也趋向改善，发展速度加快。旅游产业发展较快，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旅游经济格局。全省有10个旅游景区被列入国家4A级景区，平遥古城、云冈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年间旅游收入年均增长35.8%，以旅游业、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达3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问题有所改变。2000年全省旅游总收入比1999年增长20%，2001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旅游总收入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0.04亿元，比2000年增长22.97%。2002年旅游总收入进一步提高到115亿元。辐射全省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各类城乡交易市场发展到2000多个，初具规模的连锁企业发展到32个；商品房销售额增长32%，有8个地市的住房二级市场相继开放；通信业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广电网已成为省内第二条大型信息通道。这一切都显示，尽管传统服务业仍然是山西服务业的主体，但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正在逐步改善服务业的整体面貌。

三是投资结构显著优化。

调整投资结构，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三年来，山西在投资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外延型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内涵型投资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一改以往主要靠外延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状况。1986到1999年间，全省更新改造投资增幅平均每年比全国低5.2个百分点。新一轮结构调整开始以后，这一局面彻底改变。2000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25.1亿元，增长8.7%。其中，更新改造投资完成110.8亿元，比上年增长29.2%，高出全国增速

15.3个百分点，是1994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重基建、轻更改的倾向得到初步扭转，更改投资成为全省增加投资的重点。制造工业投资完成86.2亿元，比上年增长43.8%。其中，轻纺工业增长41.9%；炼焦工业增长1.5倍；化学工业增长21.8%；冶金工业增长44.6%；机械工业增长45.3%。在投资投向结构改善的同时，投资主体结构也发生积极变化。在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仍然是主体，投资420.4亿元，但仅增长5.3%；集体经济投资增长则高达48.4%；城乡居民和个人投资增长27.2%，增幅分别比国有经济高出43.1%和21.9%。

2001年，全省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更新改造投资继续增长31.0%，比全国高出15.7个百分点，1—6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比去年同期增幅高出13.1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在去年同期增长75.4%的基础上，继续保持77.8%的高速增长；非国有投资增长33.3%，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出9.8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在去年同期增长51.5%的基础上，继续保持39.6%的快速增长；社会服务业投资和交通运输业投资增长1.1倍。另有资料表明，2001年全省调产项目中各地区项目的雷同和重复现象明显减少，非国有企业项目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了50%以上。2002年全省更改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增幅达23.03%，继续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分析资料表明，2000—2002年全省更改投资增速比全国高出17.6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改、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三年均为全国第5位，在全国更改投资比重从1999年的1.9%提高到2002年的2.9%。三年来非国有投资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年均增速达29.3%，比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出15.9个百分点。

四是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所有制结构趋于合理。

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山西经济低效、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山西经济仍然是以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为主体的结构，但是，经过三年的结构调整，民营经济已经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三年来，全省非公有制企业的销售收入、税收同步增长1.7倍，翻了一番多；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1999年的40%，提高了15个百分点。一批产品档次高、经济效益好的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做大做强。资产超亿元的非公有制企业2002年达86家，其中海鑫集团和安康集团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纳税超亿元。全省16个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是1999年的2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开始摆脱煤焦铁等资源依赖型产业，大踏步向旅游、商贸、房地产、特色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2002年达到60%。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市，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临汾市2001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达81.3亿元，增长25.2%，比全市经济增速高出12个百分点，占GDP的比例达到40%以上，提供的税收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25.9%。临汾市当年开工在建的15座125立方米以上的铁炉和19座45万吨以上焦炉项目的承担者，90%以上是民营企业。在晋中市，2001年上半年，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入库税金同比增长51.65%，占到全市税收总额的40%。晋城市2001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6亿元，同比增长34%，占全市GDP的比重达22%，全市民营企业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51个，占到全市百万元以上项目总数的76%，项目投资额4.9亿元，占全市项目投资总额的71%。在民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国

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重组稳步推进。2002 年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 12.5%,实现利税增长 25.2%。省属 64 户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进展顺利,12 户大企业实行了授权经营,其余企业分别进行了重组、下放、破产;组建了山西焦煤等 5 大集团;全省股份有限公司由 72 户发展到 124 户,上市公司由 13 户发展到 19 户。85% 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78 个企业的关闭破产项目完成了 59 项,其余也正在抓紧实施。

五是接续产业初具雏形。

新一轮结构调整启动,山西选择确定的 7 大未来接续和替代产业产业群的雏形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煤炭深加工的龙头项目——大同汇海 100 万吨水煤浆项目第一期工程 30 万吨已经正式投产,第二期工程 70 万吨 2001 年内建成投产,年产 400 万吨水煤浆项目暨 500 万吨水煤浆大同至塘沽管道输送工程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医药企业改制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行业资产重组、优势整合已初步展开,亚宝、康宝、太行、同领、侯马中药厂、桂龙、晋光等一批骨干企业经营形势良好、发展迅速;旅游产业开发取得突出成绩,绵山成为山西旅游的一面旗帜,平遥古城筹备上市,2001 年 12 月 14 日,大同云冈石窟继平遥古城之后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它景点也正在加紧开发;铝工业强势发展,河津铝厂、关铝集团、东方铝业、阳兆铝业电解铝、太原铝材厂铝材加工等项目纷纷启动;太钢 50 万吨不锈钢系统改造工程进展顺利;磁性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迅速,两年间已经争取到 9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项目;大量精密铸造项目展开与信息技术、高新科技的嫁接等等。这一切都显示,全省接续和替代产业已

初具雏形。

六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

在公路建设方面，三年总投资285亿元，一批经济大动脉和出省通道的建设和建成使山西省跻身于全国公路建设先进行列。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公路即将全线贯通，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200公里，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突破1万公里，8000公里县际及县乡公路改造全面展开。在电力建设方面，总装机容量达到1506万千瓦，比1999年增加342万千瓦，在生态建设方面，重点实施退耕还林、京津地区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太行山绿化、黄河中游防护林工程，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历史性改变。在水利建设方面，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三年累计完成投资68.23亿元，是全省历史上水利投资最多的时期；以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为标志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几代人引黄入晋的愿望变成现实；农村饮水解困工程成效显著，三年共完成农村饮水解困投资11.69亿元，建成饮水解困工程9731处，解决了353万人的饮水困难。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坚决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在注重增量发展的同时，狠抓存量调整，将淘汰落后与改造提高相结合，加大淘汰落后的力度，三年来全省关停、取缔、淘汰污染严重、技术设备落后的“五小”企业和设施2.4万多处；重点城市、重点流域、重点道路、重点旅游景区的环保力度明显加大，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太原、大同、临汾、长治、朔州等城市空气质量进一步好转，特别是省城太原空气质量二级以上的天数由1999年的45天增加到2002年的153天。这些重大基础建设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水平，促进和带动了全省的结构调整。

七是全省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发生了积极变化。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999 年 GDP 增长 5.1% 在全国排末位;2002 年全省 GDP 增长 10.8%,比 1999 年高 5.7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在全国排第 8 位。人均 GDP 由 1999 年全国第 20 位上升到第 17 位。二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2002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实现 292.4 亿元,增长 20%,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8 个百分点。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234 元,增长 15.6%,在全国的排位也由 1999 年的第 31 位上升到第 24 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150 元,增长 9.9%,由 1999 年的全国第 22 位上升到第 18 位。可以说,三年全省住房结构战略性调整比较好地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综上所述,山西三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这种成效的实质,突出地表现在通过调整山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某些根本性转变。在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共同作用下,全省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明显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成效表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调整目标顺利实现。

二、各地市结构调整的典型经验及其评价

在我省近些年尤其是近三年的结构调整中,各地市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和经验。认真总结并推广这些做法、经验,有利于全省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

典型经验之一:狠抓环境创新,力促结构调整。

环境问题是事关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的重大问题,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环境创新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抓,各地市也都把创新环境、优化环境作为吸引项目、吸引投资的头等大事认真对待,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结构调整的进展。纵观全省,在环境创新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市主要有长治、运城等市。长治市响亮地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市委、市政府从抓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抓起,抓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从转变工作作风抓起,抓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转变政府职能抓起,抓环境创新的落实,围绕优质配套的设施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优惠宽松的招商环境、优良稳定的治安环境、优雅高尚的文化环境、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六个方面,创造全省第一、全国一流的全优环境;建立自逼机制,推行公示承诺,接受公众监督,下放管理权限,改革审批制度,减轻企业负担,取消123项行政审批和收费项目,在市财政财力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将八户企业的附属学校、幼儿园收归政府管理。经过几年的努力,长治市整体经济发展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对市场要素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先后有美国康道宁公司、香港新世界集团等国际大财团、大公司以及深圳南方建筑集团公司、山西天顺达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山东、广东、浙江等地的一大批企业和众多投资者前来洽谈投资建厂事宜。创环境创出大效益,2001年,长治市争取和引进各类资金已到位的就达58亿元,13项重点工程和922个投资30万元以上的项目顺利启动,既有效地推动了全市经济增长,又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结构调整的进展。

运城市万荣县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仅用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投资几千万元、目前国内最大的高科技恒磁

企业，创造了同类项目建设的一个奇迹。据说，投资者和技术持有者原本并没有考虑在万荣县投资建厂，但为了引回这个项目，万荣县委主要领导数十次赴北京、上运城，硬是凭着一颗真诚的心感动了“上帝”。在项目建设中，他们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县里专门派一位负责同志坚持吃住在工地，随时为项目建设提供协调服务。通过恒磁项目的建设，万荣县不仅创造了“恒磁速度”，而且取得了一种“恒磁效应”。由于软环境宽松，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先后有 30 多个国内企业和团体来万荣考察，洽谈合作办厂事宜。一个时期以来，又有西安科技大学的树脂降解薄膜高科技项目落户万荣；中鲁集团投资 1400 万元，在万荣建立了分公司；江西萍乡钢铁厂投资 2300 万元，与万荣县鑫峰煤化公司合作建设了 27 万吨的精煤生产线；华康公司投资 5280 万元的中药现代化企业正在建设之中；三九集团、山东五矿公司等，甚至菲律宾、荷兰、台湾的客商都准备投资万荣。

长治和万荣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竞争，不管是人才的竞争，还是科技的竞争、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环境的竞争，而且主要是软环境的竞争。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人才可以引进人才，没有技术可以引进技术，穷可以逐渐变富，落后可以追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本地的人才、资金、技术都会流失，富裕也会变成贫穷，先进也会沦为落后。有人说，山西经济落后主要是基础设施落后、地理位置不好，不“东”又不“西”，这些都是缺乏根据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山西基础设施环境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但经济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明清之际，山西仍然是那个山西，既不“东”，又不“西”，但却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所以说，山西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环境问题。只有解决好环境问题，山西的结构调整才有希望，山西的经济才有希望。

典型经验之二：开展资本运营，促进结构升级。

资本运营是现代企业运行的高级形态，是实施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手段。不经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资产重组，山西结构调整就可能永远处在一种调而不动、调而不优的状态之中。在这方面，运城市无疑走在了全省的前面。

资本运营就是指把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纳入价值资本的运行轨道，通过市场流动重组，实现资本的增值。我国国有资产之所以低效，就是因为缺乏流动性，国有资产要搞活，首先就必须流动起来。运城市较早的认识到这一点。早在 1995 年，他们就明确提出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活化存量资本，加快资产重组，本着“发展一批、挽救一批、调整一批、淘汰一批”的思想，重点一手抓优势企业，组建企业集团；一手抓亏损微利企业，实现资产重组。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多种各具特色的资本运营、资产重组模式，诸如南风化工集团的低成本扩张聚变模式、制版集团的资本输出型克隆裂变模式、关铝集团的千斤顶模式等等。大规模的资本运营、资产重组，壮大了运城的优势企业。南风集团通过持续七、八年的四次向外扩张，成为国内洗涤剂行业的排头兵。芮城制药厂从一个净资产不足 1000 万元的县营小企业，依托“宝宝一贴灵”的品牌优势，实施资产重组，收购三个破产企业，控股一个亏损企业，又在省内联合七个制药厂，一跃成为山西最大的药业集团——亚宝药业集团。制版集团则通过在沿海地区设立分厂，收购控股 10 个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0% 以上，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现在看来，在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工业产业素质、结构层次、扩张能力、竞争能力、现代企业制度水平等等方面，运城市都走在了全省的前面，成为全省的工

业大市、经济强市。

大同市是近几年来资产重组较为活跃的地区，他们通过租赁经营、整体出售、分拆出售、联合经营等渠道引进资金 3.63 亿元，完成了对 13 户企业的资产重组，有效地盘活了资产存量，较好地缓解了职工下岗、生产下滑、企业亏损等一大堆难题。比如，五台化肥厂出资 120 万元，租赁大同工农化肥厂，不仅解决了 800 名职工的就业问题，而且还投资 8000 万元，使该厂尿素生产能力由 3 万吨增加到 11 万吨，增加产值近 1 亿元，每年增加税收 400 万元。天津普雷特国际商品公司与英国 CM 公司合资，出资 210 万元，收购红旗水泥厂铝矾土生产线，组建了大同硅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先后投资 100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生产高级复合耐火材料，年新增销售收入可达 5000 万元，新增税收 500 万元，创汇 600 万美元。大同一电厂、炭素厂、大同县工业硅厂则以有效资产折股组建了晋能大同公司，并引进资金 9000 万元，扩大工业硅和电极产品的生产规模，并计划培育上市。

山西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以增量结构的调整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存量结构的调整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头戏，也是难点所在。如何以少量的增量投入带动大量存量结构的调整，是山西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运城和大同的经验启示我们，资本运营、资产重组是一条以增量带动存量高效调整的路子。有人认为，资本运营是企业经营的高级形态，只有发达地区的大企业、大公司才能运用，在山西没有搞资本运营的条件。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因为有了大公司、大企业，才有了资本运营的方式手段，而是有了资本运营的方式手段，才推动了大公司、大企业的迅速成长发展。山西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是劣势企业迅速退出、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迅速发展成长的过程。山西并不缺乏能够成长

为大公司的公司，关键是缺乏优势企业成长发展所必须的实施资本运营、资产重组的条件、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只有彻底改变陈旧落后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观念和方式，把管理的重点从实物资产转移到价值资产方面，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打破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局限，舍得让劣势企业退出市场，舍得让劣势企业的资产在省内、国内甚至国外市场上流动起来，山西的优势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结构调整才能向前推进和优化升级。

典型经验之三：发展民营经济，推进调整深入。

“九五”期间，受关闭“五小”的影响，我省民营经济经历了比较大的滑坡。但是，也恰恰是对于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刺激了我省一大批优势民营企业的发展。晋中、晋城、临汾、朔州等市的民营经济都已经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推进了全省结构调整的深入。

晋中市坚定不移地实施民营经济兴市战略，使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源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点。市县两级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比先进、找差距，大胆解放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创造条件，引导民营经济走特色经营、规模经营、科技创新的路子。目前，全市民营企业在焦炭、玛钢、锅炉、玻璃器皿、酿造等行业都已经形成了集群发展的态势，并加速向旅游业、农业产业化等领域扩展，药业、蔬菜、杂粮、食品加工等也都呈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民营企业家阎吉英投资开发的绵山旅游区，不仅成为晋中旅游的新热点，而且成为全省旅游的新热点。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把眼光投向绿色农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如今，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入库税金，已经占到全市税收总额的40%，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晋中经济的主要支柱。

临汾市则针对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重新制定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政策、管理、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实施"111"民营经济上台阶工程,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晋城市则通过大刀阔斧地开展乡镇企业改制,本着"能放则放、能宽则宽、放水养鱼"的原则,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一大批民营企业走出煤铁等传统领域,转向农副产业加工业、服装加工业、装饰装潢以及电脑网络、教育卫生等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有力地带动了全市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朔州市,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由 1999 年的 30%提高到了 2001 年的 50%,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全市地方经济总量的 65%以上。

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可以说既是山西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山西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晋中、临汾、晋城市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营经济能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能不能、敢不敢放手支持、扶持民营经济。山西经济结构要升级,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上台阶,而民营经济要上台阶,就必须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长治和万荣的经验,以及上述三市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创造环境的关键在政府,只有政府创造更好的环境,人民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典型经验之四:发展非煤接续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煤炭资源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系列化,是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思路。但是,煤炭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有挖完的时候。山西经济发展必须在非煤产业上做文章,这

是山西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这方面,阳泉为全省进行了可贵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阳泉是山西最早探索发展非煤接续产业的城市之一。早在1985年,他们就提出了"三转三结合"的调产思路,即"地下转地上,地上地下相结合;采掘转加工,采掘加工相结合;低档转高档,低、中、高档相结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进一步深入展开非煤接续产业的研究,明确提出了"三高三转"的战略,即依靠"高效能运转,高科技开发,高素质人才",促进"资源初级开发向深层开发转化,小型分散开发向规模集约开发转化,内向型开发向外向型开发转化"的战略,非煤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以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早在1992年,他们就抓住国家对煤炭企业的非煤产业发展给予贷款贴息支持的机会,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开发,多元发展,到1996年,累计投资非煤产业4亿元,分流划转3万人,安置待业青年1万人,非煤产业年生产经营收入达10亿元,利税和内部收益1亿元,初步形成了铝锭、磁材、建材、热电、矿机、轻工、商贸等7大产业群。全省新一轮结构调整开始以后,阳煤公司认真分析非煤产业现状,集中人、财、物精心培育铝业、磁性材料和新型建材三大主导产业。公司下属12个企业与国内11个科研机构、7个大型企业建立起了紧密的技术服务关系,促进了非煤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01年,非煤产业的年收入已达15亿多元,接近煤炭产业的收入,成为支撑公司经济的半壁江山。目前,阳煤集团非煤产业的三大主导产业已经形成气候,而且电解铝、钕铁硼、UPVC管材管件、加气砖被列入省潜力产品项目,铁氧体项目列入国家"双高一优"计划。

持续的结构调整,特别是非煤产业的迅速成长,使阳泉市逐步形成了煤炭产业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多元并进的产业格局。到

2001年，全市采掘工业增加值比重由1999年的62.5%降低到47.4%，原材料加工工业增加值比重由37.5%增加到52.6%。陶瓷、磁性材料、煤电铝、特种耐火材料、新型建筑材料五大新兴产业群体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20.81%。

煤炭产业是山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煤炭产业的战略地位不会改变。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山西经济的希望在非煤产业领域。尤其是对于一些产煤县及煤炭企业，大力培育和发展非煤接续产业，是事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山西许多地方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许多地方煤炭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但非煤接续产业直到今天仍然杳无踪迹，这是十分危险的。全省各地市、各煤炭企业都有必要借鉴阳泉煤业公司的经验，走煤炭产业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多元共进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对煤炭产业的过分依赖，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典型经验之五：坚持既定目标，实现率先发展。

近几年，全省各地市的统计资料表明，临汾市在GDP总量、增长速度及其他多项指标都居于全省前列。多项数字表明，临汾市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全面、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临汾的经验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整体环境的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坚持战略性调整，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信息化等方面。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委、市政府克服了换一套班子变一套思路的做法，始终坚持了既定目标，才实现了率先发展。

1998年，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临汾制定了“抓好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件大事，建设中西部强区”的总体发展思路。

临汾撤地建市以后，新任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并没有象许多地方习惯地那样，换一届班子换一套思路，标新立异，而是坚持两届班子一张蓝图，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既定的总体思路，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原有思路，把原有思路具体化、细分化，确立了“特色经济、结构优化、科教兴市、城镇扩张、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六大战略，用六大战略确保原定总体思路和目标的实现，全市经济呈现健康快速全面的发展态势。

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接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班子是关键。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哪里的领导班子过硬，哪里的发展后劲就大，发展势头就好。领导班子过硬不过硬，当然要看思想作风、组织作风等等多个方面，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么一种精神，即接力赛的精神。往往是换一届班子就变一套思路，后任否认前任，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思路出了一套又一套，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日复一日，面貌如故，最终是劳民伤财。许多地方，许多时候，经济落后并不是因为领导班子能力不足，问题恰恰出在缺乏一种接力精神。本来一任接一任的干下去，认定一个目标，必能有所收获，但继任者往往喜欢另搞一套、哗众取宠，以致好好的事业中途夭折。山西的结构调整，山西经济的跨越发展，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量的积累的历史过程，不是几届班子的事，而是几代人、十几届班子的事，它要求我们必须多一些接力干的精神，少一些出风头、抢功劳的念头。否则，山西的振兴永远也难有希望。临汾的经验好就好在它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接力干的榜样。它同时也说明，临汾两届班子接力干就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那么，我们各级班子一任接一任地接力干下去，山西经济的跨越性发展就不会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从山西三年来结构调整的进程和各地市创造的许多有益做法

来看，山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本经验，简言之，即项目是基础、改制是前提、筹资是关键、创新是灵魂，企业是根本、环境是保证。具体讲，第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选准操作推进的切入点；第二，准确地把握政府职能定位，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关系；第三，科学确定重点扶持的调产项目，创新政府资金的扶持方式；第四，围绕重点调产项目企业，集中改善软环境；第五，大力推进重点项目企业改制，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六，不断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坚持将做大做强贯彻始终。

三、结构调整进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及对策

三年来，山西结构调整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年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效和进展只是初步的，山西经济发展进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新型的产业体系和结构远未形成，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从三年结构调整的实际进程看，结构调整还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问题，影响到制约着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如，受能源原材料市场好转的影响，全省出现了资源性初级产业的复归倾向，“五小”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又有抬头迹象；经济增长遭遇环境容量的限制和挑战，生态化、清洁化生产和环境保护的任务极为迫切严峻；煤炭经济发展受水资源短缺与煤炭资源枯竭的双重制约，限制了传统优势产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优秀企业家不足严重制约着潜力产品做大做强；在潜力产品调整基础上行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日益突出等。这些突出问题，有些是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必然出现的问题，有些是结构调整本身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带来的。主要是:

首先,战略目标不明。

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结构只有常调常新,经济才能充满活力。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当今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的美国,最近的一轮结构大规模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第一阶段,耗时十多年,现在正处在结构调整的深化期。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从80年代末开始结构调整,到今天为止,第一阶段的调整任务完成仍然遥遥无期。那么,在山西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地区进行的结构调整,其长期性、艰巨性更是可想而知。这种长期性、艰巨性要求山西结构调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科学合理的、以一贯之的长期战略目标,否则,换一套班子,换一套主张,结构调整将永远难以做到常调常新,永远也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然而,山西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从80年代中后期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到90年代的“三基四重”,再到今天的潜力产品、接续产业,调产的口号一变再变,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却难觅踪迹。

目标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号召力。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要求必须树立这样一面旗帜,并且坚持不懈地举下去。否则,旗帜不举,方向不明,只顾埋头调整,不顾抬头看路,一味地跟着感觉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仅不会解决,相反,还有可能越调越不合理。我倒并不以为不事先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山西结构调整就不能进行。相反,在结构非调不可,不调整,山西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不调整,山西经济就无法养活山西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先行动起来,“先打枪、后瞄准”。但是,在结构调整已经进行了十五、六

年，新一轮调整也已经进行了三年的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树立起这样一面大旗的时候了。为此，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1311”规划的意见》。但是，“1311”规划只是全省“十五”期间的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规划，还不能算是旗帜。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三、五十年内都必须以一贯之坚持的战略原则和方向。这个战略目标，既要符合山西经济发展的实际，又要顺应全球性经济发展、升级的历史潮流；既要立足于山西，又要体现全球性视野和眼界。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结果以及与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交流，我认为，山西结构调整的长远战略目标应该是：从产业结构讲，是构建“四化一高”的新型产业体系，即构建一个一体化布局、特色化发展、生态化、知识化主导的综合高效的新型产业体系，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和国际影响的“四大产业基地”，即清洁高效能源基地、新特材料基地、特色机电产业基地和黄土高原绿色产业（旅游业、中药材业、生物制药、绿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业、环保产业）基地；从所有制分配结构讲，是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混合型、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是几年的事，而是几代人、几十年的事。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要实现这一长远战略，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都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都必须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勤奋工作、踏实奉献的精神。

其次，整体环境不优。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竞争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整体环境的竞争，哪里的经济发展环境好，哪里吸引到的市场要素资源就多，经济发展就快。

反之,吸引到的市场要素资源就少,经济发展就慢。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全国的经济位次不断下滑,原因很多,但归纳为一点,就是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不良。环境包括体制机制环境、思想观念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等。环境不改善,山西的结构调整就不会有大的进展,经济发展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为此,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省委、省政府尤其强调环境创新,把环境创新作为全省五大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实践情况看,许多地市也都把环境创新作为结构调整的一个关键环节来抓。可以说,经过几年的结构调整和环境建设,各地市在环境创新方面都有所行动,有所收益。但是,就全省范围来讲,环境创新的整体进展和成效还很有限,整体环境不优仍然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

据有关专家测算,20 世纪 90 年代末,山西省的市场化进程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在第 20 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尽管从 80 年代初的 20% 以上下降到 90 年代后期的 10% 强,但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周边省份,仅仅低于内蒙古,同陕西处于同一水平。根据对进口比率、出口比率、对外借款比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四项指标综合测算的结果,90 年代中后期山西经济对外开放率仅为 2.3%,位于第 25 位。1999 年,山西共有“三资企业”96 家,相当于河北(659 家)的 13.57%,山东(1625 家)的 5.9%,河南(406 家)的 23.65%,与陕西(112 家)相当,但比陕西还少 16 家。近两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2000 年,外商直接投资山西的项目为 71 个,分别比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少 24 个、421 个、144 个和 166 个,居全国第 25 位。

这一组数字表面上反映经济指标的差距,但隐藏在背后的却

是经济发展环境的差距。可以说，几年来，在环境问题上，我们还是说的多、做的少，写在纸上的多、落实在行动上的少。山西的整体经济发展环境相对弱化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各地市反映的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诸如财政收支困难问题、人才资金不足问题、后备项目缺乏问题等等，其实都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环境吸引市场要素资源的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山西的结构调整就没有什么大希望。

环境当然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但我认为，山西的环境问题主要出在软环境上，软环境的问题则主要出在各级政府身上。要解决山西的环境问题，必须政府做文章，必须政府在政府自己身上做文章。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把管理的重点由微观经济管理转换到宏观经济管理、监控、指导等方面，由直接管理模式转换到间接管理模式；由经济管理型政府过渡为经济管理服务型政府，最终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寄希望于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在短期内扭转山西经济发展环境弱化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应急之策。一是借鉴长治市、万荣县环境创新的经验，省政府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环境整治工作领导班子，负责全省的环境整治，收集相关信息，并形成一套稳定的工作责任机制和奖惩机制。二是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分析评比会等。比如，万荣县的环境创新经验就值得全省学习推广。三是开展全省范围的规章制度清理工作，清理废除所有有碍环境优化的陈条滥规。四是大力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五是对潜力产品、标志性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监控，试行一站式审批、限期审批等新的审批模式和程序，取得经验后，迅

速推广。如果说调产工作切不可急功近利的话,环境创新工作,则必须有一种只争朝夕、分秒必争的精神和态度。

再次,结构调整眼界不宽。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意味着市场要素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分配;知识经济的飞速崛起意味着知识资源、信息资源、高新技术人才资源而不是传统的物质矿藏资源,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加速则意味着技术创新和知识转化能力成为决定经济竞争力的第一要素。这一切都意味着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面对的环境与前些年相比已经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新一轮调产必须放眼世界,着眼未来,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和未来学家的思维。但是,从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实践情况看,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调产的思维还过多地局限在资源性产业上,尤其是过多地局限在煤、铁、铝等不可再生的资源性产业上,对非资源性产业基本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投资也过多地投向物质生产部门,而对知识产业、信息服务产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入严重短缺。有资料表明,在全省各地市确定的400多个潜力产品中,煤、焦、铝、钕铁硼等资源性产品,就占据了大部分。有的是几个地市争上同一项目,有的是一个地市争上几个同一项目。而且加工度并不深,产业链条并不长。潜力产品庸俗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照此以往,山西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经济发展的颓势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变。因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资源性产业将日益成为知识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附庸产业,而以资源性产业为主体产业的地区,也将日益成为知识、信息、高新技术产

业发达地区的资源性产品供应地和非资源性产品的销售市场。

我们应当明白，靠资源性产业，山西无法实现跨越性发展。资源再丰富也有挖完的时候。有资料表明，我们已经动用了山西煤资源储存量的近一半，许多地方比如大同、西山、阳泉、汾西等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有一些矿煤炭资源已经完全枯竭，还有一些矿处于资源枯竭的边缘；不少地方煤矿的资源也已经枯竭或近于枯竭。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地方的接续替代产业还是一张白纸。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山西的结构调整，必须放宽眼界，把眼光从山西移向全国，移向全球；从资源性产业移向非资源性产业、知识信息产业；把资源性产业的优势与全球性资源嫁接，把发展资源性产业的眼光转向全球市场。

当然，这决不是说产山西不能发展资源性产业，而是说要把结构调整的精力、把发展资源性产业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市场要素资源的更大一部分，放在非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上。山西的结构调整如果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产业、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上；如果不能形成新的技术、知识储备，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如果不能把高新技术与传统资源性产业充分嫁接，积累新的技术开发与投入能力，那么，山西的“边缘化”的情形也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发展的惨痛教训。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明摆着的：一是要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山西关闭“五小”的范围应该比中央划定的范围更宽些，力度更大些。要研究和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补偿政策，支持鼓励纯粹从事资源开采、挖掘的“五小”企业甚至“五小”范围以外的企业关闭、转产；二是制定全省矿产资源开采的有关规划、政策，实行限量开采、递减开采、保护开采；三是制定全省资源性产业发展政策，限制原始资源性产业发展，逐步稳妥地减少（即使不能彻底杜绝）原始资

源性产品出省，形成综合开发、高效利用的资源性产业政策；四是加大非资源性产业特别是知识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一套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制度和投资增长机制及相应的政策办法，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调产项目选择机制，保障知识产业、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产业在现有比例基础上稳步增长；五是出台山西的引才政策，从全国全球范围内，引进山西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以上这些才是山西结构调整的应有眼界和思路。

第四，改制重组不力。

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模式问题，或者是外延速度型模式，或者是内涵增长模式。结构调整也存在一个模式问题，或者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靠增量投入实现结构升级的目的；或者靠技术改造、资产重组等手段，靠存量资产的调整实现结构调整。山西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环境等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也无法支撑山西结构调整走上一条单纯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的增量投入调整型道路，而必须走存量资产调整型的结构调整升级之路。鉴于山西存量资产庞大而凝重，绝大多数资产的专用性强而流动性差，而且企业机制滞后、市场组织不完善，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的思路。几年来，全省结构调整也是照此进行的。这个思路是基本正确的，它有力地启动了全省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收效。但是，深入分析，可以说这个思路只执行了前一半，而忽略了后一半。即只执行了增量投入，忽略了存量调整。突出表现为重新项目建设，轻企业改制重组。而且，新项目布局还在一定程度地重复过去的错误。小而散、散而低的低水平重复和产业雷同，是山西经济的一大顽症，煤、焦、铁等企业几乎遍布全省

各个角落。但是，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包括铝、尿素、钕铁硼等，好几个地市都争着上，争着扩大生产能力。煤—电—铝一体化产业，新型磁材产业等，都是山西要发展的重点产业，是山西未来的支柱产业，但是，如果布局不当，遍地开花，就必然会重复煤炭、焦炭、生铁的老路。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增量投入仅仅是山西结构调整的引玉之砖，结构调整的重头戏是山西庞大的存量资产。没有存量资产的调整，山西经济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优化升级。结构调整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市场和政府的综合作用，促进劳动力、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进而从整体上实现结构的合理化、高效化。资产重组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低效益、无效益的企业、产业，调整存量资产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几年的调产实践中，全省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说，增量调整已经平稳起步，顺利入轨并初见成效，但是，具有战略启动意义的存量结构的调整还远远没有起步。一方面，许多困难企业还在苦苦支撑，大量优质资产低效运营，甚至闲置、浪费、流失；另一方面，不少有市场、有前途的企业、项目却因资本不足难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结构调整，不通过资产重组淘汰掉落后的生产能力，先进的生产能力就无法茁壮成长。可以预料，下一阶段，全省结构调整的重点将逐步由增量结构调整过渡到存量结构调整，产业重组将是下一阶段结构调整的主题。对此，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准备的关键环节就是企业改制。

企业改制是产业重组的重要前提，企业改制滞后也正是全省产业重组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对山西国企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调查的情况看，山西改制企业占到调查企业的 81.8%，这个数

字在周边省份中仅高于陕西，比河北的85.6%、河南的84.8%都低，远低于内蒙古97.2%的水平。更何况改制企业并不意味着都建立了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运行不规范的改制企业占了绝大多数。根据对全省企业集团情况的调查，26%的企业集团的母公司领导仍由行政部门直接任命，16.4%是由组织部门提交董事会任命。这种情况来源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股权结构。

资产重组的主体是企业。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是开展资产重组对企业行为主体的基本要求。只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资产重组才有可能真正启动；只有真正启动全省资产重组的进程，山西存量结构的调整才算真正展开；只有真正大规模展开存量结构的调整，山西才能真正走上结构转型升级之路，山西经济才能走上跨越性发展之路。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省企业改制工作的推进力度。一方面要抓紧未改制企业的改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未改制企业的改制一步到位；一方面要对已改制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真正建立起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运作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公司制度。

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不在企业，而在政府。政府必须进一步转换职能。政府职能转换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形成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产委托经营关系，把国有资产管理的重点从实物资产转移到价值资产方面。与此同时，要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产重组进行产业扩张，并鼓励和支持困难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实行产业退出，对省外企业、国外企业兼并收购省内企业大开绿灯。

总之，山西结构调整进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还有很多，但以上

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全省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才能进一步加速，全省经济的跨越性发展才是可以预期的。

四、结构调整的现实走势和未来前景

山西结构调整要想最终取得成功，就必须对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有一个准确、客观地判断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才能有效地推进山西结构调整的战略进程。

结合国内外结构升级的潮流，对比山西改革开放以来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认真分析和研究山西新一轮结构调整几年来的进展，我认为，在今后一个阶段，山西结构调整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

趋势之一：农业结构调整由数量型调整向质量效益型调整转化。

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旨所在。山西过去的农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是一种数量型调整，即通过调整粮经种植比例、提高粮经产量，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山西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粮食生产的优势条件，所以，进一步调整粮经比例，扩大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压缩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仍将是山西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的一个基本趋势。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农产品消费结构的升级，仅仅依靠粮经比例的调整已经无法保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农产品市场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日益加速，市场需求集中指向农产品的品质、特色、营养、保健、安全等功能。这就要求农业结构调整由向产量求效益转为向品质、质量、科技知识含量求效益。近几年，在我省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特色农副产品生

产基地和农业产业化龙头加工企业，就是农业结构调整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深化的表现，是山西农业向特色化、生态化、知识化、产业化发展的标志。山西尽管不具备粮食生产的优势，但是，小杂粮、干鲜果、草食畜牧却有着非常优越的气候资源条件，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随着农业特色化、生态化、知识化、产业化的加速，山西将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黄土高原绿色产业生产加工基地。

趋势之二：工业结构的调整由加减式调整向整合式调整转化。

工业结构调整是山西结构调整的重头戏。近几年山西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加减式调整，一方面加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一方面加紧技术改造和上马新的调产项目。下一个阶段，山西工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由加减式调整转向整合式调整，即转向整体工业结构的战略性重组、改造。这一趋势在近两年的调整中已经显现。大同市已有 13 户企业完成资产重组，引进资金 3.63 亿元。朔州市也通过对 4 户老大难企业的资产重组，解决了职工下岗、企业亏损等难点问题。可以预料，今后一个阶段，资产重组将是山西工业结构整合式调整的一个主要手段。而且，资产重组将突破省域界限，更多地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求工业产业的战略性资产重组。

趋势之三：服务业的结构调整将由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新兴服务业的培育和成长。

一个时期以来，山西服务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一直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水利设施、通信、城建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山西服务业仍然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远远不能适应山西工农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全省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都对服务业的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服务业为之提供高质量的现代化的服务。需求就是市场，就是商机。随着全省结构调整的深入，全省服务产业的升级也必将是大势所趋。从全省近几年结构调整的进展看，旅游业正在成为全省服务业发展升级的主要力量，邮电通信业的发展势头也较好，信息服务、法律咨询、会计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趋势之四：民营经济将成为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

国有经济战线过长、比重过大，是山西产业结构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结构调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在 2001 年确定的调产项目中，有 50% 以上属于非国有企业的项目。今后，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趋势在我省的一些地市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运城、临汾、晋中、晋城、朔州等市，民营经济的比重正在赶上全国水平，甚至已经超过全国水平，直追东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也越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可以预料，随着山西经济发展环境的整体改善以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深入，民营经济必将成为全省结构调整的一支主要力量。

趋势之五：高新科技产品、项目成为全省结构调整的热点。

传统产业与高新科技嫁接实现传统产业高新科技化，是全球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和趋势，也是传统产业形成核心竞争能力的必由之路。产品的科技含量低、附加价值差、市场竞争力弱，是山西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年的结

构调整,山西省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进程已经启动,高新技术产品和项目正在日益成为全省结构调整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山西争取到的国家高新技术项目仅有3项,但是,自新一轮结构调整启动以来,全省已经有9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专项示范工程和推进项目。在确定的37个高新技术调产项目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12个,国内领先水平的有21个,还有两个填补国内空白。在2001年确定新开工的30多个重点调产项目中,高新技术项目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其余传统项目也大部分采用了信息控制技术。这一切都预示着山西结构调整的高新技术化、知识化、信息化的历史趋势。

趋势之六:新的区域经济格局趋于形成。

多年来,山西的区域经济格局基本上是北强南弱的局面,南北两端差距较大。以1990年为例,南面的运城GNP总量只有约40亿元,与北头的大同市(39.6亿元,不含原雁北地区)相当,临汾GNP总量(36.9亿元)比大同市还少2.5亿元。一直到"八五"末,大同市都稳居全省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仅次于太原市)。但是,经过"九五"时期的发展,北强南弱的地区经济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地区经济格局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全省已有临汾、运城两市GDP总量超过大同市(含原雁北地区)。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1年,大同市GDP总量为190.2亿元,比上年增长9.1%;运城市GDP总量为195.9亿元,增长11.9%;临汾市GDP总量为192.4亿元,增长12.5%。运城市、临汾市GDP总量和增长速度超过大同市,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它意味着在山西经济总量中,传统的资源型经济(主要是煤炭、生铁)的地位正在日益降低,而非资源型经济(以运城市为代表)以及

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相对协调发展的经济(以长治市、临汾市为代表),其地位则迅速上升。大同市是山西煤炭资源型经济的代表,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前期,其经济发展都相当快。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种粗放式的资源型经济已经没有出路,必须培育新的接续替代产业。运城市是山西非资源型经济的代表,从改革开放一直到90年代初,在山西经济发展中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90年代以来,运城市持之以恒地狠抓结构调整,高起点发展工业,涌现出了像南风化工这样的旗帜性企业,最终由"农业大区、工业弱区",发展成为全省的经济强区。物质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断降低,非物质资源诸如知识、信息、人才、科技等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既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经济进步的标志。所以说,全省旧的区域格局的解体以及新的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也是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资源型经济(主要是煤炭,也包括铁矿)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每降低一分,就代表着山西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又前进了一步。当非资源型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的主体的时候,也就是山西结构调整取得重要战略突破的时候,就是山西经济摆脱落后,走向振兴的时候。

后　记

这本书成稿付梓之际，还有些话想说。首先要对刘国光同志为本书作序表示深深的谢意。

拙作成书的过程，正是三晋大地掀起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经过三年的努力，这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顺利实现了“三年初见成效”的目标。这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山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回顾这三年的工作，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分析面临的问题，规划未来的方向，是我萌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因。一方面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理论总结，是这本书形成的基础。书稿的主题——经济结构调整，正是我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学习、思考和探索的初步结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生活领域里的一大主题，山西要想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花大力气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不应该是简单的适应性调整，而应当是战略性的和跨越式发展型的调整，必须以全球结构调整的特点、趋势为参照。否则，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结构调整。这是我在本书第一编重点探讨的命题。

有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目标，是山西结构调整的关键之所在。

甚至,目标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成败。在第二编,我试图为山西的结构调整寻求这样一个目标。

山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点调什么?怎么调?在第三到第五编里,我用较大的篇幅详细展开论述了这方面内容。

怎样才能保证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顺利推进?这些问题在第六编予以论述。

总结与展望是根据我对全省结构调整实践进程的认识及各地、市结构调整动态情况的了解,对全省下一阶段结构调整走势进行的粗略把握和预期。未来山西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围绕建设绿色山西、节水山西、数字山西、信用山西,为实现"五年变化、十年优化"目标打好基础、努力实现山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面对案头厚厚的一大摞书稿,回顾本书从构思写作以来自己的思考历程,我不得不说,它之所以能同读者见面,是我对山西、对山西这块土地的深情所使然。

我到山西工作八年,对山西的干部群众,对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亲切、深厚的感情。八年来,我和每一个普通的山西人一样,为山西的每一点进步兴奋、喜悦,为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忧思于心。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古代,山西始终是全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区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在明清之际,山西还是中国的一块富庶之地。明清时期的晋商不仅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域性商帮,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几大商帮之一,和闻名世界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荷兰商人等齐名。连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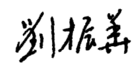
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每每因为晋商而“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遍地的旅游景点分布,丰富的自然资源蕴藏,辉煌的经商传统熏陶,相对优化的人力资本配置,潜在地成为山西发展经济的“先发优势”。然而,在过去许多年里,这种“先发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那么,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后发优势”来激活经济潜力呢?

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告诉我们,调整经济结构,是振兴经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出路。目前,全省结构调整发生了深层次变化,正由单个项目开发向建设工业园区拓展;由产品到产业逐次推进;由主导产业带动相关产业互动发展;三次产业整体协调推进。山西能源基地焕发出了新的勃勃生机,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中发展加快、质量提高,初步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正在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但凡著书立说,总须深思熟虑。这部书稿思则深矣,虑却未必熟。本书面世如能成为人们研究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引玉之砖,也算一桩幸事。

时值山西结构调整三年初见成效、山西人民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奋起直追之际,谨以此书与全省各级干部和全省人民共勉。



2003年8月